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戴厚英啊戴厚英


eBOOK
网络资料 非精英

前 言

吴中杰

1996年8月25日下午，著名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戴慧在上海寓所惨遭歹徒杀害。虽然本地传媒久久没有报导，但是凶讯不胫而走。当天晚上，我们刚从案发现场回来，问讯电话就接连不绝。此后几天，不断有朋友从本市、外地或国外来电来函，核实凶讯、表示悲愤、委托代向死者家属慰唁。

大家都为这个凶讯所震惊。虽然，案件很快为警方所侦破，凶手亦被缉拿归案，但是死者已经不能复生，戴厚英再也不能写她的惊世骇俗之作了。

朋友们都想为惨死者做一点纪念性的工作。恰好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总编辑沈敏特兄来电要我和高云主编一本戴厚英纪念集，作为对死者的祭奠，于是朋友们分头撰稿，藉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敏特兄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80年代中期与我和厚英一起在汕头大学做过客座教授，大家常在一起用餐，一起散步，谈得颇为投契。后来各奔东西，也就相忘于江湖了。这次他听到厚英的凶讯后，为要托我代向戴家致唁，这才重新与我联系上的。出于对厚英的友谊，敏特兄决定不借工本，要在最短期间内，出版一本精良的纪念集。对此，我们当然尽力予以支持。

本书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悼念，而且希望能给以后的戴厚英研究者和当代文学史家们提供一份殷实的材料。

因此，本书组稿范围力求广泛。从厚英的大、中、小学同学，到她的前辈师长；从她青年时代的工作伙伴，到从事创作后的作家朋友，还有在汕头大学、上海大学执教时的同事，以及她的亲属，等等。各人所写的，是自己与逝者交往的一段情谊，是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个方面、一个部份，合起来则能反映出戴厚英生活的各个时期和她性格的各个方面。

我们历来评价人物，就有“面面观”之说，这是辩证的方法。盖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总是由多侧面多因素所组成，单从一个方面去观察，是难得窥见全貌的。若以一己的直感去论人，也难免有其片面性。倘只从道听途说来判断是非，就更具盲目性了。只有从各方面综合观看，庶几才能得见全人。戴厚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各方人士对她的看法很不一致。如果人们并不固执己见，或因他种原因而存偏见，则对她进行面面观之后，评价自会有所不同。

回忆戴厚英，难免会涉及她生前所遇到的一些敏感问题，因而，回忆者也难免会遭到非议。但我们认为，既然所涉系历史事实，就该如实写出而不应回避。我们大家所作所为，都应对历史负责。是非功过，让后人去评说。否则，就会如鲁迅所说：“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

高云和我，与厚英交往的日子虽然不能算短，但她的众多朋友，我们仍不尽认识，因而在组稿上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承左泥、李继宗、邓牛顿等朋友帮忙，扩大了范围，但仍有许多该组而未组的稿子，或已组而来不及写的稿子，只好有待他日补充了。

谨以此来纪念我们惨死的朋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复旦凉城宿舍

戴厚英啊戴厚英
吴中杰 高云

痛悼爱国的乡土作家戴厚英
——兼谈她在海外的言论
萧乾

代卓有成就并在创作上尚有极大潜力的戴厚英，就这么为一无耻宵小歹徒所杀害，面对她这猝然而至的无妄横祸，真不知如何下笔！

她不但曾经勇敢地描绘生活，而且还曾无情地剖析生活。

关于她的作品和她那极不平静的一生，日后必将有人去研究剖析。那对于了解七九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的图景，会大有裨益的。这里，我仅就同她相处过的一段日子，写写她的一个侧面，供广大读者及研究者们参考。

先从她同一位外籍华人学者的一段谈话开始。对方说：“我们可以有不爱国的自由。投生为中国人根本便是一件非常偶然又不幸的事。因你要为这个难搞的国家，交付出一生一世，去背那沉重的包袱。生命何其短促宝贵，我们有权寻求个人的理想和幸福。”

戴厚英对这番劝告的答复是：“我自小在乡间长大，常想到乡亲父老们至今日才解决了三餐温饱问题。我无法不去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前程，我卸不下关怀祖国、同胞命运的责任感……”（见香港《明报》，1986年3月24日，“比利时通讯”。）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个剪报使我记起在港时戴厚英与我和文洁若的一段谈话。她说，临出国之前，她对领导说：“这次去港，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又说：“在国内我批评起来绝不留情，可是一出国门，我绝不说祖国一句坏话。”

当时在香港及新加坡都有不少人以为中国还在闹文革。这位由于《人啊，人》而狠挨过——而且刚挨过一顿狠批的戴厚英怎么介绍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现实呢？

她说：“文学观念的另一重要变化是，作家们从言论一律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发出个人的声音。从朦胧诗的兴起可以看到这种个性的解放。没有了‘三结合’，作家们不再按照旁人的意图写作。于是，就涌现出大批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另一特点是在艺术方法上，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一些作家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主观世界，表现心灵。”（见1986年4月20日香港《明报》）。

她还在香港文艺界为她举行的以“中国新时期文学观念之演变”的座谈会上说：“现在由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中国大陆遂能一下子涌现不少敢于表现自我的作家。她认为中国大陆文坛最重要的突破，一是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同时出版事业的循此发展。这样，作家们的腰板就硬起来。”（见《星岛日报》，1986，4，27）。

当时，香港曾有出版社在未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翻印了她的《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并将后者的“后记”抽掉，她表示不满。她说在国内出版时，除了错别字之处，都一字未改。

她甚至大声称誉近十年的文学界的复兴时期，出现的作家和作品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是很突出的。她说：“目前大陆不存在对文学界的压制。作家也成熟了，对批评不再感到害怕。作家成熟了，大多数人都敢于对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大陆的读者也是世界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他们都关心作家的命运。某个作品一受批判，许多人立刻抢着看，主要是做出自己的判断。”

（见《戴厚英：我并不反叛一切！》，作者王令，见香港《明报》，1986年5月6日）。

当有人肆意恶毒攻讦大陆文艺界时，她只慨叹说，“这些人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黑暗与光明，现实与理想，绝望与希望，都是一个铜钱的正反面。之所以看到黑暗，正因为心里怀着光明。”（见1986年3月7日，香港《信报》。）

为了不当“文抄公”，戴厚英的海外言行录就此打住。这里，说说我与洁若同这位作家相处的一段日子。

香港中文大学曾聘我为该校的1986——1987年度“黄林秀莲学人”，因此，我曾与文洁若在港岛小住。当时，戴厚英恰好也在中大讲学。校方就指派能干的吴瑞卿专门接待并陪伴我们三人。不但三餐共桌，甚至猴子山也是一道游的。

事毕，我们三人又同时接受了广东省政协主席吴老南生的邀请，在广州同一宾馆一道过的年。吴老知潮汕是我的第二故乡，又邀我们一道作岭东之游，并欢庆灯节。分手后，吴老又派车送我们经漳、厦而抵我的第三故乡闽侯。

说话快十年了。这些年，戴厚英没来过北京，我则去年四月才去沪滨小住，在竹林府上与她重逢。然而她常有信来，时而寄自皖北她的老家。

用“乡土”形容作家始自台湾。大陆似乎不兴这个。然而如果限我用两个字来形容戴厚英，我别无选择，她是那样深深扎根于故土的作家，只要学校一放假，她就必然回安徽老家。遇害那天上午，她刚从淮北回沪。她的独生女儿醒醒在美国定居了，尽管她深深爱着自己在艰苦岁月中拉扯大了的这位女科学家，然而，她更恋着她的故土。

美国再阔气、再舒适，她却属于安徽。在那里她深深地扎了根。

1985年戴厚英在芜湖出版的文艺双月刊《大江》上，写过一篇题名《归去》的小说。她仿照陶渊明把生活概括为“形”与“心”，说“形要吃喝玩乐，心要充实高洁。心既以形为主，又为形役。主和役总搞不好关系，于是，烦恼不断。”

她还曾刻过一个闲章，上书“我手写我心”。

是啊，“乡土”之外，她还是位真诚的作家。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日

哀戴厚英

黄秋耘

《广州日报》《粤港信息时报》等传媒报道，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于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寓所与其年仅十九岁的侄女戴慧同被歹徒杀害，享年五十八岁，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悲痛。

我和戴厚英虽然不算深交，但也相处二十余年之久，她的每部长篇小说，例如《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等，在出版前我都读过，她的才华和坎坷经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有些人看来，她也许只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刺头人物”，但我对她的倔强不屈性格和泼辣文风倒是深表钦佩的。特别在杂文领域里，有影响的男作家不乏其人，女作家却寥寥可数，戴厚英的杂文，论世事不留情面，砭时弊常举类型，其勇气还在一些男作家之上，特别是远在像我这样平庸的男作家之上。她的死，确实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我还听说，戴厚英近年信奉佛教，她的居室经常香烟缭绕，木鱼声诵经声不绝于耳。她还长期资助一些贫困亲友，并经常回安徽故乡参加抗洪救灾，居然是一位热心而慈祥的女居士。想不到临近花甲之年，竟惨遭血光之灾，丧生于白刃之下。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写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是耶非耶？”若戴厚英者，虽不能称为烈士，至少也可以成为善人矣，竟遭此横祸。悲夫！

戴厚英的葬礼已于九月三十日在上海举行，巴金、萧乾、白桦、岑桑、叶文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都献了花圈。葬礼大厅门前立柱上悬挂着长达五米的挽联：

辞乡四十年，几番风雨，几番恩怨，犹有文章愧须眉，江淮自古生人杰。
断肠三千里，如此才华，如此柔情，竟无只手挡贼刃，南北至今诧噩音。
这样的评价，戴厚英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

贾植芳

家戴厚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又因为死于非命，社会上因此沸沸扬扬，一时间几乎成为人们所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我获悉戴厚英被害的消息，是在案发的第二天早上。是我的邻居，一位生物学教授特来告诉我的。我感到十分震惊，在震惊和疑惑中，我一直关注着这一事件，等着案情的水落石出。开始时，凶案还未破获，报端的报道又语焉不详。接着，文艺界的许多朋友相继打电话告诉我。吴中杰同志来我家时又详细地讲述了惨案的经过，许多天以来，戴厚英倒在血泊之中的场景，总是在我的眼前浮现，挥之不去。作为一个与她有过交往的朋友，我一直为她的惨死而感到震惊、悲愤和痛惜。中外作家当中，有死于非命的，也不乏自杀的，他们或为黑暗的环境所吞噬，或为殉情殉义，或为厌世轻生，但直接卷入刑事案件而惨遭杀害，以我的寡闻，在文学史上还是一个很特殊的事例。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教授，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又偏偏被当做谋财的对象而倒在残暴的屠刀之下，戴厚英的身份和她的死亡方式，形成了一个荒谬而令人触目惊心的对照。

因为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曾与社会脱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在八十年代初以前，戴厚英的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八十年代初期，我因为参与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撰工作，开始接触一些中青年教师。一天晚上，我在一位年青同事家做客，碰巧戴厚英也在座。经主人介绍，我知道她是复旦分校中文系的教师，与我也算是同事。当天我们只是相互寒暄了一阵，没有深谈。她给我的印象是颇热情，也较直爽，时隔不久，她送我一本她的小说《诗人之死》；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了交往。

随着与文艺界的朋友之间交往的恢复，我慢慢地从侧面了解到别人对戴厚英的不同看法，并知道了一些她在五六十年代的经历。记得在八六年的一天，我应邀参加在金山某宾馆召开的一个“国际汉学家会议”，负责会务的同志驱车前来接我，又顺道去复旦第一宿舍接了戴厚英，之后又来到虹口山阴路接另一位与会者，这位先生是现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和我也都是老朋友了。但那天他上车后，看到戴厚英也坐在车上，只与我招呼了一声就再也没有言语了。去金山的路程不短，在路上的一两个小时里，这位老朋友总是一言不发，端端正正地坐在车上，使我很感到纳闷。来到会址的休息大厅，我们一行便坐下休息。许多与会者已先到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不一会儿，坐在我身边的戴厚英就起身离开了，便有人前来与我打招呼：“老贾，你怎么和这个女人混在一起了？”我一看是位诗人朋友，他比我还年长，朋友们相互间难免开个玩笑。但看神色，这回似乎并不像是开玩笑，当我说明自己其实与戴厚英并不熟悉，只不过是同路赴会而已。老诗人听后，叹了口气：“这个女人好厉害的……”接着他对我说了些文革中的事我这才明白，一路上那位出版家朋友为什么反常地沉默。后来，我渐渐了解到了戴厚英的一些经历：她出身于皖北农村的穷苦家庭，是五十年代中期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的，当时属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所谓“红五类”学生，听说入学以后，以对她的一位提倡“文学是人学”的文艺观点的老师曾毫不留情地当众批判而著名，因而为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那位“好学生”所赏识，毕业后被分配到作协文研所工作，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风

浪，尤其“文革”中有许多老作家都领略过她的“革命行动”。也难怪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们对她至今还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历史的阴影当然不会轻易抹去，我很理解他们的态度，长期以来的坎坷不能不让人心有余悸和预悸。

不过，象我这种经历过长期的牢狱生活，几度在生死线上跌爬滚打过的人，对那些曾在政治运动中风云一时的人物，倒有另种眼光，那就是看他当初的行为是否出自真诚的信仰。虽然从历史的结果而言，对别人的伤害终究是一种伤害，但如果是出自真诚的信仰，毕竟与那些为了私利己欲而投机害人为虎作伥趁火打劫者有别，盲目的轻信当然需要严肃的反省，深刻的忏悔，以总结历史教训，但也不能完全无视当事人的那一份“真诚”，尤其对我的晚辈和年轻人来说，更应如此。因为人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是时代的产儿。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即所谓年幼无知，误入歧途者也。当然老朋友们对戴厚英的戒备心理，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在后来与她的交往中，我也总有某种程度的顾忌心理。因为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到底是在历史的曲折中往前进的。

后来，通过周围朋友的了解，并读了《诗人之死》之后，我从她与诗人闻捷的感情纠葛中，看到了戴厚英的另外一面，或者说她的本质，即她在文革后期的人生转变，这也开始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她与闻捷的相识本来就很有时代特色，一个是“反动作家”，是敌人；一个是监督者，批判者，但后来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的这段经历使我想起前苏联的二十年代“同路人”作家涅维洛夫的小说《第四十一》中的故事。通过对诗人经历的了解，她发现闻捷并不象当时对他的政治宣判所说的那样面目可憎，也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不共戴天。相反，她看到了诗人的真诚、才情和不幸，她由对诗人的憎恶发展到关心、尊敬，由同情、理解而萌生爱情，这种与当时政治气氛极不相容的感情，其实是一种人性的复苏，当时则被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遭到批判，被认为是“反革命对革命者的腐蚀”。闻捷后来的自杀同这份感情在当时所受的巨大政治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诗人之死给戴厚英的精神刺激很大，它促使其从过去所坚信的极左路线和教条中跳脱出来，开始意识到那一套政治理论的反人性、反历史和反社会的荒谬本质，《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的创作，正是作者从人性的立场对极左政治思潮认真反思的产物，是对这种祸国殃民的思潮的有力的反击，从这一点看，戴厚英是一个真诚的人。

再后来，她的小说在八三年受到了种种超出学术范围的非难、批判与围剿，但她在一阵阵的风浪中都坚定地顶住了冲击，没有背叛自己，表现了她敢作敢当的生活个性；又听说她所在的单位曾不准她上讲台上课，职称的评定也因此搁置起来，但她并不沉默，她据理相争，直言不讳。只是一段时间内，在各种文艺集会上不大见到她的身影了。八六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的步子加快了，才又常见她在文艺界的一些场合露面，有时她也来我家坐坐。因为某种顾忌心理，我与她谈话总还有些拘束，但我生性又是个放言少忌的人，所以这一本性总会时不时显露出来。记得有一次因为什么事情，戴厚英打来电话，说起她正在专心读佛经，并想进尼姑庵念佛诵经了此一生。我想到她在文革前后的表现，便不禁用玩笑的口吻说道：

“你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话一出口才后悔起来，心想这句开玩笑的话，或许会伤害了她，因为这等于揭开了她的旧的疮疤。但过后不

久，她又上门来了，送来了她新写的小说《脑裂》和新版的《人啊，人！》。似乎并没有在意我的那句笑话。从谈话中才知道，她早就离婚了，只有一个女儿，在美国打工留学，因此她每年都去美国探望女儿一家，以求得精神的慰藉。又说她准备多买两间房子，以便给来上海出差谋事的安徽同乡们过宿息脚，看来她的乡土观念很重，也很有人情味。

据我的观察，她除了因为写作而养成的吸烟成瘾这一生活习惯外，其它方面的生活都很朴素。而从近几年她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她读书很多，阅读面很广，写作也很勤奋。她的年龄并不算大，她的作品已在海内外有了广泛的影响，又正是创作的大好时期，本可以在文学上有重大的发展与成就，却不料遭遇到如此的修害，不能不令人分外地痛心和惋惜！

在我看来，戴厚英是一个真实的人。她出身于贫苦的农村家庭，所以天真地相信当时党的理论观点与方针路线的绝对正确性，相信党发动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文革”发生后，她曾真诚地相信“斗资批修”的必要，坚信非如此就会亡党亡国，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万人头落地”。所以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这种信仰的背后，有着很大的盲目性，因而她也伤害了许多不该伤害的人，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使许多人（甚至至今）都对她敬而远之，怀有敌对心理，但经过切身的的生活体验和理性思考后，她醒悟了，有了忏悔和反思。听说后来她曾当面向她的那位老师认错，为当年对“人性论”的盲目批判和给这位老师带来的伤害而表示歉疚。在这之后的风浪中，她能够坚持住这一经过理性思考而获得的信念，并始终刻苦自励，勤奋工作。她一生敢笑敢哭，敢怒敢言，敢作敢为与敢当，犯过错误，有过过失，但一旦醒悟却又真诚地悔过，在风浪中不动摇。她是一个直率、坦白、纯正的人。对于她敢于面对历史，勇于正视自己的失误这种坦荡的做人品格，又使我对她十分敬重。

她活着时是真实的，她的人生真实地折射着时代的种种杂色；她的死也是真实的，死的让人惋惜，让人痛心，也让人悲哀。醒悟后的戴厚英很有人情味，很重乡土之情，也乐善好施。家乡遭了灾，她捐资相赈；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她几乎倾囊相助；家乡来人，她不但热情相待，还积极为他们介绍工作。但恰恰是其中的一位受惠者，却对她见财起意见利忘义，残暴地杀害了这位真诚善良的女性，一位不乏才华的女作家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其实她十分清贫，据说凶犯盗去的寥寥几件项链手镯，也都是不值钱的仿造品，而且都是与她同生活，又一块被害的侄女的东西。

作为一个与之有过交往的朋友，我为戴厚英之死而痛惜，悲愤和震惊。自从惨祸发生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早已有写一点纪念文字的打算。但每当提笔，她那倒在血泊中的惨象总扰乱着我的思路，只得希望在情绪稍稍平静之后再动笔。前两天吴中杰老弟又前来，说是要相约朋友们编写一本戴厚英纪念文集，因为我与厚英也有交情，请我也写一篇纪念文字，期限又紧迫，因此，仓促间就这样信笔写来。这篇小文就权作为我对一位值得纪念的朋友的悼念文字吧。

厚英，你虽然不幸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你仍然活在朋友们的记忆里；你的悲剧性的历史命运，将连同你那些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生活感悟所写的文学作品，也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篇章而永存人间！厚英，你静静地安息吧！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中旬在上海寓所

关于戴厚英 钱谷融

厚英遇害的消息我是在美国听到的，当时我正住在芝加哥女儿家中，忽然接到方仁念（戴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从普林斯顿打来的电话，非常激动地告诉了我这个噩耗。她说是刚从无线电广播中听来的，中、英文电台都这么说，大概是确实的。果然，第二天英文的《芝加哥论坛报》上，以及晚几天收到的中文的《世界日报》上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据说凶手似乎是一个与她相熟的人，作案动机则不详。后来我的另一个学生夏志厚从计算机联网中搞了一份综合报道给我，我才知道她被害的详细情况。她竟会死得这样惨，凶手竟是她中学时代一个老师的孙子，还曾多次受过她的帮助，而下手竟会这样的残忍狠毒，真使人感慨万千，而又不知说什么好！

厚英是我的学生，但在班上我对她并无印象。我是在60年代初上海作协有名的四十九天大会上，她上台批判我时才认识她的。她在会上是如何批判我的，我已完全不记得了。当时发言批评我的当然不只她一个，她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其他人在发言中对我总还是以先生或同志相称。唯有她，却是直呼其名。当时离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还有六年之久。旧有人际关系中的礼数，还没有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所有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对于身受者的我来说更是不胜骇异。她上台批判我，批判的言辞再激烈，我的确毫不介意。因为我知道，在当时来看，我的确是该受批判的，她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的。而且，不管是她或者别的人，他们多半都会真的认为批判我就是帮助我，就是对自己教师的爱护和挽救。所以我确实丝毫没有责怪她们的意思。唯独对于她的声色俱厉地直呼我的名字，不免很不习惯。我觉得她是大可不必如此的。称我一声“先生”不见得就会于她的革命立场有损。而且，从帮助我改造的动机来说，反而易于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就连这一点，我后来也渐渐释然了。因为她毕竟太年轻了。

她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我是在81年春天在大连开会时，才知道有这本书的。有一位与会者手头有这本书，在熟人中传观着。他们从《后记》中知道作者过去曾批判过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有不少人知道她说的教师就是我，告诉了我这个消息。等我开完会回到家里，就收到她亲自寄来的这本书。以后她每出版一种新著，也大部寄赠给我。厚英是很硬气的，尽管知道自己过去错了，却决不忏悔。80年代初，她由一位当年的同班同学陪同到我家里来看我（这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跟我谈了这些年来她的种种遭遇，颇多牢骚不平之意，而绝口未提当年对我的批判。我倒颇欣赏她的这种态度。她能够跑来看我，就表明她心里还是有我这个教师的，何必重提当年那件不快乐的事，弄得大家尴尬呢？而且在这种场合，我们对这件事除了彼此说些谁都会如此这般的说一通的话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所以，采取心照不宣的办法是最明智的。正象她在《人啊，人！》的后记中，也无需就当年对我的批判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本小说本身就充分地说明了她今天的认识，这比用直白的言辞向我当面表白，要更为有力得多，不过，厚英有一次也曾当众婉转地向我表示过她的歉意。那是在华东师大出版社为推出近年来所涌现的华东师大作家群（除戴厚英外，还有沙叶新、王小鹰、王晓玉、格非、孙禹贡、赵丽宏、陈丹燕等）所创作的一批作品的新闻发布会上。厚英在会上说，她曾做过不少傻事、错事，做过的事总要受

到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譬如我对钱谷融先生的批判，尽管钱先生本人很宽容，我却好的、坏的报应都受到过了（大意如此）。从厚英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我和厚英一生的接触，大概只有上面提到过的那几回。噢，不，还有一次就是吴中杰兄在他的《忆戴厚英》一文（见《心中的坟》，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提到的我为厚英晋升副教授写评审意见的事。本来，我已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即使读了中杰兄的文章，对这件事，仍旧还是没有什么印象。中杰兄在文中对我颇多奖饰，据说厚英任教的上海大学校方原来是请某先生写评审意见的，某先生因怕触犯时忌，怕得罪厚英的对立面，不肯写，把材料退回上海大学，这才改请我来写的。上海大学之所以改请我来写，是否有它特别的用意，我不知道。就我来说，我为厚英写评语，而且作了肯定的评价，我觉得是既平常而又十分自然的事，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厚英从大学毕业后已工作了二十多年，书教得很不错，还写出了颇有影响的作品，有什么理由不让她晋升副教授呢？除了前面已提过的再加上这次为她写评审意见以外，我与厚英几乎就没有什么接触了。她所寄赠给我的许多作品，我也只读了《人啊，人！》一部，其余或者因为忙，或者因为收到后就为人借走，几乎都没有看过，所以对于厚英，我其实是了解得很少的。倒是最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这本厚英的遗著，包括高云、吴中杰伉俪所写的两篇情文并茂的回忆文章，我却是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了的，这才对厚英有了较多的认识，原来在我的印象中，厚英只是一个大胆泼辣的女孩子，涉世未深，说话行事，往往顾前不顾后，因此如她自己所说的做了不少傻事错事，得罪了不少人。我不很清楚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所熟悉的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对厚英几乎很少好评。我的这些朋友，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偏狭而不知宽容的人，我想厚英在文革中的一些言行，一定确有令人难以谅解的地方。现在厚英惨遭杀害，已永远离开了这个多事的尘世，我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今天也会在默默地哀悼着厚英的。读了高、吴两位的怀念文章，我才知道厚英竟是这样一位重情义、念桑梓、能赴朋友急难的赤心人。她对父母的孝顺，对兄弟和家人的友爱，对家乡父老生活的关怀，种种表现，都十分使人感动。她一生坎坷，特别在婚姻恋爱方面的遭遇尤其不幸，因而她的心常是寂寞和孤单的。“这种寂寞和孤单使她格外依恋童年生活过的故乡，依恋母亲。每年假期一到，便飞回母亲的身边。回去的次数愈多，故乡和亲人的份量在厚英的心里愈重。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使她烦心、犯愁。”（高云：《我和戴厚英的相识、相交》）1991年安徽发大水使她寝食不安，她奔回故乡，亲赴救灾第一线，到处呼吁，奔走募捐，在个人生活方面，她自奉甚俭。她的收入几乎全部用在了接济家人和帮助亲戚上面，包括杀害她的那个凶手，也曾不止一次得过她的赠予。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我才认识到厚英本质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村姑娘，在党的教育下，渐渐的革命化起来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于那几年正是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加上“四人帮”的肆意横行，她接受的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畸形教育，因此她的个性被扭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做了许多傻事和错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她才猛然觉醒过来，回复了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村姑娘的本真。她身上固有的美德与亮色，才冲破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的牢笼和心上的障翳，一下子突现了出来。令人万分痛惜、无限怅恨的是，她竟在这个时候惨遭一个极端愚昧而又凶残的凶手杀害了。唉，

真是不幸的戴厚英！不幸的中国的这一代！
愿厚英的在天之灵能得安息。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性格即命运——忆厚英

李继宗

是在住院治病期间得知厚英被害噩耗的。头几天妻子和好友担心我发心脏病，瞒着我。后来是一位不了解我和厚英关系的朋友来病房看我，才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当时心脏马上痛了起来，白天夜晚都无法平息，整整两个通宵没有合眼。五十多年相处的景象历历在目。从小学、初中、高中我们没分离过，大学她在华师大，我在复旦，虽不在一校却在一市，往来仍很频繁。毕业后又都在上海，这十来年她往在复旦宿舍，我们更近了。五十多年这么近的相处于她于我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她却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我怎能不伤心、不悲痛。痛定思痛，唯能写点文字以寄哀思。

小时候上学之前，听大人说我家东边北大街开杂货店的戴中华的二闺女很聪明，四岁上她爷爷就教她认字了。我六岁半那年，父亲把我送到高勋伯的私立学校读书，我和几个薪入学的小同学围着一张桌坐在最前面，不久我便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即位比我小一岁的就是戴中华的二女儿戴厚英，很快我也领略了她的聪明。一次教师在黑板上写了近百个字让一、二年级的同学认，我们都认不全，只有她一人全都认得了。老师很喜欢她，我虽也另眼相看，但不大跟她讲话，课后也不跟她玩。那时老实，不愿跟女孩子在一起。真正作为很熟悉的同学，还是到了解放后1949年秋我们一起转入南照读六年级的时候。

她仍然是全班和全校的佼佼者。在班上她的成绩总是前两名，而且能说会道，对不满意的人或事说起来尖刻犀利。六年级下学期全校举行一次演讲比赛，她是第一名，奖品是一个蓝布缝制的书包，上面还缝了一个红五星，她背在身上特别神气，不光同学们羡慕，走在街上也格外引人注目。

厚英的成绩虽好，但个性强，尤其嘴厉害，不让人，不少同学说她骄傲自满。所以人缘不太好，班上的干部、学校儿童团（少先队的前身）的干部就都轮不上她。她似乎也不稀罕这些。但对一些社会活动、集体活动，她还是很热心的，我们参加最多的就是在街上广播宣传和排演话剧。厚英演过的话剧有“赤叶河”、“大榆林”、“刘胡兰”、“白毛女”等。至今我还记得她演刘胡兰的情形。她的倔强、任性、敢作敢为的性格把刘胡兰演得很真实，很受观众的欢迎。这种参与家乡社会活动在我们这些老同学中真还以她做得最多，坚持的时间也最长。中学时代每当假期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排演一些小节目或搞其他活动。1955年，有几位小同学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面临失学的危险，暑期厚英和我等商量想个办法接济他们。我提议请镇上的票友邀请外集的票友联袂演一场京剧，把卖票的钱捐给他们。大家很赞成。我父亲和伯父是南照有名的票友，听说请他们唱京剧，劲头可大了，马上找到街上其他京剧爱好者，第二天就派人到霍邱县周集（离南用20里）邀请了几位票友，连同他们的行头很快来到了南照。没几天，一场在当地难得看到的京剧演成了。我记得演的剧目中有“打渔杀家”等。厚英和我们自然也就成了这场戏的后勤杂工和卖票、收票员。事后当厚英和我把不多的收入送到同学杨某家中时，无依无靠的母女俩热泪盈眶感激不已。

十年前，我弟弟继敏、厚英弟弟厚泉编写《南照区志》，时常得到她的关心和帮助。她阅读了全稿，并以读者身分写了一篇《读‘南照区志’》附在“区志”的后面出版。

小学毕业后，我们都考进了全县唯一的中学——颖上中学（仅有初中）。但第一年是在南照小学里读的。当时因为全县升初中的很多，校本部一下解决不了那么多教室和宿舍，也因为灾荒，困难的学生多，于是就在全县三个镇的完全小学里，设立了三个分班（厚英在自传中说是“分校”有误），由校本部和分班各派一名教师来管理，我们就是颖上中学南照分班。第二年分班撤掉，我和厚英等十来个同学一起冒雨步行了60里到县城里读书。这是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第一次出远门。60里泥路走了整整一天，衣服，被子都湿透了，却没一个人叫苦。厚英最小又最好强，实在没法的时候才雇了一个人帮我们挑湿了的被子。身上背的轻了她更来劲，一路说说笑笑，直到天黑赶到学校，这在今天的同龄学生中是难以想象的。初中两年高校60里，而后高中三年90里几乎每月回家一趟，全是靠两脚走。日后厚英遇到那么多的苦难，无论生活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所以能够熬得住、受得了，我想与那时一天走60到90里路的锻炼不无关系。

到了颖上中学后，经过测验按成绩编班。成绩好的在甲班，厚英、我和另一个分班来的Z都编在甲班。我与Z同桌，厚英坐在我们前面。很快大家熟悉了，随便了。但好景不长，不到两周我们甲班仅有的两位女同学被调到乙班，原因是女同学太少，离其他三个班又很远，她们活动不方便，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就在这短短的十来天，Z已在厚英的心中植下了情种，从此决定了他们俩十年的恋爱，七年的夫妻。

不在一班了，喜欢Z，想看她，怎么办？说来好巧。我们的教室就在女生宿舍大门外的左侧。厚英出出进进都能很清楚地看见靠教室门口第一排坐的Z。从此一有空隙她就坐在女生宿舍的大门口呆呆地看他，直到一年后我们换了教室止。这个秘密是厚英在大学里向我透露的。

大约在初二下的一天，学校来了一位据说是上甘岭的志愿兵战斗英雄，教导主任陪了他三天，天天让他给我们作报告，讲他们的英雄事迹，临走那天全校开欢送大会，厚英代表全校同学讲话表示感谢和欢送，又一次展示了她的文采和口才。她的讲话博得了阵阵掌声，尤其受到教导主任的赏识。事后我们听说那个志愿军并不是英雄，只是一名普通的转业军人，到了阜阳受到处分。同学们不再关心志愿军了，戴厚英的名字却在全校传开了。以后教导主任也更加器重她，后来我才知道从此他们结下了四十多年的友情。但是这位热情、乐观、没有架子、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教导主任怎么也想不到，44年以后戴厚英竟然死在他的孙子的刀下！

进入大学，南照在沪的老同学少了，只有与厚英同在华师大的蔡基元、交通大学的陈玉鼎和我四人。我们之间显得更亲密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四个人的家庭和个人的遭遇不尽相同但都受过这样那样的创伤。

大学时的厚英还是那样天真、单纯，常用她的小名给我写信，一句话一件事通报家庭或同学情况，每次来信都没有超过50字，有时她也会苦闷和迷惘。1958年下半年她告诉我父亲被划为右派，不久又来信说三叔所在供销社遭窃，领导怀疑他“监守自盗”，他便“畏罪自杀”。我当时感到这些事很奇怪。南照集包括周围的乡镇都知道戴中华兄弟三人是老实人。老大戴华堂安安分分当店员，从不限任何人有纠纷。老三戴洪九年轻，思想进步、政治热情高，当过南照工商联主任，工作积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因二哥被划为右派而被贬到乡下供销社当主任也无怨言，怎么能会“监守自盗”？再说他们父亲、厚英的祖父戴岐山是南照有名的“老先生”，家教严格，戴家

是全镇公认家风最好的几家之一。他们一家人在街上都很有威信，兄弟仨亲密无间，妯娌仨也象亲姐妹一样和睦相处，他们怎么可能会干出那种卑鄙勾当？果然不久厚英又来通报：小偷抓到了，三叔是冤死的。

说到老二即厚英的父亲，可以说是戴家的主心骨、领头人。他也是店员出身，南照集人都知道他是最有名的两个“掌柜的”（即会计）之一，既善于经营又肯于助人，为人开朗、和气，到我家总是称我母亲大姐，称我父亲三哥，我见面叫他二叔。他是南照集商家的代表，南照小学校董事长，为学校建设出过不少财与力。在政治上他一向谨慎小心，绝不随便乱说话，据说整风时一定叫他们大鸣大放，他只说了些统购统销中的问题，竟被按百分比补划为右派。一个集镇的小店员为了几句普普通通的言语要付出如此大的政治代价，承受如此沉重的政治责任，在安徽是司空见惯的。小小的南照小学就有几个人被划为右派，其中一人被逼致死。

面对这些情况厚英怎么能不苦闷，不迷惘，又怎么能理解呢？但她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基本信念一点也没有改变：党是正确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绝不能怀疑党。她照样向党交心，打入党报告。1960年3月当我把支部大会通过我入党的消息告诉她，她很快就来复旦找我，晚上我们就在校园边走边谈，兜了两个多小时，她向我倾诉了心中的苦闷。她既羡慕我政治上的进步，又为她不知如何才能解决入党问题而感到惘然。此时她父亲作为错划右派而被甄别。但她说组织上不了解安徽反右扩大化的实情，依然把父亲作为“摘帽右派”看待，要她正确对待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她确实在用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她丢下家庭的包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出色，并不时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她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成绩使她赢得了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机会。到研究所不久她向党组织打了入党报告。这以后的几年到文革前，是她最顺利的时期也是她对党最顺从的时期。

61年夏天我们另一位南照的老同学、好朋友顾怀宁来上海实习。他在安徽医学院学习，六年制比厚英迟两年、比我迟一年毕业。五年没见面了，这次相见玩得很开心、谈得也很痛快。7月24日，我们三人在锦江饭店西侧的和平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35年来我一直珍藏着，现在这张照片更加珍贵了。

谈起怀宁，厚英曾向我讲起十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厚英应邀参加在淮南市举行的淮河笔会，会议结束时市府要员接见与会者，就在准备一起赴宴的时候，怀宁来看厚英，厚英马上向坐在沙发上的市长介绍：这是我的老同学、贵市矿工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顾怀宁同志。怀宁马上把手伸到这位市领导的面前，但这位市长大人并不领情，对站在他眼前的外科医生不屑一顾，手动也不动一下，只是看着厚英而言它。厚英恼了，未等接见结束就拉怀宁走了。出门对怀宁说：“这顿饭不吃了，对我的朋友无礼，就是对我无礼，到你家吃饭去。”这件事弄得文联主席很尴尬，只好代市长赔礼，但最终那顿饭还是在怀宁家吃的。

这又使我想起一次上海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市府给她发来请柬，她也没去，就因为一位市领导毫无根据地说她是四人帮写作班骨干成员，而从未向她道歉。天不怕、地不怕、官不怕、权威不怕、显贵不怕——这就是戴厚英的脾气，戴厚英的性格。

厚英遇害后，我首先想到的向怀宁报信，在医院病床上写了封类似蝌蚪

文的信寄给他。不久我也收到他的信，原来他也是心脏病住院，偶尔在报上见到厚英的讣告，没等收到我的信就写信问我厚英是生什么病去世的，他根本不知道厚英死得那么惨。

“文革”开始了，她也跟着造反了。一天她与我的女友、日后的妻子孙庭桂来看我，在复旦大门口一见面就指着我叫道：“你这个老保，为什么不起来造反？怕什么？”当时对待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我跟她是没有共同语言的。6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到文化广场参加市委机关造反派批判曹荻秋的大会，我坐在最后排，渐渐听到女的喊口号声音很熟悉，仔细一看主席台上，站在麦克风旁的正是她。当时我想在这么大场面领呼口号，亏她能喊得出，后来我见到她曾就此事提醒她适当注意，她却不以为然，还是那个脾气。

“炮打张春桥”以后，她造反派的热情降温了。但是随着她和Z夫妻关系的绽裂，直到离婚那几年她是最痛苦的，抽烟、喝酒越来越甚。我去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次去都是我们一起动手在她的房间楼下“作协”的厨房里烧点什么吃。70年有一次我去，她说我们不烧了，到红房子去吃。红房子离作协很近，“文革”前上海人都知道红房子是最有名的法式西餐馆，刘少奇、邓小平都去吃过。到这样的高级馆子我还是第一次，但那时的红房子也大众化了。她点了很普通的两三个菜、一瓶啤酒，然后坐下就和我继续谈起来。谈她离婚后的孤独、苦闷，谈她不敢轻易回应友人的钟情，谈她与闻捷相爱而遭到的冷眼和刺激，她越讲越激动，她流泪了，哭泣了，全然不顾周围食客们的好奇目光。最后从她嘴里迸发出沉重的五个音节：“我也是人啊”。“我也是人啊”一句话象一把刀刺痛了我的心。那些显贵、权威当他们剥夺戴厚英的恋爱权、婚姻权、言论权、出版权，还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舆论工具，对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单身女子进行围攻批判的时候，他们是否也想到了戴厚英也是人啊！“我也是人啊！”这是哀求？还是反抗？控诉？二十几年过去了，红房子里这句话一直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她说出这句话的情景。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了，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也开始了。1977年11月至87年3月，我被临时借调到市委宣传部写批判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的资料和文章。厚英当时在原市委机关写作组接受审查。我们同在市委机关食堂吃饭，每天都会见面。经常饭后午休我到她休息的房间闲聊。她说，她明明只是在写作组外电影组参与审查电影，清查的工作队硬说她是写作组的骨干成员。是成员又是骨干！任怎么讲他们也不理睬，认定你是骨干成员，不是也是！竟然这么荒唐，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顶。她说一开始工作队要她到台上检讨，她上去了，“我不是写作组成员，更谈不上骨干，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他们生气了，发火了，她也生气了，发火了。

“你硬，我比你更硬，我什么也不怕。”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跟我说，他们查让他们查去，她一点也不管，现在空闲得很，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写写东西，她决定写本小说，已经写了不少，出版社也答应给出。一次在她作协的住房还把稿子拿给我看，大约6—7寸厚的稿纸，这是后来的《诗人之死》。

1978年，厚英从南照回来告诉我一件新闻：我们的老同学大黄回来了。这可真是一件稀罕事。二十多年谁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以为失踪了，还有人传说他已不在世了，这些年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干些什么？怎么回来的，我

让她好好讲讲。其实我不问她也是要讲的。原来这位老同学有一番传奇的经历。

大黄也是我们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从小热爱文学，能言善辩。1956年考进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据说57年大鸣大放讲了些有关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什么话就被划为右派，开除学籍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回南照后他不愿在亲友面前受辱，就偷偷地跑了。经过一番艰辛曲折来到长城脚下，凭卖苦力背石头挣点钱糊口，他虽然身高体壮，但这种差事实在太苦了，受不了，就转到陕北挖窑洞，起初当工头的雇佣，做最重的下手活，工资少得可怜，但他毕竟是知识分子，头脑开窍，窑师傅怎么挖怎么修的技术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快练得一手超过当地师傅的挖窑技术，他不再作帮工而是单干了，因为他的技术好，找他挖的人也多了。不知干了多久又思迁了，来到湖北荆门一带。那年头对一个身无任何证件的“五类分子”来说，要想合法地找到一份象样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倘若暴露了“右派”身份命运更糟，照样只能卖苦力，投到了一个马车运输队，先是打工帮别人赶马车，工头总是欺负弱者和外乡人，克扣他们的工资，动辄打骂，大家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工头以为大黄这个外乡人也好欺，对他蛮横无礼，哪知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刚当右派的时候了，多年来到处闯荡练就了一身钢铁筋骨和江湖气，早说想教训一下那个工头，这次机会来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打得他鼻青眼肿，甘拜下风，从此再不敢欺负外地人。这一架打出了他在运输队的威望，成了马车队的老大。此后，钱多了，买了马有自己的马车，又学会了一套驯服烈性马的经验，马车夫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这样一直干到77年他父亲听说可以给平反才把他从湖北找回来。这个传奇故事后来就成为《人啊，人！》中何荆夫一段经历的原型。

《人啊，人！》受批判的时候我正在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此时北京也在批判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我在党校看了这部电影（至今我也不明白这部电影的编剧有两人，白桦只是其中之一，而另一位同时又是导演，按理说这另一位既编又导的作者应负有更大的责任，可报上批判始终只点白桦一个，不知为什么）。一南一北，批判的都是“人”。讲人有罪，谈人色变，人只能是“驯服工具”，或是“牛鬼蛇神”知识分子的“人”仅剩下一张皮，贴到这里是牛鬼，贴到那里是工具的一张“人”皮！对于那些批判文章，我毫无兴趣。我的兴趣是搞我的专业，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为哲学发展提出问题。研究班里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商量决定学习结束以后以国内中青年学者为主召开一次“现代科学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讨会，表明传统的认识论已落后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总结和汲取现代科学的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83年5月，在桂林开成了。我带领复旦哲学系二名博士五名硕士研究生出席会议，并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了“关于现代科学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十条提纲，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理论界的“桂林会议风波”。会后这个十条提纲作为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否定反映论的罪状先后在中央党校内刊、中宣部内刊、国家教委简报及公开的报刊上批判，我也因此成了这次会议的发起者组织者而首当其冲。此时对厚英的批判已是尾声，她也轻松自由得多了。我在接受审查的时候她来看我，了解实情以后，她要我坚决顶住，不能检讨。但我毕竟不是她，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纪律的，党组织认为你错了，不检查是不可能的。在党内我作了三次检查，承认无组织无纪律，召开这样的

会没向领导请示，会后也未汇报，承认“提纲”是我主持搞的，研究生没有责任，全部责任由我承担。这件事直闹到年底才算了结。学校领导对我还算宽容，既没公开批评，没给我处分，也没撤掉我系副主任的职。后来厚英还常拿此事取笑我：你不搞人道主义也照样挨整。

四

86年厚英第一次到香港，回来后跟我大谈一通赴香港前的波折。

1985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学院分别发来公函邀请厚英赴港讲学，经过几个月的马拉松公文旅行，终于得到批准，同意出访两周。正当她准备启程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只能去一周，理由是浸会学院的邀请来不及报批，领导没有表过态，是下面负责人答应。厚英火了，这全是谎言。她从不认识浸会学院任何人，他们的邀请信也是被拆后给她的，并关照她不必以私人名义回信，表明这是公对公，并已经答应下来了。现在又说减去一周，不去浸会学院，出尔反尔不讲信义。她马上拿起电话给新来的市委书记打电话，决定不去香港了。拨了三次对方都说听不清让她重拨，她更恼了，最后由市委书记芮杏文的秘书接通以后，她象连珠炮般大发一通：“你们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不讲信义，你们知道这样会给国家的信誉带来怎样的损害吗？你们不守信用我还要守信用呢，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种事再次表明了对我不信任，官僚主义者怕我跑，我还怕他们跑呢！他们除了头上乌纱帽还考虑什么？我真要跑一个星期也太长了，一天就够了，我不想跑一年也跑不了，凭什么以为我要跑？了解不了解我……”秘书说“杏文同志知道你要去香港，可是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不知道。”“就请告诉他吧，我不去了，我要离开上海，你们这个上海，讨厌！如果没有人敢留我，我就到处流浪，我受不了这个气！”秘书答应向芮杏文汇报。“汇报了以后怎么办？研究研究吧，你们的辞典里除了‘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辞汇？”

挂上电话立即写了请调报告：“我从这件事上再一次感到对我的不信任。作为一个作家，我一向讲信义，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我不会。为此，我作了以下决定，一，不去香港讲学了，我并不想逃跑，也不想去那里拜干爹干妈，我是为公事而去的。这方面受到怀疑，我去干什么？二，坚决要求调离上海。古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对我如此不放心，我为什么要留在上海给领导添麻烦呢？”

她没有也不想考虑后果，她说：“逆来顺受的日子受够了，结果怎么样呢？过去指挥你批判张三李四的人，如今都象没事的一样反来指着你的鼻子：‘谁叫你批判张三李四的呢？’你要是反问：‘不是你吗？’‘好，我？我是那种人吗？’否定的声音比你大的多，你又要多一层罪。”

出乎厚英的预料、一夜之间事情就变过来了。第二天市教委党委和上海大学党委两位领导一起到她家，说芮杏文同志问了这件事，问题解决了，还是去两周。她与这两位领导进行了坦率的交谈，说党在这几十年犯过许多错误，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本来没有二心的人硬打出、逼出二心来。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肺腑之言。她的“二心”不就是被反复地打出来的吗？这样的人和事太多了。我们的领导是该吸取点教训了。

五

《人啊，人！》受批判后，她多次和我谈到家乡的教育太落后，城镇还好，农村更差，6—12岁的儿童中文盲半文盲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教育经费缺少，中小学校除简陋的教室和桌凳外，几乎没有其他教学设备，教师

只能靠一张嘴讲、一双手写。她表示将来一定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点力，决心退休以后回故乡办学。

1991年初，她又来和我谈支持家乡教育的事，说不能等到退休后，现在就着手干。她动员我和她一起干，我答应了，我说：“我只能帮你出点主意，你发动你的兄弟姐妹，我也可以发动我的弟弟和侄子帮你干。”不久她又和我商量搞一个计划，作为她准备争得热心人士支持的依据。她的支持乡村教育的设想分三个阶段进行。近期希望能得到一定数量的捐款，在三年内将颖上县南照区的南照小学办成一所初具规模和现代教育手段的实验小学。为此，除进行硬件建设外，还要借助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预进行教育思想和方法的改革，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上述目标如果得以顺利实现，远期，她打算选择一所中学加以扶助，使之与小学的实验相衔接，并探讨农村教育与农业技术改革和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水平相结合的途径，那时将争取海内外更广泛的支持和援助，比如同时在海内外捐款，联合同乡知识界人士建立教育基金，争取同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贫困的颖上县建设成文化之乡。

再远，也许就是她退休以后，希望能建立一所由她自己经营并亲自传道授业的学校。

在这前后，她对家乡，主要是颖上县的教育现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经过反复分析和实施计划所需要各项经费的核算，于1991年6月5日写出了一份“支持乡村教育的计划草案”，打印了一份给我，让我提意见。我当时认为办好这件事主要不在筹集资金和硬件建设，关键是师资质量和干部管理水平跟不上。当时的不正之风也是很不利因素。我曾经想在上海联系一所中学（比如复旦附中），帮助培训家乡的中学教师，每年从家乡派几位教师到上海来观摩实习。她表示赞成，还希望我去与复旦附中联系。不久，她又告诉我有一位台湾朋友愿出一万美元资助这项计划。就这样，凭着对家乡的深情，对农村贫苦孩子的热爱，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也凭着她全家有五位兄弟姐妹从事教育工作，还有那么多老同学在家乡的教育界工作，她信心十足，热情很高，相信她的支持家乡教育的计划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施。

可是，老天不帮忙。就在这时一场巨大的灾难降到家乡人民的头上了。这年五月以来，安徽连降暴雨，淮水猛涨，泛滥成灾。六月中旬，为保证淮河下游工业城市和铁路干线的安全，安徽人民又作出巨大的牺牲，在自己境内炸坝分洪，这样全省三、四千万人口沦为灾民，八成以上的土地受灾，经济损失上百亿，其中900多万人民倾家荡产，粮食绝收，房屋倒塌，财产被洪水冲走，几十万人被围困在洪水中，饱受暴雨和高温的煎熬。一向与父老乡亲结有深厚情感的厚英如何能忍受得了这场灾难的折磨。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办学，而是救灾、救人，拯救还处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的家乡人民的问题了。那些天厚英不断向我通报她所得到的有关家乡受灾情况，并与我商量我们能够作的事，最后她作出三项决定：一是由她立即起草一份呼吁书，以她、社会学家邓伟志和我三位老乡的名义寄香港《文汇报》刊登，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呼吁伸出援助之手，救助安徽灾民。二是从自己作起在我们周围群众中进行募捐，尽快将捐款送到灾民手中。三是她将自费赶赴家乡到受灾的第一线了解灾情并随时向国内外媒体通报，以求得到更广泛的同情和救助。

很快，这三项都落实了。她起草的呼吁书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这是全国第一份向国际社会发出呼求救灾的文献，也是最早向国际社会报导安徽遭受水灾严重情况的文献。事后她告诉我这份呼吁书发出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第二项，她首先自己拿出一千元赈灾，然后在她所在的复旦大学第一宿舍，逐户登门募捐，这在当时既没有任何先例，也没有任何别人提出过这种倡议，就我所知也是这场水灾中最早的募捐活动。当时有些不理解的人甚至以为她这位知名的作家干这件事似乎有点越份。但她并不以为然。事后厚英告诉我，当她将募捐的钱连同捐助者签名的帐单送到安徽驻沪办事处的负责人手中，请他们转交灾民的时候，这位负责人甚至不知所措，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似乎以为这位女作家有点多管闲事。厚英虽不快，但毕竟却一个心愿，别人不热情她也能理解，因为这毕竟不符合共产党的常规。不久这个常规也在全国打破，只是有组织地进行的。

接下来她要自费到安徽第一线去。她作了简单的准备就和一位中国青年报的女记者出发了，临行前还和我打了招呼，表示有事和我联系。

出于我的意料，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后来，我知道她从安徽回来，但仍不来看我，也不打电话来，我纳闷不知道什么原因。大约又过了一个月，一天我陪一位朋友去吃饭，就在离她家不远的马路上碰到了她，我马上大声吆喝：“你怎么啦，回来这么久为什么连电话也不给我打？”没等我把话说完她就用手指着我同样大声叫道：“都是你们共产党……”接着就在马路边上滔滔不绝诉说着去安徽的遭遇。离沪后她和女记者先到合肥，找到省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明此行的意图，希望得到各级党委组织的支持。负责人态度很积极，表示完全支持她的行动，并答应与她们一起去颖上，要厚英在阜阳等他。但厚英到阜阳并没有等到这位负责人，到了颖上也再没见到他。她并不在意这些，本来就是独立大队，在颖上，在淮河边，她走访灾民，了解灾情，亲眼目睹了家乡人民浸泡在洪水中的惨状。她感到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采访上，她要作更多的事，要直接参与各项救灾活动，这样“独立大队”显然是不行的，原因是整个救灾活动都是有组织进行的，特别是接待外宾（如联合国灾民署派来的人）、港台人士和向外发报导，都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她考虑再三。向颖上一位救灾组织的负责人提出，让她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以便于工作。她看到当时的许多工作很乱，工作人员素质低，缺乏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和能力，尤其是缺乏接待海外人士的经验而出现不少问题。她向负责人说，她到过国外，既懂英语，又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作为组织的正式成员，有个名义工作起来方便，也更有利于及时向国际社会报导安徽灾情的严重性，求得国际更多的援助。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善良的愿望和要求得到的回答竟是：我们不需要你进入我们的机构，至于你要向外报导，谁知道你会写些什么，会向他们提供些什么。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她没有依照自己的脾气给予还击，也没有争辩和解释，因为她来的目的都不是这些，而是对家乡人民的关注。她忍辱负重照样自己干，但是，她又想错了。她看到各种大报、小报、快报、简报等报道了很多有名的和无名的团体与个人如何捐献、救灾、关心家乡的灾情和情况，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戴厚英。这她并不计较，更令她不能忍受的是，她发现，她的一切行动都有人监视，特别是与灾民接触时总有人在旁边跟着。她的心终于冷了，碎了。她痛苦地哭了。她本以为在自己的家乡，许多

领导、干部又是自己的朋友、同学，可以无所拘束，她哪里知道在他们眼里，戴厚英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在马路边她无所顾忌地大声诉说了近一个小时，说着流着泪，后来竟失声哭了起来。许多来往的行人为之惊讶，以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有的还驻足听个明白。至此，我才知道她回来后不给我打电话的原由，就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而受到了牵连。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向我提起回乡办学的事了。

“性格即命运”，这是厚英的“自传”中的一句话。倔强、任性、桀骜不驯，疾恶如仇，刚烈的性格决定了她一生的曲折、坎坷。酸辣苦涩的命运，反过来又再磨炼了更强化了她的性格。她说“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这种性格既给我造成了错误和罪孽，也给我改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动力；既给我带来了痛苦，也给我带来了欢乐：既使我遭到许多人的怨恨，也使我拥有最诚挚的友谊；既使我屡遭挫折和失败，又让我一次次转败为胜、获得成功。”是的，她的性格确实有令人难以理解的一面。她讲话尖刻，我行我素，好报复，就因为一次在阜阳一位知己的老同学没有留宿她，她竟把气出在这位同志的丈夫身上，人家来沪登门造访，她拒之门外，还不将我的地址告诉他，让他也不能来看我。当然这些不足之处以后她都改了不少，特别是近几年拜了师，皈依了佛门，天天念佛经以后，看破了红尘的一切，不再那么尖刻、任性了。但是，对金钱、对权贵，对傲慢的洋人从来也没改变过自尊、自重、不容欺侮的本色。一次应邀访欧商讨她的书出版事宜，回来后她告诉我，到了德国，邀请她的出版公司老板竟将她安排在一个汉学家孩子的玩具房里住，屋里乱七八糟，连床也没有。厚英的脾气上来了，马上找到出版商质问：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是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家，为什么要我住在这里？主人说，在你之前的作家也住在这里。你们这是歧视中国人，我不能容忍，主人只得把她请到宾馆住。到奥地利又遇到了类似情况，她向出版商提出抗议，并当即决定取消一些日程安排，提前回国。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民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登在《解放日报》上。

据说厚英被害第二天，宿舍里议论纷纷，一位教师说，戴厚英的书攻击社会主义，在国外影响很坏，连爱国主义也不讲。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有没有看过戴厚英的书？他了解不了解戴厚英？知不知道她在外国、在洋人面前的表现？不想责怪这位先生，因为这些年的舆论工具、各种明的暗的、大的小的批判文章、汇报材料，如她所说“为我绘影，为我画魂，创造出一个人物的艺术形象——恶魔戴厚英，这个形象至今还存在某些人的头脑里。”

记得王元化先生在批评电影《芙蓉镇》的不足时指出它没有揭示“文革”运动的整个民族灾难的内在深层意义。“这场浩劫在于煽起了人类的恶劣情欲，使它们象病菌一样侵入人们躯体。这些毒菌吞噬着原本健康的血肉，使人形销骨枯，变成可怕的畸形。这一切是在人的精神领域内进行的，所以实质上也就是对于人性的扭曲，使人经历毛骨悚然的异化。”那些至今还对戴厚英存在偏见，用“文革”的眼光看她的人们——无论是高贵的，不高贵的、批判过她的还是没批判过她的——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他们被扭曲了、异化了的人性是否复归了是否返本归真了？被毒菌咬噬了的血肉是否健康、痊愈了？

戴厚英作为一个出了名的作家，一位大学教授，她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不爱打扮，不戴首饰，穿着随便，谁都可以

看到她在菜市场买小菜，在小摊吃早点，在马路上和熟人搭讪。但是，我以为，就在这些普通的外形所蕴含着的那个和她命运紧密相依的性格，在当今的中国确是难得可贵的。

解放前的旧中国造就了鲁迅的性格，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胆量把戴厚英与鲁迅妄加比较，何况，新中国以来，不怕打、不怕压，坚持真理，无视权贵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一生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陈寅恪；“碎身粉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马寅初；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风狂澜的孙冶方；命途多蹇，历经坎坷，在艰苦的条件下勇敢追求真理的顾准；以及用生命捍卫真理的张志新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我认为，在纠正了几十年左倾错误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一部分官僚腐败，权贵当道、大腕趾高，买办气扬的今天，戴厚英的性格，仍然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和作用，仍然不失为我们民族的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纪念她的现实意义吧。

厚英的性格是她的命运，也是她的精神。命运已息，精神永存！

真人·才人·大写的人——痛悼戴厚英君 元三

铃铃，的铃铃……”清晨，我还没有起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抓起话机，对方是一位熟悉的朋友。她劈头就说：“老赵，你听说了吗，作家戴厚英和她侄女8月25日在家中被人用刀劈死了？”我听了，先是有点发愣，不自然地反问她：“你说的是真的么？”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感到全身血液上涌，头嗡嗡作响，手在发抖，手中的话机差点掉在地板上。我像发瘫一样又倒在床上，又像是被八级地震击倒的。我口中不由自主的念叨着：“厚英呀，您一生苦难的命运结局又怎么划上了这么一个悲惨的句号呢！”

精神稍定之后，我匆匆换上衣服，拎起包，奔向车站，去报馆上班了。公交车上，我的脑海里仍在余震，思绪动荡而紊乱。但我清楚地记得，5月上旬，我同厚英通过一次很长的电话，没料到，那就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也是最后一次接触了。7月中旬，我又打过一个电话给她，是她的侄女戴慧接的，戴慧说：

“我姑妈已到安徽老家度暑假了，开学前回来。”这是我料得到的，她一般每年的寒假、暑假都回淮北故乡去的。我不过是出于对数十年的老朋友的牵挂，习惯地例行问候而已。每学期的开学前几天，她必定准时归来，为迎接新学期的开学、开课和科研而进行准备。她对教学与科研都是尽心尽责的，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

我同她生前最后一次通电话时，她对我讲得最多的是她近年在研读佛经。我一听就马上联想到李叔同。我问她：“你是像弘一法师那样准备皈依佛门？”她说：“我只是研读佛教经典，还谈不上皈依。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和矛盾，我找不到答案，我想到佛教哲学中去找找答案。同时，我从小敏感，有许多种神秘体验，也无法解释，过去不敢正视，现在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想通过佛教探索一下诸如灵魂到底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后来有人告诉我，她近年已读了许多部佛经，还于1995年春天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了多日，参加了寺里的“打佛七”，体验了佛教徒的宗教生活。我曾读过她于1995年4月15日写的记述她那次“打佛七”的文章，她在其中说她已决定皈依佛教：“我是在传授三皈五戒仪式举行的前半小时才明确表示皈依决定的。”但她又说，她对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中有些戒条还难做到。如她说对苍蝇、蚊子、蟑螂必杀无疑，逢年过节，亲友相聚，还是要喝点酒的。她在文中还说从雪窦寺归来后，鱼汤肉汤照样喝，但“心里”却起了变化。在一年后的电话里，她对我说，她并没有皈依佛门，她至死仍是一个俗人，是确实的，她只不过是借皈依的形式，对她思想中的矛盾、问题与苦闷、痛苦进行体验与求索罢了。

到达报社办公室后，我立即同其他朋友通了几次电话，才初步了解到她被害的一些事实与经过。她是8月25日早晨由安徽老家回到上海，回到灵丘路上的复旦大学新宿舍家中的。因旅途劳顿，上午在家睡觉休息，下午3时50分有人看到她从超市买东西出来。侄女戴慧同她一起在家。暑假初就从安徽来沪的弟弟、弟媳，见她休息，就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弟弟、弟媳下午3时半打来家电话，说晚饭不回来吃了，是戴慧接的电话。晚7时半弟弟、弟媳归家叫不开门，就到近邻吴中杰教授家中取备用钥匙，门一开就发现了姐

姐倒在血泊中。

据目击者说，凶手是极其罕见的凶残。戴厚英身着 30 余刀，凶器是菜刀。侄女是被砍死在她的卧室中的。姑侄两人的血流在一起，从室内流到室外的走廊里，凶手也是极其狡猾的，对现场做了伪装，表面上来看无搏斗的痕迹，也没有失窃痕迹。

有位朋友告诉我，厚英生前在一篇文章中说，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人用斧头劈死。怎么这么巧的应验了？朋友感到奇怪。我马上去资料室查找资料，花了半天时间，终于找到了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广东出版的《随笔》杂志 1996 年 7 月 15 日的第四期上的《说梦》。

她在《说梦》中说，她平生做过许多梦，其中许多是“亲人间的心灵感应”。还在读初中时，她梦见死了一个弟弟，回家后，果然一个弟弟刚生下就死了；“文革”期间在上海，她梦见她三妹穿了一身黑衣站在她面前捂着脸哭泣，后来得知她三妹果然前不久在安徽老家病死；侄儿死时，她在美国，她梦见一排六间三层楼房在风雨中部分塌陷，像折掉的手臂；她父亲去世前两天，她梦到风雨，并且有人在风雨中喊“家殍”。她感到这些“巧合”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是解释不清的。她说，“我认为梦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会把梦也当做真实写下来。”她说她的长篇小说《脑裂》就是写梦的，“写出了在一次梦中看到的自己和生活”。她写道：“在那次梦里，我看到自己的脑子无缘无故地裂成两半，像被斧头劈开的（重点是我所加，下同——元三注），却没有流血，那裂开的两半都有一层纸一样的东西盖着，像切开的西瓜盖了一层塑料薄膜。我为此惊恐了好多天，担心是脑子出了毛病，甚至一连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头颅，看看有什么破绽。”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脑裂》正是对我当前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写照。事实上，不论在文化思考和现实思考上，我都遇到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于是一部小说就这样动手了，而且很快写成。没有精心构思，头脑里就只有那个脑裂的意象。”

若由有神论者去做简单的解释，戴厚英的归宿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实现其最后一个梦境，并是有预感的。她曾梦见“自己的脑子无缘无故地裂成两半，像被斧头劈开的”，果然，她死于刀斧之下了。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齐鲁故乡的圣人“子不语怪力乱神”传统，不相信人类的命运是由所谓鬼神主宰的，我认为厚英的梦与死之间，并没有神秘因素的联系，这不过是一种巧合，或者是凶手事先读了她的文章才用斧头做凶器去作案的。后一种情形不是西方早已有类似的小说和电影了么？

戴厚英遗体告别仪式于 9 月 3 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中举行。通知上说是 10 点 45 分。10 点一刻当我到达时，大厅前的台阶上、庭院里已挤满了人。有熟悉的面孔，更多的是陌生的面孔。在签到簿上签名的有许多是她的书的普通读者和她的学生。集体送花圈的有她所在的单位上海大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报》社等。个人送花圈或挽联的知名人士中，有老作家巴金、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著名学者王元化，中央文史馆馆长、著名作家萧乾等。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厚英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徐中玉教授以及杜宣，罗洛等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

邓伟志教授的挽联是：“真人，才人，人啊人，大写的人；屈死，冤死，死又死，永远不死。”“真人”，是说她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现实，勇于讲真

话。厚英死后，我浏览了一下海外报刊的有关报道，有些是失实的，如有家报纸说她“曾是中共党员”等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说她的作品是“写真”的。“才人”，像厚英这样有才华的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家行列中是少有的。“人啊人”，是说她一贯主张在作品中发掘“人性与人道”，在中国文坛上长期以来是处于被禁止与被批判的位置上。“大写的人”，厚英对高尔基的这个称谓是当之无愧的。

“屈死、冤死”不言自明。“死又死”者何解；“文革”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的思潮依然严重存在。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还讲当前要防右，但主要是反“左”。戴厚英是1978年起开始写小说的，当时《诗人之死》完稿后，在上海无法出版，后来在广东出版了她的《人啊，人！》。上海有位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在全市性的大会上，公开判定此书是否定伟大的反右斗争的“极右”的毒草。随之，上海两家大报奉此公之命分别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将该书判为“死刑”。于是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连锁反应。戴的文章在许多报刊上不能发表，尽管宪法规定她是有发表权的。甚至也波及到她的家乡。据戴写的随笔透露，1991年她联络两名记者去她的老家安徽赈灾，遇到种种非难、非礼。当地一位大人物公然说：她来干什么？在安徽报纸上登的捐款名单上，居然把她的名字给“漏掉”了。只写“上海大学副教授捐××元”。她写的几篇灾区见闻自然也无处发表了。后来她写了《流泪的淮河》（一、二集），是在香港出版的，但还是得罪了某些人。这种种外部的刺激与压力，使她精神上感到巨大的压抑与苦闷，她作恶梦，梦见脑子像被人用斧头劈开，她的研读佛经，想用佛经减轻、解脱精神上的压抑与苦闷，就成为她思想发展历程的必然逻辑。这一切使她生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上已处在“死”的状态。现在肉体上被罪恶的卑劣的斧头残杀了，肉体上也死了。故伟志兄的“死又死”之挽，是最确切不过的，是绝妙好辞。

“永远不死”也是无容多加解释的。即使在她生前精神状态处于死一样的压抑氛围中，也是在孕育着生的硕大胎儿，闪烁着生的巨大闪电的最初火花。就在《人啊，人！》在广东出版之后，戴厚英读到上海两报批判《人啊，人！》的大版文章是想不通的。我曾劝她，应当相信广大读者、相信历史，同时，也不必埋怨媒体，而应当感谢它们，因为它们扩大了《人啊，人！》的影响，甚至还会帮助这部书走向世界。我的话不幸言中了。国内读者读到报上的批判文章后，纷纷去购买或借阅《人啊，人！》，海外媒体纷纷报道这本书的出版与纷争，海外有多个国家的出版社与她签订了出版合同。说戴厚英是国际上知名的作家是名实相符的。假如戴厚英不死，她将写出更多的更有影响的作品。不幸，这个“假如”被凶手的斧头砍断了。尽管如此，戴厚英在文学创作上已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她在当代文学史上占一位置了。《人啊，人！》这部作品的意义将会随着历史的推进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像被开采一座巨大的矿山一样。戴厚英也将随着她的作品永远活在文学史上，活在历代读者的心里。

四

哀乐若泣若诉地奏起，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了。主持人是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文学院院长致悼词。悼词平实得出奇，叙述生平而已。家属虽然来了一串，但没有代表致答词，或者是太悲伤了，或者是无话可说，或者是一切还在混沌当中。

在全体默哀、三鞠躬以后，人流缓缓向前蠕动，与遗体告别。家属哀嚎大起，刚从美国飞来不久的女儿当场昏厥过去，由医护人员架到大厅右前侧的休息室里去。她的弟弟，既失去了姐姐，又失去了女儿，亦是悲恸欲绝，由两位男士架着他，哀声动天。

她的许多学生们、读者们，将手中的白色的月季、蔷薇、菖兰等鲜花，默默地丢在她的灵床边。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豆蔻年华的少女，有学者，有教授，有编辑，有记者，各行各业，但都是些普通劳动者，鲜见达官、权贵。人们心情压抑，欲哭无泪。她是从普通人的阶层来的，她是属于普通人的阶层的。

我缓步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凄与失落。我失去了一位结识了7年的挚友，社会失去了一位良医，读者失去了一颗良心，海内外文学界失去了一支才华横溢的笔。

一颗时代之星经过了明明灭灭之后，陨落了。更使我悲痛的是，没有想到陨落得竟是这么早，这么悲，这么惨！

我仿佛看到厚英的遗体正在焚尸炉中燃烧，她面带着笑容，口里讲着我听不清的俏皮话，从烈火中腾空，飞向那没有明争暗斗，没有争权夺利，没有痛苦忧愁，只有相互平等、相互夫照、相互爱戴的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我向她不断地摆手致意：厚英兄，佛不是说过么，“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你将在烈火中永生！

一九九六年九月三日凌夜草就

戴厚英，你没有死

陆行良

是1996年8月25日晚，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我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寓所不幸被杀害了。噩耗传来，如同晴天霹雳。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一连地打了好多个电话给有关友人，希望能得到被否定的消息，哪怕有点出入也好，但却一次次地被证实，我完全地失望了。随之也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夜不成眠，她的音容笑貌始终浮现于心头，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愈现分明。

戴厚英与我的交往前后整整四十年，以1956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四年起，1960年同被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在同一个办公室里相处6年。接着，又是同被卷入“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深受煎熬10年，1979年后的20年间，虽然分道扬镳，我去出版社、报社当编辑记者，戴厚英则去了大学执教，具体工作岗位不同了，但在文学业务与私人友谊上依然保持联系与交往。可以说，在彼此之间都形成了生活空间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难忘的广州之夜

现在，戴厚英被戴上了著名女作家的桂冠，她拥有一大堆著作并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些都是受之无愧的。但她的创作生涯却充满坎坷与不平，至多至烈，为我国当今文坛所罕见。别的且不说，就她的七部长篇小说、二部中短篇小说集、二部散文随笔集、一部自传共12部著作，没有一部是在上海出版，全部是由外省市地区和海外出版的。这个现象有谁能认为是正常的呢。诚如墙内开花墙外香呵。当然，上海广大读者的审美鼻子还是很正常的。值得指出的是直至最近，由戴厚英在“复旦”诸多好友的共同努力，突击组编，将她的遗作《心中的坟——致友人的信》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很快推出，才破了这个例，也了却了戴厚英生前的一个愿望。可不是吗，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于1979年，文稿在上海某家出版社排成清样躺在编辑抽屉一年多，比她写作此书所花时间还要长。期间，戴厚英多次上门去踏破铁鞋，磨破嘴皮，最终仍然未成果，连要讨个像样的说法也没有。东方不亮西方亮，这部书三年后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比之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人啊，人！》晚了近两年。《人啊，人！》面世还未满一年，又是在上海刮起了一阵阵的狂风暴雨予以“灌溉”。君不见，上海某家大报在三年中对此书开展两次大规模的“争鸣”，对此，人们记忆犹新，这里且不再谈它。下面就谈谈戴厚英创作第三部长篇小说《空中的足音》时一些情况吧。

那是1982年5月，我去海南岛海口市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后，回归途中在广州逗留。我知道戴厚英应花城出版社之约，在那里埋头创作又一部长篇新作即《空中的足音》。在一个晚上，我背着上海、天津同行朋友，一个人悄悄地摸着陌生路去看望她。由于当时文艺界的气氛并不正常，有位中宣部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讲话中点了戴厚英的名，批评她的《人啊，人！》是一部坏书。而且这个精神在文艺界已经层层下达，消息不胫而走。在这个氛围下，我去看望戴厚英，虽然纯属私人友谊，仍须谨慎行事，以不作声张为宜。哪知戴厚英被安置在广州城乡结合部一个不起眼的娱乐场所。我在入口处被服务小姐无情挡住。她一口回绝称那里根本没有戴厚英这个住客。我便亮出自己的身份，交代与戴厚英的关系。对方注意着我的

神情仍是直摇头。我不甘心于白跑一趟，暗暗埋怨白天在花城出版社时，友人杜渐坤（《人啊，人！》责任编辑）曾把戴厚英的住址房号写在一张纸上交我，自己粗心塞在哪里一时找不到。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只有重新搜索口袋、翻遍书包。幸而找出来了。惊喜之余，我理直气壮地将约条摊给她看，并声称是“花城”同志同意我来找她的。这着果然有效。小姐转而客气地为我引路，又打招呼说，戴厚英一般不接待来客，是他们领导特地关照过的，我是接待的第一人。我被引上三楼，在东侧的一个单人小间里，终于见到了戴厚英。

戴厚英对我的到来颇感意外，惊喜交集，惊的是我莫非受人派遣，来者不善，喜的是在异地他乡故友重逢。直到我讲完寻访的经过后，她才完全消除疑虑，露出其固有的本色来。她给我端上一杯茶后，又转身去从摊开着的一本书中取出一张纸片来，展示在我面前，并异常激动地说：“你看，这是一张什么东西。”我看着，原来是一份由上海本单位发来的电报，大意是：请速回沪，参加重要学习。她大发雷霆道：“去年（1981）某报大张旗鼓地批了《人啊，人！》这还不够，现在官方也讲话了，你不会没听说吧，说这是一本坏书，无疑要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清除罗。为此没完没了，我的日子怎么过下去，还有我的活路吗。参加‘重要学习’说得好听，我也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还会有我的好事吗。”戴厚英此时此地的内心痛苦，如同刀割，完全不难理解。俟她“吵”得够了时，我才站起身来，反客为主，为她沏茶送水，将她推到床沿坐下后，我才开始宽慰她。她余怒消清，泪珠直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转怒为悲的痛苦更深沉更难熬。当时，我真的愿意代她受煎熬，分担凄苦，哪怕减轻分毫也好。过了一会，她才转失态为正常，以柔和得多的语气告诉我说：这几天我真的怎么也想不通，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恶梦不断，有时一晚几次起床踱步。恨不得从窗口跳下去一死了之，省得没完没了的麻烦。她此话固然是气极而言之，但我也真为她担心。她孤身在此，苦闷之极时，干出那等傻事来，并非绝无可能。为此我不得不倍加小心劝导，恳求她无论如何要相信党，相信广大读者，起码也得相信你自已吧。更何况你上有高堂老母，下有亲生女儿，她们眼巴巴渴望着你去抚养与教育。你怎么能忍心背着亲人们去干那等傻事呢。亲者痛的事绝对干不得。

我的这番相劝也许有所奏效。她转而征求意见说，那回不回上海呢？我反问她“花城”同志的意见如何？她说杜渐坤昨天还来劝我回沪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我又激励她说：你心中无鬼，不做亏心事，怕什么，没有什么好怕的。你戴厚英又不是个胆小鬼，更大风浪也挺过来了，“胜似闲庭信步”嘛！此话说得她破涕为笑起来，她反讥我是在说风凉话。

第二天一早，天津、上海的同行人知道了我昨晚私访戴厚英，引起了一阵攻击，责怪我不够朋友。我被迫流露，说戴厚英现在处境不好，请予谅解。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兄说，批戴厚英无损于她，越批越出名。他早就想找戴厚英，组不到稿，见见她也好。另一位上海友人是戴厚英的同事。他说，某报邀他参加《人啊，人！》的座谈会，他表示参加可以，但要求发言内容全文发表，不能删改。吓得该报记者不再找他。就此一斑，我也深深地感到戴厚英决不是孤立的，支持同情她遭遇的人大有人在！

我回上海后不久，戴厚英也返回学校了。相隔时日，她又回安徽老家。

至此我的一颗为她悬着的心才完全地放下来。

在母校过年的日子里

戴厚英每年春节都要回安徽老家，孝敬父母，探望亲友。但也有例外，1994年的春节，却是回到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度过，而且是在我家过夜的。

1994年春节除夕之夜，我接到一只电话，一听是戴厚英的声音，但又感到意外，使有了以下的对话：

“你是谁？”

话筒中传来格格格的笑声，“我——是——老——戴。”

“是戴厚英，小戴，小戴。”

“你还是老脑筋、老印象、‘小戴’早已过去，老汉今年56，还小吗。”

“你戴厚英在我眼中永远是小戴。”

调侃一通之后言归正传。

“你家里能增加住人吗？”

我有所不解，“谁来住？”

“我啊！”

“我们全家欢迎你来，今晚就来一起过年好了。”

原来，戴厚英的爱女醒醒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不久前从美国回来探亲，祖孙三代回到安徽老家欢度了一阵后，又回到了上海。现在女儿与小外孙又飞回美国去了。戴厚英一个人留在上海过年，不免感到寂寞吧，想在大年初一回到母校来看看老师与老同学，预计白天活动紧张，晚上想到我家来过夜。

是夜，我边看电视，边等待着戴厚英，一直到近十时，门铃响起，开门一看，果然是戴厚英，她姗姗来迟。

由于戴厚英的到来，我家里顿时分外地热闹了起来。史嘉秀忙着把早已准备好的点心——红枣莲心汤重新烧热，端了出来，硬要戴厚英品尝。儿子陆阳更是精神为之一振，很想在自己准备赴美国留学问题上听听戴阿姨的高见。我们的话题也就从他出国问题上开始。

当我直截了当提出请她对我儿子出国的事发表看法时，她只是淡淡地表示：阳阳能够出国深造是好事，但要听其自然，不要勉强，青年人只要有志气有本事，在国内，尤其是在上海，同样有发展前途。何必选定一个并不明确的方向去硬拼，强人所难，自讨苦吃呢。戴厚英又告诉我们说，美国社会并不是天堂，有的人在那里的确很好，有的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心态情绪方面。她又讲到我们二位老同学夫妻俩在美国的情况，处境并不如意。我儿子陆阳出国之事后来的发展，竟然被戴厚英所言中。当然，戴厚英决不是算命的先生，她无非是根据她的人生经验与阅历，说老实话，说心里话，不迎合，不违心，对老熟人亦然如此，这是她为人的一个基本点。

那晚，我们一直交谈到深更二时，大家感到疲倦了。戴厚英才摀灭最后一根烟头，与我夫人同床就寝去了。

初二一早，我们共用早餐，戴厚英又大大地称赞我家的那张大床，说它很别致，从未见过。的确，我家的那张床，与众不同，长6尺，阔5尺，比较大，三面由三块雕刻着花孔的木板组装而成。大床分两层，底层睡人，上层为可以拆卸的架子，用以挂装蚊帐。这张床用料全部采用硬的榉木。戴厚英听了更为高兴，一再表示要把这张床的造型和历史写到她的小说创作中去。

十时许，戴厚英告辞，她计划要到市区拜访别的友人。临走时，她又忘

了带走自备的两条洗脸洗脚毛巾。我赶上去送给她。她又笑着说：你给我晒干放好，下次来住我还有用的。

现在，戴厚英突然不幸作古，我翻遍她生前近作，也没有见到她写我那张床的文字，两块毛巾依然保存着，物在人已去，成了我寄托哀思的纪念品。呜呼！惜哉！惜哉！

在悲痛之中，我把她生前所赠的一部分作品及有关她的资料，集中置于案头，借此寄托哀思。特别是当我抚摸起那《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抚摸起写作时间拖得特别长的《空中的足音》，情不自禁的想起她与之有关的种种不幸遭遇与折腾。由此又想起她，当年我们俩平肩跨出学校大门，同步迈向社会，就投身在一场莫明其妙的斗争漩涡之中。从此时起，戴厚英啊，你的大半人生似乎比谁都悲哀。你在一次次的漩涡中浮浮沉沉，翻来复去，无法主宰自己。期间，你喝了多少次苦水。当你已经挣扎起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又是好景不长。如今，一场飞来横祸，致你命归黄泉。戴厚英，作无愧是中国女性的强者，你的悲惨死去，消息传开，震惊海内外，在你所热爱的祖国大地涌现起一股不可阻挡的悼念潮流。你的遗作《心中的坟——致友人的信》正式出版之前，便有多家文学报刊竞相发表。你的《人啊，人！》等一批著作也已经重新装帧设计，以《戴厚英创作精品丛书》的名义与惦念着你的广大读者见面。你的读者与支持同情者，比之你生前是在千百倍地增加着、扩大着。你的这份荣誉也许来的太迟了，但毕竟迅猛如潮水般地涌来了。这是一切善良的人们给你的莫大告慰。戴厚英，你安息吧。！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心中的坟

沙叶新

和戴厚英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她比我高一届。我入校时，适逢反右。我的一个和她同班的回族同学告诉我，戴厚英对“右派”不论口诛还是笔伐，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是上海高校有名的反右积极分子，有“小钢炮”之称。这使我一入校便对她敬而远之，这倒并不是我厌恶反右，我那时才17岁，根本不懂政治；我之所以不愿与之接近。一是她比我年长，二是她是女的，三是我对一切善于在大庭广众振臂呼口号，一张口批判人的人总是心怀畏惧。

后来我参加学校话剧团，戴厚英也是话剧团成员，但我仍不敢与之接触。有一回，排演《柜中缘》我演陶气，她演我妈，这样我们“母子”之间就不得不发生关系了，在排戏时，我总觉得她不是慈母，即便她由衷地对我笑，也激不起我对她的亲近。她不出场时，我尚能按照角色要求，调皮捣蛋，轻松自如；她一出场与我对戏，我就人心紧张，不太自然，甚至手足无措。演出后，竟然反应奇佳，说我很能注意规定情境，把握人物关系，表演非常真实，这真是天晓得！若干年后，我当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懂得了一些表演术，这才明白我那时的所谓真实表演，其实是将生活中对她的“情绪记忆”很自然地转移到角色上去了，表演当然真实！

1960年，在某一届某一中（忘了）全会精神鼓舞下，当然也是在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批判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戴厚英又是炮手。我作为受教育的旁听者，与有荣矣，在上海作协的一楼大厅，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风采：能言善辩，锐不可挡，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我虽不是受批判者，也觉得针芒在背。

戴厚英从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文学研究所，每天阅读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研究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动向，然后编写情况汇报，忠实地作党的文艺哨兵；这种工作对她来说，实在是得其所哉。一年以后我也毕业分配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虽然我本来就与她聚散两不依，如今更可以相忘于江湖，可我总觉得我的背后又多了尖利的眼睛。这是因为当年像我这样的创作新手，是最怕搞文艺批评的，就象如今的司机最怕警察一样。尤其是我因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评价问题与姚文无争论之后，就更是胆战心惊，见到甚至听到某人是文艺批评家，腿就发软。所以听说戴厚英也操此大业，就觉得“姚文元同志”后继有人，而我们头上又多了一根鞭子了。后来她果然研究起戏剧，还在改正了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上著文批判过江苏省话剧团的一个编剧。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板凳当柴烧，桌子见了怕。我怎能不怕？我也是编剧呀！况且戴厚英阶级斗争的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万一今后我写戏不慎，把我当成了动向。到那时，我想她不会念及我与她的同学之谊，“母子”之情的。

文革中，听说戴厚英造反了，还当小头目，对此我一点也不惊奇，认为这是必然，以后又听说与丈夫离异，与闻捷恋爱，再以后又听说诗人自杀，她自己挨批……。说实话，我也一点也不同情她，用上海话说，认为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作”出来的。

戴厚英惨遭杀害之后，我读了不少悼念她的文章，非常诚恳和感人。中国有很多忌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为死者讳，所以连韩愈这样的大文

学家也写过不少隐恶扬善的谏墓文，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戴厚英毕竟已经“作古”，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已经成了历史人物，面对历史就不能太情绪化，就要冷静了。而我之所以写出以上种种，写出戴厚英的“前半生”的一鳞半爪，也决非故意隐善扬恶，而是要让今天的读者知道，像戴厚英这样 80 年代以后出现的敢怒而又敢言的正直的作家，当年在我们同辈人中间所留下的真实印象；至少是给我这类在当时落伍的一群人中所留下的真实印象。

这一印象如今当然改变了。促使我改变的是她的《人啊，人！》的后记，现在我手头无书，无法摘引原文，但我忘不了我当时读后的震撼。她在这篇后记中，没有长篇大论地痛骂自己，而是真心实意地在反省。我深感她在忏悔，真诚的忏悔；她在流泪，心灵在流泪。那还是在 80 年代初，恶梦刚刚结束，当时有多少人能够像她那样内视反听、幡然悔悟呢？更多的人是忙于反戈一击，或洗刷自己；就是现在仍然有比戴厚英更应负历史责任的人在持一贯正确的态度，对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戴厚英与之相比，是多么的不易！今年初，在母校的一次聚会上，我又听到戴厚英对当初批判人道主义一事再次忏悔，看到她向当年她批判过的老师钱谷融先生当面道歉。我很感动。我对一切在清算历史罪恶时，不仅挥拳控诉，也能扪心自责的人，非常敬重。戴厚英的忏悔让我大大地改变了对她的印象。

大概也正是这个缘故，当久无联系的戴厚英突然在 1978 年秋季的一天来电托我办一件事时，我就一口答应了。戴厚英当时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她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已毕业，但因涉及一点“政治问题”，分配不出去，戴厚英为他联系了很多单位都无人接受，一些原先答应要他的也不再敢要了。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戴厚英想到我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认为肯定敢要，就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简单地介绍了这个毕业生的情况，我听后说：没什么问题嘛，我要！她很感激，还在电话中发了一些感慨，很为这个学生不平。没多久，这个学生来剧院报到。我找他面谈过一次，以后在剧院工作期间，我和他又多次有过接触，他的素质和学问都属上乘，所谓“政治问题”云云不过是具有华夏特色的阵发性的神经过敏。戴厚英为这个学生奔走呼号，可见她爱护青年，也足见她的仗义，我对她的印象越发的好的起来。

在最后 10 年里，我和戴厚英很少见面，我只是从报章杂志和友人交谈中得知她的一些消息，知道她勤奋地写作，她的一些散文杂文能直言无忌，深得好评；又知道她在认真地教书，讲课很受同学欢迎；还知道她为安徽老家的水患募捐赈灾，身体力行她当年反对过的人道主义。凡此种种，都让我为她高兴。但间或也听到一些有关她的纠纷，比如上海一位作家出于她文革中造反的义愤，阻止她的作品在上海出版，她大为愤慨，在香港一次文学讲座上，她竟离开原来商定的讲题，一开始就指斥这位老作家，使得台下听众莫名其妙，也让她旁边的会议主持人极为尴尬。以后她又和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为作品权益问题发生冲突，互相写文章攻讦，闹得沸沸扬扬。我又很为她担心，觉得她太不安分、委屈受不得，得理不让人，总要惹出一些事来的。

最近戴厚英出版了一本新书《心中的坟》，这是她 10 多年前给友人的一封信，说的是当年她和诗人闻捷的那段生死恋情。她以前就曾以这一段悲怆的恋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以为小说难免有虚构，而且公开发表的东西总归有所掩饰，所以我就没看这部小说。而《心中的坟》是一封根本就没想到要发表的私人信件，有很大的“保真度”，我便买来读了。

我是一个晚上读完的，真是感人至深，值得一读。这本书让我进一步地了解了戴厚英。我本以为象她这样一个在文革中的造反派，定然心如铁石，可当闻捷的妻子自杀，她去看看守所向闻捷报告此事时，她表现深刻的同情；她的善良凸现了他的正直。我本以为像她这样“与人奋斗”的“小钢炮”，个人感情肯定简陋、粗糙，谁想到当她真正爱上之后，她似乎比任何人都缠绵，都执著，不惜以生命去搏取。所以她和闻捷的恋情和古往今来一切真挚、纯洁而又不幸的爱情一样的可歌可泣，感天动地！其实人性中的戴厚英、情爱中的戴厚英，才是比较真实的戴厚英；或者说戴厚英应该是这样的戴厚英，只是那个时代把她扭曲了。当年被扭曲了！由此我想到她和阻止她出版小说的老作家的结怨，细思之，双方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都是棋师手中的一粒微不足道的弃子，他们之间的结怨，原是被巨手挑动起来的群众斗群众。我想学佛之后的戴厚英肯定对此已大彻大悟，前嫌尽弃。怨气全消了。

文革已奄忽 30 年，在几乎被遗忘了的今天读到《心中的坟》真是感慨无穷。戴厚英的这本新书不光是纪念死去的恋人，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文革也成了一座坟，也埋在了人们的心中，但人们绝不会忘记。导师有言：忘记即意味着背叛！

对戴厚英的惨死我是震惊和悲痛的。纵观戴厚英的一生，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她是顺应那个时代的。即使她有那段和闻捷不幸的爱情，她也只是把它视为个人的不幸，是命运中的偶然；所以尽管不幸，她还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因此她也基本上可以得到那个体制的认同，自己并未因和闻捷恋爱而受到处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戴厚英难能可贵的是她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她颠覆的是旧我，并未抵牾于新政；她只是反思，并无反骨。她依然“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可奇怪的是她却往往得不到认同，从对她小说《人啊，人！》的批判，到她去安徽赈灾竟有当地政府派人“陪同”，甚至一直到死后，她都没能得到她最想得到的理解和信任。最令人痛心的是，当她的脑袋经过几十年的折腾终于长到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却又给一个歹徒砍下了！悲也夫，戴厚英！悲也夫，人啊，人！

我心中的她

陈冀德

十四年前，在一次文艺思想批判活动中，被誉之为文艺思想战线新生力量的两门“小钢炮”，三十四年后又双双跪倒在雪窦寺大雄宝殿的拜垫之上，顶礼膜拜，成为我佛的信徒。这是历史对她们的嘲弄？还是她们在嘲弄历史？是人生的悲剧？还是人生的喜剧？没人能够回答，也无须回答，然而，匍匐在地的她俩，此时此刻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其中之一的我在想着归宿，其中之一的她在想着新的支点。人生之路上的她俩都已经步入了晚年。在历经了各不相同的劫难之后，都感到万万分的疲惫。她们想停下来，稍事休息，来修正自己的走向。逝者已矣，来日虽已苦短，却总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她们都在想看新的生活将从何开始，试图圈点自己的未来，显然，其中之一的我点的是句号。对共产主义的狂热，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个人事业的追求，等等等等，到此结束。只想过一种世与我争我也不与之争的太平日子，安度晚年，了此一生。其中之一的她，点的却是冒号。尽管来日苦短，尽管身在庙堂匍匐在圆蛹之地，她为的是寻找新的支点，在新的支点上继续她的奔跑，继续她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不达目的决不停止、决不罢休。她就是戴厚英。

她的朋友不在少数，海内海外皆有之。为此，生前死后都曾使得有关方面颇费周折，大伤脑筋。然则，朋友虽多，知音稀。朋友多是因为她乐于助人，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梯子下面的弱者和倒了霉的人，充满爱心。知音稀，是因为她过于心直口快，锋芒毕露。往往一句话就能把人噎个半死，而且不考虑场合，从不考虑对象，从不给人台阶。叫人望而生畏。在众多朋友中，我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我了解她。刀子嘴已，豆腐心肠。她怎么说我，我都不在乎。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她是奔放的，她的心扉永远是开着的，就像她的那张嘴巴。我是内向的，我的心扉上永远有把锁管着，就像我的嘴巴也总是挂着锁一样。因而，她的种种我能了然于心，而我的种种她却未必。由于不了解而主出的种种误解，生什么气？有什么可计较的。一旦了解，不是就没事了么？再说，谁没有被人误解过？谁又敢说从未误解过别人？她有时候骂得我够刻薄的，我从不辩解，也不生气，那是我么？不是我。生气干吗。而是在内心里对于得到她的理解我始终充满信心。正因为了解她，《性格与命运——我的故事》出版后，她在给我的附信中说，在这本书里她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我相信她的真诚，没有一点水份的，经过时间考验的真心实意。火辣辣的她，软绵绵的我，真诚是我们相吸相亲的桥梁。有位名人说过，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我想真心、真话、真诚所有真的东西大概都有这样的特点吧。我敢说她对朋友们没有例外的都是一颗赤子之心，就像对我一样，人间最难求是真——让我打开挂在嘴上的锁说一句她最想听而又再也无法听到的真话吧。如果人类确有天性存在的话，她无疑是一个天生的情种、亲情、恋情、师生之情、乡情、友情、人民之情……多得满世界，浓得化不开。她似乎想要以她的情爱之心来拥抱整个世界。最最令人感动的是她那份浓浓的乡情。60年大学毕业后，我与她一块分配到作协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工作，与她同住在作协机关宿舍，每天晚饭以后，我们在宿舍里或写作，或聊天或料理生活之必需，自成乐趣。有一年春节过后不久，她从安徽老家探亲回来，在研究室召开的探亲回沪座谈会上，讲到安徽因为虚报产量饿死不少人的事。这在我这个从未跨出过上海一步的人听来，无疑是天方夜谭，

我不太相信。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后，她一反往常，独躺在床上捂着被子抽泣不已，我再三问她出了什么事情，她说支书找她谈了话，以后不让她在公开场合谈论家乡饿死人的事。说着，说着，放声大哭，边哭边说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她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件事就能叫她放声大哭的人。当时我虽然还是没有像她那样的切肤之痛，但我信她说的是事实。从此，我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天灾人祸，自然是有了一番别样的认识，而她呢，直到63年形势开始有所好转，没有过一天吃饱肚子的日子。当时每人的粮是按定量供应的。她的定量每月是28.5市斤，除此外没有一点副食品作补充。每个人的肚子能在没饿着的情况下勉强维持，而她还要从这少得不能再少的口粮中省下3—5斤，把上海粮票辄转换成全国粮票，带住安徽省老家。纵然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又岂止不悔两字。而是心甘情愿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主命。浓得化不开的乡情呵！稠稠的鲜红红的鲜血凝成。

说来也巧，在我们这几个人中，就数她的老家多灾多难，91年安徽老家闹水灾的消息传来，她坐不住了，仿佛大水淹了她床脚下似的。此时的国力已非60年代可比，各方的救援工作正在正常而有序的进行着，此时的她当然也已非昔日可比，她想为救灾工作争取到外援。但最后没有成功。她就独自一个做起救灾个体户来。一层层的楼走过，一家家的门敲过，呼吁捐款，为什么要这样？把捐款送往救灾委员会不就是了么？她偏不，她要把捐款亲手交到灾民手中。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包括我在内。但我没有表示反对。这世界上叫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太多太多，未必因为你的不理解它就注定是错的。是不是？！她是在淮河水的孕育中长成的女儿，我不是，她与家乡有血样的浓情，我没有。她毋须向谁报告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我料定，连她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何以要这样做。因为这世界上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同样的太多太多。不能理解当在情理之中。但把她的91年安徽之行说成是沽名钓誉的政客行径，这就太过份了。如她这样的性情中人，一时冲动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就是不会做政客。可以说，在她的生命中没有政客的基因。说实在的，有时候我真巴不得她有那么一点才好呢。

也许情到多时情亦昏吧。她被害后，久久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屠刀她为何不呼救？她大声斥责，乃至谆谆告诫，就是不叫救命，为什么？在搏击生死的瞬间，她在想些什么？她看到是一张同乡人的脸，这个年轻的同乡人是她崇敬的老师的孙子，他曾求助于她，她也帮助过他。她就是没有看到那把要她命的刀！这不是昏了么！人性的悲哀，信然，信然。

初读她的《人啊，人！》，并不觉得怎么样。对她在书后写的后记，更是颇有微词。认为是画蛇添足。我正想提笔写信与之讨论的时候，社会上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人啊，人！》的斗争。好奇心，公平心促使我再读《人啊，人！》，哈，果然是一部富于哲理，直面人生的好书。甚至连同她的那篇后记也不再那么使我反感了。也许是人同此心吧，市面上一时洛阳纸贵，《人啊，人！》抢购一空。本来默默无闻的《人啊，人！》经过批判一举成名。她也成了海内外瞩目的知名人物。当然，伴随着她这个名人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棍棒和指责。上海呆不下去了，她去南方得到了慰护，蜚居于僻远山区的一个招待所里，休养生息。我静观批判《人啊，人！》的全过程，总觉得似曾相识，在这类批判中，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常本是被混淆的，批判是错位的，本该在课堂师生间、学术同仁间，你我朋友间进行的事情，一下子上了政治斗争舞台。于是，你的一生就此拉倒不说，还要累及

子女家庭。她去南方的那段时间我真替她担心。所幸者，时代毕竟不同了，虽然她这个著名女作家是打骂出来的，并非“科班”出身。但在这顶桂冠的覆盖之下，终于有了比较像样的生活。女儿出国了，钱也有了些。去安徽老家买了房子，安顿好家里需要去安顿的一切。她还说想去家乡建所小学，叫我去当老师。前途是一片阳光灿烂，转眼到了89年，又坏事了。她又卷到六四事件中去了。我对她说，这一切你还没看够，还没受够么？她说，学生们的那副样子揪我的心，我是教师，我不能坐视。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阳光犹如闪电总是稍纵即逝。依然是著名女作家、教授，依然有点钱，但生活毕竟不是名誉、地位、钱的堆砌，她没有了快活。即使如此，她还会去做91年只身前往安徽救灾的事情，直到碰了一鼻子的灰回来。她才似乎有所醒悟。她说她活得累了。她要独善其身了。再也不管身外的事情了。但以她的性格，又如何能做得得到这一点呢！她不能忘怀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身外事管得少了，更多的情况是不让她管，不要她管，最好她不要参与。她一头扎进书海之中。圣经、古兰经、易经、老子、孔子、诸子，弗洛伊德、尼采、黑格尔……还有许多我都说不上名姓来的人的著作。博览群书，使她眼花缭乱，更使她兴奋不已，什么生与死，人与社会、宇宙生命乃至气功、八卦算命，都一套一套的。每当有一点心得，她就会按捺不住她的兴奋，并且把它传递给我。于是电话那头的她夸夸其谈，口若悬河，电话这头的我洗耳恭听，唯唯诺诺，当然也有不能，不愿唯唯诺诺的时候，这便是通话的高潮来了。彼此都想要说服对方，不成不休。一次通话，从晚上十点开始，十一点、十二点都不能结束，这是常有的事。我的家人戏称之为“长话”。每当她说到兴头上，而电话中又不时地发出吱吱喳喳的杂音时，她便要骂是有人在搞窃听，还说就是要骂给他们听听。从“长话”中我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快活，而且觉得此时此刻她的快活不亚于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长话”确实使我受益非浅。当然“长话”使我们俩人的心更加靠近了。但是我们有一点，始终是各执己见的，那就是人生的的是是非非有无答案可以求证？她尽管如此的见多识广，却始终不能忘却过去的伤痛和恩恩怨仇。这也可以说是她的一种天性。这些伤痛和恩仇像一台永不停止的发动机似的，驱使着她要去快意恩仇，要去把那的是是非非弄个明明白白，其结果往往是眼看着光明就在前面，待到她靠近时又是漆黑一团。于是她又开始了那永无休止的求索。她就是不明白，世上有许多事情是没有答案可寻的，没有答案即是答案。她不明白，甚至根本不想去明白。她要以她的坚韧，在她的有生之年，追逐下去。她的精神自然可钦可佩，却又是她性格中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真切写照。从雪窦寺回来后，她应邀写过一篇《结缘雪窦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说她又去思考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看来确实不适用于中国。60年代她就是这个观点，80年代她否定了这个观点，90年代她又回到了被自己否定过的观点上。自然，这一肯定与否定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有着本质的升华。是在《人啊，人！》受到批判后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长时期的反思的一个必然结论。结缘佛门而又执着于是是非非如此。阿弥陀佛！

人的性格是矛盾的复杂结合。单纯的完美是不存在的。她也是如此。

她寂寞，太寂寞了，她不甘寂寞，太不甘寂寞了。

她宽厚，太宽厚了；她刻薄，太刻薄了。

她在我心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完完整整的人。有人同情于她的寂寞，却又讨厌她的不甘寂寞，有人喜欢她的宽厚，却又害怕她的刻薄。

有人埋怨她的柔弱，却又佩服她的坚韧。我不，没有寂寞和不甘寂寞的同时存在就不会有《人啊，人！》强烈的爱和恨，才会有《流泪的淮河》；不是那如水的柔情和理性执着，又哪会有《诗人之死》呢？！她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她喝的是淮河大地流淌着的苦涩的乳汁，她奉献出来的是朵朵鲜艳夺目的奇葩。她肩负着历史的重荷，身带着历史的创伤，身后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没有一双男人的有力的手的支撑，却雄纠纠气昂昂的走在同辈人的前列。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生命不息，追求不止。我们就不能对她稍稍的宽厚些么？

雪窦寺回来后，她的行为，思想确有很大的变化。她每天念佛颂经，坚持两小时坐禅。有一天她惊喜的告诉我，她去寺里买的那串念珠中的一颗珠子里显出下一座佛僧来。这是她的虔诚得到了回报。她问我的家人，我从雪窦回来后你们感觉到有什么变化没有？至少脾气是否比过去好了些。家人答道：看不出来。她很失望。我对她说，佛在我心，道在平常，何必一定要着相呢，她默然不语。此时的她，俨然一个吃斋念佛、心气平和的老太太。她在佛教方面，活动也很多。在家里接待比丘尼。到很远的郊区去拜访90多岁的高僧讨教佛学。还经常到居士林去参加一些佛事活动。戴厚英不复再是戴厚英了。在佛光的姻 中，她身上的刺全部不见了。我暗自为她庆幸不已，坎坎坷坷大半辈子，忍受了一个女人唯以忍受的一切痛苦，也该过几年太平日子了。然而，戴厚英永远是戴厚英。有一次一些居士们约会戴厚英共同探讨佛教中六道轮回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有意为她而组织的。然而她对六道轮回很不以为然。信佛而又不信六道轮回，在佛教徒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六道轮回在佛教徒的眼里，是惩恶扬善的法定。犹如一个国家的法律。没有了它，对那些做坏事的人就失去了约束。你要做坏事么？你做吧，来世变猪变狗，在雪窦寺，她悄悄对我说，变猪就变猪，猪又没思想又不会感到痛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她不做坏事可不是为了害怕六道轮回，她不在乎来世的事。从讨论会回来后，她对我说，这次讨论会，实际上是对她的围攻。一定要把她还搞不清楚的问题强加于她。而她竟然拍案而起。拂袖而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菩萨也奈何她不得。戴厚英永远是戴厚英，我喜欢她。

她走了。按着习俗，似乎到了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了。其实，论定如何？不论定又如何？我看损上为她发的讣告就很有意思。听字便可概括，有人死了。冷漠得叫人汗毛凛凛。然而，正因其冷漠，却另有一番天大的好处，它留下了一片清白的空间。对于她的死，是悲是喜，见仁见智，每一个人都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对于她本人来说，这也是最好。她生前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在活着的时候把人说得一无是处，而当此人一死又把她说得无一不是的虚情假意，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许多朋友为她的死而惋惜。太不值了。我也这样想过。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一份杂志，上面刊有她遗稿《读尼采的札记》，其中谈到死。她认为死不过是有与无的一次转换，是另一种生命形态。她已经超脱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她要享受死亡。泰山乎？鸿毛乎？还有什么意义乎？而我那何以不叫救命的疑团也自然冰释。

她走了，带着她的音容笑貌，香消玉殒。

她没走，连同她的音容笑貌，常在我心。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我和戴厚英的相识、相交

高云

厚英来报告厚英的凶讯，我急忙打 110 报警电话，随后匆匆赶到现场。目睹厚英被残害的情景，我几个晚上无法合眼。厚英躺在血泊中的惨状时常浮现在眼前，使我颤栗不已。但我心灵深处又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真希望她像往日一样忽然给我打个电话，说是要过来聊聊天。然而，事实又是这样的无情，厚英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遥望她住的房间，那紧闭的窗户使我的心直往下沉。现在凶手终于抓获，她的亲朋好友也总算略有安慰。但厚英死得好冤啊！深夜静坐，往事如潮，和她几十年的交往，一件件，一桩桩，都浮现在眼前。我随手记下，作为对亡友的纪念。

我和厚英相识，是在 1960 年上半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四十九天会议”期间。这次会议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策划的，目的在于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在会议过程当中，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现名上海师范大学）各调出两名应届毕业生整理大会资料。我和厚英，还有另外一个女同学，来自三个不同的学校，走到一起，从此结下了几十年的风雨友谊。那时，厚英已经表现出她能言善辩，思路敏捷的超群之处。上面指派她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人道主义观点，她的发言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于是一些领导送了她一个爱称“小钢炮”。当时，我们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生，政治热情很高，一心一意要做党的好战士。本来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对于欧洲 19 世纪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甚了然，既然党叫批判，那就应该批判，党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厚英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她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之中，挺着胸脯，神气地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她完全相信是迎着真理的阳光向前迈进。49 天会议之后，我信 6 个人都被正式分配到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当时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是郭绍虞，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是叶以群和孔罗荪，是当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我们都以能在叶、孔直接领导下工作而高兴。但后来发现，除了文艺情况汇报之外，没有人关注我们个人的科研；叶以群、孔罗荪也从不照面。于是大家要求两位副所长亲临研究所听群众意见，他们果然来了。厚英和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僻哩叭啦暴风雨般提了一通意见。说些什么，现在已不记得。主要认为他们在业务上不培养青年，不关心青年。两位副所长说：“科研是要靠自己的。现在，你们要认真读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练基本功，情况汇报也是一种基本功的训练。”我们这才懂得，要成才不能一厢情愿地等别人培养，保姆是没有的，必须自己努力。学问是要靠自己去做的。厚英和我们当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上治学的道路的。那时，我们都很用功，事业心很强，求知欲旺盛。作协的藏书很丰富，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耕耘着自己的园地。我们 3 个女青年住在作协分给我们的集体宿舍里，几乎是不分上班、下班，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前读书，做笔记……为了打好理论基础，我们请同在理论组的王元化同志给我们这些小青年讲解《文心雕龙》，我们知道他有学问。王元化同志把他潜心研究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们，逐字逐句讲解，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不久，就有人提醒我们，王元化是胡风分子，怎么能让他上课呢！后来，阶级斗争的风声愈来愈紧了。不久，我和厚英就先后调到丁香花园写作班，开始

奉命写起批判文章，批判鬼戏，批判电影《早春二月》……遵奉将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还没有闯“自己的路”。

厚英来自农村的小城镇，家在安徽省颍上县南照集。她剪着一头齐耳短发，面孔黑里透红，生气勃勃，个性开朗，嗓门很大。下班后经常能听到她扯着嗓子唱几句家乡小调，周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她不是好歌手，唱歌会走调，但她善于控制，使你不感到难听。她又善于惟妙惟肖地模仿别人的言谈举止，使你笑得前仰后合。这些都表现出她的聪慧和灵气。因为她开朗乐观的性格，大家都对她很好，俗话说：人缘好。印象很深的是那时作协门房有一个老头，叫“老朱”。他的工作是看门兼作食堂炊事员。他脾气孤僻古怪，整天虎着那满布皱纹的老脸，说话狠声恶气，不经意会被他吓一跳。我怕他，不敢和他说话。但他做的小笼包子特别好吃。每逢星期天，他给自己改善生活，做小笼包子吃，自己擀皮，自己作馅，精心制作。然而他给大伙烧饭从来是马马虎虎的。当时住在作协集体宿舍的人除了厚英，没有人有福气吃到他的小笼包，而且是他特地留给她的。要知道，吃到老朱的小笼包可不容易。

一起分配到作协的6个大学生中，厚英年龄最小。其他5个人都是党员，只有她不是。厚英一到研究所便递上了申请入党的报告，找比她年长的党员交换思想，政治热情很高。那时，她可是怀着一颗圣洁的心，憧憬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常常被派下厂下乡进行“劳动锻炼”，她去得最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她身体比较好，又没有拖累；二则大概领导也特别要她多锻炼。每次派她去，绝无二话。有一回，她已经买好了回乡探亲的火车票，却临时叫她退票，立即到市郊去养猪。那是革命的年代，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更何况她是一个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能说不去吗？只有去。有一回她从乡下回来时说，因为晒被子，翻动床铺，发现床底下盘着一条大蛇。我们真为她捏一把汗，而她呢，好像若无其事，以示她的勇敢。我想，她心里一定也是害怕的，可她要强，表面上是绝不示弱的。然而，对她还是有议论，认为她政治觉悟不够高，特别是对1958年大跃进后安徽的政治、经济形势看法不妥，阴暗面看得太多。事实是，1958年安徽“共产风”刮得厉害，元气大伤，三年自然灾害一来，便饿死人了。厚英回家亲眼看到这种大饥荒的惨状，亲自经历与家人一道吃野菜、山芋度日的滋味，她回来后如实向党支部汇报，表示她对报纸上天天说形势大好有不同看法。现在看来，她只是说了实话而已。当时家在农村的同志也不止她一个，不过，别人回来只是沉默不言，所以没有受到批评。厚英说了实话，却受到了批评，可是她的思想不通，所以有一阵子，她很沉默，比较消沉。

1966年“文革”开始了。起初我们都吸取了反右斗争的经验教训，做了保守派。上街去和那些穿着长到屁股以下的旧军装、奶气未脱的红卫兵辩论。厚英是我们当中的善辩者，说得喉干舌燥。但红卫兵的“革命浪潮”愈来愈凶猛，许多诱人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使我们“醒悟”过来，还是造反有理。科研任务和正常工作都停止了，厚英和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议论了好几天，要不要造反。当我们大家都真诚地感到造反不造反是关系到“国变质、党变修”的问题时，决心下走了，造反。我们自以为是慎重的，理智的，做梦也不会想到造反又造错了。那些年的风风雨雨，事后才深切地感到被耍弄的痛苦。批斗牛鬼蛇神，夺权斗争，工军宣队进驻……何尝不是一场场的喜剧加闹剧。特别是厚英的两次感情危机，使她在短短的时间内，尝够了酸甜苦辣的滋味，

时而电闪，时而雷鸣，使她长了许多见识，洞察了许多世事。她变得深沉，含蓄起来，爽朗的性格中多了淡淡的哀愁。

正在动员“四个面向”的时候，风闻厚英与丈夫要离婚的消息。我和厚英都报名去“四个面向”，我去黑龙江，她去吉林，我们在一起谈着对于未来的时日的设想，心中浮现的都是美好灿烂的图景，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对于艰难困苦想的不多，也无法想象，因为对于遥远的北国，除了一种新奇的感觉之外，我们实在知之甚少。况且是在一种革命热情的策动之下，头脑是幼稚而简单的。不过，我直到今天都不后悔去黑龙江插队落户，我虽然失去了许多，但我同时又得到了许多。但厚英终于没有成行，忙着她的婚姻纠纷。我也顾不上她的事。开始是忙着赴黑龙江的准备工作，然后到南京去看女儿，接着便坐着为我们赴黑龙江干部安排的专列北上了。后来听到议论：“戴厚英把她的好朋友弄到黑龙江，她自己却开溜了。”我不以为然，知道她不是这种人。我只觉得厚英很苦。长时期以来，厚英是为有这样一个丈夫而感到幸福的。一则是青梅竹马的爱情；二则她丈夫比她长得漂亮，高高大大颇有男子气概。只可惜，她丈夫辜负了她的一片深情。

我于1969年10月赴黑龙江，第二年秋天忽然接到厚英的来信，报告她要 and 闻捷结婚的喜讯。我真是惊喜异常。对于闻捷我当然知道，早在大学时代，便看过他的诗集《天山牧歌》，他是个热情而有才华的诗人。在作协搞运动期间，我也曾看过他的交代材料，尽是排句，就像写诗一样。我马上给厚英写了一封回信，衷心祝福她又重新找到了幸福。我为她高兴，心想，他们结婚时，我一定要前去祝福，并送一个很好的礼物。1971年元月，我在上海休假，有一天，正准备到市区买些东西，忽然接到了厚英的电话，告诉我闻捷自杀了，叫我赶快去。这回我只有震惊了。我丢下手中的一切，马上赶到作协厨房楼上她的房间，只见她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精神已濒临崩溃。她对我说：“天塌下来了，闻捷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怎么办……”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对她说：“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她说：“我睡不着，我眼前尽是闻捷的影子……”第一天夜里，她平躺在床上，嘴里不断自言自语，不停地舒气，过一会长叹一声，一刻也没有合眼，我躺在她的脚头，虽然疲倦，也无法入睡，眼看着窗外的天空从漆黑到微明，我起来出去买早点，烧点豆浆给她吃。第二天、第三天，我是太疲倦了，朦胧睡去。在朦胧中听到她的叹息声，她还是不能入睡。

当时，我只感觉到在漫漫长夜里，我和厚英在黑暗中，在泥泞里，苦苦地跋涉，走啊走啊，总是走不到尽头。白天呢，就更不得安宁了。作协大厅里还在开批判大会。批判闻捷。人被逼死了，还要批判，简直是鞭尸。然而这一鞭一鞭，都是抽在厚英身上啊！当一阵阵口号声越过窗户传过来的时候，躺在床上的厚英就条件反射似地弹跳起来。本来稍稍平静一些的情绪又激动起来，那种痛苦，就像在已经出血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这真是人性的残忍啊！难怪在伤愈之后，厚英要高喊“人啊，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真是无能为力。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能像工宣队一样叫她“正确对待”吗？不能说，也不愿说。

但我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助她摆脱这种煎熬。当她稍为安静一些的时候，我就试着把话题扯远一些。我跟她讲了黑龙江的情况，讲那里的风俗人情，讲我和上海知青睡在一条大炕上的种种趣事。她静静地听着，两眼直瞪着天花板。同时我也尽量讲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就是我们的

孩子。我问她，醒醒在姥那边好吗？她提起精神来回答我了。我们便说起醒醒的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就爱漂亮，不许别人提起她那不太漂亮的鼻子。她也问我女儿扬扬的情况。我告诉她，扬扬到南京后，外公外婆听不懂她的上海话，闹了许多笑话；扬扬也是小小年纪就爱漂亮，醒醒姥姥给她做的那件红黑相间的条子的外套，她很喜欢穿，不但白天穿而且晚上睡觉也不肯脱，要等她睡着了之后，外婆才能把它脱下来。厚英听着，笑了。

我见她情绪好些，就劝她，眼前的事不要去想了，往前看，我们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呢。

一说到未来，她的眼泪又顺着眼角流出来了。我知道又触着她的痛处了，赶快把话题岔开。

就这样，折腾了7天7夜。

平常，厚英是个感情容易激动的人，爱哭，动不动眼泪就流出来。但我记得那一次，她并没有哭得那么厉害。人大概在超过悲哀的极限以后，反而不会哭了，那是心在痛，心在哭。我对她说：你要难过的话，不要憋在心里，要哭，就大声地哭吧。厚英翻来复去说得最多的似乎是下面一些话：她后悔那时没有和闻捷明说拒绝结婚只是暂时的，只为应付外面的压力，一旦柳暗花明，仍可恢复从前的一切。她说闻捷真傻，竟然一点也不理会她的暗示；她后悔闻捷自杀前的一天没有到他家里看看他，如果去了，和他谈谈，或许不会发生这一切。当时我并不明白她后悔没有去看闻捷的具体情况，也不追问她。后来，收到她的长信后，方才明白，闻捷自杀前的头天晚上，厚英想去看他，尾随很久而终于返回的事。

厚英那天终于没有和闻捷说上一句话，而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这成了她撕心裂肺的后悔，她恨自己，责备自己，认为是她害了闻捷。

闻捷死了，死在路线和政治的压力之下。在那样的环境中，谁都无法为力，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本来嘛，一个丧妻，一个离婚，两情相爱，自然合理，但竟被逼到如此地步。面对这现代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尽力安慰她，劝她吃点东西。

厚英在地狱里转了一圈，终于又挣扎着回到了人间。在她没有吃什么东西，又极少睡眠的情况下，我真担心她病倒。但她终于从床上起来，走出了房间，去参加作协的运动。那时作协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在继续批判闻捷，她必须去接受教育，她是坚强的，她经受了巨大的痛苦的煎熬。后来，她的香烟就愈抽愈厉害了。抽烟可以缓解心中的痛苦。等到她的心慢慢好起来后，我们经常劝她少抽烟。近几年，她抽得少了。经过了大彻大悟之后，她写出了长篇小说《人啊，人！》，由批判人道主义到信奉人道主义。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她用痛苦的人生经验换来的。

四

厚英和她的家人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父母，对兄妹，尽责尽爱，尽心尽力。从大学毕业开始，她一直把工资的绝大部分寄回家帮助父母把弟妹拉扯大。自己衣着朴素，生活艰苦。她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一书中曾说起大学时代的生活，布衣布裤线袜布鞋，直到大学毕业，还穿着三妹结婚时留在家里的旧大襟的红花布袄，里子还是旧的。记得到文研所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仍然穿着这件旧大襟的红花布袄。虽然旧，但因合身反而显出一个姑娘的朴素的美。1970年，全国各地开展城镇居民下放运动，那是响应毛泽东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厚英一家人在这样的政策

下，也迁到了农村，不用说，家人的生活更困难了。父亲年老力衰。二弟三弟刚从中学毕业回乡务农，拿不到高工分。只有大弟在小学教书，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销。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在姥姥处。厚英不得不继续背负着这个家庭生活的重担。本来，她很熟谙她生长的小城镇南照集，对那里的风俗人情，地理习尚，民间歌谣，如数家珍。现在，由于家庭成员搬迁农村，使她对于真正的农民有了认识。”我家下放的那个村庄离集镇八里地，几十户人家，二三百口人。我走遍了每一户人家，没有看到一家是丰衣足食的。全村找不到一张像样的床，矮巴巴的泥巴房里堆放的全是泥巴摔成的家具。我家的一张破方桌成了稀罕物，大家请客的时候都借来借去，冰天雪地里，农民的孩子赤着脚走在雪水里。饭吃不饱。每天劳动所得不足2角钱，每年人均口粮只有三百斤上下。还是杂粮。农民的主食是红芋干，所谓‘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

（《性格——命运——我的故事》）每次回家，她和家人一起抱着磨棍推磨，到自留地里干活……有了这些经历，她称自己为“农民的女儿”。六、七十年代，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工农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化”得很好的一个，她比同辈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接触到下层社会，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甘苦。不少人从农村到城市，上学、工作以后，很快就成了道地的城里人，一身洋气不说，还看不起乡下人。

但厚英不，她始终是个“乡下人”。她似乎比任何人都眷恋她的故乡和老家。

从青年到中年，厚英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一直住在集体宿舍里。后来孩子从姥姥处回到自己身边，依然住在集体宿舍里。1979年，她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复旦分配给她住房，这才有一个“家”。但孩子已长大，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难得周末和周日回家。长期以来，这种没有家的生活，缺少撞击，吵闹，太宁静，太单调，她的心是寂寞和孤单的。尽管她的朋友不少，住在作协时，她经常到上海戏剧学院一位教师家里去，关系也很亲密，但她还是寂寞的。这种寂寞和孤单使她格外依恋童年生活过的故乡，依恋母亲。每年，假期一到，便飞回母亲的身边。回去的次数愈多，故乡和亲人的份量在厚英的心里愈重。那里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使她烦心，犯愁。1991年，全国各地到处发大水，安徽的情形更凄惨。她寝食不安，决心为故乡的救灾奔走募捐，自己还跑到救灾第一线，吃不下，睡不下。回到上海时，只见她精神和身体都极度疲惫。前年年底，去年年初，她还在美国，听到侄儿病逝的消息，便赶回老家去安慰母亲，因为这个侄儿是祖母最喜欢的长孙。不久，她的父亲病逝，她在家乡逗留时间较长，整日陪伴在母亲身边。母亲喜欢打麻将，她和弟弟、弟媳等便陪母亲打麻将，而且要让母亲成为赢家。回上海后，她说：“这一阵，不想到美国女儿处去了，‘父母在不远游’。在上海，有什么事一个电报便可回去。”她是个出名的孝女。母亲想到她大女儿家蚌埠去玩，厚英怕高堂旅途发生意外，便雇一辆面包车把母亲从颖上县送到蚌埠。是厚英愿意去花钱吗？或者是她的钱多的用不完了？不，绝对不！这只能表现她对母亲的一片拳拳之心罢了。

说到厚英的收入，当然比一般教师多。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还有稿费。殊不知，她收入几乎全部用在了接济家人和帮助亲戚上面，还有那些乡亲。她的母亲在哪一个姐弟家生活，她就得负担这一家的开销，否则怎么忍心让母亲一个人吃好的，下辈们看着呢？干脆一道吃吧。一家的开销当然比

一个人的开销大得多。他弟兄们无论哪一家盖房子，办喜事她都得帮助。当然她的兄弟姐妹们也是争气的，但厚英觉得这样她才尽了做二姐的责任，心才舒坦。这两年，侄女戴慧在她这里住读，也是由她负担生活费的。她还不断给母亲寄钱，让她手头宽裕，否则老人家心里就发慌。这些事，都是厚英到这里闲聊时说起的，言谈之中，她也感到很苦，很累。她自己呢，不论穿着和生活都依旧比从前好不了多少。买衣服从不上大商店，从不买名牌，地摊小店倒经常光顾，偶然买到一件博得好评的衣服，她很得意。吃的是粗茶淡饭，她跑到街头小摊子上吃一顿小笼包子就十分满足。我看见了总是提醒她：街头小摊不卫生，少吃。厚英对于故乡和乡亲们的感情都凝聚在她的长篇小说《流泪的淮河》第一、二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里面。她还要写第三部，每次回家总要搜集些资料，可是现在，已成了未尽的事业，流泪的淮河只有为她优秀的女儿流泪了！

五

这几年，厚英力求心境平和。她和我们一起搬到凉城新村的新居，从我们的阳台上可以遥看她北房的窗户。她在饭前饭后，或者工作告一段落的间歇，常来我家聊聊天。我给她泡一杯浓茶，外子中杰陪她抽上一支烟。她便朝沙发一靠，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家事国事，街谈巷议，无所不谈，开心处我们就相对开怀大笑。她拒绝参加任何一个学术团体，也拒绝一切采访。她潜心于她的创作和教学工作，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她的活跃的思路和开阔的视野，给学生们以很大的启迪。剩下的时间就是读佛经了。愈读愈有兴趣，觉得那里的天地意外的广阔神奇。她说她有佛缘，有悟性，并且动员我信佛，我笑着对她说：“我这人不行，尘缘未断。”其实，她又何尝断了尘缘呢，在我家里，每每谈及家乡贫穷境况的难以改变，腐败现象的泛滥，就激动不已。她是太有社会责任感了，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的道德影响太深，她未能脱俗。

厚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与外子在初夏时曾约厚英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到外面吃顿饭，因为各有杂务在身，凑不齐，就拖下来了，后来她又回乡，相约等到秋凉再吃吧；我们和厚英还约定秋高气爽时节进一趟城，看看王元化同志，并合请他们夫妇到外面吃一顿饭，聚一聚。这一切均成了永远的遗憾。

厚英的一生是坎坷、充满苦难的，近年生活和情绪刚刚安定一点，不想最后竟惨死在一个愚昧而残忍的莽夫手里。

她才 58 岁，还有多少事可做啊。

呜呼！我又想起了厚英的话：人啊，人！

忆厚英

吴圣昔

与厚英相识是在1960年春天上海市作协召开所谓49天会议时。会议进行中因工作需要，而且拟筹备建立上海文学研究所，所以从上海三所高校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中各抽调了两人，实际上是提前毕业。她从华东师大来，我与高三从复旦来。作协会员大会显然已经发展成为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专题会，而且批判对象很明确：三所高校中文系的三位著名文艺理论教师。

我们六个人虽然初来乍到，却颇像一个战斗小组，立即被调到第一线，投入战斗：开会时参加会，要发言；会下整理有关资料，准备写出批判文章。叶以群先生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熟悉以后知道他是一位忠厚长者；但给人印象似乎不苟言笑，很严肃，所以听他布置任务，颇有一种不能打折扣必须照办的份量。

我感到有点压力。在当时情况下，要求我任何时候都能走上台前去辩论和批判，既没有这种口才，也缺乏这种勇气；虽然在校时我搞现代文学，延安《讲话》熟得几乎会背，但要我写批判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文章，却深感功力不够。于是我主动承担起多做一些整理材料的工作。

相反，厚英那阵子简直像如鱼得水那样的欢快。工作。因为她反应敏锐，辩论的口才特别好，好像根本不用事先准备那样，随时可以站出来发言，而且有一定的逻辑性，又加上一口清脆悦耳的普通话：咿咿，很引起人们注意。而且她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颇有一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概。那一阵子，她总是日日夜夜看参考书，反来复去修改那篇发言长文。我的印象中似乎改了很长时间，才发表。可能是领导要求：文章与发言不一样，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简单化。根据厚英的这种表现，领导上当然要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

这样，在共同工作中，我以为我已经了解她的性格特点。她开朗、坦率，对人热情，有话几乎都放在嘴上；当然还要求上进，敢于暴露思想，堪称富有斗争性；甚而至于有点说话不饶人。特别最后一点，似乎印象挺强烈。

我不太喜欢她这种性格。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她面前，我似乎可以老大哥自居。有一回，总之是谈天的气氛比较和谐，我就坦率地对她说，大意是一个小姑娘，不要刚性有余，柔性不足，最好能够倒过来。她当然颇不以为然，不等我说完，就面孔一板“反击”：不但说我是旧观念，还说像你这种性格好。好在哪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这是事实。我这个人堪称独行侠，喜欢独来独往，平时极少开口，总是一个人写文章，碰到矛盾避开。与厚英简直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个性。

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这也许是一种缘份。她冲我几句，我无所谓；相反，我看问题比她全面，所以她往往还是听从我的分析。由于我和她的老家和小家都在外地，在很长的时间里，她住在作协沿街厨房的楼上，我住在作协图书楼的三层楼上。所以，即便节假日也时时见面；再加上工作的原因，一般来说，比与其他同事的接触要多得多，这样一来，我对她个性的了解不免又更深了一层。原来她还有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才是她本性的表现。也许正是这一面，才使她常常陷于感情矛盾的纠葛中难以自拔，以致造成内心苦闷，甚致屡遭波折。真正了解她以后，才

知厚英其实是一位充满温情、富有爱心的善良女性。这里我不妨说几件事。

厚英老家在安徽颍上县一个集镇上。她每年几乎都要回去看望老父母。到作协不久的那几年中，有一次她回顾上，回来时因买不到车票，结果超假一天，回到单位竟被严肃批评了一通。总之，她是一肚子的委曲，悄悄地跑来向我诉说。我当时也为她抱不平，以为的确是领导不体谅人，我们日日夜夜不计报酬地工作，超假一天有什么大不了。话说得挺投机，结果得出一致的结论：头儿们对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对农村偏僻地区交通的不便，没有切身的体会。

又有一件事，那是当时作协几乎人所共知的，即厚英有一年从颍上探亲回来，向领导汇报思想时讲了安徽饿死人的惨景，结果闯了祸。当时，她曾向我提及，说安徽的工作有问题，饿死了许多人，情形很悲惨等等。听她这样一说，我不无紧张地急急问她：这些话怎能讲，不能散布，你对谁说了？当时流行的做法，对这种事，只能采取视而不见。看到饿死人不关你的事；若说饿死人，你就有被扣上污蔑所谓三面红旗的危险。不料，厚英竟说：人心都是肉做的，我看到这种情景受不了！还毫不为意地讲了一句：我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不关你的事。我担心风雨欲来，但也无可奈何。不过，此事后来却不了了之。大概当时单位领导也知饿死人是事实，不便整人过头。但是，我感到此后厚英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可能大不如前，大概把她看成是一位政治上不成熟的小姑娘了。

说到人心都是肉做的，我又想起一件事。那已是1969年秋天，上海搞什么“四个面向”，实际上是“四人帮”要改朝换代，把一批老机关干部赶出机关去。我当时已被批准到9424工程去当什么七十年代新工人，正在耐火材料厂培训，日夜三班做耐火砖，但仍住在作协宿舍。高云去了黑龙江。厚英被批准去吉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们精神上还是兴奋的，认为是到工农中去改造自己；但内心里不免认为：多年来最要好的朋友从此“鸟兽散了”，作协工宣队就点了我们这几个人下放，无疑是有意迫害，因此心存芥蒂。厚英出发前，去安徽老家安顿女儿醒醒，并转道皖南去看望她丈夫，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为了做好家属工作，以免后顾之忧。有一天，我正在宿舍休息，厚英突然回来。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醒醒好罢，又直呼她丈夫之名问他好吗。不料，她居然不吭一声，木然地坐着。这时，我才发现她神情异常，便又问：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不料，如此一说，她脸上的眼泪像珠子一样直往下落。老实说，厚英在我面前流泪已不是一次、两次，不过以前都知道她的原因，不外乎文革中受到委曲，或者甚至是受到好友的误解之类。当然，她在公开场合是决不流泪示弱的，每遇受到冤枉的批判和什么压力时，她还会故意昂起头、挺着胸在人前走过，甚至口里还念念有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这一次，我虽然估计到可能是她丈夫那边出了什么问题，但具体原因却不知。厚英只是不停地哭泣。我只好静静地等待着，让她慢慢镇静下来。厚英终于边哭泣边诉说，原来她与丈夫的感情彻底破裂，已经到了离婚的地步。厚英说：我以为人心都是肉做的，只要我对他好，最后总能感动他。那知这次去看他，他连接待都未接待。关于她与丈夫的关系，我只知道他们的感情不及以前，却不知道已经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所以一刹时楞住了。

当时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还能去边疆劳动吗？她说：去。我说：即使离婚也要在上海办；何况只有留在上海也许还可设法挽回。她似乎感到有些道

理，但担心作协工宣队不会同意，我当时深感她孤立无援，同情她，甚至可怜她，以致百感交集，竟一反常态，拍案而呼：工宣队算老几？这件事我来办。后来终于达到目的，果然取消了厚英的边疆之行。这一步棋，对于厚英究竟是福是祸，我从未想过，因为我不久就离开上海，到 9424 工地劳动了。

大约在一年以后，厚英和高云相约来看望我。高云在黑龙江劳动休假南来，在石头城看望父母和女儿扬扬，厚英大概是在皖南办完离婚手续后在宁中转。她俩走了长长的路，赶到我当时落户的荒村，这份情，这份意，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不免使我深受感动。当时的寒舍，称得上“谈笑有工农，往来皆白丁”；所以，两位共事多年的文友简直像从天而降那样突然光临，真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内子当然万分喜悦，她好像变戏法那样，做出一桌子那个年代荒村堪说丰盛的小菜来招待。而客人要求也不高，一面吃一面连声赞好。我则坐在一旁暗暗好笑：当时敝人是月领 60 斤口粮的重体力劳动者，有足够白花花的米用来喂养一群群的鸡，而鸡们和它们的蛋又转化为盘中之餐罢了。

我记不得当时大家讲了什么，厚英不外乎讲离婚，高云大概是讲边疆，我也许说了荒村岁月。总之，不谈政治，不谈未来，大家的面前都是白花花一片，管它呢！这是埋在各人心底里的话当时却尽量拣一些愉快的话语来说，以免冲淡我们相聚的欣喜。饭后，我陪着她俩又走过长长的路，送她们登上那驶向远处的车，只是当那车影渐渐远去时，我才为厚英默默地祝福，愿她在未来的生活中是一条平坦的路，幸福的路。但是，事实上在后来的长长岁月里，不论在爱情、事业、生活道路上她都遭到过莫大的波折。令人欣喜的是这些波折不但没有摧垮她，相反，她却终于从痛苦的磨炼中，坚强地挺过来了，从她自己经历的人生道路上悟彻了人生的真谛，又以最大的热情去创造事业，创造未来，然而谁又能料及邪恶之手竟在刹那间夺去她充满爱心的宝贵生命呢。

追悼会上，我曾发异想：我要对厚英诉说，厚英，您的心是肉做的；人的心未必是肉做的。然而，我终于没有说，其实，也毋庸我说。于是，我在花圈上提笔写下了一行墨字：厚英，您的作品与世长存！我想这也许可以稍慰她在天之灵。

人生到此成长别——悼厚英

吴长华

8月25日晚上8时许，电话铃响，传来的却是戴厚英的噩耗，我惊得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手握着电话机只觉得心在一阵阵发冷，真不知这杀身之祸从何而来？

日月如梭，年华似水。几十年花开花落，风风雨雨，往事并未化作轻烟消逝。回首当年，点点滴滴，深藏在心头。长歌当哭，让那抹不去的记忆化作文字，权当心香一瓣。

我与戴厚英最初相识，是在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49天大会上。那是在1960年的春天，当时我已毕业分配在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工作，因此作家协会开会，作记录、整理汇报便成为我的主要工作。当戴厚英的发言获得一片掌声走下台来时，我便立刻去询问她的情况，于是就知道她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

上海作家协会在1959年决定成立文学研究所，由于一时缺少人手，就暂定为文学研究室，除了我和张玺等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外，其他几位都是作家、诗人。他们本不是搞文学研究的，只不过是过渡性的暂时安排在研究室而已。当时成立文学研究所的决心很大，从复旦请来著名的文学史家郭绍虞先生担任所长，副所长是叶以群和孔罗荪，还设有一个学术委员会，记得刘大杰先生就是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那时定的计划是要把全市的文艺理论队伍组织起来，针对一些文艺理论和创作问题发起讨论，想对当时的文艺现状起指导作用。由于文学研究室人员太少，无法开展工作，因此急着要调人，就到复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中去挑选，每个学校2名，共6人，男女各半，戴厚英也在其中，6个人中5人是共产党员，只有戴厚英不是。当时选拔人才重在政治，要不是戴厚英在49天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了注意，她恐怕难以被选中分配到作家协会来的，因为她来后不久，我就听说她的父亲是“右派”云云。

戴厚英口才很好，但写文章却是刚刚起步。我们这一批刚出校门的年青人，思想比较单纯，想法也很简单，有报社来约稿，平均分配，每人一篇，写好后大家传着看，相互提意见、挑毛病，毫不留情，然后推翻重写，直到感觉比较满意为止。因此那时常常为一些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七荤八素，过后却从不存芥蒂。有一次戴厚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叫我给她提意见，晚饭后我坐在作协门厅的台阶上，她站着有声有色地朗读，她那宏亮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晚的空中回响，更显得铿锵有力，好象她面对的是几百个听众，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当时我提了些什么意见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很认真地听着，答应说今天晚上马上去修改，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再把修改稿朗读给我听。那时我们每天下班后，还仍留在单位里，每人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读书写作，桌上的台灯都要亮到很晚。

1961年的夏天，戴厚英突然向我们宣布要结婚了。因为她的对象当时从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安徽工作，以后两地相隔，交往有诸多不便，因此他们就决定立刻结婚，然后再去安徽报到。他们本来就是同乡，于是就急匆匆回乡去结婚了，在那革命化的年代，婚礼当然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这种闪电式的结婚，也为她后来的婚姻危机埋下了隐患。

文革开始的那年等我休完产假回单位上班，当时作家协会已经面目全

非，只见大门口贴了一巨幅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看了直觉得哭笑不得。大厅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外面来串连的人川流不息，门庭若市。作协内部派别林立、五花八门，“造反”气氛十分迷惘，但是我立刻毫不动摇地决定加入戴厚英这派，多年相处形成的信任感，使我甘愿共度患难。当然，现在看来，都是站错了队，真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1967年的1月，上海掀起了所谓“一月风暴”，也就是“夺权斗争”，当时外边盛传作家协会是“一块肥肉”，作家协会的群众都是“臭老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统统都要靠边站，因此都想到作协来“夺权”，过过“造反司令”的瘾。记得有一天夜里，先是冲进一批人来“夺权”，当时作协把男同志的集体宿舍安排在重庆路上，单位里只住着我们几个女同志。我因为女儿放在作协隔壁的托儿所全托，为了照顾方便，因此仍住在我原来的房间里。那天晚上那一伙“夺权”的人来了后，就要求我们交出作家协会的图章，因为戴厚英是小头头，所以他们就盯住她。当时情况突然，气氛也很紧张，而且无法商量，我们不了解这些人的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又是深夜，大家都下班了，只有我们几个年轻女子，我只好寸步不离地跟在戴厚英后面，以防万一，管门的老朱不放心，守在门口替我们壮胆。戴厚英很机灵，也很大胆，一口答应让他们来“夺权”，不过管图章的同志回家了，因此请他们明天早上再来，好不容易把他们打发出去，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刚躺下不久，又有人来“夺权”，其中还有一批人是翻墙头进来的，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经验，不再那么紧张了，一概都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再来。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他们即使抢到作家协会的图章，又有什么用？这种“文化大革命”中的闹剧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那时我们还不到30岁，正当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本该是发愤图强。出成果的时候，“文革”的一场浩劫降临在我们的头上，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作家协会被定为“裴多菲俱乐部”，“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停止一切业务，我们一起搬到海港，去当码头工人，又一起去到农村割麦，脱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一手拎浆糊，上街去刷炮打张春桥的大幅标语。又一起去到人民广场，参加万人大会，在那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我们“批斗”别人，自己也受到批判，我们都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学到大学，进的是人民的学校，却为什么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不能搞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要被迫“扫地出门”？我们原想好好地对党工作，但结果总是错了。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痛苦、迷惘。我们不只一次地悄悄议论这些问题，记得有一次戴厚英与我们一起坐在虹口公园的草地上，小声倾诉心中的疑问，直到夜幕降临，我们还坐在黑暗中，只觉得前途茫茫，不知何日才是尽。既忧国忧民，也为自己命运哀伤。“文革”给我们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而戴厚英是受伤最惨重的一个。

以后我们都走上了不同的岗位，见面机会虽然不多，但彼此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参加王道乾同志的追悼会，那是1993年初，我们作协文研所同志从四面八方赶到龙华，为王道乾同志送行，王道乾原是作协文研所学术秘书，“文化大革命”，他在社科院文研所担任副所长，患肝癌逝世，他早年留学法国，精通法文，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翻译工作，这样一位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他的追悼会简单得连个介绍生平的悼词都没有，我们感到忿忿不平。戴厚英率先向主持追悼会的单位提出意见，

她仗义执言，要为王道乾同志讨个“说法”。当日情景，好似就在眼前。谁知我们再次相聚，泪洒龙华，都是为戴厚英而来！眼前这个头戴假发，脖子上缠着厚厚纱巾面目全非的她，难道是生龙活虎、滔滔不绝的戴厚英？如今她再不会对我笑声朗朗，更不会对我热泪涟涟了，人生到此长别，从此天上人间、阴阳相隔，我不禁失声痛哭，一直憋在心头流下出来的眼泪终于冲出了闸门，戴厚英你死得太冤了！

自从戴厚英逝去后，我已在梦中几次见到她，但奇怪的是，一向伶牙俐齿的她，却总是默默无言。戴厚英相信梦，后来也相信佛，若地下有知，但愿我们还能在梦中相聚，呜呼！哀哉！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梦魇随着她——追忆戴厚英

吴立昌

戴厚英最后一次联系，是今年三四月间。她打来电话，询问一件什么事，接着便谈起梦来，说是的梦中预兆真是灵验。我极少做梦，对此自无体会，但又不愿扫她的兴，所以姑妄听之。前不久，特地找来今年《随笔》第4期，读了她那篇《说梦》，才知电话中之所以起劲地谈梦，原来正是她写《说梦》的前后，才知她小说里写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梦，大多是自己做过的。

厚英多梦，必定做过恶梦，也必定有过梦魇似的感觉。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中曾经有过这样生动的描绘：

有时，在惶乱中，他看见自己判定要做一种不可避免的梦——一种挣扎也无用的特别的梦魇。他在恐怖之下反抗这种命运，但是，一当这争斗的紧要关头，他便发觉自己是被什么不可知的力量压倒了。然后他又神智昏迷了，并且看见他眼前裂开了一个充满无限黑暗的深不可测的深渊。

一个无法越过的深渊——一个他会痛苦地和绝望地叫一声投下去的深渊。

梦魇是可怕的，但毕竟有梦醒的时候。人生中梦魇似的感觉则更加可怕，因为遇上了，实在难以摆脱。挣扎无从，无可奈何的处境，是极为痛苦的。

1962年秋，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作协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工作，便与厚英相识共事。30多年，我发现厚英在生活里，时常被梦魇似的感觉所困扰。可以这么说，厚英经历了从开始参与制造梦魇到日益被梦魇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苦难历程。

当年，领袖号召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学自然要更加紧密地为政治服务。文学与政治，自“五四”以来，七十余载，一直夹缠不清。建国二三年间，由于“左”的顽症，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涉，更使文学家被困扰得如入梦魇。文学家本来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有一种自觉地表现时代和政治的激情在，这时他的创作是自由的。可是，当他迫于政治压力而写作时，则只能是被动甚至违心的去表现时代，终而成为政治的工具和奴隶，失去了创作的自由。这是一种“异化”，文学家感受到的便是梦魇般的痛苦。那时，厚英和我以及文学研究所的其它年青同事，日常工作就是秉承上级旨意，阅读检查大量文学报刊，定期编写情况汇报，充当意识形态战线哨兵，为政治提供粗暴干涉的炮弹，参与给文学制造梦魇。

编写文学情况汇报之余，我们还因领导授意或报刊约稿，努力撰写文艺评论，其内容不外乎浇“花”锄“草”。这些文章除了个人写，有时也有二三人合作的。厚英和我合作较多，从文研所到1964年夏进丁香花园市委写作班的二三年内，约有近10篇。我们曾经批过《归家》、《北国江南》、“时代精神汇合”论等所谓“毒草”，我们也曾当过极“左”文艺政策的吹鼓手。1963年元旦，我们在文艺会堂听过柯庆施关于“大写13年”的讲话，很是相信。同年年末，为了筹备华东戏剧调演，负责戏剧情况汇报的厚英便被调去工作。她在锦江饭店筹备处没日没夜地看材料写简报，同时又抽出时间和我，还有邓牛顿，合作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今天舞台上的主流应该是现代剧》，笔名“邓厚昌”，由三人名字中各抽一字凑合而成。以后我们两人合写的便名为“厚昌”。就在那年冬天，一天傍晚，我正欲陪从农村来我处小住的母亲外出，厚英忽然心急火燎地拿了两张戏票跑来，说是赶快去看

话剧《年青的一代》，领导要我们看后立即写篇评论。看戏时我们确实为剧中主人公的革命精神所激动。文章写好后，我们用了《这是“保天下的大事”》这样一个题目。文章的论述，现在看看，自然“左”得十分幼稚可笑，但是，戏里人物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持的不同态度，对于现在年青的一代，未必没有一点启示作用。

写作过程中，我们也有过困惑。1965年初，上面要我们批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但在看材料讨论文章提纲时，总觉得邵荃麟说的“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我们私下都很欣赏邵所推崇的《锻炼锻炼》、《赖大嫂》里面的“中间人物”。然而，批判是党交给的任务，于是，我们便根据领袖的理论，千方百计从邵荃麟大连会议讲话中找错误，终于部分违心的写出一篇《“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真面目》，真是做到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过，平心而论，这点困惑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时我们并不像一些数十年追求创作自由的老作家那样，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会产生梦魇般的感觉。虽然从中“左”毒的角度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可是，从主要方面看，我们的批判还是为极“左”的政治给文学制造梦魇。“文革”是一场特大灾难，全国亿万人民统统深陷于梦魇中。厚英自然不会例外，她当过造反派，批斗过“牛鬼蛇神”，扛过“派仗”，又参加过“大联合”，还炮打过张春桥，总之，当时作协的造反派于过的事，她也干过，反之亦然，因为她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后来，领袖号召干部走“五七”道路，我也回到作协，与厚英一起去了奉贤文化“五七”干校。

这时，闻捷已经“解放”，算是革命群众的一员。对于他和厚英的恋爱，我是很迟才知道的。原来我和闻捷并不熟悉，得知此事后，大约因厚英的关系，不知不觉便同他热络起来。我在干校学了一点理发技术，不仅经常为革命群众献艺，也包下不少靠边人员的头，对闻捷，有两次我是主动上门服务。理发时的交谈，十分自由随便。由此，我才了解到他和我同乡，都是镇江人，他比厚英大15岁；他很豪爽坦率。我觉得，他们二人，一丧偶，一离异，性格又相近，尽管年龄相差稍大些，还是很般配的。殊不料，此事竟惊动了大人物张春桥，说闻捷的罪名是“腐蚀造反派”。于是在工军宣队主持下，连续开会批判闻捷，帮助戴厚英。厚英从此便被梦魇紧紧缠绕着。包括我在内的她的一些好朋友，在会上的发言，虽然有不少言不由衷的上纲上线，虽然厚英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原谅了她的这些“娘家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深感内疚，因为我毕竟参与了梦魇的制造。

“文革”劫难的结束，人们皆有一种“恶梦醒来是早晨”的轻松感，但是厚英却活得很累很沉，因为梦魇仍然像影子一样紧跟着她。我们虽然分属于写作班两个不同的外围单位，但都是普通成员，无须“说清楚”。大概厚英的身份有点特殊，当时主持写作班清查运动的工作组还是要她“说”。经过一年多从紧张到疲沓的学习、开会、检查，厚英终于不算太晚的通过了即使能耐再大的人物也无法、更不能说清楚的那道“说清楚”关卡。

关卡既过，向何处去？由于派性残存因子作梗，原单位作协容不得厚英了，连带她的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朋友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其实，我根本就不愿再吃回头草，因为10多年来，我已对文坛的是非恩怨、斗争批判厌倦了，很想寻个清净之地，坐下来读点书，做点学问，而最理想的去处莫过于大学。厚英自然有同感，于是我们便找到了离她宿舍也离我家很近的上海戏剧学院，而且院方已经准备接纳，不料突然发生变化，开了的门旋又关上，事后

方知有人搞鬼，目的无非是让你走投无路，当然，理由漂亮得很。出乎某些人意料的是，1979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厚英和我竟然去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我们倒并不因为复旦是名牌大学或是我母校而高兴，但在某些人看来，上戏进不了，反而进了复旦，心中不免恨恨。记得我们所在的文艺理论教研室邱主任，有天高兴的同我讲起，某人见到他，说：“两个干将到你那里去了”。邱兄从正面理解，以为这句话是指他手下又多了两名能干点事的兵，但我认为，此话还是从负面品味为宜，这将由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来证明。

进复旦前，厚英早就写完向好友高云诉说自己 and 闻捷恋爱经过的长信，并已完成了《诗人之死》二稿，似乎写得很顺利。其实，厚英创作也是有过程的。大约1975年左右，我记得她和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王兄到一艘海轮上去体验生活，说是要写小说。随海轮航行了一转，回来后便开始动笔。不久后的一天，她用一种十分风趣幽默的神态向我介绍王兄的作品，说里面尽是两个人物对话，只不过是一忽儿船舱里一忽儿甲板上的变换地方而已。听她讲完，我也和她一样哈哈大笑。但这绝非是对朋友的嘲弄，而是一种真正体会到创作甘苦获得新的经验后的喜悦，因为她自己写出来的也很不高明，所以她讲王兄，也是承认自己创作失败后的自我解嘲。此后，王兄便不再涉足创作，仍然执着写他的很有深度的理论文章去了；而厚英并不灰心，且有创作悟性，所以经过一点曲折，便很快进入创作的良性循环的境界。想不到的是，小说顺利写完，出版却遇上了麻烦。

起初，厚英见到我，总是讲她的稿子某某看了表示肯定，某某看了颇为欣赏，特别是出版社的左泥兄更是大力支持。当时她真有点春风得意。然而，过了不久有人暗中阻挠《诗人之死》出版的消息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一天，厚英气呼呼的对我说，她曾经闯入出版部门领导的办公室当面责问，为什么决定出版的事又反悔，什么人在背后搬弄是非，有本事就站出来同她当面对质。结果自然问不出个所以然，只是一阵“哈哈”了事。她知道该领导有口难言，她也知道自己到了无处抗争无法告状的地步。我见她将双拳攥紧举在胸前说：“我现在连吵架的人都找不到了”，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神态给我印象很深，每念及此，脑子里便跳出鲁迅笔下那个陷入“无物之阵”的“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但他举起了投枪。”“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厚英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此时经受的梦魇似的痛苦与那位“战士”十分相像。后来她回忆时说，这般经历使她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确实如此，当我读过一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之后，也才发现，《城堡》、《审判》里的老K，《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第22条军规》的尤索林这些人物的梦魇般境遇竟然会在厚英的生活中再现，实在可悲得很。

厚英创作的热情很高，《诗人之死》出版受阻，并未使她灰心，而是再接再厉又写出第二篇《人啊，人！》而且在广东找到了知音，上海方面虽然仍有人不肯罢休，但鞭长莫及，人家广东可不买你的帐，照出不误。1982年5月，我去广州开会，厚英正在广州写新作。其时，大环境比较宽松，广州尤甚。厚英赏饭，席间她大谈广州的朋友怎么热诚怎么仗义。看得出来，这是她自闻捷事情以来过得最为舒心的一段日子。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文坛的气氛又紧张了，于是《人啊，人！》又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靶子，罪名是宣扬人性论人道主义，正好符合“大方向”，公私一致。有的人，当面吹捧的话还言犹在耳，现在风向一变，马上慷慨陈词，批判有力；有的人，其实

切身感受过“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并非真的从心里要否定人性论，而是为了跟上形势，甚至是出于私怨，暗中幸灾乐祸。同她作对的人里面，有无一种连自己也不知道的被扭曲甚或变态的潜意识妒嫉忌恨心理？恐怕不能排除。

近两三年，因为不在一起工作，住处相距又较远，所以当面交谈机会不多，但知道她读老庄，啃佛经，前年还跑到雪窦寺向老和尚学习了半个月，似乎对人生有所了悟，不再像过去那样死心眼了，万万料不到，佛祖如来也未能成为她的可悲命运的逋逃藪。二个多月前，我曾写了篇悼念厚英的短文《戴厚英的性格》，结尾是这样：“呜呼！性本善良，意罹此难，苍天无限，哀哉厚英！”寄给上海某报，说是要用，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毫无动静，写信去问，稿件退回，原因是“涉及敏感人物”，“领导意思，不宜炒得太热”。倘若因文章本身问题，我无话可说。可是，“敏感”“炒得太热”云云，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不知道是哪一级领导的意思。从这一件小事，我好像也尝到了一点梦魇的滋味。

从1956年9月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到1996年8月在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厚英在上海整整生活、学习、工作了40个年头，然而，上海这块风水宝地并没有给她多少天时、地利、人和。尽管厚英有她的弱点和缺点，待人待物亦有种种不周之处，但她深爱着她的国家，她的家乡，她的亲人，她的朋友和众多弱小者，而命运对她却太不公平。40年来，厚英每每在生活的重要关卡，都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牺牲。一些事发生在她的身上，便弄得满城风雨，甚至惊天动地，从而使她更加成了名人。然而，她的这个知名度却是以她在爱情、创作方面的精神生活严重受压和最后肉体生命的惨遭杀害换来的。厚英惨遭杀害虽然是一次偶发的恶性案件，但是，梦魇伴随了她的大半生，却不能没有它的必然因素。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厚英向了空门，伤心事仍接踵而来，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愿厚英在天国销尽伤心事，愿厚英在天国彻底摆脱梦魇。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

毕生引人瞩目——痛悼戴厚英同志

曾文渊

有想到她走得这么早，更没有想到她是这么走的。

如此猝不及防，如此惨不忍睹，多么令人悲愤，多么不可思议！8月25日凶案发生后，大约晚上九时许，陆行良同志电告我此事，我不敢相信，希望是讹传，后来终于被证实了。此后接连好几天，家里电话不断，都是告诉我此事的，或者查询具体情况的。打电话者大都是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领导，可见大家对她的关切。现在，追悼会开过了，凶手也缉拿归案了，但戴厚英的形象，她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里映现。我为失去这么一位朋友而痛惜，更为文坛失去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而悲哀！

我认识戴厚英也是始于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的49天会议。戴厚英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她的能言善辩、思绪敏捷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少在我是这样的。49天会议之后，戴厚英提前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室工作；不久，作协机构内部调整，文研室扩大为文研所，我也调到那里。她在理论组，我在现代组，平时一起学习、一起工作，接触的机会也就不少。在文研所里，戴厚英给我突出的印象是思想敏锐、工作努力、学习勤奋。在理论组里，她负责的是戏剧、电影一条线，平时不仅认真阅读作品、作札记，还积极参加戏剧界、电影界的活动，和不少编、导演、演员交朋友，因此，汇报工作时，她讲得头头是道、内容丰富、生动具体，既有文学材料，又有活的见闻，往往能发人所未发，使人茅塞顿开。业余时间，她抓紧进修，既读理论著作，更读文艺作品，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等的作品，她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戏曲剧本，凡整理出版的，她也一本本地找出来阅读。有段时间，她还自学英语，借助于字典读原版小说，这在同辈人中是较少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她来自农村，父母、兄弟姐妹都生活在农村，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的甜酸苦辣有较深切的了解；为着接济家庭，她个人的生活很清苦，平时衣着朴素，从不讲究，几乎没有看到她穿过什么鲜艳华丽的衣裳，更不要说打扮了。

戴厚英的个人生活也是很不幸的。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第三者的介入，大约是1969年，她丈夫正式向她提出离婚的要求，晴天霹雳，她一气之下答应了，女儿由法院判给她抚养。她与闻捷的恋情，特别是闻捷自杀以后，弄得满城风雨，成为各界都关心的社会新闻，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更是大泼污水，把她说得一无是处，好象她爱上闻捷只是看中闻捷的地位、名气和财产，这最使她受不了。她与闻捷的这段恋情，在她遗作《心中的坟》里有详细记述，读者可以参阅。“文革”中有一年春节，戴厚英没有回安徽过年，吃年夜饭时我忽然想起这事，匆匆赶到作协探望，没有想到七时左右她已熄灯睡觉，听了我的叩门声，她回了一句：“大年夜有家的人热热闹闹，我们母女俩吃了没有什么事，就早早睡了。”听了这话，我心里不禁为之凄然：戴厚英她苦啊。

粉碎“四人帮”后，参加了康平路学习班，戴厚英到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任教，我则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和《文学报》工作。不在同一单位，住处也离得很远，见面机会少了，但彼此还是挺关切的，偶尔也可以碰到。她因创作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人啊，人！》而惹出风波，压力甚大；同时也名声大噪，在读者中很有点知名度。作为老朋友，我为她取得的成就而高

兴，而同时也不免为之担心。

戴厚英思路清晰，有相当的学术造诣，更有演说家的才能，她在讲课时能博得学生的热烈欢迎，这点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她惯于逻辑思维，后来居然写起长篇小说，而且那么酣畅淋漓，那么富于激情，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而为着阻止她作品的出版，有些人那么东“撬”西“撬”，企图把它们扼杀于摇篮之中，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诗人之死》在上海出版受阻转到福建去，福建方面先是答应出版后又搁了下来，后来终于在项南同志支持下出版了。见书后，我认真地读了，深受感动。这是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艺术上也许尚有稚嫩之处，但却有生活、有激情，人物形象也鲜明生动，是一部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人啊，人！》在写法上与《诗人之死》不同，几个主要人物轮流叙述，时空交错，广泛地吸取现代派及其他艺术方法的长处，写法甚新颖，也很有可读性。当时有朋友约我写文章批评《人啊，人！》，我婉言谢绝了。这倒不完全是从私人关系着眼，而是觉得对人道主义思潮怎么看，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都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采用大批判的方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且容易适得其反。此外，戴厚英还写了《空谷足音》、《脑裂》等一系列小说，报刊上还时有她的散文随笔出现。戴厚英是有才华的，她的才气既表现在理论批评中，更表现在创作上。如果说，她过去的不少理论文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留不下来，那么，她的创作特别是以自己经历为素材的知识分子三部曲将不断被人们提及，甚至成为专题研究的题目。在当代作家中至少是在同辈女作家中，戴厚英是艺术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位。她不仅从小受民间文学的熏陶，而且长大后博览群书，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唯其如此，她才能在短短几年中写出那么多作品，有的还颇有深度，能给人以哲理的思想。而这样一位很有希望的作家却死于非命，可惜啊可惜！

戴厚英是个悲剧人物，也是位充满矛盾的作家。在她身上，当代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弱点都表现得很充分。特别可贵的是不管个人生活道路如何坎坷，遭受过多少不公正的对待，都没有动摇对祖国的挚爱，对未来的信心。她每次出国都按时回来，不为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所诱惑，不为某些外国人的傲慢态度所吓倒，表现了拳拳的赤子之心，表现了中华儿女的堂堂正气！有同志说，戴厚英穹追求的是激烈的革命、纯真的爱情和完美的人性，这话讲得很好，可惜她的追求并没有实现或完全实现。戴厚英的悲剧和矛盾，有个人性格的因素，更多的则是急剧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所使然。戴厚英的一生大多是在磨难中度过的，并没有过多少舒心的日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这种生活磨就了她的性格，也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现在，戴厚英已经作古，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戴厚英的生活道路，她的为人、为文，作品的成就和不足，都值得总结，后者可以从中得到警戒，包括我本人在内。

戴厚英啊戴厚英，你活得好累，死得好惨，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

岁月沧桑忆厚英

邓牛顿

厚英生前曾经探讨过人的“前世”与“来生”的问题，似乎相信人有前世，亦有来生。这位出身于皖北贫瘠农村小镇的女作家，其宗教意识是浓厚的。我也出生于农村，知道来自中国农村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大抵都摆脱不了宗教氛围的笼罩，因为这是人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人世之谜有许多尚未揭开。所以9月3日那天，向戴厚英遗体告别仪式后从龙华归来，车子疾驶在高架路上的时候，我把胸前别着的小黄花使劲地朝窗外抛去，让它把我无尽的思绪撒向整个城市，乃至整个宇宙。仰看浩浩的蓝空，我在想，此刻，戴厚英正在升向天国，和大地上许许多多刚离人世的平民百姓一起，簇拥着，一齐飞向一个极乐的世界。因为我相信，她和他们都是好人，应该升天堂，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来生。

认识戴厚英，是从1962年10月我进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开始。那时，她在理论组，我在古典组。大家都是青年人，常常聚在一起工作学习，相处得甚是融洽。1963年冬，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对“鸳鸯蝴蝶派”和“鬼戏”的批判，成立了三个小组，由孔罗荪、刘厚生、姚文元三人牵头，前两人各带一至二名助手，姚文元资格差一点，个人单干。孔罗荪选择戴厚英和我做他的助手住在丁香花园里。那段时间，戴厚英和我在陈赓大将生前住过的那所房子里，面对面地坐着看了若干鸳鸯蝴蝶派的书和批判鸳鸯蝴蝶派的史料，整理汇编了一组资料，大幅度地修改了孔罗荪先生的文章初稿，并且合写了一篇小文章，均在《文汇报》上刊登。和小戴的深入接触，觉得她思维敏捷，聪颖过人，不愧为文坛的“新生力量”，应该好好向她学习才是。以后戴厚英、吴立昌和我三人还合写过一篇关于现代戏的文章，登在《文汇报》上。撇开60年代初的思想文化背景不议，当时我们所里青年人之间以各种方式交叉合作写文章成为风气，大家都并不在意列名前后，稿费分多分少，这种友情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是愉快的。

戴厚英是事业型的女子，住在作协食堂楼上的单身宿舍里，我经常笑她衣服浸在盆里三五天不洗，她总以没时间作借口为自己的“懒”而开脱。不过她确实事业心很强，不仅文笔佳，而且口才好，浑身充满着灵气。在上海滩上，我们同辈人中，我以为才华出众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的人有三个，戴厚英、沙叶新和余秋雨（他比我们小几岁），而戴厚英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尽管我们青年时代接受的是驯服工具论，但骨子里都有些桀骜不驯。比较起来戴厚英尤其突出，她生就的性格倔强、出言尖利、有理不让人。记不得是哪位领导问过我，戴厚英适不适合当头头，我回答得很干脆，不适合。因为凭着她处事待人的态度，我以为她对人对人真诚坦率，但不善于虚与委蛇，见风转舵，她不会，也永远学不会钻营和阿谀。

戴厚英能在文学上取得大的成就，跟她大起大伏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波澜密切相关。说得直白一点，她的成名，是用血泪与汗水换来的，是用才情和毅力铸就的。

《诗人之死》的出版，在上海受到阻挠，这给她以沉重的打击，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她那张又黑又黄的憔悴的面庞。好在，中国国土辽阔，可以迂回。广东、福建的出版家拯救了处在困境的她，使她的作品得以面世，并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虽然她事业上遭受挫折，感情生活上迭遭磨难，可

全国有许多出版社和报刊的编辑们长期支持了她的创作，她赢得了许多热心的读者。特别是有好些青年读者经常写信给她。我知道，这一切，是她这许多年来精神上的巨大支撑。

戴厚英一生命运多舛。文化大革命中在干校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挨整；八十年代初因为写作《人啊，人！》两次挨批。干校的那一次我虽然借调到市文化局工作，但也因为有炮打嫌疑而下放干校劳动，我亲眼目睹了她挨整的那一幕，大字报铺天盖地，气氛严厉，紧张逼人，可我心里坚信她不是反革命。八十年代那两次挨批，我跟她同在复旦分校中文系，自然就逃避不了干系。可第一次我硬说小说没看完，设法表态，第二次正巧我要到四川开会，躲过去了。她书中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对，怎么批判她？记得当时在任校党委书记李庆云同志很好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保护了戴厚英。他的举动深受爱戴，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建立了不可埋没的功绩。

她的职称评定也不顺利。评副教授时，她因事耽误了考外语，一个人关在资料室里补考，监考居然就是我们教过的刚刚毕业留在人事处工作的小青年。为此我十分不满，认为领导上居然一点也不考虑知识分子的面子与心态。好在戴厚英并不怎么介意。其中有的人没考就糊里糊涂地溜过了关，更多的人则是有过当干部的光荣经历。戴厚英认为要考就大家一起考，公平竞争。我对她说，这是上头的规定。为了平息她的不满，有一次我用了激将法。我说，老戴，你必须按照一个普通平民百姓一样地生活，劝她去参加外语考试。她勉强地去了，听说是一边考一边骂。结果成绩只有四十几分，没过关。这事对戴厚英打击甚大，以至后来一提评职称，她就要发火。我因为在系里做副主任，记得又有一次好心地去通知她评职称，她居然不留情面地把电话给摔了。我理解她，我当然原谅她。评职称要考外语，这大约是中国的特色，我不知道英国人评职称要不要考中文或其他的外国语？自然，我认为懂外语越多越好，只是以为不要作为评定职称的必备条件来卡知识分子。戴厚英的教授职称后来是领导上特批的。一位开明的领导说，“谁取得戴厚英那么大的成就，我们都特批。”需要补叙一笔的是，我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是戴厚英作的介绍，而戴厚英评教授，则是由我来为她写所谓的“学术鉴定”。而我一直认为，论学识、才华，她应该比我更早地成为教授行列中的一员。这就是历史！

四

戴厚英的生活一直很清苦。做小青年时钱少，当大作家时钱也并不多。在处理亲情关系上，她恐怕算得上是最传统的，所得稿费大部分用在孝敬父母，支持在农村集镇的兄弟姐妹。还有就是安徽家乡发水灾，她总是慷慨解囊。她那个皖北的家乡，确实相当贫穷落后。我曾有机会在那片土地上行走过，从她前夫张忠礼的老家正阳关步行70里到她籍贯所在的颍上县县城。戴厚英遇难后，上海《青年报》上刊登过一张照片，戴厚英和《青年报》记者相遇在安徽救灾第一线。要了解戴厚英的为人，就请来看一看这一张珍贵的照片吧！

我曾经劝戴厚英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因为我觉得她过得真太苦了。有一次，在复旦宿舍里，她给我诉说她的苦楚：一个人，从安徽老家回上海，挤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一路颠簸，弄得精疲力竭，进屋没有一口热水，一碗热饭，什么都得自己来，硬撑着干，病了也没人照顾。可天啊，找对象又不是拉郎配。要找一个能跟她说话，又甘于做这个成功的女人的背后的男人，

实在难寻。虽说有过几次际遇，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戴厚英没有后方！我们这些朋友，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都得为自己的生存而奔忙，即便抽空去看她几次，也确实难以分担她的那份孤独与寂寞。她只能在没日没夜的阅读与创作中寻找欢乐，寻找慰藉，安顿她那凄苦的灵魂。

五

因为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1993年9月，我从中文系调至中国文化研究所任所长之职。翌年春天，领导上与戴厚英对话，她表达了愿到文化所工作的愿望。有着多年的相交，我不能因为避“老同事、老朋友”之嫌而拒绝她。她来了，与所里同志相处得非常融洽，尤其是对李向平、田兆元两位博士分外关照，格外关心，对他们的才华称赞不已。可以说，这二、三年，是戴厚英心情比较安静、比较愉快的时期。

自然，这一段也是我和戴厚英接触最多的时光。因为住处相距不远，周五学习或平时上下班，都有机会见面，有时就一起走路或坐车回家，海阔天空地一道交谈，谈读书，谈文学，谈校内事和一些社会上的事情，我则经常询问她的生活状况，偶而我也登门去看看她。记得有一次她发烧得厉害，我去看望她，心里确实替她的这种生活景况担心。她跟我说希望退休，去当“专业外婆”。可她做事依然十分认真，对所担负的课程，兢兢业业，认认真真。我多次请她担任课程，她都从来没有回绝过。1994年4月10日，她的父亲去世，赶忙回了老家，不久，她给我来了一封信：

牛顿：您好！

我父亲突然于十日故世，匆匆忙忙赶回故乡，未及告诉同事。

现在殡葬事宜已经结束，但母亲身体不好，我自己也觉得十分软弱，所以一时不能回去，请代我向教务处请假。

一切回去再叙。

祝

好！

厚英 1994.4.17

这就是戴厚英对待工作、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在处理很多事情上依然循着传统的规则，也许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几十年来训练的结果。接信后我旋即于26日发出唁电：“伯父仙逝，遥致痛悼，请伯母和全家节哀。”

不过，戴厚英这些年来内心深处依然有许多不平。比方，她从美国回来，为了落实户口在上海费了许多周折。为了办理去韩国的事情，她在北京折腾了许久，结果依然没有成行。在国内文坛上她也似乎有些被冷落之感，旅欧赴美，都是她自个儿去的。有鉴于此，我在1995年1月4日《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戴厚英新作迭出》，将她的“教授”身分亮出去，告知社会。同年春夏之交，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她的大部分作品，写成《戴厚英论》，先由日本东京《中国研究》第8期揭载，复刊于1996年第4期中国西安的《小说评论》。我是8月13日收到的，8月25日她即不幸去世，来不及给她看，成了永远的遗憾。

六

1996年8月25日晚8时许，我突然接到本系钱乃荣教授的电话，说戴厚英在寓所不幸被害，消息来源是与戴厚英住得很近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立元教授。我立即打电话告知院党委书记，并通知系副主任邓朴安同志，请她立即赶赴现场核对事实，以防误传。半小时后老戴被害被证实。晚十时

多，我赶赴凉城地区派出所，和公安干警一起分析老戴被害的可能性和有关线索，直至十二点。记得戴厚英生前说过，“看着一个人衰老下去，是多么的残酷。”可如今，一个活生生的戴厚英就这样惨死在歹徒的刀下，这是多么让人不敢接受的残酷的事实。

从8月25日一直到9月3日，我作为所在单位的系主任和文化研究所负责人，全过程参与了戴厚英丧事的操办。院领导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根据“庄重”、“简朴”、“风光”、“有序”的要求，院里投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办理老戴的后事。我阅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所有唁函唁电。9月3日上午10时45分，龙华大厅的遗体告别仪式悲痛而隆重，洁白的花瓣撒满老戴的遗体。出席告别仪式的有她的师长杜宣、徐中玉、王元化等同志，有她的乡亲、同学、同事、朋友和读者。中国作家协会，海南省作家协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等六十多个文化、高校、新闻、出版单位，黄宗英、叶文玲、陈忠实、古华、岑桑、曾敏之、刘以、陈若曦等著名作家发来了唁电，吴南生、邓伟志等许多政界人士、文坛学者教授和海外华文作家也发来了唁电、挽联。花圈和花篮摆满了整个大厅，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向这位淮河的女儿、平民的作家作最后诀别。

人民不会忘记戴厚英！读者依然阅读着戴厚英的作品钦慕着她的人格精神。

1996年11月25日为厚英逝世一季度而致祭，愿她在故乡的土地上安息。

琐事几则忆厚英

姚汉荣

些天，中杰兄来电称：海南某出版社计划出本纪念戴厚英的集子，请他主持其事：相邀厚英的生前友好写些纪念文字。于是，中杰兄在电话中约我也写一篇。

不久前我突发心脏病，住了一个月医院。大病初愈，身心交瘁，对写文章这类事，颇感力不从心。但又断无向亡友交白卷之理，于是我欣然允诺。

我和厚英相识于1957年，屈指算来，四十年矣：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同处一个单位，加之我夫人和厚英又是大学同窗，所以我和厚英交往甚密，自然可写的东西是不少的，但究竟是什么呢？厚英惨死于血泊之中，一提起此事，我就激愤不已，但我的病又是最忌激动，所以我的文章只得避开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去写些生活中的琐事。

熟悉厚英的人，都说她是个炮筒子性格。她的嘴巴从不饶人，甚至多少还有点刻薄。特别是对她所不满的人，攻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她根本不顾场合，也不看看她所攻击的对象是否在场，总是要说就说，要骂就骂，而且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这种时刻，那些被她攻击的对象如果在场的话，真会进退失据，如坐针毡，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所以，有些人一谈起戴厚英的性格，便会大摇其头；但是，也有人点头的，因为她说了他们想说的话。

几十年来，戴厚英就是扮演这样一个风风火火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是厚英的全部，她同时还具有一个中国妇女所特有的善良、温顺、体贴和善解人意。不过这一面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不易被人发现，而我在跟厚英的长期交流中，对她的这一面却感受颇深。

戴厚英的夫妻生活是不幸的。

她的前夫，是她中学时代的同学。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中学毕业，双双考取了上海的两所名牌大学：男的同济，女的在华东师大。同一城市的几年大学生活，进一步发展了双方的感情，所以尽管大学毕业后女的留在上海，男的分在安徽，他们还是很快就结婚了。

厚英的丈夫，风度潇洒，一表人材，我们常常和她开玩笑；别人家夫妇是郎才女貌，你们这一对却是郎貌女才。听到人们对她丈夫的赞美，厚英心里是乐滋滋的。婚后的最初几年里，夫妻琴瑟和谐，感情弥笃。但是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丈夫耐不住感情的寂寞，终于和别的女性发生了婚外恋。当戴厚英得到这意外的信息时，她如雷击顶，满腔怒火，于是向她丈夫“兴师问罪”。但当丈夫向她痛哭流涕，自我检讨后，厚英的一腔怒火未经发泄便烟消云散了，接下来便是夫妻抱头痛哭。

后来厚英在和我们谈起此事时说：“我最经不起别人的眼泪。一见他的眼泪，我的心就软下来了，原来一肚子的怒火，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说实在的，他是犯了错误，但也还有他的原因，我既然原谅了他，剩下的，就只有爱，只有柔情，站在我面前的，仍是我所爱的人。”

又经历了几番风雨，厚英的婚姻终于破裂了。在那政治动荡，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厚英的生活很坎坷；政治上，她不断受批判；生活中，她也孑然一身。就是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独力支撑着一个家，抚育着年幼的女儿。在很长的时间里，戴厚英和前夫断绝了联系。但女儿慢慢地长大了。女儿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她对含辛茹苦，独力抚养自己的母亲，充满了理

解和挚爱。但她不能只有母爱，没有父爱啊！特别是一个充满文学气息，感情丰富的女孩子，是更渴望得到父爱灌溉的。于是，女儿瞒着妈妈，偷偷和爸爸进行了通信。当戴厚英了解这一情况后，她想干预，想禁止，但继而一想，还是让女儿这样做去吧！之看，厚英和我谈起此事时说：“一想起他是一个对妻子、孩子、家庭都不负责的人，心里就气；女儿竟然还跟这种人通信，我心里就冒火。但冷静想想，女儿的做法也有道理。孩子的成长，是应该得到父母共同的关注和抚爱的，但是在我们这样夫妻离异的家庭，孩子却不可能得到父母共同的爱，实在是我们做父母的愧对孩子。现在，孩子要争取她所应该得到的父爱，这是她应得的一份权利，我是不应该进行干预的”，厚英这种对前夫的宽容，对女儿的深情挚爱，使我深为感动。现在社会上，夫妻离异的家庭不少，为了财产分割，为了子女的所属，不是诉诸法院，就是终日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直至闹出人命。厚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1960年暑假，在戴厚英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的同时，另外两名女大学生也同时分配到上海作协。尽管她们性格各异，但三个姑娘年龄相若，且都才华横溢，相互之间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三个姑娘情同手足。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一个人们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岁月。忽然，其中的一个姐妹出事了。一天，戴厚英对我深情地说：“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十多年，对她的了解就像对我自己了解得一样清楚。她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所以，即使她出事，我还是认为她是个好人。十多年在我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决不会因为高墙和铁窗的阻隔而断绝。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她的孩子还小，但我想过了，到那时，我会负起一个母亲应有的责任，把她的孩子抚养成人。”对友情是否真诚？在那种惊涛骇浪的岁月里，是对友情最彻底的考验。许多声称有深情厚谊的朋友，转眼成了怒目相视的仇人。可是，在裂岸惊涛袭来的时候，厚英对友情却这么执着和坚决，使我对她更为钦敬。

因为戴厚英是著名作家，课又上得好，深受学生的爱戴，所以不少青年教师喜欢到戴厚英家去串门，和她随便聊聊，同时请教一些问题。我教研室有位大龄姑娘也是去戴家串门的常客之一。对于这个姑娘的真诚、热心，戴厚英极为赏识，因此，对她的婚姻问题也更为关心。有次厚英碰到我后劈头就说：“老姚，对她的婚姻不多关心点呀！在我和她的接触中，虽然很少正面谈到她个人的婚姻问题，但我总感到她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孤独感。时代耽误了她，让她这样的姑娘至今还没找到理想的对象，老天对她实在不公平。但是，我还是相信，最终上帝会让她找到一个好丈夫的。”厚英和丈夫离异以来，二十多年中，一直过着单身女人的生活，其中虽然也有不少男性钟情于她，甚至已经敲开了幸福的大门，可是命运终于使她失去了最钟情的。在婚姻问题上，厚英的一生是最坎坷的。可是，她在这个大龄姑娘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种真挚、热情、体贴、善解人意，实在是感人肺腑的。

厚英就是这样一个人：野与文，粗与柔，火爆和纤细是如此舛忤，却又如此真实地统一在她的身上，而统一的基础，就是她的率真和坦诚。

晚年的厚英，喜欢读老、庄，以后又沉溺于佛经。我们每次见面，她总要和我谈论佛老，甚至更深夜静的时候，她也会来电话和我谈老庄和佛经，她似乎已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不过，庄生虽表旨于物外，实是未出尘外之

大悲者；佛陀悉尼多，大苦、自苦之人，其“三藏”真经，据说深悟世间无常，色空聚散诸理。我不知厚英是深悟了其中玄理、佛理的女弟子，抑仍是个徘徊于佛老门外并未忘情世事之人。但是，作为朋友，我却真诚地祈求这颗一生追求真、善、美不得而痛苦不安之心，能在天国安定下来。安息吧，厚英！

一生坎坷，不断与命运抗争

燕平

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1996年8月25日，我象往常一样，刚洗好澡在看电视。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拎起听筒，一个熟悉的带着颤栗的声音传来：“施老师，你知道吗，戴厚英被害了！”

打电话来的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殷仪副教授。这真是晴天霹雳，太令人意外了。我说：“她不是到安徽老家探亲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了？”

殷仪同志平时身体不太好，加上受这突然事件的刺激已经无法回答我的问话，只听得她说：“我不行了，我头痛，我头痛……”随即“咔嚓”一声，电话挂断了。

我心乱似麻，马上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文学院的同事了解详情，但许多人和我一样，并不知道此事。最后从一友人处得知，消息是从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那里传出来的。于是我赶忙拨电话至吴家，但是拨了多次，并无人回话。这更增加了我的焦急和不安。一直到深夜，我终于打通了老吴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中杰的夫人高玉蓉教授，从她口中，我知道了戴厚英被害的事实。

9天后，即1996年9月3日上午，我去上海的龙华殡仪馆为不幸遇害的戴厚英送行。两年多前的一个冬天，我曾经和戴厚英一起在这里参加过一个追悼会，那是为送别戴厚英踏上文坛后的第一个顶头上司王道乾同志。万万没有想到，时隔不过三年，当我再次来到这里，竟然是为身体健壮的戴厚英送行。

殡仪馆大厅里，摆满了花篮和花圈。前来送行的人群已挤满了厅前的院子。陆续前来的，有她的大学教师徐中玉教授；著名的作家、散文家、80多岁高龄的杜宣，拄着拐杖，在女儿的搀扶下也来了。此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的一些教授、学者、上海的部分作家，出版社的朋友和来自她安徽老家的亲友、同学，和一些并不相识慕名而来的热心读者。据我知道，这些胸前佩着小黄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从报上看到戴厚英女儿戴醒刊登的《讣告》后自愿前来的。

厅堂里布置得庄严肃穆，中央挂着盖有黑纱的戴厚英遗像。对于照片，戴厚英曾在一篇题为《留影》的随笔中提到过：她不喜欢把她拍得太美，当然太丑也不行。她崇尚真实。而这一张黑白的照片，显然是由她女儿按其妈妈的意愿精心挑选的。照片上的戴厚英衣着朴素，尽管戴有一副近视眼镜，但在眉宇间仍能透出她的睿智和聪颖。眼神有沉思感，仿佛还在构思酝酿一部新的长篇著作。

在向遗体告别时，我致礼后默视良久。感谢殡仪馆化妆师的高超手艺，使这位惨遭砍杀二十多刀的死者，并没有露出惨不忍睹的伤口。白色的纱布围住了颈项，一直到她的下巴，双眼紧闭，脸色黝黑。眉角间似乎透出一股怨气。据说，和戴厚英同住一院的一位气功修炼者，在戴厚英遇害后，曾用气功测出，说戴厚英的阴魂不散，屋子四周弥漫着一股怨气。是呀，她怎么甘心就此撒手西去？十多年前曾经有一位看手相的人说她可以活到85岁，她当时欣喜地想：还有四十年好写，如今，鬼使神差，把这两个数子前后倒了一下，她只活了58岁，一下子勾去了23年珍贵的岁月，她怎么能甘心呢？

“小钢炮”和“傻丫头”

我和戴厚英相识于1960年。30多年来，我们几乎始终在一个单位里共

事。先是在上海作协，我们在一口大锅内吃饭，一起经历了动乱岁月，一起下干校。“四人帮”粉碎后，我们又一起进了复旦大学分校（即现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一起在中文系教书。几十年交往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遇害后，我在家中整理有关她的遗物中，竟然发现我还保存了她 24 封来信（这当然不是全部来信的数字，有的随手扔掉了）。重读这些来信，使我联想到许多往事，昔日的种种经历，反复在我脑海中浮现。

那是 1960 年的春天。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这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例会，开个三五天也就收场了。谁知在 2 月 25 日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作政治形势报告时，提到了要批判十八、九世纪外国文学中所宣扬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分组讨论时，在一片赞扬和拥护声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噪音”。几位在高等学府讲授文学理论的教师和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老作家提出了异议。于是阶级斗争嗅觉灵敏的有关领导，把这视为资产阶级文人挑战的信号，决定组织力量反击，而且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为了扩大声势，培养批判的新生力量，会议邀请了华东师大、复旦、上海师大三所高校的部份师生代表参加。戴厚英作为华东师大的学生代表，带着青年学生的朝气、锐气、风风火火跨进了作协的大门。会议开开停停，历经 49 天，所以被称为“49 天会议”，到 4 月 13 日才宣告胜利闭幕。

在最初几天，我们对这位来自安徽农村并带有满身土气的女学生并不在意。她那朴素的衣着，毫无修饰的一头短发，太阳晒黑的脸上架了副在地摊上随处可以买到的近视眼镜，相貌平平，举止随便，怎能引起众人的注意。一直到有一天，她拿着按领导意图写成的批判稿，在作协大厅批判发言时，她那带有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调激昂，口齿清晰，她基本上不看讲稿，滔滔不绝，不打一个“嗝登”，没有一句重复，连珠炮式的责问，震惊了全座。

她的发言，象一把盐撒进滚热的油锅，不仅在当时赢得了满堂掌声，而且在会后，在作协机关引起巨大反响，我们《萌芽》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更是赞佩不已。这一天，在食堂的餐桌上，在二楼、三楼的过道走廊里，她的发言，成了大学的热门话题：“多厉害的嘴呀，象是一门小钢炮！”

“……”

她那“小钢炮”的绰号，就是这么叫开的。之后不久，她受到提前毕业分配的“恩宠”，正式走进了上海作协的大厅，在文学研究所内，占领了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的席位。从此，我们就成了同事。

戴厚英绝顶聪明，但有时又傻得可笑。她对人世间许多复杂的事，看得十分简单，常常会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她的性格刚强豪爽，对看不惯的人或事，即使是天皇老子，也敢顶敢撞，只要有理，就据理力争，她不懂得也不会使用一点应有的策略，必要的节制和妥协；她的感情丰富但又比较脆弱，容易激动，动辄流泪，看电影，读小说，念家信，有时也会偷偷流泪。与人交往，只要投机，便会捧出一颗透明的心来，以为别人也会象她一样坦露内心的秘密，结果常常受骗上当。由此记不起谁给她取了并无恶意的“雅号”：傻丫头。一直到她成名以后，熟悉的老同事还这么叫她。这绰号她本人也乐意接受。“小钢炮”和“傻丫头”，这两个互不搭界，相去甚远的绰号，却十分贴切地统一在她一个人身上。

总之，年轻的戴厚英是个风趣、调皮、好强、善辩、天真的“傻丫头”，这一切，在普通情况下，无可厚非，但是在六十年代这个特定的时期，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岁月，就难免吃亏，甚至摔跟斗了。

“造反”生涯

戴厚英在业务上，大家是公认的。她写的文章，笔锋锐利，逻辑缜密，文采也好。她这枝笔，在紧要关头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因此当上海作协的秘书长兼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孔罗荪，奉命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时候，就看中了戴厚英，成为他两名助手之一。但是在政治上，对她是有看法的。我当时是上海作协党支部成员，支部书记是由人事科长兼的。在支委会上，支部书记多次提到过戴厚英的情况，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她本人在反右期间也有右派言论，差点划为“右派学生”，这当然不是他的捏造，而是从她的档案中获知。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又说她政治上动摇，给“三面红旗”抹黑，散布安徽饿死人的“流言”。她结婚以后，又传来消息说，她丈夫也是差一点被划为右派的人。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岁月里，“右派”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亲属中有一个右派，政治上就会受到歧视。何况戴厚英除了政治因素，还有思想问题，有“个人主义”，还有“无组织无纪律”，其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如为了纪念结婚一周年，竟然超探亲假一天；平时对领导的工作安排，工作方法，总是她的意见最多，常有异议，因而在领导的心目中，她这个“工具”不够“驯服”，总有点“疙疙瘩瘩”，由此种种，尽管戴厚英向往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打了入党申请报告，但在支部发展对象的名单中，从未把她列入。即使是在她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时因表现突出，能吃苦，不怕累，不怕脏，对贫下中农有感情，工作队建议上海作协的党支部发展她入党。但我们的支部书记还是摇着头否定了。说像她这样的人，需要长期的“考察”和“锻炼”。为了给她创造更多的“考察”和“锻炼”的机会，当作协每有下乡下厂劳动的任务时，支部总是“优先”想到她。

一直到文革初期，党支部对她的看法并无改变。记得当时，我被市委宣传部指定为上海作协的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领导小组对全机关人员作政治排队，按照市里的要求，一共分为四类，即：好的；较好的；问题较多的；性质严重的。而戴厚英则被排在第三类。

在十年动乱中，戴厚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对此，外界一直有许多说法，一直到她遇害之后，在晨练的公园内，在喝早茶的馆子里，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在传说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对她的这段经历，也有多种传说。早在1984年，有一位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在香港出版的《香港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代沟——几代人，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一文，其中称戴厚英是靠极左路线飞黄腾达，并在上海作协残酷地虐待过许多老作家的人，稍后，在1986年，他在德译本《人啊，人！》一书上写了个“结束语”，重复了这样的观点，由此迫使戴厚英在德国旅游期间一再加辩驳，澄清事实，并在回国后公开写出了《得罪了，马汉茂》一文。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1966年8月，全国红卫兵运动掀起时，上海作协一夜之间，在当时领导组织下，除了被勒令靠边的人外，老老少少都成了“红卫兵”。戴厚英的臂上也套起“红卫兵”的袖章造反了。但在这个阶段，虽然天天高喊“造反”，其实“保皇”。她除了按领导布置，和大家一起查批判者的文章，写大字报外，还由领导安排到上海市委门口，去和北京来的红卫兵展开激烈辩论，历数上海市委是革命的种种理由。有一天上午，上海师院开来两卡车红卫兵，要作协交出老作家魏金枝，因魏金枝除了担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外，还兼任上海师院中文系教授。当时作协领导小组的主要头头；是一位著名诗人，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采取避而不见，责成

口才出众的戴厚英以红卫兵的身份去应付。戴厚英即挺身而出，在作协大厅内与对方辩论，她滔滔不绝，历数不能让他们带走魏金枝的种种理由，讲到激动处声泪俱下。那些乳臭未干的“革命小将”当然不是她辩论对手，只得败下阵来，草草收兵。老作家魏金枝因此少受了一次摧残和折磨。当然，戴厚英是不甘心这种奉命行事的，外界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报纸上火辣辣的号召，同作协机关的温吞水式的运动气氛，很不协调。于是她和研究所的另外两位青年，公然越出轨道，写了一张矛头直指领导小组的大字报。这使当时的一位主要负责人特别紧张，认为这是转移大方向，为了及时扼止这种“苗子”，除了组织会议批判，发出警告外，还责成我找她个别谈话。记得在7月14日那天，我找戴厚英和另一位女同志谈了一次话，名义上是征求她们对机关运动的意见，实际上是进一步摸摸她们的思想动向，防止她们走得更远。由于我们相处得还可以，彼此不存芥蒂，加上戴厚英的直爽性格，她毫不掩盖地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她说能参加这个运动，很开心，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她怀疑现在的领导小组能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为什么领导小组只是动员大家批判谁，揭发谁，而自己身上同样有问题，为什么不引火烧身？为此她希望上级派工作队来，对我们这几个人领导机关运动她不放心。而且直接批评了我，说《上海文学》上发了这么多毒草，作为编辑部的负责人难道没有一点责任？

到了1966年12月中下旬，她觉得机关运动并无多大起色，便和所内的另一位女同志公开宣布自己解放自己，并擅自离开机关，到外面世界去感受“新鲜空气”去了。她们去了几所高校，参观了几个兄弟艺术单位，看了大量的大字报，那些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那些“修正主义”的活动，她都信以为真，太触目惊心了，要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江山！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在她心中汹涌。回到机关，她和所里六、七个观点相同者，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取名为“火正熊”。戴厚英成了这个组的组长。这时，整个作协机关已经乱了，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除了所谓“牛鬼蛇神”和处于半靠边状态的人外，都按照各自的观点、兴趣、亲近、疏远，自发组成战斗小组，宣布造反。小小的作家协会，出现了十几个战斗小组，取名更是五花八门，什么“云水怒”（这是针对“火正熊”而取的，同样是从毛泽东诗词中摘出来的三个字，用意是以水压火）、“解放”、“驱虎豹”、“战恶风”、“舍得刚”等等，《上海文学》的一位工人作家自称为“独立大队”，一个人独立活动。这些小组个个宣布造反，但一个组一个主张，有的要打倒这个，有的要打倒那个，观点不一，于是就展开辩论，大打派仗。一直到报上号召大联合，各组的组长联合在一起，组成“勤务组”，戴厚英一度成了五人勤务组的成员之一，排名为第四。

如果说，在这之前，戴厚英是一直作为“工具”在奉命革命，那么这一个时期，她是真的“造反”了，她串联、辩论、写大字报、打派仗，都是本着她志愿保卫毛主席的狂热激情下干的，不是出于谁的指令和组织。应该说，在批判“党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大毒草”时，她从未打过人，或指使人进行任何肉体摧残，但是她的那些大字报，她的那些批判发言，上纲上线，调门之高，确是与众不同，为了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她宁左勿右，事事冲在前头。不仅在上海作协，有时还跑到出版单位去帮助“点火”。戴厚英就是在那个阶段，得罪了相当一部分人。这些人在若干年后，有的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一切，相逢一笑罢了，有的却耿耿于怀，成见根深蒂固，

个别的甚至一有机会就给她制造一点是非，在她落难时不惜踩上一脚。

马汉茂所讲的“残酷地虐待过许多老作家”，其真相就是如此。

本人在领导小组当了两个多月的“领导”后，很快便以“黑帮忠实爪牙”的罪名拉下来了。之后，我这种半靠边的人没有资格参加造反组织，但可以自己选择去“兼”一个战斗组。我当时认为戴厚英她们几个战斗小组联合成立的“战恶风”联合战斗队更革命一些，因此就“靠”在她那里。这样，戴厚英就成了我的“头头”，而且戴厚英一度还奉命办了个批判刊物《文艺革命》，她是这个刊物的头头，我是作为可使用的干部，在她麾下干些具体的编辑事务。但是，戴厚英不是当“领导”的料，特别是在那样复杂、混乱、动荡的年代里。她不懂得权术，缺乏应付自如的本领，常常凭一时的冲动行事。她的聪敏，使她接受“新潮流”特快，报纸社论里一天一个调门，一天一个指示，她跟得特别快，报纸社论里一天一个主意，经常180度大转弯。几天前，她还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呢，一口一个“春桥同志”叫得很亲切，几天后，当她还从另外两个头头处听到张春桥是大叛徒、有严重问题时，她就在机关的全兵团会议上声泪俱下地高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并带了一部份人连夜到马路上张贴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去了。打派仗时，她这一派人日夜磋商，如何抓住对方的“辫子”，挖他们的“疮疤”揭他们的底。到报纸上号召“斗私批修”时，她又心感有愧，是“私”心作怪，于是在会上她把背地时偷偷摸摸的活动，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毫不遮拦藏掖，这就向对方提供了进一步打派仗的“炮弹”。同组内的人一再批评她忽左忽右，摇摆性特强。“你这么快的急转弯，我们实在跟不上，都要被你摔掉了。”其实，这个阶段的戴厚英，仍然没有摆脱“奉命”两字，所不同的是过去她是奉机关的领导行事，如今是奉报纸上的社论、号召在行事。如果翻开当年的报纸，对照她当时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证明她的“紧跟”是非常及时的。但戴厚英毕竟是有思想的，有独立思考的一面，在一次“亮私”的会议上她说过，在白天，按“两报一刊”上社论的调子，挥着语录本本喊“打倒”、“批臭”，到夜里静下心来想想，这一大批的知名人物，个个成了黑帮，成了反革命，这会不会是过头了呢？会不会冤枉了好人？她的内心好矛盾啊！幸亏她这个“头头”前后不过当了三个月，到1968年9月20日那天，人们敲锣打鼓，排着长队，挤在文化广场门外迎接工宣队进驻文化系统后，她的造反生涯就结束了，而且前后两次被当作批判斗争对象。在人妖颠倒的那个年代里，这种变化不足为奇，奇的是戴厚英的独特性格，当她成为全机关的众矢之的时，她那“狂妄”的举止，不知进退，顶着上面的态度确是少见。这是她性格上的优点呢还是弱点？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赞赏，有人鄙夷。

批判风波和“闻戴”之恶

对戴厚英的第一次批判，是在上海市松江县的一个名叫辰山的小村子。当时上海作协在“备战”、“拉练”的口号下，移驻到该地。在“狠抓现行反革命”的动员下，工、军宣队有意识地把矛头转向戴厚英。中心问题是两个。一是炮打张春桥，二是她当头头的时候，对作协的一批“走资派”脉脉温情，每次批判时，她就溜掉了。在当时，许多人一批就倒，大字报一围攻，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可是戴厚英不，她吵，闹，顶，人家发言批判她，她不象一般人一样，老老实实，低着头，好好记录，而是抬起头，听着，听到有歪曲的不实之词，她就马上反驳，尽管主持人要她端正态度，耐心听，她还是要声辩。我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作为朋友，我曾经小声提醒她注意对

工宣队的态度，不能对运动有抵触。她大声回答我说：“工宣队意见对的我接受，不对的，我说明，这态度不对吗？”又说：“我对运动没抵触，对有些大字报是抵触的，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给我戴反革命的帽子！”特别使人显眼触目的是戴厚英的神态，她倨傲不屈，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不避人群，照样与勤杂人员，炊事员等谈笑风生，大声嚷嚷，对眼前处境，根本不当一回事。她说：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灰溜溜地抬不起头。这时，作协机关正要从辰山各干校转移，对她的批判，暂时告一段落。

1970年3月7日，作协全体人马进了干校。干校的全名为“五七干部学校”，那是根据“五七指示”的精神举办的。干校设在上海南端濒临东海的奉贤县所属的塘外镇以南，在这片茅草丛生的盐碱地上，集中了上海市级的各个文化艺术团体，故又名“文化干校”。

对于农田劳动，戴厚英不象城市出身的那些女同志视为畏途。她原本出身于农村的小集镇，同劳动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进了上海作协以后，又多次被安排到乡下劳动，所以在女同志中，她的劳动是一流的，无论是挑粪、开沟、填土、打夯，她都可以和身强力壮的男同志比个高低。但是，从辰山掀起的那场批判并未结束，几天以后，雪片似的大字报又出来了，其来势之猛，远远超过了辰山，芦苇织成的笆墙上贴满了，就在宿舍门口的空地上竖起竹杆，拉上铅丝，大字报就挂在铅丝上。军宣队的一个头头在总结时得意地说，在短短十天内，共贴出了400多张大字报，还收到50多份检举信。其中多数是针对戴厚英的。戴厚英呢，仍然我行我素，有时也写大字报，进行辩驳和澄清。她说：群众运动嘛，我也是群众，为什么不能写大字报？工宣队要她作检查，她在会上对自己的极左思潮，炮打事件，承认有错误，但都是事出有因，她盲从了。检查完，她依旧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挑担子时大声地打着号子。这场批判，前前后后，大约持续了三个月左右，最后，实在抓不到她更实质性问题，运动的中心转了，对她的批判也就偃旗息鼓了。过了一个时候，为了表示对“新干部”（指造反后当过头头的）落实政策，就封戴厚英为抓生产的大队长。

此时，诗人闻捷也已“解放”，同样是为了表示落实政策，安排他担任了生产队长，论关系，他是在戴厚英的“领导”之下。戴厚英是总的领导，闻捷不过是具体安排一些生产事宜，如谁去种菜，谁去开沟等等。相同的命运、志趣、使他们在日益增多的接触中，产生了感情。有关闻、戴的恋爱经过，戴厚英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和她遇害后出版的《心中的坟——致友人的信》两书中作了详细的描述，用不到我再重复，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把见到的以及当时的情况，作些补充。

前些年，上海的一位传记作家采访戴厚英，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戴厚英曾痛心地说：“他（指闻捷）的吃亏在于不虚伪，在那样的日子里不懂得伪装自己。”这自然是痛定思痛后的泣血之言。

其实，戴厚英自己当时何尝懂得伪装？他俩都太天真。闻捷是诗人，感情容易冲动，按说，戴厚英是搞理论的，应该多一份理智，遗憾的是他们两人都被渴望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平心而论，那是谈情说爱的年月吗？每天傍晚，他们都在一条河边的长堤上倾心交谈，开始，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他们是研究生产，但很快就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一般了，从她特别轻快的步伐中和兴高采烈的眼神中，都能感觉到她已陷入爱河中了。有一次，他们去附近生产队联系生产事宜，中途下了场暴雨，深夜回来两人都淋得象落汤鸡，可

他们毫无怨言，相反兴奋得像小孩子一般。最惹人显眼的是在食堂排队买饭菜，通常都是各自拿回宿舍食用。只有他俩，在空荡荡的食堂里，蹲在一个角落里，旁若无人地边吃边谈，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

对他们的恋爱，同事中大概有三种态度，一是戴厚英的一些对立面，他们是唯恐戴厚英身上不出一问题，多少带点幸灾乐祸的态度，关注着问题的发展，他们知道其结局是不会圆满的。另一种是坚实的反对，这主要是研究所内的一批小兄弟，其中有几个是原则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他们是以“娘家人”保护“弟妹”的身份激烈反对，除了觉得年龄相差太大（闻捷时年47岁，戴厚英是32岁，相差15岁），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觉得闻捷是文艺黑线方面的人，而戴是造反派，两人不应该结合在一起。还有一种则认为他们的结合未尝不可，但现在不是时候，至少不能太张扬，否则影响不好。我就是属于后一种。记得戴厚英和我谈过他们俩的关系，并想知道我的看法，我就表示了上述的观点，要她注意影响，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中，不要表露得太亲密了。但戴厚英当时完全受奔放的激情支配，根本听不进。她说：“那怕什么，我爱他，他爱我，这就行了。我们有什么不对？”

终于工、军宣队公开出来干涉了，这个迫害过程，一直到闻捷自杀，戴厚英都写了，我不再重复。记得是在1971年1月14日上午，我们在作协大厅里听头头传达一个报告。这一天，会场的气氛十分异常，先是有人把一个头头叫了出去，不久这个头头回来，马上写了一个纸条塞给《上海文学》的一位女同志，不久又把《上海文学》的一个人叫了出去，又不久，把工宣队、军宣队的头头叫了出去，最后又把戴厚英叫出。这一切，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的。自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坐在我身边的邢庆锋碰碰我身子说：你觉得吗，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我问：什么事？他说：你看看会场上少了谁？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少了闻捷。邢点点头。我想了想，在记录本上写了两个字：自杀。邢问：你怎么知道？我说：是估计。戴厚英出去后没有再回到会场来，传达在继续，真实的消息一步都没透漏，一直到下午，在会议休息的间隙，一贯消息灵通的何小雄，在厕所内关上门小声告诉我，说闻捷已在今天清晨自杀。他走得十分从容而悲壮，桌上有酒杯和空酒瓶，有满碟的烟头，证实他喝了不少酒，抽了不少烟，还写了遗书。他十分细心，生怕煤气泄漏进女儿的房间，把通向女儿的门窗关好，用纸条把缝隙封严，他还把钥匙塞在房门的锁孔里，大概是防止女儿用钥匙去开门，身上还罩了一块雪白的床单。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向扼杀他们爱情的人，作了最后的抗议。

第二天，也就是1月15日，一些人奉命去医院献血，在医院里，我遇到了戴厚英，只一天功夫，她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了许多。谈起闻捷的事，她就告诉了她在《心中的坟》一信中所提到的闻捷送两张照片给她及照片背后的题词的事。同时，充满遗憾地说：现在回想起来，闻捷死前已有预示，如要她经常和他的两个女儿通讯，还说他正经历着生与死的搏斗等等。但当时她气得糊涂了，没有警觉到这点。如果那天她去他家的话，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到16日的下午，机关召开了批判闻捷“自绝于人民”的大会。戴厚英没有参加，有人反映她托人买了两包香烟，一个人关在宿舍小楼上。工宣队马上派人去“侦察”了一下，回来汇报说，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对着闻捷的照片，不住地抽烟流泪。这汇报，有没有添油加醋，不得而知。但这个打击，

使她的内心痛苦到极点都是事实。她病倒了。在献血那天，她就昏倒在输室内。有人担心她也会走绝路，但她没有步闻捷的后尘。说死是没有用的，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把痛苦埋藏在心底。

闻捷的死，先是一切攻击都集中到闻捷身上，而在“四人帮”粉碎以后舆论转向了，所有“罪名”都推到戴厚英身上，归结到一点：闻捷是戴厚英害死的；有人把她描绘成狐狸精式的人物，谁碰谁倒霉。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种恶毒的流言害人匪浅，不仅在上海，在外省，在北京，以至在国外，都有类似的风言风语。

戴厚英在闻捷问题上究竟有无责任。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她不懂得伪装，不使用欺骗，不会口是心非。如果稍为使用一点手段，把真挚的爱藏在执着的心底，那么度过肃杀的严寒，终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时候。可她没有这样做，她太认真，当她知道严重的阻力来自张春桥的黑手时，她真的以为无法挽回了。

从《人啊，人！》的批判中奋起

戴厚英真是一生坎坷。闻捷死后，大概半年左右，当她刚从这场灾难的感情风波中挣扎出来，又成了深挖“5.16反革命”的对象，她又经历了一次沉重打击。这些我就不再细述“四人帮”粉碎以后，她先后写了《诗人之死》、《人啊，人！》等长篇小说，其出版过程，又经历了种种曲折，这里要记叙的是有关对《人啊，人！》的批判。

《人啊，人！》一书，以鲜明的风格和独特个性，很快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但出版不到一年，就在报纸上出现了批判文章。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发表的评论和批判文章，多达六、七十篇。影响之大，波及海外。

今天再来讨论这场批判的是非曲直，已无必要，历史和广大读者已作出公正的结论。现在，问题已非常清楚，这场批判，名为“学术讨论”，实际上是和当时的“清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知怎么传出的，有人说戴厚英是属于“三种人”，只是由于“清查工作的疏忽，才没有被定成为敌我矛盾。”还说她“过去从左的方面向党进攻，现在又从右的方面向党进攻了。”这种结论传到市领导的耳朵，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了。

这场历时很久的批判，对戴厚英的影响和震动是巨大的。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她的第一个感觉是：“仿佛1966年夏季的那场风暴又掀起来了”，“的确有点招架不住。”

1979年，我从北京回到上海，随后调入复旦大学分校（即今天的上海大学文学院）。而戴厚英此时也由复旦大学转到分校。我们都在中文系任教。相隔不过两三年，我们又同一个财务部门领取工资了。

对《人啊，人！》的批判开展以后，在学校里引起了很大震动。分校的党委首当其冲，对本校的一位教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能置之不理呢！党委书记李庆云是位老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在复旦大学担任组织部长了。他为人厚道，政策性强，对教师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他几次对我就说：“老施啊，《人啊，人！》这本书究竟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组织几位教师认真看一看，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座谈一当时，中文系主任已去日本讲学，我作为副主任，代理系的行政工作。从感情上说，对这么一本书，发动如此声势浩大的批判，我认为是不正常的；把它说成是“对新社会血泪的控诉”，更不能接受。但作为系领导，又不能置身度外，我只得找了几位教师，请他们抽空看看这本书，但是经历了极左思潮的各种冲击，大家对这种

无限上纲上线的批判已经不感兴趣。好在学校不是坐班制，一星期只去两个半天，其间不一定都与党委书记照面，能拖则拖，幸好系主任讲学归来，我也就卸任在上海各报批《人啊，人！》最激烈的时候，戴厚英正在广州。花城出版社的领导和几位编辑，通过《人啊，人！》一书的出版，与戴厚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此，他们邀请她去广州创作第三部长篇。走前，我们请示了党委，是否同意她去。当时批判已经开始。党委研究以后认为，限制她的行动自由是不对的，经向市教委办的有关同志打过招呼后，同意她赴广州了。之后，我作为系领导之一，又是朋友，和戴厚英通话联系较多，上面提出的她给我的信，有多封就是这个时期写来的。

上海各报的批判，引起许多广东读者的关心，特别是大学里的师生，知道她在广州，慕名求见的很多。戴厚英在1982年3月19日给我的信中就提及，对这种求见，她“基本上谢绝。但是实在难办”，“身为教师，对这些同行和学生拒而不见，实在是‘架子太大’了”。于是她会见了暨南大学的一位姓潘的教师，结果出了事。她在4月4日的来信中，再次提到此事时说，她“实在恼火透了”，这位教师“一再热情地探我的病，说要研究《人啊，人！》，我便与他谈了我的经历（当时正好上海有人诬陷我为漏网的帮派分子），这样也就讲了一些反驳这些人的意见。我完全想不到他会把这一切，包括谈到书中人物时的随便谈话，都作为‘来访记录’，又是经过歪曲、改造后发表了。他的改造主要有：一，他根本没有记录，全凭印象，自然错误百出；二，他自以为好心，删去和修改我的自我批判的内容，如我说我一登上文坛就是小混子；三，他把从别处听到的关于我的传说，也当作‘访问’的结果写进去，如‘才女，之类；四，他根本不能区别一个人说话的幽默和玩笑，而且是零零碎碎，有具体语言环境的。他把这些拼凑成一段一段的话，用我的口气加上引号，好象俨然是我说的；五、他只与我有极少的接触，但却一口一个‘厚英’地叫，使人相信他所写的全是真的。”

文章刊在香港出版的《新晚报》上，戴厚英在二月中旬才知道此事，她当时气极了，一方面给作者写信批评，同时写了一个声明，托花城出版社的负责人岑桑转给《新晚报》，但为时已晚，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了。

文章的内容很快传到上海，文内被提到的一些人，他们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新的罪名又有了，说她是“私自”接受香港记者（其实根本不是）的采访，“借港报美化自己，攻击别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了。这个事连同她“向新社会进行血泪控诉”的书和“清查中漏网的帮派分子”等罪名加在一起，谁听到了都会觉得严重之极，所以有位领导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这真是雪上加霜，使戴厚英的处境更加险恶。

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给学校带来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教委办的一位负责同志公开指责分校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思想严重右倾，与戴划不清界限，斗争不力，特别批评了在这种情况下，还公然批准她去广东（尽管事先打过招呼）。有关部门还三天两头派人到学校，了解批戴的情况。并作出了几项规定，一是戴厚英不能再上台讲课；二是撤销她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职务；三是这一年教师普加工资，但戴厚英例外（此事党委曾几次打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建议工资还是加给她，但未获同意）。

在此情况下，学校不得不考虑要戴厚英返沪。嘱我先与花城出版社联系。我写一封信给岑桑同志，讲了上海的情况以及要戴返校的意向，并希望他不必让戴看到此信。由于戴知道我给岑桑写了信，急于要看，岑桑就给她看了。

岑桑在4月20日给我的来信中说：“她看信后，激动非常，立即病发卧床，给你写了信，要立即回沪。我还不曾见过她激动到如此呢！经过几位好友的苦苦劝说，她才稍稍平静下来，但精神十分萎顿，不思茶饭。我们把她送去医院，医生说是神经官能症。”信中还建议不要叫她在这样的时刻返沪，他们打算让她到增城去继续写作，到六月初再返沪，出版社还准备派一位女同志陪她。花城出版社对一位处于严重逆境中的女作家，如此宽厚和爱护，令人感动。

果然，4月19日，即在岑桑给我来信的前一天，戴厚英给我来信了。从信中可以感知她极度激动内心情，她表示要立即回沪。她说：“我没作亏心事，我对得起人民和自己的良心。有些人不作任何调查就对我批评指责已不是第一次了。我无怨气，因为我是小人物，应该习惯这一切。回沪以后，如认为有必要仍可批判、斗争，我也一样忍受。我不再向任何人作解释，我尊重自己。请学校扣发我的工资，以减少压力。”

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多少年来极左思潮的害人之深教育了大家。党委书记李庆云就表示过，过去这种极左的做法害了多少人，埋没扼杀了多少人才，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三年多了，还能这样只凭道听途说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整人吗！于是不仅不扣发她的工资，还安排她回老家好好养病。当然，这样做是要冒一点风险的，由于在批戴问题上思想“右倾”，李庆云同志不仅受到审查，还被迫作出检查，差点被撤销党委书记的职务。自然戴厚英本人并不知道这样的内幕。

这期间，我从戴厚英多封来信中知道，广东的有关领导和一些知名作家，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些领导和编辑，北京中国作协的张锲，特别是安徽老家的一些地市委领导和老作家陈登科以及一些素不相识的热心读者，都向她表达了许多鼓励和安慰。有的充分肯定其作品；有的请她去休养写作；有的动员她回老家去当专业作家；有的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她爱惜自己，把目光放远，还愿意在医药方面帮助她；有一位身患绝症的女青年生怕她从此被开除公职，陷入困境，表示尽管工资很低，要尽力帮助她：“我保证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有什么比在逆境中受到这种抚慰更感人的呢？戴厚英深深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和厚爱，她打消了“真不想活下去”的念头，重又奋起，在难捱的岁月中，以顽强的毅力，排除干扰，坚持完成了第三部长篇《空中的足音》，为中国的当代文学，献出了又一朵鲜花，同时也以此报答关怀她的广大读者。

戴厚英一生坎坷，饱经忧患。一直到最近几年，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才使她安稳下来，过着稍为舒坦的生活，谁料到会在歹徒的屠刀下，过早结束了生命！

在与戴厚英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以为她是中国文坛上非常独特的一位才女和奇人。她有许多常人不及的长处和优点，但也有不少不足和缺点。而她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不足，往往结合在一起。譬如她才华过人，绝顶聪敏，看问题深刻，一语破的，但有时过于简单，对复杂的环境和人事关系，认识不足；她为人真诚，喜交朋友，但不善于分清善意的忠告和不怀好意的奉承；她自尊心特强，容不得半点屈辱和误解，但有时会忽视别人的自尊；她感情丰富，富有同情心，但很容易感情用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有时过于情绪化，不懂得适当的节制；她性格刚强，在真理面前，不妥协，不懦怯，但往往得理不让人，有时不免尖刻。凡此种种，她在近年都意识到

了，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她的坎坷遭遇，当然与她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紧紧相联，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她性格上的这些特点，不无关系。

为了纪念她，拉拉扯扯写了这么些，不成系统。戴厚英是当代作家中值得研究的人物，那么这就算是提供研究的一份粗略资料吧！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于上海

当代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戴厚英的人品和文品

左泥

一时期，我曾经想和戴厚英约个时间，核对一下当年《诗人之死》出版中的折腾。以及《人啊，人！》的“讨论”的种种，写出我们所知的第一手材料，以供将来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人作参考。只是因为手头工作还没有完全了结，而我们现在住得又相距遥远，一在东北角；一在西南隅，隔着一个大上海，一时也就没有积极进行。现在她死了，出于友情，也出于道义和责任，我不能不来为她写这些文字了。

江淮才女初露头角

我与戴厚英同事，始于1960年，而真正“认识”她，成为知友，那是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她写《诗人之死》的时候了。但要说她这位江淮才女，还得从1960年说起。那年上半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以批判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艺（所谓“挖祖坟”）的作协会员大会。分组讨论报告时，有几位教授、作家对完全否定人道主义，发表了不尽相同的意见。这怎么可以呢？于是郑重对待，部署批判。前后开了四十九天，后称“四十九天会议”。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派来的学生代表之一，她那个比乡下大姑娘只多了一副廉价眼镜的土里土气样子，本没人注意她。岂知一开口，话语简洁犀利而嗓音又响亮，令人刮目相看，她由此脱颖而出，被视为“文艺界的新生力量”，分派到大会上去重点发言，批判她的教师，以《文学是人学》一文名噪当时的钱谷融先生了。那年戴厚英从华师大毕业时，顺理成章被选进了上海作协文学研究室（后改为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文学研究工作，主要的任务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收集、分析报刊发表的作品，写汇报材料，作文艺方面的“哨兵”。工作是带点机密的。

文学研究所和我们《上海文学》（后改为《收获》）编辑部都在一幢大楼办公，每餐又都同在一个小小的食堂里吃饭，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却很少交谈。目光相遇时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那种不相往来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大都是刚出高校的青年，和我们编辑部的中老年人共同语言不多；也由于那时机关中的人，经过了几次运动以后，已养成了不随便交谈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所当文艺“哨兵”，查阅作品（自然也包括我们每期出的刊物），但不管查阅发现作品有什么问题也好，发现了作品也好，他们都不能随便给我们谈。我们当然也知道他们有成文的纪律，不会随便去问。无形中便形成了一种隔膜。那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戴厚英是皖北人，皖北饥荒灾难之烈，如今大家知道了，可是那时上海人有谁知晓？一次支部会上，作协机关支部书记叫我们不要轻信农村传来的谣言。他举戴厚英为例，说她是个刚强的人，下放农村劳动时，锄草锄了手指，没落一滴眼泪，可是最近收到家信，竟在宿舍里哭了，说家里人饿得怎么怎么样。支部书记已经找她个别谈过话，批评她这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要我们党员引起注意；关心当前群众的思想动向。那年（也许是次年）除夕，作协机关聚餐联欢，他们文学研究所编了一个独幕剧，戴厚英饰农村老太婆，演得唯妙唯肖，令人叫绝，直到春节后上班，大家还在议论，说她有专业水平。不过总的说来，那些年她在作家协会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文化大革命”给戴厚英提供了更多发挥才华的机会。“文革”初期，她是“保皇”的。有一天，北京的红卫兵南下来冲击上海市委，作协“文革”

领导小组接到通知,叫大家套上红卫兵袖章去延安西路 33 号市委门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保卫上海市委。出门时作协“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芦芒特别叮嘱戴厚英:“你这门‘小钢炮’(她有“小钢炮”的绰号)今天要发挥威力!”戴厚英果然不负厚望,在唇枪舌剑的人圈子中,好多人都在持了尚方宝剑而来的北京红卫兵面前败下阵来,独有她站在一个大圈子的中央,口若悬河声音嘹亮,常常使对方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有几个稚嫩的中学生,被她问得无话可说,急得面孔血红甚至哭了起来。但后来对方有人使出一招,问她是什么身份,什么家庭成份。这对她来说,等于“吃闷棍”,因为她父亲是右派,而她又懂得这种政治辩论是不能说谎的,于是只得退却了。不过那天回来,领导小组还是表扬了她。

上海作协这个“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在编人员一共“一百零八将”。“文革”中被“揪出”的所谓“三名三高、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以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占了半数以上,加之经过了几次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而新进到上海作协以及和她一样的新来者,不谙底细,天真地看待机关里貌似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实际上揭发中又怀有各自的动机、目的的运动。他们以革命小将自居,当仁不让义无反顾地要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为真理而斗争”最前沿。而同是揭发批判一个人或一件事,别人的大字拖或发言,可能淡而无味说些套话不伤皮肉,她伶牙俐口才思敏捷要言不烦入木三分。常言说:“利刃割体创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这些揭发批判给戴厚英带来的后果,使她整个下半生未能脱尽灾难。八十年代初我在某地组稿,那时她的《人啊,人!》已经出版,在一次饭桌上,有人提到戴厚英,一位省作协的领导忽然大声问:“是不是上海那个骂人恶毒的坏女人?”其实戴厚英说话刻毒有之,骂人的脏话粗话是一句也不会说的。凶手陶锋在交代他杀害戴厚英时,戴厚英说:“你要干什么!”“你会后悔的!”这两句话,确实像她最愤怒时说的最严厉的话了。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神交已久的北京某报记者,他是高度评价《人啊,人!》的,而见了面就急着问我,“戴厚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也是听到太多的有关戴厚英其人的丑话了。多少年后,戴厚英在欧洲某国访问,还有人问她闻捷是不是她害死的哩。天可怜见!人类带着感情编就的历史。——即使是口头创作,要将它恢复原貌,比消融三尺之冰,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了!她出版《诗人之死》反复遭受的折腾,根源也就在此。

十年浩劫中的戴厚英,从“保皇”、“造反”,一度还当造反派小头头,到工宣队进驻后作为“反工”、“炮打”的重点审批对象。在那个颠来倒去、朝三暮四的特殊年月里,批与被批,原无什么是非可言,人们完全可以“一笑泯恩仇”。而戴厚英在个人生活方面,“文革”中遭受的两次打击,那可是两次炼狱了。结婚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文革”中丈夫有了外遇,闹离婚。戴厚英为了不让四岁女儿的幼小心灵受父母离异的伤害,忍辱退让,只要丈夫同意维持一个名义上的家庭,孩子有父有母,她允许丈夫与情人往来,不加干涉。这样的委曲求全,沦到和封建时代的妇女一样了。但她确实这样打算过。这使人会想起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一位女作家。“五四”时期她是以追求个性解放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名噪京华的“四分子”中最激烈的一位,与有妇之夫结婚后不仅甘当偏房,而且竟忍受公婆和丈夫大老婆的羞辱不作反抗。人是复杂的!戴厚英在伦理道德观和社会思想方面,明显地存在着差异。她对父母、亲属、乡邻的忠孝仁义,是广为人知的。我甚至觉得,她惨

死于家乡人之手，从原因来说，与她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也不无关系。她和女儿相依为命的母女之爱，更称得上是典范。母女俩那对人生、对事业、爱情、朋友和国家民族的相互倾诉、探讨，在那几十万字的“两国书”（一部份在《小说界》发表过）中有憾人心弦的表述。

戴厚英对丈夫的委曲求全，最终还是一厢情愿。丈夫搞了一张离婚证和她离了婚。那天正是工宣队在开“一打三反”的小结会，戴厚英被一个女工宣队员叫了出去，回来时一脸咽泪吞声的样子。她被叫出去便是在离婚书上签字的。第二次的打击那便是与闻捷的生离死别了。闻、戴这段很简单短促的恋爱史，经过各种人的传说，流行过几种颜色的版本。她自己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自传一书中（上卷）也有自白。最近她死后，她的好友高云找出18年前她应高云要求写的材料（即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更详细记载了她和闻捷相识、相知、相恋到死别的全过程。那是怎么样的一次感情的炼狱啊！

闻捷之死到《诗人之死》

闻捷之死和《诗人之死》，成了戴厚英下半生的人生转折的重要契机。他们恋爱于1970年夏季的奉贤县海塘边的“上海市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当时闻捷经过隔离审查从监牢放回，宣布“解放”，被任命为干校四连的男队劳动队长；戴厚英因“炮打”被审查也已“解放”，被任命为女队劳动队长。闻捷在关押期间妻子被迫害自杀，成了鳏夫；戴厚英与前夫离了婚，单身独处。在思想性格方面，两个人都有直率、热情、天真而胸无城府等许多共同点。尽管闻捷比她大了15岁，怎么说两人结合算得上是“天作之合”的。他们天真地以为两个伤心的人，两个破碎了的家庭，马上又要圆满起来、幸福起来。岂知这纯是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梦，很快便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击得粉碎。他们打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以后，戴厚英的好友便“怀着沉重的焦虑的心情”找她，劝她打消这个念头，直到明确告诉她，对闻捷和她恋爱，张春桥有批示，说“这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事例”，“是文艺界的一个怪现象”。戴厚英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也难分难舍。而闻捷这样一个被关押审查过的“解放干部”，经张春桥作了这样的批示，日子就更难过了。工军宣队不仅在生活上故意刁难，拆散他们，还不断组织批斗。在结合无望的情况下，闻捷于1971年1月12日之夜，喝掉一瓶白酒，抽掉十九支烟，以棉被蒙首伏在煤气灶上自杀，在打开煤气之前，他还仔细地将女儿房门上的钥匙孔塞好，以防煤气溢进去。这是怎么样的一场人间悲剧！不过在那个没有人道、失去人性的疯狂的年代里，也不过小事一桩，闻捷之死不仅“死有余辜”，要开大会批判，还有人要工军宣队将病在床上的戴厚英拉起来去听批判受教育。这也可见戴厚英单位里的人与她敌意之深了。

戴厚英从“文革”初期造反到后来几经审查批判，她都无怨无悔，还是“无限信仰”“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照办那些朝三暮四的“最高指示”的。前夫和她离婚的悲剧，尽管也是她个人感情生活中的一场炼狱，但那和“文革”无直接联系，所以她并未因此对“文革”运动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此次和闻捷相恋，竟惹得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春桥作如此指示，“文革”怎么“革”他们这么正常的恋爱的“命”呢？及至闻捷自杀，这场感情的炼狱之火终于融化了她头上对“史无前例”运动忠心不二、“无限信仰”的紧箍，有了自己的脑袋，有了独立思想、重新认识的自觉。戴厚英的思想从此起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在她对运动从未有过的消极，干起了剪裁、结

绒线的家庭妇女干的活来。自己没有毛线可结时还帮着别人结。并说出了一句“名言”：“现在是妇女家庭化”。读书则识古鉴今，对明史清史、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还拜读莎士比亚，认真作读书笔记。这比之她在“文革”开始时，将读关汉卿作品时做的读书札记全部烧掉，“轻装上阵”，思想起了多大的变化呀。闻捷死后，尽管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和工军宣队都表示，他们是把她与闻捷区别对待的，要她振作起来，并给她安排了一定的工作。而她怎么也振作不起来，一直被动应付，若即若离，很有点“不识抬举”了。在后来的批林批孔、批邓等重大回合中，她不仅不积极发言，不写文章，还私下与知心者议论起是非来了。这也应了“祸福相倚”的规律。“文革”结束，清查开始，多少双手要将她推下地狱，最终还是拿不出“上台面”的证据。这算她“三生有幸”了。

戴厚英的思想变化的过程，为她后来创作《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全国，《诗人之死》是持否定“文革”观点创作最早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另外有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将军岭》和《冬天里的春天》），只是在上海出版遭遇折腾，被拖了三年多才得到在福建出版。

1978年初，戴厚英应好友高云要求，写下了四万多字她和闻捷的关系的始末，七年多来逐渐冷却下去的感情死灰复燃了起来。她把材料交给高云后，又写下了二十多万沾血带泪的回忆文字。此时我刚“战高温”归队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小说编辑，听到这个消息，便去向她要来看，岂知已被原先文学研究所她的领导王道乾要去看了。我去王道乾家，他将那些纸张杂乱文字潦草的一堆稿子给我时，反复给我说一句话：“你要给小戴强调，要写小说，不要写回忆录”。我看完那些不好辨认的文字，觉得题材很好，写得很有基础，要求她改写为长篇小说，她同意了，长篇小说初名为《七封信》，那是以书中女主人公向南的七封信串连全书故事情节而命题的。她将先写好的五封信直接文给了当时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姜彬同志。也许她是考虑我刚落实政策进出版社，工作权力有限，而姜彬在“文革”前是上海作协的党组书记，是我们共同的领导吧。姜彬将稿子交给我处理时，也说基础很好，要认真抓出来。我读完《七封信》的初稿后，提了意见，她又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她不习惯在原稿上修改，动辄重写），成了一部五十万字最后我删去了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改名为《代价》——这些年来经过折腾大家都付出了“代价”，包括闻捷的生命。后来觉得《代价》这命题不新鲜，她又想了四五个题目，其中最满意的是《诗人和他的专案组长》（或用《专案组长和她的专案对象》），觉得这题目新鲜独特，也很切题。只是考虑到她曾经参与过审查闻捷的专案工作，尽管不是组长，总容易使人疑为是回忆录，最后才用了《诗人之死》这个她并不很满意的书名。因为《诗人之死》是以我们所在单位的“文革”运动为背景，又是从回忆文字脱胎而来，有些情节还带有真实性。为了避免她的那些“对立面”“对号入座”，有关情节我建议她删去时，她都尽可能地删了；有些关系故事整体结构删不了的，也尽可能给予改造。她是排除了个人恩怨的艺术创作考虑的。她几次说过：“写这本东西，难道是想揭露哪一个人吗？我还不致于降低到那样的水平吧。”《诗人之死》中写了一个叫贾羨竹的书画家，此人的原型就在我们身边。他原是位青年编辑，1957年因骄傲自满说怪话而被打成右派，成了机关里的“贱民”。从此他一反常态，自卑自贱，处处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文革”中他成了“死老虎”，开起会来，工军宣队常常先点他的名，要他交代揭发。

后来他也摸着规律了，一开会便抢先举手，站起来弯着腰交代自己罪行，揭发别人的问题。其实说的都是鸡毛蒜皮，只是要在工军宣队面前表现积极而已。为此大家都很看不起他，戴厚英也常常轻蔑地模仿他举手弯腰的自卑相，引大家发笑。可她在《诗人之死》中塑造贾羨竹，没有停留于此人的表面现象，她设计了这样的情节：贾羨竹的女儿有音乐天赋，文工团有意录取她，但要以她父亲的问题解决为先决条件。为此贾羨竹便不顾脸面处处表现积极，希望工军宣队将他早日“解放”，使女儿能被录取。后来工军宣队并没有先“解放”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不能“解放”，而是因为他身份太低，“解放”他不可能在文艺界起到体现政策的示范作用。贾羨竹求告无门，悲愤地跳楼自杀……。这样刻画一个小人物被扭曲了的灵魂。她写《诗人之死》就是这样站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高度进行考虑的。

《诗人之死》写的是“儒林哀史”，但字里行间依然意气昂扬，催人奋发向上，在曲折的出版过程中，经多位领导审查，也都是肯定的。那“再铸一腔热心肠”的一节“尾声”，从作品的总体结构看，我觉得累赘，是狗尾续貂，曾建议她拿掉。她考虑再三，对我说：“写东西，总要给人希望吧”。一定要留着。这些都反映了她的创作动机和观点。我正是仗着了解她有如此积极的动机和观点，在出版屡遭折腾时，才敢于要这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总编丁景唐、范政浩两位带我到上级领导面前去为她慷慨陈词，作了毫无作用的游说——其实是我“拎勿清”。法制不健全的时代里，许多事往往是“通路子”见分晓的。徒使这些领导在“上下夹攻”中跟着受委屈，这是我应该抱歉的。

对《诗人之死》中我们都不满意的是诗人余子朔所写的那首《不尽长江滚滚流》的诗。我曾写打油诗戏她：“半身鲜花半身刺，天才小说庸才诗……”因为对小说提意见时，只要点到；她就会意而且改得比预期的好，而对那首诗，改来改去都不满意，后来还请了一位诗人帮忙，也未能改得如愿。她那么善于捕捉形象，又有那么犀利明快，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文字技巧，为什么写不好一首诗？这是不是也是人的另一种复杂性呢。

《人啊，人！》的创作和出版后的轰动

《诗人之死》创作定稿以后一段时间，戴厚英的痛苦的感情得到了宣泄，心情平静了，工作又已得到安排，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后转入复旦分校（即后来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她准备安下心来教一段时间的文艺理论课，还曾准备联系创作《诗人之死》的实践，自编一套创作心理学的教材，并没有考虑继续创作。令我们、包括出版社领导都估计不足的是，《诗人之死》的出版会受到那么严重而且几次反复的无理阻挠。她多次直接找出版社、出版局的领导交涉，要他们说明原由，出版不出版给明确答复。甚至不顾这些领导人的难言之隐，当众责难。另一方面也按组织程序写信申诉。她天真地以为“有理走遍天下”，然而结果不是“太极拳式”的答复，便是石沉大海了无音信。当时她住在巨鹿路上海作协厨房间楼上的小屋里，与我住的四明村斜对门，晚饭后常到我家来发泄怨气，说自己如身处浓雾中，时时处处被缠着，而要对付它，却又抓不住摸不着，不知道它在哪里。她忍受不了这种回厄，一场新的感情冲动起来了。偏巧，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后来的花城出版社）的岑桑同志，来电向她要稿，希望给他们出版。这事本来可以就此解决，她只要将《诗人之死》收回寄给岑桑好了。可是“性格决定命运”，戴厚英之所以为戴厚英，于此可见，她一定要出版社写退稿信说明理

由，“为什么你们约的稿已经决审通过而不出版？”否则给退稿也不肯接受。出版社领导不便满足她的这一要求，于是僵持着。而王道乾知道情况后还特地来关照我，《诗人之死》稿子千万不要回到戴厚英手里，怕她一怒之下烧掉。她会做得出来的。

她不肯收回《诗人之死》的稿子，而在交涉中处处碰壁时引起的思考和感情冲动，使她完成了一个新的创作构思。这便是《人啊，人！》有关《人啊，人！》的素材，她在此前多次谈起过。何荆夫身上的部份情节，便是取自她的一个右派同学的经历。那位很有才华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后，到处流浪谋生，受尽了苦难。她一心要将他写一本书，但主题、表现手法等都没有考虑成熟。现在构思好了，她决定把这部东西写出来给岑桑，以报知遇之恩。她落笔神速，前后二十一天，一部近二十万字的稿子写出来了。人累得像大病了一场似的。我看了觉得比《诗人之死》更好，那表现手法当时在国内长篇创作中还从未见过，不忍释手。而当时《诗人之死》的出版，经过我们社里领导的努力，又有了柳附花明的希望，稿子已下厂付排。因此我还告诉社里一位领导：戴厚英又有一部新的极好的稿子，我们好不好留下。他说：“还是快点让她给别人家去吧，我们不要再惹这个麻烦了！”他比我更知底细，还在为《诗人之死》最后能不能如愿出版在惴惴不安哩。1980年6月18日，我代她将《人啊，人！》稿子寄给岑桑，没有几天他们就派了两位编辑来谈对稿件的意见，后来邀她去广州修改定稿，补写了“后记”。在此过程中尽管还有人企图阻挠广东出版，但广东人民出版社未受干扰，于五个月后初版，即印行了12万册与读者见面了。这在当时可算最快的出版速度了。

《人啊，人！》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就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在中国恐怕是并不多见的。我为收集资料，从她那里先拿到过一百多封读者的信。当时上海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一对新婚夫妇回娘家，新娘子到家里看到一本《人啊，人！》就手不释卷，通宵在娘家把书看完。而复旦大学老教授朱东润先生，还不无幽默地见到戴厚英喊她为“人啊人”。这都说明了《人啊，人！》当时的社会影响。

《人啊，人！》的轰动效应，却又成了戴厚英一场新的炼狱的序幕。本来被某些人禁止出书的她，现在居然引起了如此大的影响，岂能不郑重对待？接踵而至的是《诗人之死》出版再次搁浅。出版社完成了一切程序，就是不能下厂印刷出版；而《人啊，人！》“后记”里公然宣扬人性、人道主义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前者多在内部进行，外面无声无息，众所不知；后者则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见诸报刊，众所周知其表，不知其里。使谁都始料未及的是，“讨论”《人啊，人！》，使戴厚英在一夜之间成了远远超过《人啊，人！》影响的名人了。用现在的话说，反把她“炒热”“炒红”了，以致有人后悔说，应该在内部关起门来批的。这场对《人啊，人！》的“讨论”，在当代文学史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号，也给史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课题：《人啊，人！》现象。试看：当代有几部小说引起过文艺界、教育界、读书界、政界、新闻界……都对它如此关注？有几部小说给人的评价有如此天壤之别——誉之者谓国色天香，要捧它上天；毁之者谓毒草蒺藜，要打地狱？而十多年来，它又经几家出版社连续印刷十余版，迄今还行销不衰的呢？更不必去说国外出版的众多译本了。这不值得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研究吗？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史的人们，恐怕不仅要《人啊，人！》作出科学的评价，对那场“讨论”的原委以及其方式，看来也是不能回避了，应

该有个说法的。其实，就我辈庸夫俗子们来看，在经过了一场十年浩劫，人性，人道被摧残殆尽之后，有人来呼唤了一下，退一步说，即使说得不周密或有偏颇，那时节文艺界拨乱反正要解决的问题多多，何必把她作为“雁奴”呢？而且，那种先有结论的大批判式的“讨论”，又何尝不让人感到沿习二十多年的“大辩论”之遗风犹在？从这一点来说，那倒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真可说是“一个时代结束了。”而戴厚英其人的一生，她以批判人道主义开始进入文艺界；二十年后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自己宣扬人性的人道主义，并又回此而挨批。更可悲的是，又过了整整十五年，她还是惨死于毫无人道、绝灭人性的同乡人的刀刃之下。这难道只是她个人的悲剧吗？

戴厚英死了。她如此死于非命，这么突然，这么意外，我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死于非命的文人。王勃渡海溺水，那太久远了。近代的，徐志摩飞机失事，罹难高山；聂耳游泳弄潮，葬身大海，这些虽都出意外，令人浩叹，但还能够想象。而江淮才女戴厚英，在极其偶然的的情况下，死于同乡人谋财害命的极原始的暴力之下，正如农村人说的：淹死在牛脚塘里。如此意外，只有“无语问苍天”，不得不归究于命了。当年闻捷自杀后，有人从戴厚英的玻璃板下查出了她写的一张纸片：“人固有死，或重于泰山”。那后面半句“或轻于鸿毛”，她故意不写，这是她对闻捷之死的评价和哀悼。而今她自己如此死于非命，死而有知，她自己将怎么说呢！

戴厚英踏上文坛，就是一个是非人物。她的是非，一半是由于她那自信、天真、敏感、倔强而又野性十足的性格，一半是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时差和思想观点的分歧。她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但她的缺点错误“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大体的清。”（借鲁迅评刘半农语，无相比之意）她的缺点错误，多数是在“无限信任、无限崇拜”的时代，自以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中形成的。而当她一朝醒悟后，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光明磊落，并不掩过饰非。这从她的许多文章，尤其是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中可以了然。近两年来她皈依佛门，研读老庄。（实际上她不可能真正“出世”）如果天假以年，不仅将会在新的领域有成果贡献于世，她的性格也会有所改变的吧。而如今她死了。“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戴厚英的是非，待文学史家们去研究评说吧。我这里记下最后告别时挽她的一联：“老九”灾难，纸上风雨，满城争读《人啊，人！》；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文坛痛失戴厚英”。聊表呜呼哀哉之情。还妄言一句：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各种体制、法制不断进步和完善，落后腐败不断被消除，戴厚英品格的亮点将会愈益显露出它的光彩，而且会远远超过她的作品的价值！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

忆戴厚英

吴中杰

英遇害将近一个月了，凶手已经捕获，公安局刚开过新闻发布会，报纸、电视台正在报导此事。但我总有一种虚幻的感觉，仿佛觉得厚英还活着。早上到门房拿牛奶时，希望还能碰到她拎着塑料袋去买菜；在家静坐读书时，总觉得她什么时候还会跑来，谈她所遇到的各种奇人怪事，然后露出无可奈何的微笑。

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我到过凶杀现场，亲眼看到厚英遇害的情景。

于是，在我眼前时常交叠出现许多厚英的形象：她手持香烟陷入沉思的形象，她在我家客厅谈笑风生的形象，她碰到不顺心事激动不已的形象，她遇害后倒在血泊中的形象，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她头戴假发颈绕围巾的形象，还有那一年她得到某种消息后，冲到我家，靠在书房门槛上哭泣不已的形象，……

接着，我眼前一片模糊，脑中一片空白。

这篇文章我自然不能不写。但“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现在，各种生活片段还在记忆中翻腾，很难理出一条线索来。我只能随着翻腾的记忆、写下一些片段来。

我与厚英相识，是由于内子高云的关系。她们是多年的老朋友，36年了，风风雨雨，相互支持，算得上是患难之交。

1960年，她们各自从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一同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工作，一同住在作协厨房楼上接受烟火的熏陶；她们一同翻阅各种新出的文学杂志，编写情况汇报，认认真真地做“文艺哨兵”；她们一起学习写文艺评论文章，一起听王元化先生讲《文心雕龙》，听得津津有味，接着又一起受到机关党支部书记的批评：“你们难道不知道王元化是胡风分子吗？还听他讲什么《文心雕龙》！”

“文化大革命”前两年，她们一起进了丁香花园写作班，接着，又一起下乡搞“四清”；文革开始时，她们一起紧跟党组织保卫上海市委，接着，又一起参加造反派。其实，她们那时根本不懂政治，只不过跟着上面转，跟着形势转而已。转得很认真，也转得很吃力。到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他们又跟着一起上街刷大标语，接着自然一起受批判。后来，要“四个面向”了，她们二人革命热情高涨，互相鼓励，积极报名。当然是一报就批准。高云把两岁的女儿送到南京娘家抚养，自己戴上大红花奔赴黑龙江插队落户，在冰天雪地中战天斗地，一斗6年，厚英被分配到吉林，由于出现家庭危机而未成行，但却经历了更多的事故。……

1960年与她们二人一起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还有一位女士，厚英在回忆录中以英文字母C作为她的代号，我也从例称她为C女士吧，因为当时文研所只有她们三位年轻女性，住在一起，又做着同样的工作，自然就比较接近了，被别人称为“小姐妹”或“三姐妹”。这三个异姓姐妹，有着相同的起点，却有着不同的归宿。由于她们的性格不同，所以命运也不一样。C女士性格沉稳，外柔内刚，听上面的话，组织性强，深受领导信任，当上了干部，但后来跟错了路线，卷入了政治漩涡，在接受审查之后，很早就退休在家了，“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内子高云一向不喜欢出头露

面，凡事跟着走，当初在写作上也曾努力过，发表过不少文章，但自从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她跟着受连累，历尽了世态炎凉，也就把世事都看淡了，只求完成本职工作，不想再奋发图强，她把许多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对于女儿的关注甚于一切。“三姐妹”中，个性最倔强，最有奋斗精神，而且业务成就最大的，是厚英，但生活最不安定，遭遇最不幸，命运最惨的，也正是她。她自己说过：性格即命运。她的命运除了时代因素之外，确与她的性格有关。所以她把她的自传就叫做：《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当然，谁也料不到最后她会死得这样惨。

如果有人仿契河夫写《三姐妹》之例，以这三个异姓姐妹的生活遭遇为题材，写成一部文艺作品，大概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来。

我已记不得我与厚英何时相识，第一次谈些什么话。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熟悉之前，我已在巨鹿路作家协会大厅里见识过她雄辩的本领了。

那是在她正式分配到作协工作之前。1960 年上半年，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马拉松式的讨论会，后称 49 天大会。此会名曰讨论，实则批判，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开始时面铺得较广，后来批判矛头渐渐地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华东师大的钱谷融，上海师院（现称上海师大）的任钧。这大概是平均分配的惯例吧，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以供批判之用，当然，相应的，三所高校也各一名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那时候叫做“新生力量”，这三名“新生力量”在大会作重点发言，各自批判校内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厚英就是华东师大选派出来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新生力量”。记得她一上台，就引用了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虽然并非她所创造，但此情此景，引用得恰如其分，给人印象至深。钱谷融先生的代表作《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厚英发言的内容当然也就是批判人道主义思想了。其论点大抵是引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话：“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此外，还发挥了一下当时否定 18—19 世纪欧洲人道主义文学的流行观点，似乎并无什么新意。但厚英的口才极好，这些流行观点经她激昂慷慨地一说，就变得极其凌厉而且动听。于是，她一下子就出了名，而且得了“小钢炮”的雅号。

不久《文艺报》以显著的地位报导了上海的 49 天会议，而且表扬了这三位“新生力量”。只是，厚英的名字是排在榜末。虽然，名列榜首的那位复旦的“新生力量”，口齿不清，讲话含糊，发言更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出来，但由于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本身又是党员，是学校重点培养对象，也就理所当然要挂头牌的了。

在当时，青年人尚不敢自封为“青年学者”、“青年理论家”之类，别人也没有用这种桂冠去美化他们，能够名列“新生力量”之榜，而且又是在权威理论刊物《文艺报》上露脸，自然是难得的殊荣了。特别是像厚英这样，既非党员，又没有什么背景的学生，更是难逢的机会。但在出名的同时，厚英也遭人侧目。特别是当批判高潮消退，甄别、道歉工作开始之后，“小钢炮”当然就要受到别人的指责了。这事，厚英自己自然要负一部分责任，但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件工具，或者说是枚棋子而已，是由人使用，由人摆布

的。奇怪的是，当时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或者连会场也不必到的幕后指挥者，倒并没有受到非难，且照样接受人们的敬意，而名列榜首的那位“新生力量”也照样得到各方面的关照，并没有受到什么压力。这大概也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民情吧，如果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能对此作些专题研究，一定可发掘出一些深层文化含义来，有利于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工作。

但厚英全不懂这些人情世故，只知道按照从书本上看来或从大报告上听来的那些“革命原则”办事，而且又颇争强好胜，嘴巴不肯饶人，因此就时时得罪人。不知始于何时，她获得了“傻丫头”的雅号，这是很能传神的。在大庭广众之中，别人这样叫她，她也坦然答应，并不见怪。记得她住到复旦宿舍之后，我们都已是40开外的中年人了，有一回，我在第一宿舍门口老远地看到她，还大声叫她：“傻丫头！”她也大声地答应着。内子高云在旁批评我：“大家都是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象小孩子一样？以后不准再叫傻丫头了！”从此我才改口叫她的大名，有时则叫她“戴丫头”，免去“傻”字。

倒是钱谷融先生本人对她的批判并不介意，后来也向我谈及此事，总带着宽容的笑意，并且很欣赏她的才华。毕竟厚英是他的学生，而钱先生又是极其通达的人，他知道，对他的批判，根子不在厚英，即使没有戴厚英，上面也会选别的什么人来对他进行批判的。80年代中期，厚英申请晋升副教授时，校方原来是请某先生写评审意见的，某先生因怕触犯时忌，怕得罪厚英的对立面，不敢写，把材料退回上海大学，后来还是钱先生为她写了评语，而且评价很高。此之所以为钱谷融先生也！

厚英虽然口才一直很好，但开始时笔下却并不怎么见长。听说在49天会议期间，领导上要她把她那篇精彩的发言稿修改出来，准备发表，但她改来改去总是改不好。这也无足深怪，发言的精彩与文章的精彩原不是一码子事。厚英从小参加过宣传队，又登台演过戏，能言善辩，所以能作精彩的发言，但那时在写作上还缺乏锻炼。

厚英日后能成为知名作家，写得一手好文章，全靠她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以后艰苦努力而成。

只是，她开始学写的是文艺评论，并非小说散文之类。

那时，三年大跃进已经结束，接着而来的是三年大困难。填饱肚子是当务之急，阶级斗争只好暂时放松一下。每天早中晚三节时间都排满会议的日程表，也略有松动。我们带着半饥半饱的肚子，总算可以坐下来搞业务了。

那几年，文研所里几个年轻人除了编写情况汇报之外，还各自选择专题，从事研究工作。内子高云和所外的我合作研究鲁迅小说，并撰写了一些当代小说，散文评论，厚英则侧重于戏剧研究，除写些当代戏剧评论外，她还在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写了不少笔记，但终于未整理成书。那段时期，厚英还读了不少18—19世纪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再加上家乡的饥饿情况、家庭的困难处境，对她触动很大，使她的思想观点有所变化。但此种越轨思想在当时是犯忌的，这使她很痛苦。

不过，没有时间可容她多加思考，形势又起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稍一好转，阶级斗争这根弦又要绷紧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艺界照例是首当其冲。文研所这批年轻人本来就被当作“文艺哨兵”来使用的，此时当然要被驱上战场了。就是我们这些以教学工作为主的高校青年教师，也要参加战斗，否则便会走向反面。当时，我们自己的“战斗热情”也很高，反修防修嘛，又是锻炼自己革命思想的好机会，要在战斗中成长。

于是，批《早春二月》，批《北国江南》，批《不夜城》，批“鬼戏”，批“中间人物”论，批“时代精神汇合”论……，这些，都是中央定好调子，下面跟着唱，也有上海《文汇报》别出心裁，自定题目，组织我们写批判文章的，如对于金为民的批判。

金为民当时在江苏话剧团工作，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而且敢于开顶风船的青年人。他对姚文元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文章提出过商榷意见，对戴厚英等人批判小说《归家》的文章也发表过不同见解，1964年7月间，他又以金为民、李云初的名义给《文汇报》写了长文，对正在讨论的新人和英雄形象塑造问题，提出质疑。——那个时候，常有几人合用一个笔者，或者一个写作班子共用一个笔名，而他则一人化成两个名字联用，作为笔名，其亦抗俗乎？——但在当时，批判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写这样的长文投给《文汇报》，无疑是自投罗网的行为。《文汇报》在发表他的文章之前，就将它作为供批判用的内部材料，以“密件”的形式印发给我们了。——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材料和《文汇报》写着“定期收回”而结果并未收回的信。

当时，我和高云、厚英等人都写过批判金为民的文章。我发表过一篇《时代精神与英雄形象的塑造》，占去《文汇报》四分之三版的版面，吴立昌、戴厚英、高云三人则合写了一大版的文章：《分歧的实质是什么？》，也发表在《文汇报》上，那是批判金为民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的。大概厚英她们的文章给他的印象特别深的缘故，事隔30多年，1995年年底，金为民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求索与反思》，还特地寄给厚英、立昌和高云各一本。书是寄到厚英那里去的，还有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厚英收到书和信后，非常高兴，拿着给高云和吴立昌的两本书到我们家，还未进门，就大叫道，“喂！你们猜猜看，谁给我们寄书来了？”我们猜来猜去，当然猜不着。于是她从背后拿出书来，说：“金为民！你们还记得他吗？”我们当然记得。不但记得金为民、李云初的名字，而且也记得我们写的批判文章。我们不禁相对大笑起来，笑我们当年所做过的蠢事，也为金为民的大度所感动。厚英说，她已经给金为民写了回信，对当年的批判表示歉意。

四

这些批判，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但当“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曾经担当过小小吹鼓手的人，却很快就被抛到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不过在这场运动中，人们的角色转换过于频繁，正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厚英在运动中担任过不同的角色，也是不足为奇的事。这些事，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有忠实的记录。我只想谈几件对我印象特别深的事，大致也可从中窥视她性格的某一侧面。

一是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事。

1968年4月12日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一位在北京《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学生来看我，我在作协高云的住处带孩子，他赶到作协找我，告诉我，前几天陈伯达到报社来，以相当明显的语言煽动反张春桥，报社领导就派他和另一名记者到上海出差。我问他：有重要任务吗？他说：没什么要紧事，了解了解情况，组点稿。我们立刻意识到，这是让他们来散布反对张春桥的讯

息的。因为这两位记者，都是从复旦调去，一位原是上海红三司红卫兵，另一位原是上海红革会红卫兵，而这两个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都参加过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而且都对镇压参加过“炮打”学生的“反逆流”运动非常不满。我们同时也意识到，这次即将起来的“炮打”运动，是高层人士矛盾的产物，我们当老百姓的，何必受利用，当炮灰呢！于是，我们相约不传播消息，不参加炮打，做个看热闹的观众。我回复旦之前，特地嘱咐内子：近日上海必有大事，不管什么事，你们都不可表态，不要参加。但到4月12日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那一天，高云和厚英却仍一起上街去刷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了。我周末回作协时，她们正以待罪之身在准备接受批判。我责怪她们，她们却傻笑着说：“作协领导要我们去刷标语的，我们想总不会错的。”但这位领导却把责任都推到厚英头上了。因为她也算是领导小组成员，虽然是忝陪末座的。

二是主持会议批判高云之事。

尽管我竭力想避开“炮打”，但仍被看作上海市鼓动炮打张春桥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工宣队一进校，就盯上我了。再加上我常常要发表一些虽符合事实但却不合时宜的议论，所以更容易被抓住辫子。比如，工宣队队长在大会上批判知识分子道：“你们知识分子晚上迟迟不睡觉，早上睡懒觉，与我们工人阶级不一样，这是不正常的生活。你们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之后，当然是严重的反工宣队亦即反工人阶级的罪行。我第一次受批判的罪名，就是“反工”。那时，时代虽然到了20世纪中叶，但株连之风未衰，而且还有派性作祟，对立派想以此事为突破口，搞点什么名堂，作协于是立即也以“反工”之罪名对内子高云进行批判，而且要厚英主持批判会。厚英居然大义凛然地主持了批判会，这使高云很生气，但高云心里很清楚，她知道厚英其实并无恶意，只不过以此显示其革命原则性强，大公无私，即使是好朋友，同一派人，如果有了错误，她照样要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错误，以及批判的背景如何，她就不多去考虑了。不过没多久，厚英就发现上当了，她又主动与高云接近，两人和好如初。后来有困难时，仍常找高云帮忙，如闻捷自杀后她精神近于崩溃时，就打电话找高云去陪她七大七夜，才度过危机。而我后来被打成“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黑谋士，在40万人大会上受到批斗，弄得臭不可闻，以致牵连妻女，别人对她们也避而远之，但厚英却常到我们家来，不避嫌疑。

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厚英的单纯、天真来。她实在是胸无城府，没有心机。

到文革后期，由于经历的事情多了，厚英变得深沉、成熟起来。

记得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有一天我进城办事，顺便到作协看望厚英，正好前一天家乡有人给她带了羊肉来，她就留我吃红烧羊肉。我们边吃边谈，谈了很多事。她清醒地看到，一场政治大变动迫在眼前。文革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很引起她的反感。特别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她认为这个案早迟非翻不可。而且她也看到，文革派只有笔杆子，抓不住枪杆子，虽然声势造得很大，但是难以持久。这时厚英已经被起用，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下面的电影组工作。这在当时是被某些知识分子羡慕的工作，她到我家来时，就有人硬拉她去吃饭，以示亲近，或者是想通过她去亲近某些人。但是厚英并不以此为荣，内心充满忧虑。

五

大概就因为进了电影组的关系，“四人帮”倒台以后，她也成了“说清楚”对象，与写作班的其他人一起，进了学习班。我和高云到作协宿舍去看她时，她谈起有些人为了“反戈一击有功”而乱咬乱攀，有些人为了标榜自己一贯反“四人帮”而隐瞒事实，她很看不惯。我们劝她看开一点，因为这种人所在多有，以后如果搞运动，也决不会缺少的，对此类人，何必认真看待。

“学习班”结束之后，就重新分配工作。作协是不能回去的了。当年文学研究所的伙伴，基本上都已离开作协。她想到某校去从事戏剧研究，但被拒绝了。这时，复旦大学就显示出它的气度来，它愿意接纳戴厚英。1979年，厚英到复旦来工作，分配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与我在一起。那时厚英还住在作协，为了求近，当复旦分校成立时，她要求到分校工作，一一这分校，后来并入上海大学，成为该校的文学院，厚英也随之成为上海大学的教师。

不久，复旦给她分配了住房，在第一宿舍。她终于离开了作协那间小楼房。

但她开始小说创作，还是住在作协等待分配工作时。是在1978年。

那是3月份，我和高云准备一篇论闻捷的文章，高云请厚英提供一点闻捷的资料，她就在四月份给高云写来一封长信，详述她与闻捷相识相恋的始末。信写在练习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三本半，情深意切，十分动人，我们的论文因故没写成，但却促使她走上了创作之路，据她自己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写了这封长信，“感情一下子被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己”，于是接下去就写出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来的。

虽然当时文学界和出版界都刚刚苏醒，长篇小说的创作极少，但《诗人之死》的出版却很不顺利。

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编辑左泥和别的几位编辑对《诗人之死》颇为欣赏，愿意出版。此事也得到社领导的支持，于是迅速发排、看校样、看清样……但不料在开印之前，却出了故障。书被卡住了。于是，厚英找出版社总编辑，找市出版局长，但都无济于事。她要他们说明不能出版的理由，是作品有问题，还是作者没有出书的权利？都不是。那么为什么不出呢？他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厚英又发挥出她的小钢炮精神，对这两位领导猛轰一通，有时出语相当尖刻。这当然是很得罪人的。好在这两位领导修养极好，总是笑脸相迎，用的是以柔克刚的传统手法。

我对于厚英在与别人对阵时，出语过于尖刻，只求自己说得痛快，不留回转余地的做法，颇有些意见，也曾劝说过她。但有时又觉得，在某些场合下，如果一味讲究温良恭俭让，就更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难矣哉，处世之道也。

但不管厚英怎样奔走，怎样说理，怎样斗争，都无济于事。

其实，关键不在于两位领导，是有更上层的人插手，才会造成这种不尴不尬的局面。这些事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它属于权力的范畴。一切以当事者权力之大小为转移。而且照例，上面的意见，下面的领导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所以他们只好“吃轧档”。

有些人在受压迫时，要讲民主、讲法制，但一当他翻过身来，而且恢复了权力，却又往往会以老法子来对付别人了。也许，他正要与孔老夫子反一调：己所不欲仍施之于人也。

由此，我也感到改造国民性的困难。如果思维模式不变，深层文化结构不变，单是某些外部条件的改变，或者是名词术语的变化，是无济于事的。正如鲁迅所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诗人之死》在上海僵持了很久，终于还是不能出版。倒是她的第二本作品《人啊，人！》很快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人之死》后来是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听说上海有位老作家还曾写信去“撬”，但福建人民出版社不买这个帐，仍然出版了。

《人啊，人！》是一本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呼唤人性觉醒的书。这是厚英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动乱之后，进行痛苦的沉思和反省的结果。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她回顾了从当年批判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现在转而信奉人道主义的心路历程。她认识到，她“一直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人。”她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她要实现自己“人”的价值，而不愿再做“驯服的工具”。她说：“一个大写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正是当时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的知识分子，深感扭曲人性、抛弃人情、背离人道的可怕后果。他们重新呼唤人道主义的来归，有用理论语言来表述，有用文艺创作来表现。《人啊，人！》就是文革结束以后，较早地以文艺的形式来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作《人啊，人！》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也有它的新颖之处。如果说，作者在《诗人之死》里运用的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那么，在《人啊，人！》里，就吸取了不少现代派技巧，如意识流手法、梦境的象征方法。而且，在《后记》里，她还宣布了对流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背叛：“严格他说，艺术创作的最高任务并不是起初地再现现实，而是真实地、形象地表达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的认识、态度和感情。艺术所追术的最高真实不是仅仅对生活的逼真的描绘，而更应该是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 and 态度以及对这种认识和态度的准确而生动的表达。这似乎有意在概念上兜圈子，其实不是，我是想强调艺术创作中，作家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强调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表现作家主观世界的重要性。”

应该说，《人啊，人！》无论在文学的观念的转变上，在艺术手法的更新上，或者在人道精神的觉醒上，都是先行者。

先行者的行动，总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既受到新进者的欢迎，也受到保守者的反对。

《人啊，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这部小说在1980年11月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特别在青年读者之中甚为流行。而且很快传到国外，先后被翻译成英、德、法、俄、日、韩等多种外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但同时，也受到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批判。

《人啊，人！》的受到批判，有人事上的原因，也有思潮上的原因。

人事上的原因，暂且不去谈它。单就思潮而言，这本书在当时也逃脱不了被批的命运。因为无论是人道主义思想、表现论文学观念、或者是现代派表现方法，在当时都是犯忌的。而那时，大批判的遗风未衰，有些人动不动

就要对不合己意的观点进行批判，仍持大批判万能论，以为一批判就可以把别人批倒批臭。

所以当时的形势实在是非常的严重。除了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大批判文章之外，高校中文系还接到指令，要组织批判班子。别的学校的情况，我知之不详，单就复旦中文系而言，这个批判组就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除了集体撰写大批判文章之外，还组织了好几次大批判会议。听说该批判组的组长在一次批判报告中说：“《人啊，人！》写得蹩脚极了，这种书，我两三个晚上就可以写出一本来！”而据厚英告诉我，在《人啊，人！》刚刚出版，尚未受到批判时，此公却曾特地跑到厚英的住处表示祝贺，并要向她学习创作。我当时就曾质问过系总支书记：“你们搞的什么名堂？”不料总支书记回答也很坦率：“组织批判组，是上面的指示，我只能执行。至于为什么让某人去这样搞，我问你，我要是叫你去批判，你肯去吗？不派他去，我又能派谁去呢？”如此回答，我也无法再说什么了。

至于厚英所在单位，当然也要组织批判，而且还罢免掉她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有一段时期，连课也不要她上了。但这也是奉命行事。据我所知，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有些领导，特别是该院的主要领导人——党委书记李庆云，对她还是很爱护的，至于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就更不必说了。因为时间毕竟到了80年代，人们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一些问题，不愿意再唯命是从了。

而且，也许是逆反心理的作用罢，《人啊，人！》愈受批判，就愈得到读者的欢迎，作者戴厚英也成为许多青年的崇拜对象。我和高云去看望厚英时，就常碰见学生或读者围着她转。复旦分配给她第一宿舍的房子时，我的几位工作朋友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帮她装修，不计报酬，只要求送一本作者签名的《人啊，人！》——在装修完成后，厚英还是请他们到馆子里吃了一顿饭。

愈批愈走红，这大概是发动者的始料所不及的罢？

但当时，厚英的确还有很多难关要过。有许多朋友为她担心，为她出谋划策。记得正在批判高潮中，吴晓平兄特地在华山饭店宴请了厚英一次，邀我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几位教师作陪。当时，宴请戴厚英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且在公开场合宴请也的确有所不便。晓平选中了华山饭店，因为那里是属军队管辖，地方上的干部不大能去。恰好某军区吴司令在这里开房办事，晓平就以他的名义订席。席间，有朋友劝厚英写份检讨，应付过去算了。厚英坚决不从。她说，她没有错，就是不检讨。她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也以为不必检讨。虽然从策略上看，检讨未始不是一种过关的办法，而且过去不乏以检讨过关的先例，但你戴厚英却不行。一则，写检讨不符合戴厚英的性格；二则，据我的观察，大凡上面准备让你过关时，检讨才有用，否则再怎么检讨也是没有用的，而现在还没有让厚英过关的迹象。大家觉得我言之有理，此议遂作罢。

厚英当时就这么硬顶着。

厚英是坚强的。当她被批判得厉害时，内子怕她一个人住在作协不好受，邀她到复旦我们家来小住，她不肯来，说：

“我能挺得住。”但她内心是很痛苦的。

对厚英的批判和排挤，在文艺界也引起反感。在批判高潮过去后，有一次陈丹晨兄到上海出差，在我家吃饭，他就主动提出要为厚英做一些工作。他说，把戴厚英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排斥在作家协会之外，并不是作协的

光荣，但要上海分会来吸收戴厚英入会，怕也很难，好在中国作协有条规定，凡是中国作协会员者，就是各地分会的当然会员，因此，要我劝厚英直接加入中国作协。当时丹晨兄担任《文艺报》副主编，并在中国作协兼任什么职务，他有权处理此事。厚英就是这样加入作家协会的。入会的介绍人大概是萧乾和刘宾雁，但最初动议者是陈丹晨。丹晨还要我写一篇重评《人啊，人！》的文章，给《文艺报》发表。我很快就写好寄去，但压了很久都发不出来，我只好要回来给《上海大学学报》发表。文章虽然在这家学报上发表出来了，但签发我这篇文章的学报执行副主编施燕平兄，却因此受到了批评，这使我很过意不去。

七

在厚英处境困难的日子里，给她支持最多的是广东文化界。

广东人民出版社——后来是花城出版社，不但出版了她的《人啊，人！》和其他几本著作，而且还安排她治病，招待她休养，使她感到温暖。有一次，她对我们说，她想离开上海，调到广东去工作。我们劝她不必割断与上海的关系，可以暂时借调到广东工作，而户口和人事关系不妨仍留上海。毕竟改革开放了，有些情况是暂时的。上海将来总会发展得好的。虽然她谈起此事，很是激动，但真要调离，却也颇为犹豫。因为上海毕竟是她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这里还有她不少老同学、老朋友和青年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权，但多少能给她一份精神上的慰安。

她终于没有调走。

不久，香港企业家李嘉诚要在他的家乡广东汕头创办一所大学，主持其事，担任校董会主任的是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吴南生很赏识戴厚英，邀请她到汕头大学长期讲学。这时，厚英的女儿已去美国读书，她也没什么牵挂了，就在汕头大学任教了好几年。

厚英到汕头大学不久，我也受遭到汕头大学做客座教授，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从1987年初到1990年初，在汕头大学工作了整三年，厚英比我去得早，也比我回来得早。

我们到汕头大学，是因为李嘉诚向邓小平要求师资力量的支援，于是国家教委指令8所重点大学派教师去。我们复旦大学就派去10多个人。在我决定是否到汕头大学任教之前，内子特找厚英商量。厚英很鼓励我去，这才下了决心。因为复旦去的人多，所以很热闹。大家与厚英的关系都很好。

厚英在汕头大学很受尊重，她的心情是舒畅的。

吴南生对厚英颇能礼贤下士，每次从广州到汕头，总要来看厚英，或请厚英到他的住处叙谈。汕头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和一些干部也对厚英非常客气，有些人还想托厚英反映点情况，办点事。厚英深知其中奥妙，总尽量不介入校事。不过，有些看不过去的事，她也会主动站出来来说话。我们刚到汕头大学时，主管行政工作的副校长提出，要客座教师交房租、家具费、被褥费等，而且数字不少，客座教师很有意见，不肯交，但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恰好吴南生到汕头，厚英见到他，就批评道：“这些客座教师是你们请来的，又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他们都是单身借调过来，在本校都有家，都付了房租，你们要他们在这边再付房租，合理吗？你们这样做，以后谁还肯来支援汕头？”吴南生听后，说他并不知道此事，并且马上打电话通知那位副校长，要他改变此种做法，停收房租等。还有一次，也是我们初到汕头时的事。那时还没有搬入客座教师楼，我因为生病迟

到，也没有与其他人同住，而是暂时住在一间有较好家具的住房里。但第二天，就有人来说要搬走家具。我只当他们有什么要紧用场，也就同意了。后来没有来搬，听说是厚英干预了。因为厚英听说是因某干部的亲戚要用，而来搬的，马上加以制止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尊重教师？随便折腾。吴老师要是知道你们搬去给什么干部的亲戚用，他非拍台子回复且不可，你们看怎么办吧。”厚英说话，在汕大是能起一走作用的。

汕头大学校园风景美丽，生活环境很好。厚英住在教授楼招待所，那里背山面野，还靠近一个小湖，即使在冬天，四周也开满鲜花。厚英除教课之外，每天在那里看书写作，怡然自得。教师学生来看她的很多，谈创作，谈学问，谈人生。晚饭后我们常在一起散步，星期日常在一起聚餐，有两家朋友也常请我们一起去吃饭，生活过得颇不寂寞。她 50 岁生日时，校方特地宴请了她，我没有参加，只听她说起过，厚英很兴奋，舞跳得很多。还拍了很多照，《往事难忘》中的最后两张插照，就是那时拍的。

厚英在汕头大学那几年的生活，对调整她的情绪，治疗心灵的创伤，很有好处。但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时间过得长了，对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不利。她过了几年宁静的生活之后，还是回到了纷纷攘攘的上海。

八

在复旦，我们一直住得很近。先是，厚英住在第一宿舍，我住在第三宿舍，相距几百米之遥；后来因为扩大住房，我们又一起搬到凉城新村，从我家阳台上可以看见她家后窗。这样，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

但大抵是她来我们家的时候居多，我们到她家的次数少些。一则，是怕打扰她写作，——我们知道，创作是不好打断思路的；二则，她家常有些读者来访，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们不愿意凑这个热闹。她每当写作告一段落，或者有什么事要商量，就会打电话说要过来坐坐。有时从菜场回来，也会顺道过来坐一会。

厚英一到，就热闹了。她接触面广，见闻多，又善模仿别人的动作、语调，总是说得我们哈哈大笑。我的女儿就特别喜欢听她神聊。别的客人来时，女儿不大出来参加谈话。戴阿姨一来，她就来劲了，不但听得出神，而且问这问那，有时还要发表评论。她们二人谈得极为投机。厚英什么都谈，从社会大事到个人的生活小事。而且在她周围，发生的怪事也多。有一次，她说到有一位男读者，比她年轻一、二十岁，硬要追求她，说要与她共同生活，怎么解释也听不进，真是哭笑不得。

对于读者，她是很尊重而且爱护的。读者的来访，能够交流思想，也能慰她寂寞，但有时也会带来麻烦。有时她正忙着写作，读者来了，只好停下来接待。有些人粘着不肯走，就要陪着耗时间。她曾说起过，有一个人来坐得很久，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她急于写稿，示意请他走，他就是不走，一直到吃饭时间，还是不肯走，厚英说，我今天没买菜，没有什么吃的，那人说，你吃什么，我也吃什么，还是不肯走。结果是，只好请他吃卷子面。还有一次，厚英要到门房拿东西，远远看见一个她不想见的人来了，就躲到我们家来，聊了一会，想回去写作了，又怕那人等在她门口不肯走，要我去侦察一下，确证那人不在，她再回去。这也是单身名女人的苦处。

但也因为出了名，算是“统战对象”吧，厚英在分房上是得到照顾的。好几年以前，上海大学文学院就接受上面指示，要给她扩大住房，先是，分到杨浦区的什么新村。三室一厅，比她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一室半无厅房好多

了。她考虑了很久，决定放弃，宁肯等几年，也要在复旦分房，她爱复旦的学术气氛，而且复旦的朋友多，可以互相照顾。所以她又等了好几年，直到凉城新村新宿舍造好，她将第一宿舍住房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增配给她的曲阳新村住房一并交给复旦房产科，才得到复旦凉城新村宿舍里的三室一厅房。但谁能料到在她所喜欢住的复旦宿舍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厚英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教授。她认为只会编故事的作家是没有出息的，作家应该有学问。所以，她喜欢结交学者朋友。住第一宿舍时，她常到朱东润、王中、贾植芳、伍蠡甫诸位老先生家中聊天，也颇有些中青年学者朋友，她与胡守钧等人谈得很投契。住到凉城新村后，与校本部隔得远了些，但这里还住着许多中青年学者，时相过从。她还要我邀陈思和等住得远的青年学者聚聚，我已通知思和，可惜还没有来得及安排时间。

她喜欢看书，也喜欢买书。有时买到或借到一些颇有新意的书籍，还特地送过来给我们共赏。她出国时，曾问我想要什么书，她可以买来送我。我说，国外书价太高，不必费这个钱，你自己若带什么书回来，借给我看看即可。有一次她从香港带回一大摞新儒家著作，我们轮着阅读，而且还边读边讨论了一段时间。

但她对于自己的著作却很不注意保存，别人问她要，她会把自己留存的最后一本也送掉，或者说，家中还有没有保留样书，连她自己搞不清楚。前年，《诗人之死》转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她竟然连一本样书也找不出来，只好跑到我家来把当年送给我们的初版本拿走，后来送了一本大白版的新版书来补偿。听张晓三说，厚英再版别的什么书时，又跑到她那边去借，而且忘记还给她新版书。

对于厚英这种马大哈作风，高云不知批评过多少次，她总笑嘻嘻地表示接受，但老是改不掉。干脆，连家里大门的钥匙也交一把给高云保管，说是以免有时出门忘带钥匙，把自己锁在外面进不去。她的确出门会忘带钥匙，每次来拿备用钥匙时，总表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但下次照样会忘记掉。

九

厚英的课讲得好，新颖、生动，极受学生欢迎。她讲《文学概论》，讲《马列文论》，讲《写作》，讲《文艺心理学》，都能讲出新意。特别是《文艺心理学》，她钻研尤深，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她写过很多笔记，写了不少讲稿。但终于无暇整理成书。她曾与一位青年教师合作，整理出过几篇论文，但由于彼此事忙，未能继续下去。

厚英的职业是教师，写作是余事，所以她一直自称是“业余作家”，这也是事实。但由于勤奋和出手快，她仍旧写得不少。

前几年有一位作家朋友友善地问她：为什么近年来不大写东西了？她笑嘻嘻地报了一笔账，使那位朋友吃了一惊。原来那几年她出书不少，只是大都在香港出版，国内难以看到。

前年，她一下子送给我们三本新书，还不算再版书。都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从1978年她因偶然的机缘创作《诗人之死》算起，到1996年被害为止，18年间，她一共出版了12本书，计有：

长篇小说7部：《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风水轮流》、《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

中短篇小说集2部：《锁链，是柔软的》、《落》；

散文随笔集 2 部；《戴厚英随笔》、《结庐在人境》；

自传半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

另外，她在报刊上发表了 不少散文随笔，还可以结集为 1——2 本散文随笔集。她与女儿戴醒的通信集，已由老编辑左泥整理成书，也是准备出版的。

厚英遇害后，她女儿和女婿从电脑中调出了自传下半部的未完成稿，还有一部写得不多的长篇小说稿。

内子高云也找出了这封厚英在 1968 年写给她的长信，约近 5 万字之多。

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厚英作品的全部，——她女儿准备为她编全集，我相信编出来一定会比上面的统计数字多，——但就是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来看，也足以说明厚英的成就了。

厚英出手极快，写《诗人之死》初稿 30 万字，她只化了半个月，二稿 45 万字，只化 40 天；25 万字的《人啊，人！》则在两个用内完成；《脑裂》20 万字，半个月即写好初稿。

有一次，我说起，从香港一本作家杂谈录中看到，说香港有些通俗小说家，一天可以写两万字，遂表示惊服。厚英说，她写得顺手时，一天也可以写两万字，并解释道：写小说与写学术论文不同，不必言必有据，不必引用那么多资料，而且写对话时，空格多，文字不象学术论文那样堆得结实，所以可以写得很快。但无论如何，我对这样的快手，仍是很佩服的。

而厚英，却也因力这样拼命的写，经常写得腰酸背痛手臂发麻，以致落下颈椎骨节增生的毛病。但她还是想写。她曾对我们说过，以后如生活能安定一点，她想每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再写些散文。为此，她想提前退休，还曾提出过申请，但未获准。盖因时势不同了，上海大学文学院要用她这块牌子，以光门面，自然不好让她提早退休。

在厚英已出版的小说中，《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音》是一套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三部曲；还有一套描写农村生活的三部曲，总名为《流泪的淮河》，已出版的《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就是其中第一、二部，已开手写作而未完成的那部长篇，不知是否即是《流泪的淮河》第三部，那我就不能确说了。

有人说，戴厚英的小说写的都是她自己。这话自然不无道理。她写的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许多女主人翁差不多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大抵也以她的家族历史为蓝本。但文艺创作总是有原型的，作家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融入作品人物中也是常事。胡适之不是考证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吗？郁达夫则认为所有文艺作品，包括散文，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何况戴厚英是主张文艺要表现自我的。如果要做索引派的考据文章，我不但可以考出小说女主人翁的哪些思想、事迹是属于戴厚英本人的，而且还可以根据厚英平日的闲谈，考出其他某些人物的生活原型来。但这样做，似乎也很无聊。还是把阅读的注意力放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上吧。

我以为，戴厚英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是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同时代人的命运，作者所追求的是人道的精神，所呼唤的是人性的觉醒！

十

厚英初次出国时，有人担心她会不回来，这在当时称之为“叛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她每次出去都住不长。她眷恋着我们这块土地。而且，在国外，她还常与那些轻视中国人的洋人和假洋人进行斗争。倒不是她故意要显示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是实在看不惯那些仗着自己有几个钱就看不

起中国人的人，或凭着手中有支配某种基金的权力，就把某些没骨气的中国人当猴耍的人。每逢碰到这种人，厚英又要发挥她的“小钢炮”的威力了。

厚英更热爱她的家乡，那块苦难的土地。

厚英是安徽颖上县人。父亲原来开一家小店，生活还过得去。公私合营以后，他仍是店里的负责人，也还算不错。1959年“整风补课”时，她父亲因响应号召，提了一条关于统购统销问题的意见，却被补打成“右派分子”，监督劳动，工资降为26元5角。从此，日子便艰难起来。大跃进年代，安徽是共产风刮得很厉害的地方，到得三年灾害时期，自然就要饿死人了。这时，厚英的家是靠刚强的母亲支撑着的。大家吃山芋、野菜和胡萝卜度日。厚英的工资也有限，先是48元5角，后来加到60元，65元5角，她大部份都用来支援家里了。所以家里人对她都很尊敬，她对家人的感情也很深。到她成名之后，经常有些稿费收入，就花更多的钱支援家庭，除了赡养母子外，对于姐姐和弟弟，每家都给予帮助。听说，亲戚和乡人有困难求告。她也解囊相助。而她自己，则日子过得很紧。

厚英在她的散文里常写到她的乡情和亲情，如《怀乡曲》、《故乡情》、《儿女情长》，而《送》则是写她对女儿的感情。这些散文都写得很好，因为她有真实的感受，情真意切。

对于家乡的事情，厚英一向是很热心的。大约在1990年，有一家外国基金会，愿意通过厚英来支援中国的教育事业。厚英就想把这笔资金引到颖上县去。她为落实此事，还特地回乡走了一趟，想在一所农业中学进行投资，后来不知为何没有谈成，厚英很感懊丧。1991年，我国有好几个省份闹水灾，安徽是重灾区。厚英又寝食不安了。她要募集款项，回乡救灾。我不大赞成她此项行动。因为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此类活动大抵只能由政府组织，个人不宜出面，救灾款项也只能交给政府机构支配。厚英听不进这个意见，而且颇为生气。但当她从安徽回来之后，又笑嘻嘻地跑来了。人晒得很黑，精神很疲惫。她说，她募集了很多钱，自己也捐了不少钱，但传媒报导这报导那，就是不报导她捐钱救灾的事，而且，当地政府还派了一个人“陪同”，到处跟着她，不让她自由活动。她参加救灾，是想为乡亲办点实事，本不在乎报导不报导，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种态度来。说罢，不禁恍然。

厚英一心想为乡人办事，谁知最后竟会命丧在前来求助于她的乡人刀下呢？

呜呼！

十一

厚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她追求激烈的革命，她追求纯真的爱情，她追求完美的人性。

她鄙视庸俗，她讨厌虚伪，她憎恨恶浊，她也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

但是，她对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是了解不足。她不大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她不知权变，不讲妥协，不够宽容，她要一往直前，不肯迂回前进。因此，她经常碰壁。

她任性。她的书房就取名为“任性斋”，而且还请一位书法家写了斋名匾额，挂在显著的地方。不知是想策励自己改正缺点呢，还是表示要我行我素？——我始终没有问过她。

她在事业上是成功者，但在生活上却是失败者。她经常陷入痛苦之中。

大概是因为碰壁碰得多了，她想有所超脱。

近年来，厚英先是耽读老庄，后来又热衷于学佛。还写过《我读<庄子>》和《佛缘》等散文。她到我家闲谈时，也大谈佛理和佛缘。她还以佛参梦，讲她做过的各种奇怪的梦。厚英本来就是一个激情、敏感的人，从来就多梦。奇怪的是，这些梦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应验。她说，80年代初，她在广州郊区养病，必情很不好，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高云去看她，第二天就接到高云的信，非常高兴。又说，她家中有人死亡时，她梦中总有征兆。后来她把这些材料大部分都写入散文《说梦》之中。

她想引导内子高云与她一起学佛，可惜高云尘缘未断，俗情难舍，望佛门而却步。厚英对我说，她已买了不少佛经，叫我不必再买，要读时可到她家去拿。我虽对佛经颇感兴趣，但终因俗务缠身，还静不下心来读佛。她带她另一位小姐妹C女士到奉化雪窦寺去看做佛事，原说是去参观的，但一到寺内。为此情此景所感动，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她们在雪窦寺迟迟不归，害得C女士的先生急得团团转，还打电话到我们家找人，他以为C女士出家不归了呢。而C女士从雪窦寺归来后，却对高云说，厚英在那边很投入，她却始终只是个旁观者。

其实，厚英自己也是尘缘未断。她一放假就往安徽老家跑，她记挂她的老母和姐弟；为了照顾侄女戴慧，她暂不出国；她还关心社会上的反腐斗争；她关心祖国的前途，关心家乡的建设。她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对那些不问世事的先生表示不满。

是的，像厚英这样性格的人，怎样能够不关心世事呢？怎样能够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呢？

我想起了清人龚自珍评论陶潜的两句诗：

莫信诗人竟平淡，
二分梁甫一分骚。

厚英如不死，她还会写出社会性很强的作品来的。

戴厚曲的性格

邓伟志

与戴厚英同龄，都是 1938 年出生，她比我大几个月。因此，每当我与她发生争论时，她最后总以“听老大姐的”，迫我接受她的意见。

我与戴厚英同事，都在一个大学里任教，还在一个研究生导师组里带研究生。不过，我们分别从事着不同的专业。在业缘重于地缘的今天，隔行如隔山。

因此，我与戴厚英是既熟悉又不熟悉，熟悉她的性格，不熟悉她的文艺理论。

戴厚英性格的最大特征是不阿谀奉承，无媚骨媚俗。她就是对她所钦佩、崇敬的人，在背后可以把人家评论得很高大，可是，见了面也不吹捧人家。这两个月，很多友人提到她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一书中写到的事。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那段文字我是在戴厚英去世后，才知道的。她在书中那样为我说话，可是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半句。我与耀新（妻子）手捧着一位博士传真过来的那一页文字，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耀新才慢慢他说一句：“这就是戴厚英的性格……”

戴厚英性格的又一特征是：“说大人则藐之”，尤其是不买那些道貌岸然而又喜欢整人的大人物的帐。谁无端地给她扣政治帽子，她就顶谁。不管他是什么人，她都敢跟他争，跟他吵。明知争了以后，人家会报复她，她也要争。明知争了没好处，争了更倒楣，她也要争个水落石出。大事，这里不便去说了。这里提件小事。她自知自己是内控对象，大报不敢发她文章，照一般人的做法，吃个“哑叭亏”就算了。可她不，她非要捅出来不可。1996 年夏，《新民晚报·夜光杯》举行发奖大会，气氛热烈而又轻松。许多人的发言都很得体，可她站起来说：“人家说我戴厚英只能在《新民晚报》这类小报上发文章，上不了大报，我想，我什么时候能冲出小报，走上大报……”会后，我同吴祖光、戴厚英等被分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批评她的发言“同整个会议气氛不协调”。吴祖老似乎也同意我的看法。戴厚英却不接受。我俩争论起来。她说：“我就是要让头儿脑儿们感到在百鸟朝凤中还有乌鸦。”吴祖老可能是嫌我与戴的争论又同晚宴的气氛不协调的缘故，同我们讲起他的趣事，把话题岔开来。

戴厚英性格的第三个特征是：尽管她在大人物面前吃不得半点杂面星（这是我们淮河儿女的土话，意思是受不得委屈。

）可是她又勇于认错。人们都知道她批错过人，“左”过好一阵子。可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她后来对“左”的认识，相当深刻。深刻得可能比某些受过“左”之害的人还要深刻。戴厚英对邓小平多次谈到的“主要防‘左’”双手赞成。她丝毫不回避自己“左”过。一次华东师范大学讨论华东师大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作家的“丽瓦河现象”。这是一场庆功会。没想到戴厚英居然作起自我批评来。她表示向自己批判过的同志赔礼道歉。与会者对她的诚恳，啧啧称赞。戴厚英还有一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位犯“政治错误”的青年男子把一部分责任推给了她。这是不应该的，可是，有关领导一找戴厚英谈话戴厚英就认了。事后她同我谈起，我问她：“怎么可以这样？”她爽朗地回答：“这说明女人做事比男人漂亮。“这就是戴厚英为人的“忍”字，是佛家之忍。

戴厚英已离开我们几个月了。我与研究生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对研究生说：“你们当中有奔戴老师来的，可是，你们迟了一步，没有见戴老师一面的福气。”仔细想想，我在与戴厚英的学术交往上，又何尝不是迟了一步和几步呢？平常总觉得太熟，总觉得来日方长，没有抓紧时间向她讨教。近来有些新闻出版单位问我有无戴厚英的照片或信件，我才发现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们是两代人的交情，我女儿同她女儿从小就是好朋友，她们也没有留个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太刻板了呢，还是什么原因？我说不清楚。我只觉得埋藏在心底的友谊最珍贵。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于上海

苍天无眼——悼女作家戴厚英

安文江

月3日，戴厚英追悼会结束后，戴的邻居、好友、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中杰教授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很沉痛很悲愤他讲述了著名作家戴厚英及其侄女戴慧惨遭杀害的情况。我半晌无语，只长叹一句：苍天无眼！

戴厚英的第一部小说是《诗人之死》（因种种原因，出版于《人啊，人！》之后），我读到她的最后一篇作品，是刊于《随笔》今年第4期的《说梦》。她的梦写的全是死：弟弟、三妹、侄儿、父亲……她说：“我自己真的在随着身边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而慢慢死去。”

她真的死了，却不是慢慢死去。她是被尚未缉拿归案的凶手用乱刀砍死的。

在新时期冒出来的女作家中，戴厚英是最多骨气、最少俗气的作家之一。这也不奇怪，原先她并没想过当作家，当她经历了与大诗人间捷那段刻骨铭心的爱，又目睹间捷不堪摧残而自尽于动乱年代的惨状，她就把满腔的爱与恨喷泻在白纸上，完成了她的处女作《诗人之死》。接着，她为了控诉人斗人的变态，为了呼吁人性的复归，又创作了历尽曲折终于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人啊，人！》等七部小说、两本随笔，使她成为中外关注却又颇多争议的作家。褒也罢，贬也罢，在她的作品里，你读不到大话假话，看不到虚情假意。文如其人。或许正因太少虚饰，大多率真，她成了赤膊上阵的许褚，招来如此多的明枪暗箭。其实和她熟悉的人，都说她胸无城府，都承认她看似过激、偏执而背后有一颗纯真的爱心。随意举个例吧：《人啊，人！》的出版屡遭封杀，是花城出版社顶着压力拍板，责编是杜渐坤，戴厚英不忘知遇之恩，在杜渐坤任《随笔》编辑、主编后，她一无例外地把得意之作寄给老杜发表，绝没有“人一阔脸就变”的病态。这本是为人的准则，但真要做到也难，戴厚英做到很有点愤世疾俗的戴厚英是性情中人。她曾说：“我安份守己，十分安份守己。（厉害）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份守己的权利。”因为社会上太多人“视有型有骨为异类，定要折其骨、毁其型”。于是，本来向往安份守己的她“只能呲牙咧嘴，厉害厉害了。”但厚英并无奢望，她“祷告乞求：给我一份安宁，让我安份守己。”

然而，似乎命运注定她与安宁无缘，以至被残忍地剥夺了一个人作为人的起码的权利——活着。

戴厚英很相信梦是能超越时空的心灵感应，因为先她而逝的亲人都曾托梦于她。可是，我不希望她在梦中读到自己的噩耗，尽管她早已写下“历史在渐渐死去”的日记。

苍天无眼，让不该早死的戴厚英以不该有的方式死去……

但愿苍天有情，让58年人生难得安份守己的戴厚英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一份安宁！

戴厚英百日祭

范民声 庞曾涵

年八月上旬，我们女儿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人高兴非凡，忙着把喜讯通知至亲好友，其中自然也包括我们全家的好朋友戴厚英。女婿星阶把电话打到她家里，她侄女戴慧告诉他说：姑妈回安徽去了。于是女婿向她问了安徽家中的电话号码，打了一个长途给她，不巧她又不在，没有办法，只好托她的家人转告，我们想，她得知这一喜讯后，一回到上海，很快就会笑嘻嘻上门来道贺的，因为她是看着我们女儿长成人，并一直关心着她的。

到了八月二十五日，已是深夜十一时半了，突然接到一个来自虹口公安分局的电话，说是“戴厚英教授遇到了一些麻烦，知道你们是她的朋友，想来向你们了解一些有关情况。”这一电话立刻引起了我们全家的惊疑不安，什么“麻烦”，竟值得公安部门深夜出动？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大家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灾难已经降临到她的头上。一个小时后，公安局的人来了，我们急着向他们打听她目前的情况，但他们不便讲，只是闪烁其辞地说什么你们不久就会知道。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我们也已从他们调查的内容中约略地猜到，她所遇到的决不是一般的“麻烦”。大家心情沉重，惴惴不安，整整一宵难以入眠。果然，第二天一早，就有朋友打来电话，传来了戴厚英在家中被杀的凶讯。尽管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噩耗还是像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们都震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是真的吗？庞曾涵忍不住失声痛哭：“小戴，小戴，你死得好苦啊！”

这件事对我们两人，对我们全家，都是一个巨大的、极为可怕的打击。从此以后，我们家中就失去了一位举家欢迎的重要客人，失去了一位可以充分信赖的真诚的朋友。

我们和戴厚英之间的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开始的。在此以前，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个“激进的左派”，上海文学界的一尊“小钢炮”，其他就不太了了。在文革中，听说她也随大流参加了“造反派”，后来又卷进了“炮打张春桥”事件。不过这些事在那一时期是司空见惯的，并没有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后来听说她同诗人闻捷谈恋爱，闻捷因而被点名批判，被迫自杀，我们才开始注意她，觉得在她身上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东西。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同她有了交往。那时，她带了女儿住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内，而我们家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富民路上。那时大家都没有多少正经事可干，找朋友聊天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排遣，所以就互相走动起来，渐渐地发觉彼此都很谈得来，走动也就愈来愈多。特别是她，差不多每星期都要来我家一二次；有时我们也去她住处看望她。连我们的女儿霜霜与她的女儿醒醒也成了好朋友，醒醒比霜霜大四岁，霜霜称她为“老戴醒”，两个孩子现在都成了大人，做了妈妈了，但至今感情很好。

我们所以能和戴厚英谈得来，在她是因为知道我们是真诚待她的，完全可以信赖，在我们则是由于在交往中发觉，她其实并不是一个“左”得可怕的人物，虽然她常常出言尖刻，锋芒毕露，心地却很善良，很有人情味。我们之间谈得很多的一个话题是关于闻捷。庞曾涵曾同闻捷在上海京剧院同过事，文革中也曾有过交往，对他有一些了解，所以在谈起闻捷时，不能不引起对这一对不幸的恋人的深深同情。此外，她在闲聊中流露出来的对父母、家人的深厚感情，对故乡的真诚热爱，也很使我们为之感动。生活中的戴厚英与传说中的戴厚英竟然大不一样，而这生活中的戴厚英却是真正的戴厚

英。

戴厚英很早就是一位社会名人，所以少不了要与某些上层人物打交道。如果她想爬高杆的话，那是十分便当的事，但她却是十分傲气，就是不愿意爬高杆。即使在她困难的时候，她也不愿意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地巴结、求助于别人。一些正直的领导同志很喜欢她这种性格，但她也难免得罪了另一些人。这些人说她“太骄傲”，“太目空一切”。其实，她心高气傲或有之，但在待人接物上还不至于傲慢无礼，相反，她是很懂得尊重别人的。她的朋友中很多是没有显赫头衔或知名度的普通人。她一样同他们平等相处，真诚相待。她的朋友很多，我们同她成为知交，在某种程度也是出于喜欢她这种不媚上、不骄下、平易、真诚的性格。

在“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她被临时调到市革委写作组所属的电影小组工作。但没有多久，“四人帮”就垮台了，电影小组自然也随之解散，她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写作组的学习班。她在电影小组中既非领导，也非核心，时间也不长，自然并没有多少需要“说清楚”的事情，但她还是认认真真地参加了学习。这一时期她到我家来的次数很多，每次来都要告诉我们不少见闻。

据我们所知，她对“四人帮”的垮台是由衷地感到高兴的，不仅因为她本身就是文革的受害者，而且也是由于她对江青为人的专横跋扈早有反感。她有一个原先关系很亲密的朋友，七五年跟江青去了一次大寨，回来后向她出示了与江青等人合摄的照片，一脸得意洋洋的神色，却不料招来了她极度的反感。她后来对我们说：“我从此再也看不起这个人了，这种人无耻得很。”这件事不只说明她为人清高，同时也反映出她那时的政治态度。她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当时的所谓“批邓批孔”，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在我们面前也常有流露，只是碍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即使是好朋友，有些话也只能点到为止，不便明说。当然，我们对此也是心照不宣的。

所以她在学习班中，一直没有以“接受审查”的身份自居，也没有急着要为自己开脱。她原先是想当一名“旁观者”的，但终于也有“旁观”不下去的时候。当她看到有一个过去曾为“四人帮”出过力的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对别人胡咬乱攀，无限上纲时，便忍不住拍案而起，当场提出质问，要他把过去写的东西也拿出来“说说清楚”。这突然的发难，使那个人顿时张口结舌，狼狈不堪。她回来后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我们都为之开怀大笑。

学习班结束后，她又面临着重新分配工作，那时我们想介绍她去戏剧学院执教，因为在此之前，我曾请她去戏剧学院为木偶班同学讲过一次课，课堂效果很好。她毕竟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都相当出色，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教师。当时她自己表示愿意去，戏剧学院领导原先也是同意接纳的。但是由于文革中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时还来不及清除，一些说不清的矛盾纠葛仍在紧紧地缠绕着她，所以她终于没有去戏剧学院，而是去了复旦大学。不久又为了贪图路近，改在复旦分校（即现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执教。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几年中，她的心境一直很不好，夜间常做恶梦，遇事容易冲动、发怒，甚至用摔东西来发泄胸中的郁闷，对此我们是理解的：她实在生活得太累了，各方面的压力，大大的超过了她能承担的负荷量，这怎能不引起她精神的反常。那时，她在经济上的负担是很重的，一个

月六十六元工资，除了抚养一个已经上学的女儿外，还要经常接济安徽老家的亲人，她又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境况之窘迫可以想见。不过，经济上的窘迫，她还是可以承受的，苦日子过惯了，对物质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奢望，荆钗布裙，粗茶淡饭，她也不当一回事，也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哭穷。使她最难以承受的不是物质生活的艰辛，而是来自外界的精神压力和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空虚寂寞。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十年的动乱，不仅使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翻来覆去的政治风云，无休无止的批判斗争，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人与人之间的误解，猜疑甚至仇恨也就因此而生。戴厚英原来的工作单位——上海作家协会更是极左路线特别重视的单位，早在柯庆施当上海市委书记时，这里就已矛盾重重，斗争不断。戴厚英和其他几个青年人被派到这里工作，自然要奉命参加战斗，因而不可避免地卷进斗争的旋涡，并得罪一些人，其中有些人对此是能谅解的，知道这是形势使然，并不予计较，但也难免有一些人一直耿耿于怀，再加上文革中间的翻翻覆覆，使年轻人之间也产生了种种误解与分歧，甚至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些往事陈迹，现在看来都不难理解，不会有人再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可是在文革刚结束的那一时期，旧日的积怨却还不能立刻得到化解。因此在那几年里，戴厚英总是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摧残她，压迫她，甚至剥夺她同别人一样的工作和生存的权利。她愤慨不平，她奋力抗争，却终于无济于事，于是出现了更严重的精神危机。

后来，她终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写小说，用她和闻捷相爱的故事做原型，开始了小说《诗人之死》的创作。我们原先以为，她是长期搞理论工作的，写小说恐怕非其所长，但为了让她的庸苦有所排解，还是支持她去写，我们想即使写不成功，至少还能为闻捷留下一点纪念。

大概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吧，她写《诗人之死》的速度是惊人的，几乎每天都可以写出万把字来。她夜以继日地写呀写，废寝忘食，心无旁骛，全部身心都扑在小说上面。坐得时间太久，累了，就干脆双膝跪在椅子上写。我们的女儿一次去她家，看到她这种姿势，感到很奇怪，回来学给我们看，我们都为之感叹不已。

每写完一部分，她都把草稿拿来先给我们看，让我们充当她的第一个读者。在读了她的初稿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部小说竟然写得如此真实、生动、感情饱满；实在大出我们意料之外。虽然从小说技巧的角度来看，也许它还不怎么成熟，但它是作者用她炽热的感情来写成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她对诗人热烈的爱，对“四人帮”强烈的恨。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使这部小说具有非凡的价值。从此，我们再也不怀疑她写小说的才能了。

在为《诗人之死》出版事宜奔波交涉的同时，她就着手写第二部长篇小说了，这就是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人啊，人！》。书同样写得很快，在广东花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没有多久就修改、定稿、发排、出书。这是一部广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不仅在知识界引人注目，就连一般的工厂、商店甚至小菜场中，人们也在为它议论纷纷，它的作者顿时出了名，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是好事吗？未必。《人啊，人！》的轰动一时带给戴厚英的是更沉重的压力。在那个时期，不少人的思想还没来得及转轨，还不习惯看这类有些

“出格的”的作品，尤其是过去的“左派”戴厚英竟然写出这样的作品，难免会引起某些人的大惊小怪，于是某报刊载了长篇的批判文章，一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过这时的戴厚英，比先前更坚强了，并没有因此而惊慌失措，或垂头丧气。她心地坦荡，泰然自若地承受这一切，却仍不改初衷，继续写她的第二部小说。

后来她搬家了，搬到了国清路复旦大学的第一宿舍。由于离得远了，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因此减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变。她有事进市区，总是顺便到我家吃饭，有时怕我家临时不及准备小菜，还特地买了一些熟菜带来。我们有事上复旦去，也少不了要去看她，问问她近来的情况。我们发现，自从她搬家以后，精神状态比前好多了，也许是因为创作上比较顺利（她正连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也许是这时理解她，支持她的人已愈来愈多，也许是因为生活条件已大有改善，同时她的女儿又学有所成，已去美国一所大学进一步深造，她的心情比以前舒坦多了，在交谈中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

不过，我们同时也感觉到，在表面上平静的同时，她的内心深处仍是不平静的。象她那种性格的人，很难满足于个人的安居乐业，出于本能，必然要去深入思考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她在写小说《人啊，人！》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并作了具体发挥；后来思想苦闷时，又从我家借去一部线装的《庄子》，饶有兴味地读着，还写了一篇《我读庄子》，似乎悟出了一些道理；不久，大概受海外华人圈子的影响，她又关心起“新儒学”来了，找了熊十力、梁 溟等人的一些著作来读，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什么。近年来，她又突然“逃儒归佛”，对佛学大感兴趣，访高僧，读佛经，认真得很，好象真的已经皈依了佛门。最近几年她来我家时，除了像往常一样聊聊家常外，谈得最多的便是哲学。她津津有味地谈庄子，谈儒学，谈佛理，滔滔不绝，十分投入。听得多了，我们反而滋生出一种疑惑：难道她真的相信这些哲学吗？我们觉得她所讲的内容与我们原先的了解不大一样，至少没有触及这些哲学的核心部分。如果她真是其中一种哲学的信徒，那是不至于如此的。

后来我们渐渐地明白过来，这其实都是她对人生的一种探索。她虽然思想敏锐，智慧过人，但在当前的社会大转折中，难免也会陷入一片迷惘。而她又不是一个甘心于庸碌无为、得过且过的人，她需要对目前的各种矛盾现象作出解释，需要了解人生的真谛，因此她不厌其烦地到处寻找，希望能找到一条能够破译人生密码的途径。她不是哲学家，她也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她之所以热衷于前人的种种学说，无非是想借助于前人的智慧火花，帮她来找到真理之门，所以，她在介绍那些学说时，并不着眼于这些学说本身，而只着眼于她自己对它们的认识和体会，她是在用前人的思想材料构建自己的认识体系。可是，她的探索，她的构建只刚刚开了一个头，就被迫中断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一个聪明睿智的头脑，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灵，竟然就此永远地消失了！戴厚英啊，你熬过了文化大革命中艰难的岁月，你经受住了风风雨雨的交相侵袭，你曾经是那样刚强无畏，不折不挠，却不料竟会被一个贪婪愚昧、全无人性的歹徒莫名其妙地夺去了生命！你本来还有许多的书要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可是却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笔。停上了前进的脚步！这些本来都是不可能和不应该发生的事，偏偏在你身上发生了！彼苍者天，曷其有极，你如泉下有知，当会理解我们这种悲愤难平的心情。

今日是戴厚英遇难百日忌辰，我们无以为祭，权撰此文，以寄托我们对她的思念，愿她的在天之灵永远得到安息。

垂泪忆金屏——缅怀戴厚英

岑桑

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岑桑散文选》。

有代序一篇，作者署名“金屏”。朋友们问我金屏是何许人？我遵作者之嘱，秘而不宣。如今可以公之于众了，金屏。是戴厚英的小名。她信手拈来，作为那篇代序的署名。自此之后，我遂常以金屏呼她。

我与厚英结识，纯属偶然。

79年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刚开过，一位文学界的前辈与我谈起上海文坛近事，说一位名叫戴厚英的女作者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记叙她与诗人闻捷的恋爱悲剧。书稿送到出版社，已经发排，但在出版过程中横生枝节，受到阻滞，被搁置起来。他建议我不妨向作者把书稿要来看看。那时我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分管文艺书籍出版的副总编辑。我接受了建议，给戴厚英发去电报，商请她把《诗人之死》书稿寄到广州来。她给我回了信，说《诗人之死》的出版事宜已有了转机，可望得到解决。为了不使我失望，她说她可以给我另写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我当即去信表示欢迎。事后不久，她当真把题为《人啊，人！》的长篇稿子寄来了。我阅稿后，十分欣赏。随即请文艺编辑室的两位年轻编辑杜渐坤、杨亚基抓紧审阅。他们读稿后也很称赞。我们三人交换了意见之后，便由杜、杨二人带着书稿和我们的修改意见到上海拜会作者，商讨修改方案。由于改动不大，厚英很快便修改完成。她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80年8月间到广州来定稿。大概只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便定稿，迅即签发了。

出版《人啊，人！》，是我和杜、杨三个人共同决定的。签发之前并没有请示过或请教过任何人。这并非纯然因为我们过于天真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也不能说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人啊，人！》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它关心人的命运，通篇洋溢着亲切温馨的人情味。这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然而，字里行间的许许多多倾诉和呼唤，不正是千百万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声吗？人民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有价值的，因而为之冒着风险也是很值得的。道义与良知常使人置之己的荣辱安危于度外。我们拍拍胸膛，就这样干了。我们都知道，戴厚英在上海文艺界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何有争议我们也了解过了。她要在广东出书的消息已在上海不胫而走。有人忙不迭地向广东施加影响和压力，企图阻止她的作品在广东出版。事不宜迟，要向谁请求或请教都来不及了。我们深知，只稍稍为迟疑，这部作品便会在外来的影响和压力下遭到扼杀。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为此我们不惜作出了自己有生以来也许是最为困难而又大胆的决果，书稿刚送进印刷厂排印，一位上级领导从上海出差回来，便立即气冲冲地召见了我们，制止这部书的出版。我对他说：“书已付印，不能改变了。”他警告说：“风要刮来的，你得有思想准备！”

就这样，《人啊，人！》在81年元旦来临之际问世。书一出，便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了轰动效应。兴奋的读者们奔走相告，赞不绝口。然而正如我的那位富于经验的上级领导所曾预料的那样，风，果真猛然而至了，而且越刮越凶，顷刻之间便形成了风暴般的大批判势态。先是从上海刮起来，然后来到广州，各报各刊都连篇累牍地刊登留情或不留情、说理或不说理的文章，从“讨论”、批判渐次升温至近乎声讨了。从来势之猛，人们已预见

到《人啊，人！》及其作者以至其出版责任者，将不可避免地陷于没顶之灾。真难以设想像厚英这样一个无所依靠的单身弱女子，如何承受得了如此严酷的精神重压！然而厚英是坚强的。就在那沸沸扬扬的时刻，她仍镇定自若。有一次我去看望她，见她正在奋笔疾书。我问她写些什么？她反问我：“你猜呢？”我打趣道：“此时此刻，你只有写检讨的份儿。”她听了哈哈大笑，然后狠狠吸了一口烟方说：“我这人从不写检讨！也不会写检讨！我对自己做过的一切都永不言悔。有比下跪求饶更难看的丑态吗？”接着，她揭开谜底了，原来她正在草拟下一部长篇创作的提纲。“这一部，”她说：“也是写知识分子的，可以说是《人啊，人！》的姐妹篇。书名想叫《空中的足音》。这名字你看怎样？若说不好，将来请你给它另起一个。”好一个戴厚英！她似乎对自己当前的凶险处境毫不在意。本色出来了！性格坚强，内心踏实，因无私无倪而无畏，令我为之感动而惭愧，顿觉自己因处于逆境而威戚然患得患失的心态，实在大渺小了。

患难是友谊的沃土。自此之后，厚英和我，还有和王曼、李士非、杜渐坤、杨亚基、胡宰华等人，都成了知心朋友、莫逆之交。通过我们，她又结交了广东文艺界、出版界的好些朋友。她常笑说广东成为她“巩固的后方”了。“到了弹尽援绝的时候，”她打趣道：“我便要退守后方，受用后方的粮响了！”广东真算得上是她的“后方”。她和我们这几个知心朋友的妻子儿女都混得稔熟，孩子们都前一声“戴姨”后一声“戴姨”的喊得挺甜挺亲热，令她有如归之感。她每次到广东来，常在我们家住宿，由各家“派饭”。遇上春节，大家争相宴请，叫她无法分身。没有比我们这几个人更为深知厚英的品格和喜恶的了。我们敬重她，爱护她，不仅因为她的冰雪聪明，她过人的才智和文采；更因为她的心性高洁，如玉壶白雪，如秋水寒潭！因心境光明而总是那么开朗，豁达和无所忌惮。她仿佛是透明的，真诚而耿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她愤世嫉俗，与丑恶的人和事难以相容，但有时也会失之偏颇；唯其如此，难免开罪了一些人。这位性格刚烈的女子也有她温厚的一面。她古道热肠，极富同情心，每因别人的苦难而焦灼得落泪。前几年华东水灾，她不惜病弱之躯，不顾酷暑骄阳，深入灾区，出钱出力，为灾民奔走呼号，简直是鞠躬尽瘁了。她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过自己的一个夙愿；到了退休之年，便回老家办一所私立小学，为家乡的穷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实事。今年7月间，也就是她遇害前的一个多月，她回安徽老家前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她要回去呆一段日子。我说：“安徽近日发大水，你还要回去？”她朗声大笑，“你以为我要回去过小日子吗？越是大水，越是要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厚英的声音了。

至于与厚英的最后一面，则是7年前的事情。——那一年夏天，国事螭螭。厚英经广东去国外。那天早上，是我把她送到火车站的。一路上她神情凝重。告诉我：出国只是暂时，她是永远也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只有中国才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握别之际，她一连说了两声“再见”。我说：“一路福星！我们终归会再见的。”然面事与愿违，那竟是我与她的最后一面了。她漂泊了几度春秋之后，回到上海安居，一直没有机会南来；这些年我也未尝赴沪。7年前互道“再见”的愿望终于无缘实现。本来她曾打算明年再来广东过春节，看望老朋友们，岂能料到冷血歹徒的凶刀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与广东朋友们再见的期待也破斩断了。

与厚英睽违的7年，虽不相见，而书信往还未尝稍辍。几年间，她的来

信共有数十封之多，大都保存至今。她身后，重温她的遗书，如见故人，音容宛在，不禁潜然。

这几年间，戴厚英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显然是在她到美国不久就开始了的。在90年4月3日的一封来信里，她就说想回到乡下，做一个隐士。不到一周，她又在另一封来信中说。“我要考虑认真安排我的后半生了。也许我将放弃一切追求，做一个隐居者。”这一年7月5日，她离开芝加哥，翌日回到上海。同年11月间，她到杭州游览，灵隐寺香烟缭绕的宗教氛围，一定曾使她的心境变得更加苍凉。11月11日的来信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去了灵隐。三十二年过去，大雄宝殿的大佛给我的印象至今未忘。那是一种崇拜混杂着恐惧的震惊。这次的体验仍一样，只是没有第一次强烈。”此后的几封来信，一封比一封更甚地涌溢着宗教意味。她说：“我越来越倾向于宗教。在世界上活过了五十多年，有过不少欲望与追求，也付出过不少代价，但终于觉悟了——无欲无求就拥有了一切。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它们都属于我。”她说：“我已失去了目标。那个以前的我已不复存在。种种的物质的欲望对我已失去诱惑。我只求心灵的宁静。”她说：“我思考着自己的道路——人性的迷失到复归。我的路由宽到窄，又由窄变宽了。”……在92年5月28日的来信中，她写道：“我会皈依佛门的。现在，每当心不宁静时，我就求佛帮助，离开人间罪恶。”

其后的好些来信，她都向我诉说她业已进入的那个精神世界的诸般美态。她说：“宗教可以拯救我们的灵魂。”她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归宿，终极的关怀。现在找到了，我为之欣喜。”……我日益清楚地看到她心境的变化。她的感情色彩，她的思维方式以至生活方式，都在明显地层层蜕变，有一次，我在信里对她说，“你此时过的是近乎居士的生活了。”她回信说：“我已经是一个居士了。”啊，究竟是什么使她进入了这样一个境界呢？尽管她说她自己为此而感到欣喜，而作为她的朋友，我却一直为之深感悲哀。

是的，厚英变了！然而她心性的原色依旧，丝毫也没有改变。她依旧是一个无限忠诚的爱国者。她在信中说：“一想到即将回国，心里就有一种亲切。中国，还是我最爱的地方。”对于父母，她依旧是一个千依百顺的孝女。她在信中说：“父母老了，需要安慰和照顾，我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而且，我的故乡是我的创作基地，通过她，我与人民中国息息相通。我要尽可能多地到那里去。”对于朋友，她依旧是如此深情，不时向我打听这个那个，关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年前我生病住院，她忧心忡忡地给我写信：“写这信的时候，”她写道，“我曾停下来，对着面前的鲜花为你祷告，我觉得花草树木均有佛心。我为之感动得流泪。……朋友，你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因为我为你祷告了。读了这封信，你的身心都会感到轻松。我相信你就在此刻，在我写信的时候，你已经感到轻松了。”

每读一遍，这一段话都使我热泪盈眶。

厚英说从前的她已不复存在，而在我看来，戴厚英还是那个戴厚英。虽经漂泊，虽历风霜，她拥有的还是那副热腾腾的心肠。

戴厚英不幸遇害，亲朋们、读者们以及文艺界中许多善心的同行，都为文坛失去了这洋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痛惜：作为曾经与她风雨同舟的患难之交，我倍感悲痛的是失去了一位心地光洁如同水晶的良朋挚友。诚然，厚

英不是完人（世界哪里去找完人呢）。她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甚至还会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她毕竟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高尚，应是人生的要义和追求。高尚比聪明才智金贵得多，至于财势权位，更是等而下之了！

高尚的人已走上不归之路，朋友们都祈祷她安息。而她那焦灼的灵魂怎能安息呢？她心爱的祖国还举步维艰，淮河还汨汨流泪，人民还有许多伤心事，并且常为灾难受苦……这些她都曾经为之心碎。她的灵魂真是难以安息啊！

金屏，永别了！你再也听不到朋友的呼唤了！而朋友仍将以为你为楷模，塑造自己的心性。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我为戴厚英编辑《人啊，人！》

枉浙坤

曾在1981年12月10日，给友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我首先得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因为我做了戴厚英长篇小说《人啊，人！》的责任编辑，而这部作品在社会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你为我捏着一把汗，并且频频来信问我：你为什么要编发这样一部书稿呢？你不怕担风险吗？你对这部书稿的看法到底如何？我坦率地告诉你：担风险我是不怕的，记得看完这部书稿，我就表明我的态度了。我怕的倒是，一部见解尖新艺术手法独特的书稿，由于编辑的平庸和自私胆小而被扼杀；而对于这部书稿，直到现在，我仍是取了肯定的态度的。”

戴厚英遇害之后，我又重新翻出了这封信的底稿。目的不为别的，只为激活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其时，已是《人啊，人！》出版一年有余，批判《人啊，人！》一月有余的时候了。

1981年10月17日，上海《文汇报》率先发表了姚正明、吴明璜题为《思考什么样的“生活哲理”——评长篇小说（人啊，人！）》的长篇文章，拉开了这场长达数年之久的大批判的序幕。尽管该报在“编者按语”中一再声明，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然而，其批判的动机和性质，明眼人一看也就明白。这篇长文措辞之严厉和定性之吓人且不去说，单是那作者署名所取的谐音：姚正明——“要正名”；吴明璜——“无（不）明其因”或“不明白这个戴厚英在于什么”，就很能使人联想起“文革”中“梁效”（即“两校”，以清华和北大组成的写作班子）一类的名字来，紧接着，上海高校中文系接到了指令，要组织班子批判《人啊，人！》，戴厚英也被免去了复旦大学分校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都相继发表了有关《人啊，人！》的争鸣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不能不有所反映了。1981年12月4日和10日，省委宣传部邀请省直和广州市文艺、新闻、出版界的部份人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对长篇小说《人啊，人！》的看法，研究广东对这部长篇小说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措施。会议由宣传部长陈越平主持，副部长张作斌、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长黄文俞等有关领导人，均参加了座谈会。作为该书责任编辑之一的我和负责决审这部书稿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岑桑，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岑桑在会上发表了充分肯定这部作品的意见，我以文学编辑室名义呈交了说明该书编辑情况及肯定该书理由的书面报告。在这两次会议上，除一人对《人啊，人！》持否定意见外，其他发言者均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看法。黄文俞还就广东如何对待《人啊，人！》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广东对《人啊，人！》的方针应该是自由讨论而不是批判。

我给友人的信就是在这两次会议后写的。

现在看来，这两次会议对决定《人啊，人！》及其作者戴厚英的命运，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尽管批判并没有就此结束。以后还有一次可怕的升温，并且据说，上面还有一个大人物点了戴厚英的名，说《人啊，人！》是一本坏书，《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也因此一再受到种种压力。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是最终经受得住这种旷日持久声势凌厉的考验了的。

《人啊，人！》是作者直接寄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关于这部书稿的来

历，在批判它时有一家报纸的报道与事实不符，说它是在上海不能出版后才转来广东的。事实是：其时在上海出版受阻的，是戴厚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而不是《人啊，人！》。作者当时尚未撰写《人啊，人！》。广东也还未知道有个作者叫戴厚英。大概是1980年的三四月间罢，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著名作家黄秋耘，才从友人处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作者写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在上海某出版社已打好了纸型，但因人事关系上的纠缠被压着，一时说可以出版，一时又说不能出版，几次三番反复无定，作者为此事也被弄得苦恼万状。从此我们才知道有个戴厚英。又或许是出于一个前辈作家的爱才之心和一个老出版工作者对文学出版事业的责任感罢，黄秋耘对上海此举颇不以为然，便叫岑桑致电戴厚英，广东愿意出版她的书。岑桑的电报发出不久，戴厚英回信了。她说上海知道广东要出版她的《诗人之死》后，又说该书上海仍要出版，既然如此，她就只好把书稿要回来了。她将另写一部长篇小说给我们。（但事后表明，上海说出版她的书稿只不过是一种托辞，因该书最终还是未能在上海出版，就是后来易地出版时，也仍然受到来自上海方面的干扰）。

就这样在1980年6月下旬，《人啊，人！》如约寄来了。

应该说，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无论是对书稿还是它的作者戴厚英，我们都是取了相当客观、冷静、认真、严肃和负责的态度。不但负责终审工作的岑桑自始至终关注着这部书稿，单是做具体责编工作的我，在初审时，就对书稿进行了反复的掂量。记得当时我曾在家里写一短简托人带回单位给岑桑说：这是一部很有意义很有艺术个性的书稿，修改后完全可以出版。它的意义不在于展示伤痕，而在于提倡以求实的态度去总结历史和对与此相关的人道主义的呼唤。但这些问题不但是严肃的尖锐的而且是相当敏感的，有些还是我先前一直没敢接触甚至是有意地躲开的，估计出版后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又以为无论如何都是批不倒的。为了将来一旦真的遭到批判甚至有棍子漫天扫来的时候，我们能毫无愧色地对作品负责并能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请允许我以几天时间在家过细再看一遍，逐章逐节地对各个问题进行推敲，然后拟订出具体的修改方案。此后，当我们被岑桑指派到上海（同去的还有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杨亚基）与戴厚英当面商谈修改方案时，我又认真听取了戴厚英与书稿所写有关的一些人生阅历，以及她对有关问题的思考体认等等，并据此建议她调动有关生活对初稿进行修改。此外，因为听说戴厚英在上海是“有争议”的人物，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破例到作者所在单位征求有关领导的意见：是否可以出版戴厚英的书（对一般作者来说，出版社在当时已是无须这样做了的）。在有关领导表态可以出版戴厚英的书，并同意戴厚英来广州定稿后，出版社才最后敲定出版她的书并邀请她尽快来广州定稿。

但是，尽管如此，当我们到上海找作者谈书稿的消息传开后，上海即有人打电话给广东出版局领导，劝阻不要出版戴厚英的书，接着又有人写信说戴厚英是“漏网的三种人”，出版她的书会影响我们的声誉等等。当我们的局领导明确表示，除非上海方面发来正式公函，说明戴厚英已被依法剥夺了出版权利，否则，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上海还有人说，此书一出版他们就批判。这在当时是很唬人的。但同时又让人觉得蹊跷；这部书稿还未出版，他们还未看过《人啊，人！》，还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怎么一出版就批判呢？幸好当时局、社两级领导人的意见都很一致，才使这部

书稿不至于中道夭折。

《人啊，人！》由作者于1980年5月开始撰写，6月下旬完成初稿寄来广东人民出版社，7月初经出版社初审完毕并由责任编辑到上海与作者商谈修改方案，7月下旬至8月中旬由作者推倒原稿重新改写一遍，并由原来的17万字增加至24万字，9月初经出版社二审、终审后发排，11月出版，比戴厚英于1979年开始撰写而几经折腾后不得不易地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还早出版一年多。这不能不说是戴厚英的悲哀，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文坛的悲哀。而《人啊，人！》初版就印行了12万1千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争相购阅，编辑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收到了二百多封读者来信，除少数来信对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外，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褒扬。此后，出版社又根据读者要求先后10次重印，总印数不下百万册，国外也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正清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还辟出专节对《人啊，人！》作了记述。一部书稿能获得如此成功，这或许又是对它发起批判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如果说，决定《人啊，人！》命运的是这部作品在当时能否顺利出版。以及出版后作品本身能否经得住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批判狂潮的考验；那末，决定戴厚英另一部作品《空中的足音》的命运，则是戴厚英本人在撰写这部作品过程中，能否经得起种种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了。是的，《空中的足音》的撰写过程是多灾多难的。其创作起始于1982年初春，按她的才华，她的勤奋，她的如泉涌流的写作速度，是应该很快就能完稿的。但这部作品从开始撰写到最后定稿发排，却整整拖了三年时间。究其原因，一是《人啊，人！》一直在受到批判，尽管戴厚英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对这种批判不在乎，甚至说过欢迎这种批判；一部作品出版后能受到批判总比无人问津好一些。但这种异乎寻常的批判给她心灵所造成的阴冷却是不言自明的。二是在那一两年，上海以种种的理由一次二次地召她回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或“说清楚”，加上广州某个好事之徒对她“采访”后在香港发表文章所造成的风波，反复无数的折腾，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情绪，损耗了她的精力和时间。三是她原来所经历的个人感情生活上的磨难：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与她的离异，她后来与著名诗人闻捷的苦恋，以及这种本属合法、纯真的恋情却受到横蛮无理的干涉而造成闻捷自杀身亡给她带来的永难平复的心灵悲伤，以及长期的奔波劳碌，清苦的生活等等，使她先后又患了急性肝炎和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中止写作，有时甚至想什么也不写了，甚至想以一己之死来谢天下。然而她的《空中的足音》终于不致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空中，而是实实在在地降生到了大地上，成为人类文明的又一财富，不能不说是这个命运多舛的作者在身罹百难时强吞悲声奋力创造的结果。

在此期间，1982年12月，戴厚英还在广东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这也是由我责编并收入了当时出版的大型文学丛书“潮汐文丛”第2辑的一部作品。该书共收戴厚英中短篇小说共5篇，16万字，全部都是她在这年春天心境特别忧郁压抑时写成的，由此可见其与厄运顽强搏斗之一斑。

四

因为广东出过戴厚英的三部曲，这些书又都是在戴厚英处境最困难的时

期广东为她出版的，所以戴厚英从此便与广东结下了难解的友情。戴厚英是很重感情的，她和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至交好友，几乎每年都来一两次广州，或写稿或改稿或定稿或避难，她曾不止一次地把广东的这种深深情谊写在她的文章里，哪怕是有谁为她做过一点帮忙的事情她都表示着衷心的感谢。

广东的许多人对她都是非常友好的；上至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下至青年学生乃至招待所的服务员。记得当她精神极度悲苦几近崩溃的时候，吴南生书记就曾请她到家里吃饭，并送给她一条香烟，以后又特邀她到广东汕头大学讲学。而当她因无法忍受外界压力而躺在床上欲哭无泪凄楚万状之时，招待所的服务员不但在床前守候她安慰她，在大门口挡驾不让陌生人去干扰她，有的还特意从家里熬鸡汤送来劝她喝。出版社当时的领导更不例外，无论是岑桑、王曼还是李士非皆如此，经常请她到家里作客，陪她去白云山、西樵山、罗冈、鼎湖山等风景区走走，帮助她度过一次又一次精神难关。

我也正是在责编她的上述三部书稿时与她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于以后我编《花城》、《随笔》杂志时一直与她保持着联系。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或许是我小她儿岁因而她在她眼里我总是个小弟弟的缘故罢，她有时也不大不小地与我开点玩笑。她的骨子里其实是大方的爽朗的欢乐的甚至是有有点调皮的童心未灭的。记得有一次我与岑桑、王曼一道送她去广州市郊增城县居住，岑桑、王曼和增城县文化局的丁枫在前面并排走着，我与她在后面走，走着走着，她突然忍俊不禁地咯咯地笑了，因为她看见岑桑、王曼和了枫个子都不高，而且一个比一个矮，此时又都整齐的阶梯似的排列着，大踏步地向前走，她觉得非常好玩，于是又强忍住笑用手比划着说：“小杜，你看，他们三个多好玩呀。”又记得她平时总叫我小杜，到了要我办事时就一本正经地叫我老杜。有一次我也笑着对她说，老戴呀，你好功利呀，怎么平时叫我小杜，一到了要我办事就叫我老杜了？她也咯咯地笑着说，小杜呀，此时不把你叫得老点，怕你办事不牢呀。只是这种本该欢乐爽朗的天性，却被她所经历的许多荒唐和严酷一再地压灭了，由此而滋生起无尽的悲酸、痛楚、狂躁、压抑和忧伤。但是尽管如此，最终却不能压灭她那颗为仁厚的淮北乡土所培植起来的质朴良善之心。那种敢于直面严酷审视荒唐的勇气，那种剖析自我清算自我的坦率和认真，那种关心民瘼的热忱，因而才使她读懂了“人”与“社会”这两部大书，也才有了《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音》、《流泪的淮河》（一、二部），《心中的坟》等十多部作品。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作品无疑都将会愈益显出其历史价值和理性光辉，并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其不可忽视的位置。坎坷历尽西去不旧的戴厚英啊，这是你不幸中的万幸吗？

一九九六年岁末于广州

戴厚英与文东出版界

李士非

夏的八月底，我从苏北故乡返广州，路经南京稍作逗留，偶遇上海吴亮同志，听到了戴厚英遇害的消息，不禁啊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

厚英才 58 岁，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不该如此早死，更不该如此横死，近年她在研究佛经，佛法何在？

她是一条汹涌的河，还未到入海口，怎么就突然断了！

翻开通讯簿，她的地址、电话号码都在，却再也不能与她通信、通话了。这种沉重的感受，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成为一种隐痛。

我注视着报刊，寻找着有关戴厚英之死的一切报道和文章。

感谢《广州日报》，9 月上旬连续作了两次报道。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戴厚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她的某些作品是“有争议的作品”。争议本应是正常现象，可是在我们这个习惯了“定于一尊”的社会，什么人和事一旦与争议沾边，便令某些人敬而远之了。

在我们广东，先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后是花城出版社，十多年来，与戴厚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称得上是同甘苦共患难，对她的争议也是对出版社的争议，对她的批判也是对出版社的批判。虽然后来由于领导班子的更换，对她的作品的再版问题因处理不当，引起了她的不满，可是她对编发过她的作品的一批老同志如王曼、岑桑、杜渐坤等，始终是满怀友情的。这次她不幸遇害，花城出版社派了杜渐坤和岑桑之子岑之那飞往上海参加她的葬礼，带去了广东出版界她的所有老朋友的哀思。

出版社和戴厚英的友谊，始于八十年代之初《人啊，人！》的出版。当时是有压力的。还未发稿，就有人打招呼，某市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 XX 先生甚至写来了亲笔信，叫出版社不要出版戴厚英的作品。理由呢，无非是作者和作品都“有问题”。出版社上下一致，认为戴厚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学教师，完全有权发表自己的作品，而《人啊，人！》是一部有出版价值的好作品，它讴歌人道主义，赞美人性，何罪之有？这样的书不出，要出版社干什么！坚决出，出定了！当然，书一出就受到了批判，这是意料中事。

近日有一位作家在一家发行量极大的刊物上写道：“那是在 11 年前——1985 年，她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成了众矢之的，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

不对了。不是 1985 年，而是 1981 年，书一出版就批开了。批判者不会如此宽容，等待 4 年之久才下手。至于“众矢之的”，也要分析一下。这个“众”有多大？少数报刊而已。毕竟“文革”已过，想要“共讨之”、“共诛之”已经办不到了。至少在广东，开始的时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文俞同志主持会议。定下了“我们进行自由讨论，不搞大批判”的方针，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比较公正的言论，后来迫于形势，“批判”的色彩才重了起来。至于在民间，在广大读者当中，这部书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和赞扬，出版社收到大量肯定的来信，没收到一封否定的来信。甚至可以说，你越批读者越喜欢，“批判”成了最好的广告。某些人不能也不愿理解，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人民对这样的“大批判”已经深恶痛绝。

还有一位朋友写文章说，“我们这文坛，还是宽宥了戴厚英和她的《人

啊，人！》吧。既然有许多人许多事我们都可以宽宥，为什么就不能宽宥戴厚英和她的《人啊，人！》呢。”

我看了很不舒服。“我们这文坛”没有“宽宥”戴厚英及其《人啊，人！》吗？谁代表“我们这文坛”？戴厚英及其《人啊，人！》需要请求什么人的“宽宥”吗？这位朋友的用心是好的，可惜太软弱了。

忘不了1982年的初春。北京的杨沫、张洁、马宗启，湖南的叶蔚林，上海的戴厚英等作家云集广州。杨、张、马、戴在广州过的春节。出版社的几位编辑轮流邀请他们到家中过节。当时大批判的硝烟未散，戴厚英不仅未被压倒，而且即将动手写作她的第三部长篇《空中的足音》。朋友们对她和她的作品的态度，不是什么“宽宥”，而是喜爱和欣赏。杨沫这样的老作家，介绍戴厚英加入全国作协的萧乾先生这样的老作家，还不能代表“我们的文坛”吗？难道只有那热衷于大批判的少数人才是“我们的文坛”的代表？

1983年12月，戴厚英又一次来到广州，住进白云山上的松涛别院进行《空中的足音》的定稿工作。不料刚过了几天，上海方面通知她回去“参加非常重要的学习”。如此来去匆匆，心情自然是压抑的。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兼花城出版社党委书记林坚文同志，在一家宾馆设宴为戴厚英饯行，黄文俞同志出席。在我的印象中，德高望重、作风严谨的文俞同志，亲自参与饯别一位即将近回原单位迎接某种风浪的作家，这是仅有的一次。这位敢于主持正义的革命前辈已在今年先戴厚英而逝，行文至此，仍忍不住心中的哀痛。

1985年，大的风浪已经过去。戴厚英在《空中的足音》后记中说，“1985年春天来到了。又是耕耘和播种的季节，”心情已经不同于前几年。

当年因为编《花城》杂志，戴厚英几本书的出版我都没有介入。我经手编发了她的中篇小说《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这是我最喜爱的中篇之一，它虽然没有得过什么奖，我以为比之许多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并不逊色。去年在珠海西区金梅岸，与一位来自粤西茂名的业余作者谈心，他自然而然地谈到这篇作品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令我十分惊喜。我马上写信告诉厚英，她的作品发表十多年后，仍有人念念不忘，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花城》1992年第2期，发表了戴厚英的短篇《完成》，《小说月报》很快转载。我早已离休，当时又因病住院，没有及时看到这篇作品。很久以后看到，大为感叹！这是多么精彩的短篇啊，不到五千字的篇幅浓缩了三个人物50年的命运，抵得上洋洋数十万言！戴厚英以似乎平静的心境为我们讲述了这个令人不能平静的故事，思想和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堪称传世之作。我立即写信祝贺她的成就，希望她多写这样的短篇。

我和戴厚英最后一次见面，是1991年10月。那时我因事到上海，到复旦大学宿舍区去拜访她。谈起她的处境，她笑着说，我现在不错了，和白桦的待遇一样：小报上可以写文章，大报上不能露面。能上讲堂，能发文章，能出书，能出国探亲，自由已经不少了，还要什么呢？只求能安安静静地做学问，搞创作，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了。一副与世无争的神态。

最后一次通信，是1994年春天吧。那时我自费印了92年病中写的长诗《逍遥游》，无法发行，在3月16日《新民晚报·读书乐》专栏上发了一篇短文《寻找读者》，宣布来信索取即免费赠送。不久收到厚英的信，对我的做法表示赞许，说她也要登报寻找读者。我回信说大可不必，我的诗无人肯卖也无人肯买可以理解，你戴厚英的书还怕卖不出去吗？如果哪个出版社因

怕亏损而拒绝出版发行戴厚英的作品，那肯走是神经出毛病万万想不到，五年前的会面、两年前的通信，竟都成了最后一次！

戴厚英竟然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被歹徒残杀的作家！

那个才二十多岁的杀人凶手，为什么竟如此地灭绝人性呢？他是吃狼奶长大的吗？翻开报纸，形形色色的凶杀案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无不令人深思。

在诸多原因之中，数十年来反复进行的、无休止的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伐和批判污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是否也算一条呢？

谁还要批判人道主义？小心你的笔尖沾上人的血！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日

我们曾经一起战斗

王曼

东，1980年的天气，一时晴，一时阴，晴时阳光灿烂，阴时虽不是狂风猛雨，却也是阴雨绵绵。这天气同当时广东的文艺气氛一个样，有时也会令人感到窘迫。这年，我们花城出版社的编辑和《人啊，人！》作者戴厚英，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经受着烦人的折磨。

这年的11月，花城出版社（《人啊，人！》原稿是由花城出版社前身广东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的）出版了作家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这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长篇，它通过他们的活动，揭示了人为的“阶级斗争”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创伤，控诉了极左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呼唤人道主义，在表现手法上也改变了传统的手法，不按时间的顺序去结构情节，不落窠臼。整部书充满着诗意的魅力。书一印出来。便庄省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书店门市部的柜台前挤满了购书的人群。作家为此高兴。我们的编辑更为出版了一本好书而欢欣鼓舞。

第一次合作获得了成功，大家都有说不尽的高兴。我们知道作家写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尚未有着落，便向她建议，如果上海方面不给付印，也可以拿来由我们出版。戴厚英回答说，《诗人之死》，福建人民出版社杨云社长已派人到上海跟她接洽。她同意交其出版，不好违约，她现在正酝酿着另一部新作《空中的足音》。这部书也是描写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与《诗人之死》、《人啊，人！》是揭示同一主题的三部曲。如果我们同意，写出来一起交由花城出版。我们当然欢迎，希望她能尽快写出来。

正当我们和作者在分享《人啊，人！》出版获得好评的快乐时候，从上海方面却传来了不愉快的消息。一家大报率先刊登了批判《人啊，人！》的文章，指责它宣扬人道主义、人性论云云，这在当时是个严重的罪名。像这样的批判，按已往的惯例，也许会在全中国推起一个批判的狂潮。但现在已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年代，人们已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有许多人盲目跟从。而令我们担心的是戴厚英能否经受得住这样严重的批判，如果思想不通会怎么样。在此刻，我问觉得最要紧的是向她伸出支援之手。于是我们分别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信，劝她要冷静对待人家的批判，不要自暴自弃；要她坚信《人啊，人！》中所揭示的问题是正确。

所幸的是，她没有出现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她来信说，她看到了那些批判，心中虽有不愉快，但没有过很大的波动。尤其是《诗人之死》已正式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令她无比高兴，现在，福建人民出版社正约请她到福建一趟；并说她到福建后即折到广州住下来写《空中的足音》。这使我们暗暗的放下一个牵挂。

其实，这时情势已危机四伏。广东有关单位已被查问，“你们为什么要出版《人啊，人！》？”而在此之前，上海也有人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出版局领导，劝我们不要出版《人啊，人！》一书。我们的局长回答得很坚决，除非上海方面发来公函，说明戴厚英已被依法剥夺了出版权利，否则，什么个人的话都不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书就这样出版了。可上海方面仍然不肯放过，首先发起批判。这股风很快刮到了广东，广州某个文艺权威写了一篇措辞强烈的批判文章，刊登在《羊城晚报》上，文章说它是借宣扬人道主义，进行反党，是一株大毒草。恰好这时，我们收到戴厚英从福建发来的信，告

知她几天后即赴广州。这可怎么办？让戴厚英知道上述的情况，肯定会给她造成精神上的极大打击，不利下一部书的创作。为此，我们决定不让她知道这些事实。

戴厚英抵达广州那天，我和岑桑、杜渐坤一起到机场去接她。她情绪很好，在车上滔滔不绝地谈着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诗人之死》的情况。我们听着悄悄的放下了心，知道她还不清楚《羊城晚报》刊登的文章，以及上面来电追查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压力。我们把她接往珠影招待所住了下来。

几天后，我和岑桑、杜渐坤去招待所看她，发现她脸色不好，还以为她知道了我们所担心的事，而影响了情绪，休息不好所致。经查问，才知道她近年来肝区常感到不适，而影响了休息。我们怕她是生病了，即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她患了急性肝炎。我们要她住下来安心治疗，而她却提出要走，出医院边吃药治疗边写作。这使我们很感动。我和岑桑、杜渐坤设法把她送到郊区增城县荔城招待所住了下来，并托请文化馆的同志就近予以照顾。

这样一住3个月，戴厚英边吃药边写作。《空中的足音》初稿快要完成的时候，却又闹出一场意外的风波。原来是戴厚英住院期间，一位大学的老师闻名而至，向戴厚英进行访问。戴厚英是位直爽的人，她把自己在文革初期被借用去市委写作组工作的事也说了。这位好事的老师把这些事都写进了访问记，寄到香港一家报纸发表。上海方面看到这篇访问记后，说戴厚英是向域外透内部消息。这次她再也忍受不了，她情绪十分激动，再也无法进行写作。我们不得不把她接到广州，住在市委榕荫宾馆。我和岑桑、杜渐坤去看她，她一见到我们便大哭不止，把茶杯也摔了。我和岑桑不断劝说，她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也许是受到长期的激怒和抑郁吧。戴厚英这时患上了“神经官能病”，她无法再写作了，只好让她到安徽她姐姐家住下来疗养。

大约过了半年，到1983年2月，我们收到戴厚英的来信，得知她的《空中的足音》初稿已完成，要我们去上海看稿。这时，岑桑已调到广东人民出版社，我便和杜渐坤一起去上海。我们住在上海一家杂志社附近的一间阁楼上，什么地方也没去，日夜埋头审读《空中的足音》。用一个礼拜时间看稿，向她提了修改意见，并希望她尽快改出二稿，争取年底付印。戴厚英满口答应。我们相信戴厚英是会把稿修改好的，我们怀着这样的祈望第二天返回广州。

到了这年的12月，戴厚英果真带着她的修改稿来广州完稿。吸收上一次的教训，我们决定不让她住在广州城里的宾馆，以免有记者或什么人来访问她，为此，我们把她送到白云山上的松涛别院一座清静的院落住下来。我们满以为这样便可以让戴厚英专心写作了，谁知才刚住5天，上海方面又通过省委有关方面转来通知，要她马上回去参加整党学习。

我们知道戴厚英不是党员，为什么要她回去参加整党学习？个中秘密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上级转来的通知，我想顶也无法顶住了。便约岑桑和杜渐坤一起坐车上白云山去劝她遵命回上海。

这次，她意外的平静：“我来时就预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走就走吧，没什么。”

我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为她愿意回去而欣喜，我说：“你把稿子留下来吧，学完快回来。”但戴厚英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把稿子一起带回了上海。

她走后，我心里老放不下，怕她会出事，第二天便打电话到她的家，询问情况。她平静地说，她一到家即往机关报到，没有什么事情，很平静，你们不用为我挂心。我把这些话告诉了杜渐坤和岑桑，大家的心情才感到了踏实。

一晃又过去了一年多，到了 1985 年春天，《空中的足音》终于排除一切干扰胜利排印了。

这可谓是一个难产的婴儿。

戴厚英是一位有才华有抱负的作家，她把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对国家当前存在的某些事物的忧虑，全都灌注在她的作品里。她的那些观点，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是对的，纵使不合某些人的胃口，受到了指责，但我们觉得不应该就此而畏缩，作为一位出版工作者，在此时更应该给予作家以支持。所以，我们在出版《空中的足音》之后，又会同福建人民出版社把《人啊，人！》和《诗人之死》推荐给香江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以扩大这些作品在海外的影响。现在，《人啊，人！》已被翻译成英、俄、德等文字，销行全世界。

我们和戴厚英就是在这样的出版书稿的过程中结下深厚情谊的。以后，她写了什么作品，首先送给我们花城。她后来写的《流泪的淮河》原也是交给花城和香江出版的，可惜她把第一部《往事难忘》的书稿送来时，我正因出版《丑陋的中国人》，陷于尴尬的境地，只好把它转交香江出版社先行出版。1989 年，我因年届 60 而离休，这套小说，未能在花城社出版，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现在，戴厚英同志不幸遇害，已先我们而去，我很为失去一位正直的有才华的作家、一位老朋友而痛惜。为了纪念我们在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段友谊，我写下这段文字，以寄托我对她的深深的哀思！

戴厚英二三事

丹晨

日正为戴厚英不幸遇害而感伤之际，忽然收到复旦大学高云、吴中杰两位教授惠寄的戴厚英遗稿《心中的坟》，急忙诵览，竟欲罢不能，读到在那个黑暗日子里，她和诗人闻捷的爱情，活生生地被法西斯魔手扼杀的情景，不禁感慨唏嘘。我和戴厚英虽然相识很久，但平时却没有很多交往。这本书中附有吴中杰兄写的怀念厚英的文章，说及我曾介绍厚英参加中国作协一事，与事实略有出入。中杰兄是厚英的好友，也是此事的当事人之一，可能因为事隔十年，记忆有误之故。所以，我想索性艳我与厚英有限的几次接触写出来，以后如有有心人要为戴厚英立传的话，也算是提供了一点第一手资料。

我最早认识厚英是在二十年前。那是1975年，我还在光明日报做编辑。报社因要恢复几个文史哲经的副刊，由报社领导马沛文率领方慕温（理论部）和我（文艺部）专程到上海征询意见，组约稿件。我们住在锦江饭店，曾经约见过厚英。事情的缘起是由我提名的。其实我并不认识她，只是听说文革前，她曾被看作文学界的新生力量受到重视，文革初造过反，很激烈，后来上海的头头想重用她，她又保持了距离。对这些传说，我从未再核实过，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有个性，有主见，有思想的人，所以推荐给老马，老马也是爱才的人，当然一口答应，然后约见了她。

那天厚英如约到饭店来见面，大家随意谈了些文艺理论问题。厚英好象不大愿意多说什么，只表示对许多问题要重新思考，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所谓文艺理论颇有微词，但又说一时也还说不清楚。我们邀约她写稿，她答应了，但后来她并没有寄稿来，我也不曾再催约。

那次这位瘦瘦黑黑的三十多岁女子，一副矜持落寞的样子，至今仍然清晰存留在我记忆中，其实这是她和闻捷的故事发生的四年后，她在精神上的创伤恐怕还未平复哩！

1982年秋，我到上海出差，住在汉口路申江饭店，恰好《芙蓉镇》作者古华和花城出版社林振名也住在那里，遇到我在闲谈时说起戴厚英。古华不久前与她有多次交谈，了解很多情况，对她很同情，也很不平。他说，戴厚英很有才华，写的小说也很棒，但她在上海处境不好，写的小说出版不了，文学界活动也都不叫她参加。希望我能找戴聊聊，为她呼吁呼吁。

那晚戴厚英和她女儿一起来访，她女儿好像已上大学一年级，母女俩几乎齐肩一般高。她谈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与上海某些作家的恩恩怨怨，说现在有人把她当“四人帮”余孽对待，被排斥在文学界之外。她写的书在上海也出版不了，有人还要批判她，她很愤怒。我听了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也因为不了解真实详细情况，不便于在当事人面前直接表态说什么，只表示尽力向有关方面反映，也劝慰了她，希望她与文学界有关朋友主动改善关系。她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时，她还送了我一本《人啊，人！》

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忆起来恍若隔世。尤其让年轻人听来更觉荒唐古怪，谈论人性怎么可能会是被禁忌的，岂非海外奇谈！但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像《人啊，人！》这样一部描写校园知识分子生活，呼唤人性的作品本是平常而又正常之极，但在1980年刚出版时颇有“轰动效应”，到处传说议论纷纷。一方面有专事侦伺批判的哨兵们剑拔弩张，想大大批判一番。

一方面读者反响强烈，市面上脱销，供不应求，仅在出书的一年多时间，出版社就连续重新印刷了四次（最后一共重印了几次则不得而知）。

这多少说明《人啊，人！》在当时的影响确实比较大，但却没有因此改善厚英的处境。我在那晚与她母女交谈后就曾向上海作协负责同志反映过。他们认为这事不好办，不是他们不团结她，而是她浑身长刺。后来，我在看望巴金老人时，又向他反映过，想请他给予帮助。巴老说，戴厚英给他写过信，对文革初期造反伤害了许多老作家一事承认了错误，现在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巴老给她回了一信，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年轻人犯错误，改了就好，希望她好好写作，写出好作品。我说：您是不是可以和上海作协说说，请他们从领导角度主动做做戴厚英的工作。巴老无奈他说：我说了也没有用的。

然后，我回到北京，连同在外地其他的见闻，给中国作协和中宣部有关领导写了一个情况汇报，建议过问一下戴的事情。我的中心意思是希望对于一个有才华有影响的、即使犯过错误的女作家，作协有责任帮助她，团结她。但是并没有产生什么积极效果。有一位非常善良厚道的老同志对我说：丹晨，你就别管这个事情了，戴厚英在那时批斗我们是很凶的，有名的“小钢炮”嘛！

在后来许多日子里，我没有再和戴厚英联系，也没有再为她去呼吁，因为我觉得我已尽了力。另外，批判《人啊，人！》和戴厚英本人一事终于没有继续发展。时代毕竟不同了，因为对一个作品持不同看法，就要大张挞伐，毕竟是不大容易行得通了。但是所谓“人性论”仍然断断续续时起时伏受到批判，有时还会掀起轩然大波。记得1983年初，我曾参加过一个研究单位召开的研讨人性、人道主义的学术会议，有人打小报告，结果就兴师动众追查这次会议，一时弄得非常严重，最后当然只能不了了之。在这同时，人性却愈来愈被人们重视，视为正常现象，并没有因为这些蹩脚的批判而消失。

1984年秋天，我到上海时，曾去复旦大学探访朋友，在吴中杰、高云家里聊天时，谈起戴厚英的近况，好像与某些作家的关系没有什么改善。我说《人啊，人！》这样一本有影响的小说在文艺报从来没有人评价过。我请中杰写文章寄给我，争取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中杰辛辛苦苦很快完成了，最后还是未能刊出。这倒不是什么政治原因，只不过是我又一次无能而没能帮上忙。

这时，我和中杰还议论到一个问题，就是厚英已经出版了好几部有影响的作品，却不是作协会员。我总觉得不管戴在过去有过什么错误，与文学界某些作者有什么恩怨，作协还是应该吸收她入会而不应该将她关在门外，这是不正常的。虽然，我个人只是中国作协系统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我完全是出以公心，为作协着想。所以，我又一次向上海作协建议过。我也通过中杰劝说了戴厚英：现在上海作协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与你也无过节，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

戴厚英开始表示考虑我的意见，认为完全可以和上海作协新领导友好相处；到了1985年八、九月间先后给我信中抱怨个别同志对她有偏见。她列举了许多事例；另外，对文学界某些现象也看不惯。她说：“我已四十七岁了，时间不多，精力有限，何必去为无谓的斗争消耗自己；我不求官，不求利，不希望享受特权，只要安宁就行了。为此，我想在上海文坛上还是不露面为好。这样，我或许还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她还说：“请相信，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用那种卑鄙的手段对那些人或其他人。我只想洁身自好，保持自己

的人格和尊严。”戴厚英后来十年的活动，证明她的这些话不是信口说说的，而是真诚的，实实在在付之实践了。

就在这时，她与中国作协一位著名作家有过接触交谈，这位作家非常同情她，并且认为索性直接参加中国作协为好。她把这个意思告诉我，并说她自己无所谓，即使在会外也一样努力写作。我当然赞成她加入中国作协，但还是写信诚恳地劝她不管入总会还是分会，都还是应该和上海文学界朋友改善关系，不要搞得太僵。至于后来她入了中国作协，不是像中杰文章中所说的是我帮她办的，我想主要恐怕还是那位作家朋友像《圣经》里所记载的，耶稣看见一群人正用石头围着砸打一个犯了错误的妇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人群中从老到小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会给我们启示的。

后来，戴厚英努力写作，以数百万字的实绩蜚声海内外，证明她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女作家。她并未因远离文坛而影响创作，削弱成就。她是中国文坛以外的一位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独行侠。我有一位熟识的香港作家朋友，最为钦佩厚英，每次厚英过港，他必与其畅叙，也写过文章评价她。他对我多次赞扬厚英的清高倔强的性格。我也是从他给我的信中较早知道厚英是被谋杀的真相，那时内地报纸还只登了噩耗，因而使我震惊，以至不敢相信。由此，我想起我最后见到她，是十年前在上海的一次文学会议结束后的宴会上，她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新作《空中的足音》，还祝愿我多帮助别人。厚英现在已经不在人世，想到我在她生前始终没有能给她什么切实的帮助，写这篇文章追叙这尘封的往事，也只是为了说明一些事实真相，并借此表述自己的愧疚而又悲愤之情祭献于她。从此，在中国文坛将永远不能看到这位独行侠的身影了。

“我与每个人都是生死一体的”

白桦

厚英之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竟死于一起图财害命的凶杀案。

我认识戴厚英很晚，已是八十年代中期，我调到上海工作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我常常听到别人讲到她，给我的印象是：戴厚英是上海许多老一辈子作家长期不能谅解的一个人。1980年她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上海不能出版，广州花城出版社却接受了这部后来产生过很大轰动的文稿。一位上海老作家（已故）极其坦率地对我说：应该设法阻止戴厚英的书在广州出版。我当然能理解这些老前辈的心情，在他们的脑际，总也无法抹去“文革”中的戴厚英，那个戴厚英我没有见到过，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都没法回上海。可以想见，1966年的戴厚英还只有二十几岁，是当时上海作家协会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年轻人。出生于安徽农村；对领袖、对革命满腔热血。而那些从三十年代就从事写作的作家们，“文革”伊始就被江青们钦定为“反动文人”。得到“四人帮”青睐的她，对这些“反动文人”的态度一定不会“温、良、恭、俭、让”，必然是革命性很强，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在“文革”中又因为一段主死恋情、以诗人闻捷的自杀而轰动上海。临近“文革”结束，戴厚英才知道自己还有一颗可以独立思考的脑袋。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蠢事、错事”进行了反省和公开的道歉，她找到了面对昨日自己的勇气。为了重新认识失落的人性，她在长篇小说《人啊，人！》和《诗人之死》里，在回顾往事的同时，痛定思痛，给自己和读者以振聋发聩的启示。1979年，我在北京曾经看到过她写给一位女作家的一封长信，非常详尽也非常激动地在剖析自己的前提下，叙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她在当时真诚的追求、真诚的迷失、真诚的爱情、真诚的委屈和真诚的反省。即使我这个“文革”的受害者，也十分理解。我想：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很多比她成熟的人不是都曾经迷失过么？

和她本人认识以后，从不多的接触中，知道她的确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态度鲜明，口直心快，容易激动，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她的故乡安徽，是个多灾多难的省份。1990年，安徽洪水泛滥，她放下自己手头的创作，自费奔赴故乡灾区，除了捐款捐物以外，积极实地采访，希望能向海内外对灾情做连续的实况报道。结果事与愿违，地方上一些人误会她的来意。她只好返回上海，见到我，不住地叹息。“做好事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理解的，有时，恰恰相反。人家也许会想：别人都在大都市风风火火地捞钱，你到乡下水里来捞什么？我捞什么？那里是我的家乡呀！连着我的肠子呀，你们晓得不晓得！”她激动地指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些误解了她的人。

其实，我知道；她生活得很不容易，她在六十年代就离了婚。唯一的女儿和她远隔重洋，在美国读书——工作。1988年冬天，我去夏威夷，她的女儿戴醒和女婿在夏威夷一边打工、一边攻读学位，遵母命开车陪我玩了整整一天。1989年我去过戴厚英在复旦大学的宿舍，很小，住室只有一间半。那天她就曾忧心忡忡地向我讲了一件刚刚发生在她邻居的凶杀案，一个年轻学生图财把教师给谋杀了。讲完这件事，她还说了一句笑话：“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我的生活中应该有个男人。”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七年以后，她也成为一桩图财害命案的受害者！她说：“我没有一般单身女人那样痛苦的孤独，我写作，不就是真诚地生活在我作品中的人物中间吗！何况我每两年

可以去美国当几个月老外婆，每一年可以回安徽乡下当几个月小女儿。”活得够有滋有味了！大约是前年，她从美国回到上海，告诉我：“我回来以后发现失窃了！”我问：

“丢了什么贵重的财物？”她说：“是我最贵重的东西，我电脑硬盘里储存的全部文稿，一字不剩。”（这件事，她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我说：“有这种怪事？大概是我们对电脑还缺乏知识，关机太久也许就要出现这种问题吧！”她使用电脑的历史比我长，断然否定了我的推测：“没那事！是千真万确的夫窃！”我问她：“还丢了别的什么东西吗？”她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丢。”我笑了：“那贼一定很喜欢读你的作品，是一个你的崇拜者。”她说：“不是，如果是个崇拜者，拷贝（copY）一份就是了、为什么把我的文稿全都抹掉呢？”我笑了，“这么看……他还是一个雅贼哩！全部抹去了你的作品，他得到的文稿，不就成了海内外价值连城的孤本了吗！”她十分悲哀地摇摇头：“不知道……文稿固然丢的可惜，可是这件事的发生又让我感到可怕……”去年，她搬了家，有了新的电话号码，她有些得意地在电话上告诉我：“我有了新居，比以前的房子大多了；就是更远些，更偏僻些，不过我不大出门。”我没去过她的新居，我想象不出她被杀害的环境。

她不止一次说过：“我的精力旺盛，我有很强烈的创作冲动，我还有好多好多书要写……”她那些没写出的书，一下就被死亡无情地淹没了！任何人都措手不及。

我记得，关于死亡，她最近在一些文章里，讲过许多耐人寻味的话，请允许我转录几句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尾：“昨天，我因为一个熟人的亡故思考过死亡问题。睡前，我写下‘历史在渐渐死去，的日记，因为我想到这位死者与我的一段经历多少有点联系。但是，夜间的梦却把这句话扩展为：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部分死亡，我与每个人都是生死一体的。在半睡半醒之际，我的脑子里翻来复去都是这句话，而且伴随着一种相当实在的感觉，我自己真的在随身边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而慢阳死着……”

而她却是如此突然、如此惨烈地死去……萧红还在临终前说过一声“不甘”，戴厚英连说一声“不甘”的机会都没有。

戴厚英 淮河的女儿
鲁彦周

厚英的死讯，给我的震动太大了！那天我像平时一样随随便便地翻着报纸，突然发现了一条戴厚英的死亡消息，这条消息简直像一声猛烈的炸雷，震得我几乎晕了过去，愣了半天，我才有勇气重新拿起报纸，仔细看这一条该被诅咒的消息，可是这条消息却语焉不详，然而习惯我们报纸某些报导手法的我，却完全能从中参透戴厚英之死是非同寻常的死，这更使我在伤感中感到她的遭遇肯定有着更为悲惨的背景。

当天我从上海作家协会得知戴厚英死的详情，更令我惊愕万状，任我想象力怎么丰富，我也不会想象出她会是这样的死！，一个呼喊人性复归的人道主义作家，竟然死于非人性的一个恶魔手中，这真是人间的最大的悲剧。我真想呼唤苍天，质问上帝，怎么能让她有如此结局？

我读戴厚英作品在先，认识她本人在后。在没有认识她以前，传到我耳朵里的对于她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有人赞扬，有人贬斥。而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又几乎清一色的是贬词，但说实话当时我都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因为朋友们讲的有关戴厚英的一些事，我在她的《人啊，人！》的后记里，已经读到过，而且我在读的时候还曾非常感动过，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坦诚地鲜明地深刻地解剖自己呢？同时对于一些事的是是非非，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时代的错误，导致她的命运颠簸反复，因此而引起种种相互矛盾的表现，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总的来说，我对我们这位同乡还是同情的成份居多。《诗人之死》、《人啊，人！》的呼唤就足以使我们对她有足够的信任，其余的事有什么必要去印证、去研究它的是和非呢？

后来，在一次笔会上，在淮河边，我终于见到了戴厚英本人。说实话，她的模样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外，一是我没有想到她的个儿很不高，一是我没有想到她是乡村姑娘似的黑，还有一点就是我没有想到她的穿着这么随便。我原以为戴厚英是个飘逸的热烈的奔放的人，甚至我以为她是一个很动人的成熟的中年女人，因为我也未能免俗，我认为多情的人，特别是多情的女人，即使不是一个绝色，也应当是一个女性味很浓很具吸引力的女人。否则我们的大诗人怎么会那么热烈地爱着她，并且为她而殉情呢？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戴厚英，却和我的想像大相径庭。

我所见到的戴厚英，是一个娇小的皮肤较黑的很一般的女人，她既不是绝色，也谈不上动人，她很普通，太普通了，你要是不认识她，她从你身边走过，决不会引起你的回眸。但这只是一种极为粗略的靠不住的印象，当我开始同她接触，开始同她交谈之后，我对于站在我面前的戴厚英，很快就有了另一种感受。你从她的爽快的敏捷的有时又非常尖锐的言谈中，你立刻就会忘记你对她的外貌评价，你便会发现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同时你也会忘记了你是同一个女人讲话，而是在和一个有思想的人进行愉快的交流。不仅如此你再较为深入地接近她，你还会发现，她有一双锐利的明亮的表情极为丰富的眼睛，这双眼睛不仅表情丰富，而且颇为深沉也颇为美丽，你再和这双眼睛对视，则又不仅是颇为美丽，而且你会发现她是很动人的了。

这时我才承认了，戴厚英除了作为一个有才气有思想的作家，还是一个

极富个性色彩的很有吸引力的女人。其后，我和戴厚英开始有了交往。我在她的身上有了更多的发现，因而也更加觉得她的身上有许多值得赞赏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富有诗意的东西，我说的诗意是这位思想颇为超前，作品以大胆泼辣闻名的女作家，在骨子里，在灵魂和情感深处，却有着浓浓的中国式的传统情怀。她完全不像一个都市女人，她始终是一个淮河边上的女儿。淮河，这一条沉重的多灾多难的在不胜负荷中呻吟的河流，它的水，它的土壤，它的受过太多苦难的人民，始终压在戴厚英的心头，使她不能摆脱，她似乎把失去的女人的爱的浓情，完全转移到对故乡的人民，转移到淮河的身上。这种女儿对母亲依恋式的情感，是当代某些作家很少有或是很难有的。这使她和现在文坛上的许多女作家完全不同，也更使我对她刮目相看。

有次我和她谈起淮河，谈起淮河两岸人民的苦难，谈着谈着，她的眼里似乎就要涌起泪水。戴厚英心里似乎也有一条河，一条像淮河一样的历经苦难的不胜负荷的沉重的心河。

戴厚英因为这种浓厚的故乡情，使她不断奔波于上海和淮河之间，我经常听到她又回来了的消息，她在她的故乡颍上县南照集，有时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南照集我早年去过，那只是淮河边上的的一座穷困的破旧的小镇，街上几乎看不到一座像样的建筑，它后来即使有所变化，我想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因为颍上县本身就是一个穷困县。在这样一座小集里，夏天的闷热，污水横流，冬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放眼望去，大平原上一片灰色，单调的淮河水日日夜夜呜呜咽咽地向东流淌，……戴厚英能在这样的故乡，一住就是很久，若不是对于故乡和故乡的人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她是不可能在这里住下去的。

戴厚英的乡情，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乡土观念，事实上也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式的文人的对于土地的深深热爱。这种现象，产生在戴厚英身上似乎是有些矛盾的。因为她的作品她的文章，却完全是现代的甚至有时还有点超前的意识，她似乎不应当还有那种我国古代诗人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情，然而事实上她的内心深处却又确实具有这种中国式的传统的乡村诗人式的情怀。

世界上的事物，特别是万物之灵的人，总不会是单一的，总是充满矛盾的，单一的人也许有，但戴厚英却完全不是，我上面说到戴厚英是淮河女儿的一面，但是她还有另外一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她的内心深处的对于人间，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看得很重，很重，因为看得重，而这个世界又不可能像她所想像的那样，于是她在内心深处，就时时处于骚动、不平甚至愤恨之中，加之她的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充当了运动的号召者的工具，并为之冲锋陷阵，这种生活上的灵魂深处的阴影甚至伤痛，不能不对她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上个人婚姻的失败，浓烈的生死之恋的毁灭，当然使她对于人生会有一个大的转变。正因为如此，所以她在她的书的后记里，写了那么多那么动人的忏悔式的文字，这种种都表现她后来的大彻大悟是十分真诚的。但是这个倔强的女性，她自己反省可以，却不愿让人看出她的内心世界，更不愿让人提起她的某些过去。她的心灵是严密地封锁着的，只有她在写作时才有情不自禁的流露。在另一面她又是一个自尊心极强表现欲也极强的女人，她不可能像有的人一样背上包袱，从此消沉或是沉默。不是，完全不是，她对于世事，对于人间的不平，以至于对于文坛上某些不良现象，她都不会表示沉默，不仅不会沉默，她还常常以非常尖锐甚至尖刻的语言，

直刺一些社会现象，有时甚至使你感觉到她是在故意刺伤人，这当然使她很容易得罪人，又因为她无防人之心，在行动上她也就不怎么注意别人是如何看法，我行我素，这样自然也就容易给人以口实，也自然易招来一些是非。我不知道她对于自己是怎么看的，也许她也有所觉察只是不能自己，这多少反映了她的身上有些悲剧式的性格。我曾听说，她为了对她的故乡救灾问题，曾和一位当地领导大吵大闹。我也曾知道她在故乡还曾被人中伤，这种中伤，对于一个单身女人来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事在她心里曾造成很深很深的伤痛。有次她为这事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很愿意理解和谅解别人的苦恼，我知道大家都活得不轻松，都要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危机，但是什么事都得有个限度，不能把自己的苦恼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她说她要回到她的故乡来和人辩论，当然她最后听从了我的劝告没有来，但她的心确是被人刺伤了，她在这封信里既透出她的愤怒，也反映了她对于中伤她的人的理解和宽容。但她为什么会，遭到中伤？也还是由于她的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所产生的。

有好几年我没有看到过戴厚英了，我只看过她的一些散文，我还听说她有些信佛了，从她的散文里透出的信息，我感觉戴厚英已经在改变她自己了，她似乎变得稳健，变得成熟，变得对于人和人世间的事有更深更透彻的了解了，说她要研究佛，我也相信，从经历看她会皈依的，是的，皈依，我们都要皈依的，只是皈依未免太惨烈了。

戴厚英，你这淮河的女儿，听说你的骨灰已洒到淮河里去了，淮河，正是你的真正的母亲，祝你的灵魂在这母亲的怀抱里安息吧。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于樱榴居

何处觅断魂

叶文冷

风乍起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总要听到讣闻，对于相熟的鹤寿而逝者，总觉得是人生的必然归宿，虽怅怅而并不十分心哀。

秋风乍起的时候，我埋头赶写的《秋瑾》正接近高潮，昼夜劳作足不出户自不必说，整副心神都沉浸在“鉴湖女侠”的英魂浩魄里，日常行事，时有恍惚之态，此问情状，凡爬过格子写大部头的，都有体会。

为此，我辞谢了许多应酬，为此，连大哥叶鹏在上海动心脏手术，我都硬了心肠未去探望，这在一向极重手足之情的我来说，至今犹觉歉然。

8月27日晚，早已饭罢的家人连连催我就餐，我正写至欲罢不能之际，又延宕了许久。大约八点光景，总算暂时住手，正洗手准备吃饭时，电话铃响了。

是嫂子陈浅萍的声音，且指名要寻我通话。

我的心卜卜地跳，不祥的预感与哥哥的手术连在了一起。

不料，语声急迫的浅萍，脱口而出的是这句话：

“戴厚英前日下午被歹徒杀害了！吴中杰本来下午要来医院看你哥哥的，因为他是凶案发生后的第一目击者之一，公安局要找他了解情况，他没法来了……”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手中的湿毛巾滑落在电话机旁。

一连串的问号和伴随而出的惊叫都被我闷在了喉咙里，听着话筒那边的嫂子语声惶急而又零乱的叙述，我还是无法相信。

对于这样的噩闻，即使对凶杀司空见惯者，也无法不为之心惊。

嫂子最后又说：“中杰希望你向中国作协的领导同志报告一下，厚英生前多次说过，中国作协张锲同志同她是老乡，一向关系很好，请你将这事转告于他，还有别的同志。若要知细情，你可以往中杰家直接挂电话……”

人在突如其来的惊惧悲哀面前，眼泪都会被吞噎。我捺下纷乱的思绪，往中杰家挂话时，中杰还在与公安局的同志谈情况，他让我十点以后再打。

情况再次证明凶讯的千真万确，我心如垂铅，整个神魂象被噩梦所缠，人是整个儿傻了。

我跌坐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湿毛巾的水珠一滴滴到脚上、地上，就象莫明其妙委屈屈的泪滴。

惊惧和疑惑攫获了我的心。世事再蹊跷，一件凶杀案和一个作家怎么能连在一起？而且是既非“大款”、“大腕”更不是时下“走红”者的戴厚英？

我无法相信。

我想告诉在杭的厚英的朋友们，可是惶急伤心间，我想不起来可以接受此种噩讯的人。因为此时我分外记起厚英曾经有过的诉说，记起她在极孤独的时刻里对我的诉说。是的，名声响亮的她，其实非常孤单寂寞，特别是文坛，往往是别人知道她她却识别人，此间没有嘘寒问暖的朋友。

挂通了张锲的电话，吃惊非常的老张大哥，也要我问明细情后再详告。

我好不容易捱到十点，再次听到中杰的声音时，他已比刚才平静多了。我不知道事过两日且是死者密友的中杰夫妇如何度过了这样的时刻，我只是觉得虽然我们彼此都面对话筒，彼此却都抑止不了泪音。

中杰叙述所目击的情况，恰如他后来在报章所披露的一样。虽然悲痛难

忍，我们还在电话里讨论了一会“可能的凶手”。因为被害的还有厚英的小侄女戴慧，我们共同推测案情或许由侄女的恋爱事件引起。但即使找到了这点“最大可能性”，我还是无法相信，这样残酷的事件怎能与她，与厚英连在一起？

命运中真有一些属于“冥冥天数”的质因？天哪，几日前我在《随笔》和《作品》上刚刚看过她的近作：《说梦》、《我的沉沦》，特别是前者，现在看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前兆”。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第一个念头是立即飞往上海。我相信在凶手未曾缉获前，屈死的厚英决难瞑目，我听中杰声音颤颤他说起厚英脖颈的刀痕之深、姑侄两人血流成河的惨景，真是令人森然，令人欲哭无泪。

探望的愿望在彼时已不切实际。中杰说姑侄两人的遗体及现场已被监护，公安部门非常重视这一案件，而查缉行动唯有亲友们的密切配合，才能有效：而我这边呢，为了推选出席第五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我省作协恰在次日要召开在浙全国会员大会，会期一天。公务在身，我断断无法离开。

饥肠辘辘却食欲全无，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我一夜无眠。

近几年来，我经历了一些亲人朋友的死亡。最悲痛的莫过于母亲的逝世。虽然都是“伤逝”，却是可以慢慢消解的“人生必然”。面对厚英的噩耗，却是难以言喻的惶悚，难以接受的震惊。

我对厚英，虽不敢谬托知己，但从相识起便党性情投契。人与人之间友情的建立，往往没有什么附加条件，也不在于对方是否顺遂显达还是失意落魄。我和厚英的相识纯属偶然。厚英她胸无城府快人快语勇于剖露自己的坦诚豪爽，她那很有男儿气概的行事脾性，都很使我欣赏。而且，我永远记得我在四十八岁生日那天收到的一束鲜花，是厚英相赠于我的。

这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束鲜花，记忆分外深切。

那束早已变成尘泥的鲜花，以它灿烂的花朵，以它碧绿的枝条，重新在我眼前鲜活起来，我再次感觉到生命的芬芳依然缭绕鼻端，我再次难以相信这个和鲜花碧草一样，“年年春风吹又绿”，对生命充满爱心对生活如此积极的人，真的就这样凄惨地被结束了生命？

与厚英结交的往事就如纷谢的花瓣，片片飘落眼前。

初识厚英，是在86年春。我还在河南。

我先生王克起和哥哥叶鹏，受复旦中文系之召，回校参加当代文学研讨会，彼时，我亦应《小说界》之邀赴沪参加笔会，于是复旦中文系也顺邀我这个“双重家属”参加讨论会。

复旦是兄长叶鹏的人生之桥，他在跨下这座桥时所发生的重大转折，不仅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也关系了我到河南乃至度过24年的艰辛岁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复旦也成了我的命运之舟。

叶鹏兄和“复旦家属”的我，在讨论会上浸透人生五味充满感情的发言，激起了极大反响，那一日的会场，连窗台上走廊里都坐满了学生。

复旦自有许多昔日的朋友。盛会中间，中杰要举行家宴招待我们这几位远客，并说与之相邻的还有一位好友，意欲邀来共餐，问大家是否欢迎？

那日同在中杰家的，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好友——鹏兄和中杰的学长、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范伯群。范大哥当时就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戴厚英！

那时，厚英的大名虽然早已如雷灌耳，我却还没见过她本人。六年前，我在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时，班上同学没有人没读过《人啊，人！》。有几位轻易不夸同行作品的“文坛骄子”，在议论《人啊，人！》时，不仅称颂其创新的文体，更由衷佩服这本书所透露的思想锋芒，由衷佩服作者的才情胆识。

作者戴厚英的一些书外故事，就在这先先后后听说了：她不邀而去参加闻捷追悼会、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戴上黑袖章并且站在“家属”队列里的勇敢，尤为我所心折。并非我夸大，假如我们不健忘的话，1980年，重新集结的作家队伍还有许许多多“伤痕”，解冻的心灵刚刚苏醒；“思想解放”还只是随风潜入夜的春雨，刚刚开始滋润我们这些饱受磨难者的心，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对认识许多历史问题，还有几经反复的过程。

戴厚英就是文坛许多人常挂嘴边的人物之一，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她与闻捷的那段不寻常的恋爱，毋宁说是由于《人啊，人！》。

厚英是中杰夫妇的好友。那时她虽然在上海大学执教，宿舍却在复旦校园。那天，她应邀而来，进门不过几分钟，大家便相熟了。

那天，她穿了一身藏青色运动衫，内里是一件玫瑰红色的秋衣，显得很精神，一进门就自告奋勇要去厨房帮忙，可是被能干的高云谢绝了。

我对初次结识的人，常常是听得多，说得少。坐在中杰家的沙发上，厚英马上成了谈话中心。而且，她一坐下就声言：你们兄妹（指我和叶鹏）的故事，我全部知道。

这当然也由于中杰夫妇的传告。

“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呢？”她自言自语地问我象问自己。“作家首先要教自己的笔和心灵一样畅快才是！”

我无言。痛快淋漓的话语使人感慨万千，我立即加深了好感。但此时，我还无法告诉她：“写下来”的愿望，在我已经“成竹在胸”了。

厚英滔滔不绝，尤其对叶鹏一见如故。她出言的惊人坦率和爽快，她毫不做作绝无矜持之态的行状，使第一次见面的我和其他人，都有“新知似旧雨”之感。而且我发现，只要她在场，妙语如珠的她总会成为每次话题的“倡导者”。

我当然也听说了，她的讲课受到学生热烈欢迎。

再次相遇却是在异国他乡——德国的莱茵河畔。

我是与十位作家一起受一位钟情中国文学的老太太赛夫人所邀，组成代表团访问那时还称为“联邦德国”的西德，主要落脚地是波恩和汉堡。厚英却是因为汉萨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人啊，人！》，该社以邀她来访游览作为应付的版税；而组织中国作家代表团举行“波恩——中国文学周”的东道主，就想趁机搭一下“便船”：让戴厚英还有顾城、谢烨夫妇也在这场“文学周”上讲演并和我们一起活动。我不知道这种在国内来说应当是很简易很可通融的事，到国外就变得复杂了。记得主办者和团长好象交涉了许久，双方好象都有点不愉快。最后，虽然在有次讲演里，刚刚赶来的厚英和我们坐在同一会场，但以后，对她的接待和她的游览参观，又都恢复成她“独行侠”的身份了。

厚英自然也得知了这一交涉过程，于是，心直口快的她，便有许多牢骚。我生怕她语无遮拦，会惹出更多麻烦，却不知怎样才能有效他说服她改一改这种遇事沉不住气的性格。不过，说实在，人的命运往往能被生活所强制，

而人的性格，却委实是“本性难移”的。

但就在这次短暂的相聚间，我又一次体会了她那发自内心的处在文坛“圈子”外的孤独；那种渴望被理解、被谅解而未能如愿的苦闷。我劝她把心放宽点，说话处事别太激烈，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接触的，许多误解隔阂，往往一经接触便可以消除，你也不妨主动点，比如说，主动上门去接触那些与你曾经有隔阂的……她不等我说完便叫了起来，我的心路历程、我的忏悔，都在我那两本书（指《人啊，人！》和《诗人之死》）里表露无遗了，如果硬不谅解，叫我怎么办？反正我这人永远不会口是心非，刻意求善缘非我所长，但求无愧我心吧！我也就只好这么的了！……

她说着，泪影闪闪。这是真诚的委屈和泪水。霎那间，我又一次为自己笨拙的劝说惶惑起来。是的，象她这样冰雪聪明的人，是无需劝也无需说的，她在不平常年月中所思所悟的，难道不比我更深刻吗？

这以后，我们又有过一次小聚。我在又一次去复旦时，还去过她的小窝。好象是秋天的晚上，因为我记得她穿了一件厚厚的毛线长袍似的“大褂”，说实在，这件织得乱七八糟的灰不灰蓝不蓝长过膝的大毛衣，使她显得臃肿且难看，她却得意洋洋于自己的这件“服饰”，并说穿这件大袍子在家不管干什么，都很随意方便，还一个劲儿问“手工”怎么样？

拉倒吧！我说，要论织毛衣你得拜我为师！她一听就笑了，坦白道：这是在一家地摊上买的处理品，就因为太难看了，所以价钱极便宜，但穿上很暖和。她承认自己做针线活做家务不行，现在雇了个钟点工，来了后就一下子给她做上一两天的饭菜，她只需从冰箱里拿出热热就对付了一日三餐。

单身女人生活的凄惶，无可言喻地展示出来，这间冷凄凄的小窝，这发着清冷灯光的度数很低的日光灯；不知怎的，很令我为她生出一种隐隐的忧伤。那时，她唯一的爱女戴醒已经去了美国，只有在说到爱女时，她才又乐呵呵的谈笑风生。

厚英那晚坚邀我去她家看看，是为了展示女儿刚为她买来的一台荧屏只有书本大小的小电脑，这是我第一次得见电脑用于写作。厚英兴奋不已地向我讲述怎样操作并热情地演示给我看，可惜对当时“电脑盲”的我来说，一切都象听天书似的，只是无限羡慕她接受高科技的聪明敏捷，并且，我对她在教学之余能够创作出这么多作品也就有了实在的答案。勤奋是成就的重要一翼，厚英正是在这一点上也令我感佩不已。

到那时为止，我和厚英的交谈还纯是作家之间的有关文事的闲谈。厚英完全向我敞开心扉，是在1989年那个闷热而不寻常的夏天。

我从深圳创作之家准备回杭，抱着我那还未修改完成的长篇《无梦谷》路过广州，住在花城出版社那小小的招待所。天气燥热，心情也很沮丧，而厚英和另一个从天津来的年轻作家张蔓菱，正好也都为文事留于此，花城主编范汉生、李士非是接待我们的东道主，而先后当过我们三人文稿责编的社渐坤，也是位极热心而诚挚的同志，处处照拂我们。诚意难却且旅途有伴，我忘了一时买不到机票的烦恼，安心地在此住了三日。这三日，我们三人除了白日的各自写作，吃饭、闲暇都在一起，竟日畅谈间，厚英悄悄告诉我：其实她是在等签证，她想出国去。

我很为之吃惊。当即直率地表示她现在申请出国的不妥，又问她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她顿时一呆，情绪激动地痛哭起来。

此时，她才向我细细诉说了近年来外界对她的种种飞短流长的闲话，那

是真诚力轻浮所欺的又一个悲剧。因为所涉及的是我也非常熟悉的人，面对她的失意和痛苦，我简直束手无策，我立即又一次痛恨自己在劝解这类事上的无能。只是笨嘴拙舌他说对于一个根本不值得你耗费感情的“精神侏儒”，连痛苦都是无意义的，你的泪水会变成无聊者再次喷溅唾液的笑料……她虽然渐渐止住了哭泣，却再次呜咽着喃喃他说：我是很愿意真诚爱人呵，可是，谁爱我呢？现在，要是有一个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好男人，那怕他只是粗识文字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只要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要他对我说：厚英，我爱你！我会马上打消出去的念头，跟他白头偕老！可是，文玲，说来你都不会信，没有，我的生活中，连这样的求爱者都没有！我不知道我在人们眼中成了什么，没有人爱我！……

我自然又是无言。我再也无法应答她这又一自语式的沉痛的问话。可是，事隔七年，厚英那发自内心痛苦的掩面而泣的神情，她的近乎号陶的痛哭，使我至今一想起都心头隐隐作痛。我颓然感到，爱情于一个优秀的女人，常常是无缘的。

后来我听说她居然去了美国，并住了不少日子。这以后，又是长长的未曾联系。当有日电话铃突然响起时，就是我才提到的过生日那天，90年的11月4日。

记得那日我去参加绍兴文联的一项颁奖活动回来，同时担任评委的，有雷达、有《当代》副主编朱盛昌、还有南京军区的铁竹伟。也是因为机票问题，他们都要在杭州耽搁一下，我便邀这些远方的朋友来我家吃饭。

最喜“有朋自远方来”，我便大显身手做了满桌的菜，吃了饭正要切蛋糕时，厚英这不速之客来了电话。

原来，她应杭州的一个干部业余学校之邀来讲课，听说我这儿有一群朋友，便要来热闹一番。电话放下没多久，门铃响了，容光焕发的她，手捧一束绚丽的鲜花亭亭立于门首。

我无法掩饰我的惊喜。1990年的一束生日鲜花在当时也属少有的奢侈，而于从来简简单单且大都忘了过生日的我，当然是平生第一次享受这一奢侈。

我是那样惊奇并珍惜这束鲜花，我更惊奇的是厚英那天极好的气色和出众的神采，我揣测着她或许遇到了真正的幸福或称心快事，才有那样好兴致，才有那样灿烂的笑容。

自然，谈笑风生的她又成了“夺主”的“喧宾”，说实在，若无她的到来，我们的这场朋友聚会，不会有那么多欢畅的笑声。

铭记至深的还有铁竹伟。在报上惊闻厚英被害的凶讯后，竹伟小妹也是最早给我打电话的一个，她异常难过地记起了“与厚英大姐唯一的一次在你家的相逢，还记得她当时说过的一些笑话，记得她所说的许多极生动的生活细节，我是那么惊奇她的口才，她真是一个好作家，就是在讲述极简单的事时，也如写小说刻划人物那样生动又有趣，记得吗，她那无告诉我们女同志怎样在公共场合巧妙地脱长裤换裙子又不失雅相，我到现在都没忘掉！那样一个好人怎么会被杀死啊！我简直无法相信！……

又一次被回忆触痛的我，眼前飘起的，是那晚欢聚的情景，竹伟说的那些细节我都忘了，但厚英立于门首映在花束中的笑脸，却永远生动地镌在我的心头。我们没有过书信来往，但彼此的惦念却与时俱深，到了对方的所在处，总会立刻想起联系。

就在两个月前，我去上海时，我们又通过一次长长的电话。

我奉命到上海作有关文化战略的调查，厚英得讯，定要我去聊天，并说自己过些日子还要去美国，因为戴醒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将第二次去尽外婆的责任，她夸爱女、女婿、外孙女……就在她絮絮的话语中，我再次感受了她对生活、对下一代的绵绵无尽的爱意，真是一个慈心丰厚的外婆呵！我因为住处离她的新宿舍太远，说这次就不来了，而且来看你不去中杰家又不行，两下走，时间来不及，有什么“大天”，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一会吧。我还说我前些日子看了你写的一篇关于朝圣和如何结了佛缘的文章，现在连你这个一向忧国忧民的家伙都这样清高冲淡远避尘世，太令我吃惊了！

这一来，她马上又抓着话筒滔滔不绝起来，极有劲头真诚无比地向我娓娓讲说自己的心得。那是一个“身在红尘心系佛门”的厚英，（她自己的话），虽然我对她心灵轨迹的变化不无惊诧，但我从她非常平静的语调中感受了她与时共深的冷静和高远。那个一向热情丰溢而极易冲动的戴厚英，似乎渐渐远去了。

果然会远去么？那个对故乡亲人痴心脉脉、那个对世间的美善礼赞不已、对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对生活的一切进步和变化如此悬心萦怀的人，怎会“思”入空门？我思索着她的这篇关于朝圣和佛的体验，确实是另一种真诚，也是完全变化了的又一个令我陌生的厚英。她如此兴致勃勃地钻研佛教，是为了解脱感情生活的苦闷还是仅仅执迷于佛学的高深和警世的哲理？

是什么原因令她的处世哲学再次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深刻的内在的原因，决非是写在纸上的这一点，而近乎谶语的《说梦》，至今还令我蓦然心惊。

因失子而悲痛之极的祥林嫂的絮语，成了“发傻”的象征。面对厚英的极度不幸，即使在凶手已经缉获之时，我仍然久久地心悸，久久地悲愤难平。

事过三月，我仿佛依然不能平静地回想此事，也无法平静地回忆厚英与我虽然平平淡淡却不无真诚深刻的相知相怜。

在面对这个旷古未有的不幸时，我发觉我也成了“祥林嫂”，而我发傻的痴语也还是这一句——我不相信8月25日发生的这桩血案是真的，那么一个好好的戴厚英，就这样轻轻松松被一个无赖之徒夺去了生命？叫人怎么能够置信？

我无法相信这事是真的。厚英，我无法相信啊！

面对厚英的血案，我又一次感到了文学的苍白无力，在影响改造人的心灵上，它有时竟如此荏弱可怜！我们曾经言之凿凿笃信无疑的对文学功用的估量和信心，竟被这残忍的刀锋砍杀得只有瞠然木对的份。

难以抑制的悲哀和沉痛！

掬尽千滴泪，何处觅断魂？厚英，我只愿大家对你的深挚友谊，能慰你在人世所欠缺的爱·慰你寂寞的心灵。厚英，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爱你呵，你该地下有知！

不死的美丽童话的了结——也谈戴厚英之死

彦火

厚英在上海寓所被杀，据曾到过现场的一位文友称，其状甚恐怖，现场血肉淋漓，面目难辨，令人震惊，闻耗后其巨大阴影如梦魇久久徘徊不去。

我早年因研究当代大陆作家，于一九八二年造访戴厚英。当年戴厚英在广州养病，我是由《花城》杂志创刊人苏晨兄的荐引，在医院与戴厚英作了一次长谈（该次长谈后来整理成文，收入拙著《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此后经常通信，每次她来港大部能相约叙晤。

坊间谈到戴厚英时，很多人都回避了她在文革期间不太光彩的一面。其实戴厚英是一个心直口快、胸怀磊落的人。她首次与我会晤，对外间谈论她曾是张春桥在上海的文化打手的说法，直言不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由于天真幼稚做过一些蠢事，错事，是冲击了上海一大批老作家、文化人”。这也是后来戴厚英的小说只能在南方的粤闽港地区出版、而无法在她执教的上海出版的原因了。

戴厚英于文革开始，无疑曾作为张春桥的御用文人而被利用了，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她一度被卷入了上海的“炮打张春桥事件”，也曾受到批判、审查。

戴厚英与大陆著名诗人闻捷的生死恋，曾广为流传。她自己后来也把这段曲折的感情写进了她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她在一次言谈中，告诉了我关于这段感情的真相。

文革开始，诗人闻捷即被隔离审查，期间戴厚英曾作为造反派，负责对闻捷进行思想改造，到底戴厚英也是没有被改造好的“革命小将”，一经邂逅，她便被闻捷的才华所倾倒，七一年闻捷获释放，两人过往甚密。但这段感情受到张春桥的诸多阻难，张春桥勒令戴厚英与闻捷划清界线。当戴厚英在巨大压力下把上头的意思告诉闻捷时，闻捷对人生的希望可谓彻底破灭了——一个只懂得摇笔杆却不能写诗的“反动诗人”，当他用以维系生存的一线曙光也被浇熄了，他只好愤然选择奔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闻捷是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开煤气自杀的。

戴厚英谈起这段感情泣不成声。她后来把她过去的经历、感情生活都浓化在她的笔下，分别写了知识分子三部曲——

《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足音》；《流泪的淮河》三部曲，只写了《往事难忘》，（反映反右运动）、《风水轮转》（反映文革）二部，第三部的题材是写改革开放，据出版淮河三部曲的林振名兄说，尚未完稿。看来作为淮河女儿的戴厚英的眼泪终是永无了期的逗点。

戴厚英曾对我说，她平常写稿的时候就像“拼命一样，每天写一万字，写完以后往往就像生了一场病一样”虚脱，也许积淀在她心中的块垒太沉太重了，她以写文章作为解脱的手段。

戴厚英后期皈依佛教，她说，在她的“安徽家乡做了不少慈善事业。广积善缘。她在一首小诗中曾表示她不相信“不死的谎言”——“你说你心里怀着不死的信念，/我却早已不相信这个美丽的童话了。”戴厚英之死，也许是“不死的美丽童话”的了结。果然如此，她也死得太惨苦了，——她的悲剧岂只是一个童话的破灭？！

青葫芦 刘心武

家中客厅茶几上，养了一丛合果芋，是用一只大葫芦水养的。那大葫芦是有一年上冀东农村，向一位农民老大妈讨来的。那是她自家院里结出的葫芦，家人将葫芦上部对称地割去两块，使留下的部份恰呈提把形状，她用来当针线篮儿；我见了喜欢得不行，便要出钱买下，她哪里要我的钱，说：“喜欢你就拿走！”并且立即腾空了那葫芦，热情地塞到我手中。我将大葫芦篮儿抱回了北京家中，灌水养绿叶，往厅里一摆，真是人见人爱。

几年过去，所养的绿叶越来越碧翠秀逸，那木化的葫芦壁纵使再厚，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浸润腐蚀，终于在最近我拿起换水时，溃破了一个铜钱般的洞。于是寻觅一个新葫芦便成了我的一桩心事。但这样的葫芦在农村也并非俯拾即是，欲在城里找到一个岂不是想入非非？

谁知天下竟有十分凑巧的事。有一天我在居处附近的护城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忽见一处临时工棚的朝阳一面，栽有一棚攀缘植物，绿润润的好爽人眼目。先是看出吊着些丝瓜，走近细观，哎呀，竟还有一角是栽的葫芦！有一两个葫芦虽然不及我所拥有的那只大，却也“非同小可”；栽种者怕它们的蒂经不住自重，已经用草绳盘了吊圈，从架子上垂下来接住它们肥胖的身躯。我知道那工棚是为一栋必得盖上两年的大厦，而为外地民工所设的；他们来自农村，带些瓜籽什么的播在工棚外面，恐怕大半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寄托着说不出来，却时常在灵魂深处涌动着的一种情愫吧。

那天我走拢绿棚下时，工棚里空空的。一位老师傅迎上来，他显然是留下看管工棚的；我们很快攀谈上了，我发现他操一口地道的川东话，原来是个老乡！我便也用家乡话回应他，一来二去的，双方都倍感亲切。他对我有问必答。我得知住这工棚里的民工大都来自一个乡，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在内。

我问是不是因为他属于老弱，所以派他留守，他便站起来，挺直腰板，屈伸双臂，笑说在这工棚里掰腕子，他还稳拿第三名呢！后来我便问他这葫芦是谁的？说想买一个，他说：“送你就是！如是公家的，我也不能送，可这是我种的，你喜欢，送给你，也算有缘！不过，它们都还没长‘登’呢……”“没长登”就是还没发育充分的意思，于是他问我住在几号楼几层几号，说过些时“长登”了，他会在轮休时送到我的“府上”。

谁知恰在那以后，上海传来戴厚英遇害的噩耗，并且不久便破了案，凶手竟是她老家原来教过她的中学老师的孙子！我与戴厚英八十年代在芜湖、广州、香港有过交往，音容宛在。真不能接受她大白天在家中被砍杀的事实！我一连好几天都为那凶手人性的黑暗而战栗；同乡，母校师长之孙，曾接待过的人……竟突然凶像毕露，举刀劈来！这样的事发生过后，我们的家门还能轻易地为仅仅是同乡的初识者而开吗？

在我印象里，戴厚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遇到她时，已是她的《人啊，人！》出版以后，她对“文革”经历的主动反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1986年初夏，我和她分别由不同的机构邀至香港访问，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一家饭馆里，香港文化界的一些人士把我们邀到一处晚宴；那大概是戴厚英头一回出境访问，言谈举止中，虽旷达爽朗，却也略显拘谨，那时我们对香港人那“夜生活从晚九点方才开始”的生活观念，很是陌生，因为她是位于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的，住在那边招待所中，所以席间她几次跟我说，这

样晚了，回去那么远的路，在中大车站下了车，还要爬上树木蓊翳的山坡，会不会不安全呢？其实我们散席后，港岛湾仔、铜锣湾一带，正是万丈红尘，热闹到不堪的地步，而无论九龙那边的弥敦道，还是新界的商业区，也都是“好戏才揭序幕”，哪里算得夜深归晚？后来我也曾到中大作客，住在校外赤泥坪村，常常夜里十一点才从港岛归去，也曾爬过那座树茂花繁的山坡，何曾有过什么危险？……忆及这些琐细的事情，我的心只感到灌了铅般沉重；万没想到戴厚英却是在自己的家中，在一个大白天，在她绝无防范的情况下，反遭到了致命的危险！消息传来时，也曾替她设想过，进门后发觉异常，何不转身奔出，赶快招邻报警？据说她当时是大声呵斥，甚至当凶手来扼她的喉管时，她还来得及对那毫无人性的凶手说：“你会后悔的！”她至死不改其性格，对凶手尚存劝善之心，思之更令人惻然！

戴厚英的悲惨遭遇，确实令我心乱。我们究竟还要不要放胆地接触陌生来访者，或家乡、熟人辗转介绍而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说到底，我们对人性还要不要存有基本的信心？难道我们必须将怀疑与防备作为待人接物的头一道“工序”吗？即使对那些我们看出是“来者不善”的家伙，我们是否仍应抱有他可能会知耻而悔的信念？这思考真令人痛苦。为什么偏让戴厚英这样一个人遇上了灵魂酩酊、无可救药的残暴杀手？命运于她而言真是太诡谲不公了！……

那一天我心里正乱，忽然门铃锐响。没约过人呀，谁呢？打开门，原来是前面讲到的那位民工老乡。我迟疑了一下，才把他让进屋；他进得屋来，我才看清他提着一个鼓鼓的塑料袋……原来他给我送来了两个葫芦，他笑吟吟地说：“让我好找！……这葫芦倒是长‘登’了，可还是青的，你要把它们放到阳台上，让太阳照上一阵子，它们才好变黄呢！”我忙请他坐，给他倒茶、削苹果，和他聊天，还找了几件半新的衣裤给他……然而临到他告辞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你莫把我这个地址再告诉别的人……现在社会治安……哎，你来，我是欢迎的，可是，你们那么多的……”他望着我，那表情让我莫可形容，稍顿，平静地说：“我晓得，晓得……我就是给你送葫芦……我再不来的……你还是要到我那个棚子底下来玩啊……”

送走他，我把葫芦放到阳台上，抚摸着，心里更乱，我不知自己是应该为跟那民工老乡说了那样的话而害臊，还是应该为自己从“戴案”中无形提升的警惕性而自得……我忆念着戴厚英临死前吐出的那句话，想到她在那样的情景下还对黑暗的人性存有可能悔悟的信念，不禁喃喃自语：“人啊，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改定

真实的人

赵丽宏

年8月26日晚上，我刚从国外回来，一个朋友来电话，告诉我，戴厚英前一天在家里被人杀害，死得很惨，还不知凶手是谁。这消息使我惊愕。前不久，我们还一起回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一个聚会，在会上她谈笑风生的样子还在眼前。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作家，竟然死于非命，实在令人心痛。人的生死，竟如此无常，如此难觅轨迹。那天晚上，我很难过。很自然地回忆起和她的一些交往。

我和戴厚英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校友。不过，她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而我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很早就听说过戴厚英。根据“听说”而造成的印象，使我觉得戴厚英是一个不值得交往的人。这样的印象基于两点：第一，“文革”中，她是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曾经是有名的“小钢炮”，批判起那些老作家来很不留情。对这样的人，我很难产生好感。第二，我所钦佩的诗人闻捷之死，和她有关。听说她在“文革”中和闻捷谈恋爱，后来又抛弃了他，使诗人绝望而自杀。有这样两个原因，我认为她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

然而对一个人的印象，光凭“听说”是靠不住的，最准确的印象应该经过自己的观察和交往而得到。有两件事，使我对戴厚英原看法开始有所改变。第一件事，是读到了她的小说《人啊，人！》。我是以挑剔的目光来读这本书的。我曾想，一个专事批判他人的造反派，会写出什么好的小说来。然而她的小说感动了我，并使我的心灵受到震动。在小说中，我看到了她对“文革”中那种思维模式的全面否定和批判，以及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在当时，这样的声音难能可贵。在她的激情洋溢的文字中，我看到了她的才华，也感觉到了她的真诚。她在小说中表达的不少看法使我产生共鸣。一个作家，能这样反思过去，并对以往的错误作检讨和忏悔，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作家就做不到，在他们自己的文字和言语中，他们永远有先见之明，永远是受苦受难者，永远是不屈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英雄有几个呢？第二件事情，是诗人闻捷的女儿对她的态度。如果她是闻捷之死的罪人，她必定是闻捷家人的仇人，但我亲眼看到了闻捷的女儿对她的亲近的态度。这使我对以前的“听说”产生了怀疑。我想，事情可能远不像我听说的那么简单，一定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故事在其中。后来，对《人啊，人！》展开了批判，我是反感的。这种大批判的做法，还是“文革”的风气，那些深受“文革”之苦的人们，仍沿用“文革”的那一套来对待一部小说（其实是针对一个人），实在不明智。更何况，小说中宣扬的人道主义，正是我们曾失落的珍贵的东西。这人道主义，在“文革”中曾经受到过何等严厉的批判。

后来，开始和戴厚英有了接触。记得第一次和她交谈是十年前，在《萌芽》编辑部，那时我还在《萌芽》当编辑。她见到我，笑着说：“哦，你是诗人。你知道吧，我最喜欢谁的诗？北岛！”然后，她微笑着，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诵起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她朗诵的时候，眼睛发亮，很有感情，还带着手势，但很自然，不做作。看来，她确实是喜欢北岛的这首诗，已经熟记于心，并且把诗句中表达的哲思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她朗诵诗歌的样子，留给我很好的印象。我觉得她的心态很年轻，不像一个 50 来岁的人。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出乎我的意料。那天是《萌芽》文学奖的颁奖会，戴厚英是杂志社邀请的客人。发完奖，客人们发言。轮到戴厚英发言时，她只说了几句和《萌芽》文学奖有关的话，话锋就突然一转，以愤怒激烈的口吻谈起了这些年她所受到的压制和批评，而且毫不客气地点了当时作协领导的名字。她的发言，使全场愕然，会议的气氛也变得很尴尬。事后没有听到谁议论戴厚英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但是与会者恐怕都很难忘记她在会上的表现。

这就是戴厚英留给我的第一次当面的印象。以抒情陶醉的神情朗诵诗歌，以激烈的态度抨击自己不喜欢的人。两者并不统一，但都说明她是一个坦白直率的人，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欢喜则歌，不平则鸣，爱和恨，都溢于言表，一览无余。这样的性格，在“文革”中成为“小钢炮”，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有多少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以真诚的狂热干出许多荒唐愚蠢的事情。这是时代的悲剧。“文革”使很多知识分子深受迫害，也使很多知识分子人格扭曲，被批判被迫害当然吃了很多苦头，批判迫害别人的，其实也是被扭曲的灵魂。对这一点，戴厚英其实是最有体会的，因为，在“文革”中，她既当过批判他人的“小钢炮”，也曾成为被人批判的对象。然而那天开会听她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是，她还没有从“文革”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当然，要一个人改变性格，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此后，我很注意戴厚英的文章。她的一些散文随笔，写得很出色。她的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对腐败的权贵者的痛恨，对不幸的弱小者的同情，在她的文章中经常能看到。我好几次听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说起他们的戴教授，说她的课上得非同一般，学生都喜欢听她的课。在最近几年中，曾经有不少次和她一起出席会议或者参加笔会，她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和她在一起时，我一般总是听她说。她向我谈她的女儿谈她的侄女，谈她的家乡，谈她在国外的经历。关于她和闻捷的故事，我不问，她也一个字不谈。前年秋天我们一起去浙江桐乡参加一家杂志的笔会，一路上，她都在和我谈她读《可兰经》的心得。我问她是不是打算入伊斯兰教，她笑着摇头，然后很平静地说：“我信佛教。”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决不是开玩笑。记得她还说：“现在我想通了，对什么都无所谓。”那种超然的表情，和多年前她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似乎是判若两人。桐乡笔会后，我收到她寄给我的厚厚一包书，其中有她的三本新著：小说《脑裂》，散文集《结庐在人境》，还有一本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我读了她的自传。在自传中，她对自己的在“文革”中的作为进行了反省，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她这样写：“写着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仿佛看着海面上漂浮着的一团泡沫，随着海水的浪头忽上忽下地起伏，一会儿清洁，一会儿浑浊；一会儿竖起一根草棒，好像小船竖起了风帆，一会儿又一明一灭，被自己撕成了碎片。原来以为已经清楚的自我形象，倒反而模糊起来。于是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在那次

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帽子’，只能借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里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了：政治媚俗。”在这本书中，她第一次详细地叙述她和闻捷之间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场摧残人性的人间悲剧。我读得很感动，也深感悲哀。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抒发的是真情。读过这本书，我相信那些曾把闻捷之死怪罪于戴厚英的人，都会改变看法。

戴厚英之死已经真相大白，想不到凶手竟是她老师的孙子，是她曾经帮助过的人，是如此愚昧的一个蠢贼。她的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划上句号，实在不可思议。而她虔信的佛，没能阻挡凶手的屠刀。据在法庭旁听了凶手的审判的朋友告诉我，凶手从戴厚英家中盗得的财物，只值人民币两百多元。这更使人唏嘘不已。她的清贫，由此也可以想见。

斯人已逝，永难复返。生命是短暂的，人人都会被死神召见，或早或迟而已。然而，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历史总是公正的。因为，能够使他们的形象留存于世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文字。戴厚英的作品，为世人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灵魂的人。这样的人，人们不会忘记。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于四步斋

梦讖——怀念戴厚英

竹林

知戴厚英遇难的消息在秋天里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没有任何预兆，一位多年不见的友人从我洞开的大门直直地闯了进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戴厚英昨天被人杀害了！”

“哪个戴厚英？”

“还有哪个啊，写《人啊，人！》的女作家戴厚英！”

“怎么——会？”

我震惊得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飘飘渺渺地，友人的话传进我的耳膜：“戴厚英昨天早上和她的侄女一块从安徽探亲回来。她的兄弟和弟媳原本住在她那里为她看家，因为她回来了，觉得比较挤，就住到别处去了。晚上七点左右，弟弟回来看看敲门不开，向楼上邻居取了一把戴厚英留在那里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发现自己的女儿和姐姐都被歹徒杀死在屋里了，现场惨不忍睹！”

我瞪着友人，思维处于一段空白的停顿，悲哀和恐惧慢慢来临。我不能想象，一位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慷慨激昂、精力充沛的鲜活生命，一位已经大彻大悟、皈依佛门的善良女子，竟会突然之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与戴厚英有很深的友情，但直接接触并不多。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神交”大于“身交”。

我第一次见到戴厚英，是在80年。那时，她还在上海作协食堂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住着。当时我的处境很糟，曾经为了一部书稿的出版，历尽了曲折与坎坷，刚到而立之年的我，心境沧桑得像个老太婆。听说戴厚英也处境不好，却强盛得如暴风雨中挺立的大树，心里便萌生了一种好奇与羡慕。于是，我就冒冒失失地上了她楼上的宿舍。想看看她是怎样生活的。

那是个大白天，将近中年时分，可不知何故她那个房间里很暗。她又抽烟，昏暗和烟雾中我连她的脸也看不清楚，只听见她热情的声音滔滔不绝，我当初的感觉是：仿佛面对着一座阴云笼压下激情奔涌的火山，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但那是善意的能量，并不杀伤人却给人一份温暖的感染、力量的支撑，她一句也未谈及自己的不幸，却把全部关注投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只是在谈到最后，她才发出一声喟然长叹：“唉，在中国，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出了名的女人更难啊！”

这句话后来被一位大红大紫的影星说出，变成了她的版本，可我最初听见的，确是戴厚英所说，如果不同的两个女子竟能悟出这么相同的人生感叹，可见这“难”字有多么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内涵。

此后，年复一年，我在乡村的一隅默默笔耕，和她没有片言只语的书信往来，但常常在报上见到她的名字，不管是挨批判还是被赞扬，我相信，她也肯定不知道我消失在何方了。

这一年的中秋节前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邢女士来到上海，她是戴厚英一套自选文集的责编，她问我能否相帮与戴厚英取得联络。

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应承下来。我通过老作家萧乾先生知道了她新居的地址电话——萧老在戴厚英的《人啊，人！》受批判之际开始与她通信，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给了她父亲般的温暖、关怀和切切实实的帮助，为她作品

的出版，工作的调动都尽了努力。在萧老创作生涯 60 年回顾展之际，戴厚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朋友萧乾》。我总觉这题目有点“老茄茄”，作为晚辈的她这样用题不甚妥当；并且文中也未对萧老一味赞扬，却剖析了他不少弱点。可后来知道萧老对此文相当满意，认为是“最了解我的朋友写的”。我终于悟到，在戴厚英透明如水的心智中，人确无高低贵贱之分。她写《我的朋友萧乾》，也写《流泪的淮河》，写她家乡许许多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正是对一切“人”的真诚之爱，使她能保持在一切“人”面前的那份洒脱，也获得许多“人”的真诚回报。

约好了时间，我陪邢女士去凉城新村戴厚英的新居。这是我第一次去戴厚英家，也是此生唯一的一次了。当时，我对这“唯一”没有一丝预感。只觉得岁月悠悠，我们有的是时间。不知为什么，在这所崭新的三居室客厅里，我依然感到不那么亮堂。在微暗的柔光中戴厚英和她的责编热烈地交谈，我则埋头于读她那本新出版的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早就听说在文革时作为“造反派”的戴厚英与她的审查对象诗人闻捷有过一段生死相恋的动人故事，她因此写成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所以我一拿到这本自传体作品就先翻到有关闻捷这一段，我一字字读下去，热泪渐渐自心底溢出……隐约听见一旁的戴厚英说，她自从写过《人啊，人！》之后，研究人、剖析人、表现人便成了她的创作中的自觉追求。她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变迁中，苦苦思索着人的价值……

听到这里，我愣了一下，感到这番话是从自己的心里掏出来的。刹那间我明白了。我们之间何以能心有灵犀的原因。她的追寻，也正是我这些年来苦苦的求索。我忽然与她有了一种亲密似家人的感觉。午饭时，我们谈起了我们共同尊敬的前辈萧乾先生。只有一个肾并且肾功能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的萧乾先生，在给我们的信中反复提到他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他好像从不忌谈死，时时把“死”挂在嘴上。对此，戴厚英发出了赞叹：“他真是把生死看透了！”我点点头：“萧老说，他走的时候，谁也不通知。”这下戴厚英愣了：“他真是这样说过吗？”我告诉她说，“有一次萧老还跟我开玩笑，说也许有一天待你出国回来，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里，门一开，发现我已不在“那可不行，我得去送他！”戴厚英忽然大叫，停了片刻她很认真地望着我说：“如果真到了那么一天，我跟你一起去北京送他，好不好？”

她这么一说，我感到这一天就在眼前似的，心里很难过，再说不别的话，只是使劲地点头。

“那好，我们说定了？”

“说定了：

我们击掌相约，这是在 1994 年中秋佳节后的第二天。两年后的中秋未到，相约之声犹然在耳，我却给她捧去了萧乾先生为她题的挽联——“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我挽厚英。”许多人赞这幅挽联写得好，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彻骨悲凉，也许只有我的体味最深刻。

去年四月初，萧乾夫妇来上海主持全国笔记丛书会议。萧老给我来信说，戴厚英是他这次来沪后最想见的人中的一个。四月五日的傍晚，我在家里招待萧乾夫妇和戴厚英。有个爱好大学的女孩自告奋勇地帮我做菜、招待客人。然而，当戴厚英推门进屋时，她却未加理会，我笑着推她一下：“你怎么啦？这位就你崇拜的作家戴厚英呀！”她这才噢呀一声恍然大悟，事后她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那天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戴厚英，她还以

为那是在嘉定乡下结识的农民朋友呢。

确实，洗尽铅华的戴厚英与以往几次见到的不大一样，她那黑黝黝的脸上没有一点脂粉，一件半旧的手织绒衫裹着瘦瘦的身躯，真是纯朴的一如农家女。特别令我不解的是她对满桌的荤菜视若不见，只肯少少地拣些素菜吃，无论怎么劝也没有用。帮我烧菜的女孩尤其惶恐：“戴老师，是我烧得不好吃吗？”

“不，不，”戴厚英见这女孩一脸无辜的样子，似觉于心不忍，“你烧得很好，可我现在吃素了。”

“你吃素了？”

一桌的人，除了萧乾先生见怪不怪，始终如弥勒佛般地笑着以外，大家都惊讶地望着戴厚英。

“我吃素是因为我信佛了。”戴厚英轻轻地说。

“为什么？”我还是不解。真的，茫茫人海，芸芸众生，还有谁比戴厚英更是性情中人啊！她怎么会突然一本正经地信起佛来了？难道她放弃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忘记了以天下为已任的雄心？难道她沸腾的血液已经完全冷却、平静，能日日孤守青灯、诵经念佛了？

对于我的疑惑，戴厚英给了我一个恬淡宁静的微笑：“你知道，探索人生、人性和人的命运，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孜孜以求的，可我始终未悟出它的真谛。我在许多事情上为自己感到委屈，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不能走出个人恩怨的圈子——这影响了我写《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下篇，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具备应有的思想高度来驾驭这段历史，最后我研读了大量的佛教书籍以后，突然有一种云开日出之感，人要是能把个人的一点利害抛开，把眼光放远，那就没什么想不开的了，从这点来说，佛教是伟大的，远比现在名利场上的许多理论深刻得多……”

戴厚英还从腕上取下一串佛珠给我们看，说这是从西藏带来的，会有热乎乎的气冒出来。大家听了都伸手来试，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只有萧乾先生抿嘴直笑，埋头吃他的菜。聪明的戴厚英显然知道我们对她的佛珠不虔诚，收起来戴好，忽然说起了她的梦。她说她做梦非常灵验。凡亲人有难她都能事先梦见。有段时间她反复做一个同样的梦。她梦见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群奇特的山峰之间，山与山相隔不远，但又互不相连，只是群山之间有一座主峰，朦朦胧胧的地，她感到主峰上有座佛像，佛像的肚子里又有一座佛殿。她像一个朝圣的香客，怀着热切的期望朝主峰奔去，可一旦接近，却又惊恐交加，躲之不及，好象等待她的是一场对异教徒的审判……梦就在这时候醒来了。

“既然‘佛’要审判你，那你怎么还信呢？”我傻乎乎地问。

戴厚英没有回答，却又说起了她做的另一个梦。她说她曾梦见和所有死去的亲人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她那死去已三十年的祖父坐在主位上，说她的妹妹正在受追捕。她妹妹也死去二十多年了，可祖父这么一说，她依然为妹妹焦急，好像真看到了妹妹在东躲西藏，但祖父却毫不在意地说：“她跑不掉的。”话音刚落，一张报纸传到她手里，报纸上登着妹妹被捕获的消息，还赫然印着妹妹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半身的，妹妹的头很大，但颈骨已被折断，所以头歪在肩上，祖父拿起报纸说：“这个样子拍照说明已经判了死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依然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戴厚英犹豫了一下说：“也许我会大难临头吧。”

“你可不要瞎说，这不过是一个梦呀！”我一面安慰他，一面感到毛骨悚然。

“我的梦都是很很灵验的。”她再一次强调说。我把目光转向德高望重的萧老，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您说戴老师她太过虑了吧！”

不料他老人家干脆摇摇头：“我从来不做梦。”见我一脸愕然，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也从来不信命。”

这样坚决和严肃的口气，却是对戴厚英含而不露的宽慰。我知趣地闭了嘴，可萧乾的“朋友”戴厚英，却不那么领情。她说她信命，也信梦。她还说她曾请朋友为她分析过从前的一个梦。朋友告诉她，她在梦境中的所见所感，是她的一种潜意识的想象和创造——把自己对于命运的思考作了形象，往往人感到不能掌握命运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宗教情绪，由于她自幼接触的是佛教，所以就不自觉地把命运与佛教联系在一起了。她在梦中奔向主峰时的热切与虔诚，表明了她对命运之神的期望，而后来的恐惧，则说明她终于看到了命运的真谛。说话时，戴厚英脸上所显现的，依然是无畏的自信。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戴厚英。从那以后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每次所谈的内容，都是有关佛。她告诉我她去哪里烧香，去哪里结缘，又去拜见了哪位高僧，研读了多少经书。她现在不但吃素，而且每天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坐禅入静，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忘我无我的境界中体会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

看来戴厚英的生命犹如一团火焰，在狂烈的燃烧后已趋宁静，再也不会灼伤别人，也不会被别人烧伤了。然而天理何昭——她竟是这样的被“人”所害啊！

我听说戴厚英这些年做了许多善事。她为受灾的家乡慷慨解囊，为自己众多的亲属作无私的奉献。为了培养出生在农村的侄女，将她接到自己的身边来读书，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最近，戴厚英还捐了一笔钱给佛教事业……我不明白，佛为什么不保佑她？这究竟是佛的疏忽，还是佛道的虚妄？

据说，佛主释迦牟尼是认识了世界而又无意改变世界的；而戴厚英的那些梦，也正是她自己的命运，却又不改变它！

然而，这仅仅是佛的信条。而梦究竟是人以往生命历程的组合和重现，还是未来命运的先验？这个问题也许值得人类为之永远地研究、探索和追寻。我想，戴厚英始终在潜意识中企图摆脱和拒绝梦中命运的控制。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她未能冲破命运的罗网。但是，不管怎么说，戴厚英的一生，是她与命运抗争的一生，是她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的一生；她的成绩是辉煌的，她的胸怀是坦诚的，她没能辜负此生，虽然还有遗愿未完成，还有遗憾留人间：她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让我用与她告时赠她的挽联来结束此文吧：

胸怀如镜爱憎如镜镜照人心心存憾
世事如梦人生如梦梦成诚言言难尽
安息吧，我的朋友戴厚英！

她在远处皱眉而笑

柯文辉

有些亲近的人去世使我们泪雨滂沱，几年之后，音容即被淡化；也有交往甚少的朋辈，辞世噩耗来时，至多鼻腔一酸，泪潮在泪囊中挣扎却不能涌出，为时愈久，形象愈凸出。自惭不懂心理学，即或“生死见惯浑无泪”的老境迫近，对上述反差仍无力求得甚解，总不免惘恨。

和我相识于七十年代末的戴厚英君显然属于后者，仅是普通熟人，算不上知友诤友畏友，从报上得知她被害的消息时，前思后想都难信以为真，眼睛灼痛而无泪……

善良会杀人么？我不信！

尽管她是真的死了，死得那么悲惨！一些小小往事被我记起。

初晤戴先生是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第一宿舍，朱东润老师家堆满书籍的小楼上。老师打了电话请她来坐一会儿。我生于安庆。她从小住在颖上，1951年春天那儿还不通汽车，我由阜阳步行120华里，从西十里铺数到六十里铺，又自东六十里铺倒数到东十里铺进入城关，匆匆看过魁星阁的建筑，次日赶到后来易名“淮上公园”的尤家花园，树荫蔽天，琪花瑶草错落路旁，客厅里大总统之流的题匾油染剥落，条架上的古书和几叠唱片已经蒙尘。我的任务是去发动乡亲们植树，有了昔日热火朝天的一段生活，同乡见面，绝不拘谨。

朱老师兴致勃勃地谈起我为成年人写的童话诗剧《雄鹰之死》。老师用夸张的江苏普通话念出一段台词，善意地揶揄我说：“此剧若被一位倒霉的大导演搬上舞台，连我和小戴在内，用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卖十二张票。其中还包括演员们的亲属！”

“朱老师！我对您写的《张居正大传》佩服得五体投地。老柯说此书是‘五四’以来传记文学之冠，不错！但今天斗胆要说句反调，若演《雄鹰之死》，会有上千或几千观众去看，说不定年轻人还会鼓掌。只卖一打票未免悲观！”她掏出手帕擦着眼镜。

朱老师纵声大笑，要为我们泡茶，被她拦住。看来她是熟客，不一会儿三杯清茶放到长几上。她说：“这几十年把曾国藩批得极臭，曾有该批的地方。他的文艺思想是怎么回事？请老师给我们两个学生上一课。因为您老人在五十年代末就写出过很大胆很客观的文章！”

老师取出一本札记。上面是曾国藩论点摘要，娓娓道来，了如指掌，后来还引证诗人黄遵宪阻止梁启超为曾作传的信，翔实，全面。戴先生逐条记在稿纸上，井井有条，显示出严谨与专师。

几个月后，《人啊，人！》出版，我去朱宅。老人打电话或谈心，都用书名代替对她的称呼：“‘人啊，人！’！老柯来了，带两本新书过来！”

但她只携来一册，双手呈送给我：“多多批评！”

“我的一本呢？”

“老师要写的书太多，拿拙劣的习作来浪费老人家的光阴有罪，原谅学生不听话！”她连连鞠躬。

每回告辞，朱老师都要送我到半里之外，看着我乘上公共汽车离开才缓步归去。这回却破例说：“‘人啊，人！’我感冒，请你代劳送客人！”

“应该，遵命！”

“等你到八十多岁，肯定著作等身。要注意休息，莫累垮了。我没有才气，太平庸！你要胜过我十倍！”老师目光深沉，眼角鱼尾纹上跃动不停，长者的爱护溢于言表。

“学生哪配跟您并论！我只有一丁点愚鲁的小聪明，在疾迷心窍的年月，也幻想拼凑几条语录批倒师长和古人，伤过老前辈的心。老人们不计较，我可没忘记自己有多么可笑，可怜！悔之晚矣！教训惨重！每当半夜醒来就难再入梦，流过好些泪水，恨过自己……”

“人啊——人！”老师把第二个人字拖得很长竖起姆指说：“对自身开刀要大智大勇！孩子！人不是神，我讨厌人扮演的神！有缺陷能反思才是‘人啊——人’！觉醒的人碰到的艰难更多，思想上要有所准备。我太糊涂，到七十多岁还没有你现在明白。你到八十岁会有一、两本高出同时代人的大书，那多么好啊！”

“我怕活不到那么大，内伤太重，又爱生气好胜……”

“会活到的，我打包票！到那天，我的骨灰被树吸收，站在路边看着你们……”先生有点恍然，笑声中似乎掩饰着什么，或许是深心的寂寞吧……

她的思维比我快两三拍，比当代批评家们快半拍。今天看来，《诗人之死》，笔力还嫌稚弱，真情流行，非常投入，艺术形象中有她的面影。《人啊，人！》开头赵振环破浪追逐小姑娘的镜头，是作者追逐希望的诗意再现，谁料不曾伤害父老姐妹的小说惹来几阵微澜，虽未见到传诵千古的批评佳作，具体感受又使作者困惑，手足彷徨、孤独、委屈，今天置身事外事后的人们会笑她自扰，实则未必有这样权利。能预见明天的人太少，苛求何益。当慢半拍的人们加快一拍时，一切云散烟消。

在她压抑的半年中，我们共同的友人左泥和夫人给予她诚挚的友谊。左兄心底洋溢着尘世沧桑中冲刷不去的童真。没有当上戴先生两部书的接生员，他对作家与读者都有自责的心情。左夫人做的家常菜清爽可口，我陪在未座，静听老左安慰女作家。她说到自己审美的心理流程，还小饮了两杯酒，空气轻松，她的眼光柔和洒脱，“我去广东一所新建的大学讲课，投资者兴建的六七十套单元房，被新提升的中层行政干部一夜间分光，教授教师们仍住招待所，上课也没劲。我就劝他们对学生负责，传授好知识。次日投资者来校遇上了我，我动员他再盖七十套，保证不再让新干部们分光，投资者照办。现在新宿舍盖齐，教师们搬入了新居。如果不是开放，我说公道话不怕报复吗？”她双颊漾出桃红，莫明其妙地联想到一张古画《病树醉春面》，她是伤残不太严重的树，到鸟啼花开，草青如毯，她也昂头迎接春光，好抖落肩头冬的余寒……

“有左泥和王美仙这样的朋友，吃一顿饭，比出书更高兴！使我对扰扰攘攘的人世间享到暖流，也算幸福，我知足啊！”她忽然对我讲起颖上话：“死也无憾了！”

“不！朱老师说你八十之后还有大作为呢！”

“那太远，难熬得到……”

大约是84年初秋，我与她又在上海美术馆邂逅，迎面走来一位皖籍画家，我们都相识，便联袂步行到南京西路去吃西餐。饭店内几乎没有其它顾客，空空的大厅成了我们三人的“超级包间”。

画家当时为海上闻人，住在申江饭店，宾客川流不息，其画鲜艳，驰名港台。他的开场白是：

“大哥！大姐！但白从宽：小弟是地地道道的骗子！在画室里搞制作来骗自己；在社会上搞运作借官商朦胧关系发点小财，即是骗人。你们明白：真关系没有，真衙内真小老板都不买我的帐。”

“不！”戴先生说：“你是好汉一条，‘四人帮’关你，打你，斗你，你没有咬任何人。我很敬重你！要是我就挺不过来，不自杀就发疯，也没准儿会写两张鸡毛蒜皮的大字报揭发朋友过关，朋友不会计较……”她是由衷之言，说完还敬酒一杯。

画家摇摇长发，默然良久说：“我不够格，敬您，您是最服气的作家，老柯！不怕你听了光火，你比她差得太远！远得像隔条大河握手……”

“就算比老柯强一点，在世界文学史上算老几！他没有写小说，没有勇气……”她豪迈地喝了。接着又说出一串对画家的颂辞。

我极少开口，不是感到被冷落，自知写作、制作、运作都外行，完全服输。只是画家身上有我厌烦的气息，失去了兴味。分别之后有如释重负之感。

中秋佳节在我的心中没有位置，平时吃点好菜便算过节，节日反而比别人多。也是巧合，我在这天乘火车回合肥，她到颖上，在蚌埠转车，车票是托画家在申江饭店订的，这样有了一次长谈的机会。

“你对画家太冷漠！”她批评我。

“你对他不了解！我为他悲哀……”

“你太迂执，他首先是好汉！”

“英雄人物也需要接受再教育要不断更新思想与业绩，否则会降格落伍！你对他评价太高！未免糊涂！”

“不糊涂！他面对你我坦率如孩子；见了高位者大款则媚态如猫；见了别人吹牛拍马又嫉恶如仇，破口痛斥。他把自己塑造成这样是主动选择，你生那门子穷气？太没度量！若干年后，右手拿笔左手拍马的能人比他更浅倨，更少道义负担。这是历史、环境、个性结合而使之然……我看得太清楚！”

“不对！这种生存方式导致人格分裂，唯名利是图，不到十年会被正气所淘汰！”

“你真愚蠢！淘汰得了！十年一晃便过去，跟你抬杠不如对牛弹琴，十年后你才五十多岁，可以让实践来检验你的预言……如若你对了，我请客，花上半本书的稿酬也甘心。如果你输了呢？”

“十年太短，十五年后不死再看看吧！”我的语气软化“天翻地覆人如蚁，助人为乐即英雄。”看你的诗似乎明白，其实欠通脱，跟你说不清，换个题目吧。”

“往后想写什么！”

“故土风情画，普通小人物的善和美。”

“顺利吧？”

“不顺利。”

“小人物就没有阴暗面？没有，如何产生立体感？”

“我也写了负面不美的东西，但只当味精使用，没有完全按照生活现实中人的弱点去正视。与其说是粉饰，不如说是自我安慰的需要。于是陷入矛盾：镀金虽薄也失真；存真就不理想化，为几个人物品质美而使全书失去艺术美。难！我对好些人失望，才奉劳动者，农民为地上的神，再幻灭就没有心灵支柱。”

“遇着困难可以停笔歇口气。”

“你可以不写，因为写作欲不强烈。我以教书养身体，写作养灵魂，爬坡中一再倒退，仍要坚持着爬上去。”

“你的小说太写实，如繁笔素描，属西画体系。何妨按祖宗讨论画论，来此写意手法！当教授总是学者，比老知青小右派分子的书卷底子厚得多。巴乌斯托夫斯基书斋里的功夫超出同辈作家，作品偶有斧痕，生活气息欠浓，也是大手笔。你有潜力，对‘两作’画家的透视比我预料的高明。除掉曹雪芹，古典小说家对市井文化的吸收，都很勤奋，可惜包括吴敬梓，都没有与文人画的文化传统有自觉联系，作出主动决择。你有条件，请三思！如果你恼火，我不再饶舌。”

“能写篇文章批批我的小说么？”

“我写不好论文。对文学只读不议，三十多年如一日。因为太爱它了？”

“你不觉得可恨，甚至害羞么？只进不出是自私！要勤快些，不要东跑西颠用打杂逃避自己。做一两件中等工程，办不到莫要再来见老乡：”她的语气倔犟、自信，有点咄咄训人的味道，反映出当教师诲人不倦的职业特征。冷场片刻，为了缓和气氛，一个独特的微笑把她的脸切成两半？双眉半锁，额上密集着岁华与沉思刻上的浅纹，目光忧郁，略带感伤，是紫调子画成的工笔重彩；下半张脸很亮，反射着钻进车窗的阳光，是儿童的单纯。为时短暂的欢欣，学生本色，一丝儿村姑的质朴背后，透出少许骄傲的得意。两个半球合成人生的矛盾与矛盾的人生，在书中书外给读者们苦涩的甜味，正是这皱眉而笑昨天和今天握手，生与死握手，书中人与书外人握手，美与丑，不朽与腐朽，思维与现实，地球与太阳，太阳与群星都在握手，我找不到被我久久淡忘的小星，站在远处的戴厚英君，只有这些零断无章的杂忆。

戴先生，我要告罪；写完此文，真的要忘却你，我的老乡！若你有灵，我将说你不会被后代忘却，真的！虽然我无评论你著作的本领。您去之后，南京东路的灯火依旧辉煌，复旦校园里还有书声琅琅。除开海外归来的女儿，谁在人流中，在寂静的窄窄的马路上，寻找你皱眉而笑的面容？

西天又多一尊佛——悼念戴厚英

徐瑛

敢说，在当代作家中，没有谁比戴厚英更注重梦的了。她对梦的感悟、解析，简直达到了专家的水平。近两年和戴厚英见面，她总是津津乐道地谈梦。

她说，梦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特殊思维，而且是神奇的、创造性的思维；

她说，有一类梦是亲人间的心灵感应；

她说，有一类梦具有相当的预见性；

她说，梦中还有清醒时没有想到过的深刻哲理；

她说，梦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梦的心灵感应和预见性之说，戴厚英曾给我讲过很多事例。她说，她小弟的死、三妹的死、侄儿、父亲的死，她都曾在梦中有过预感、先兆，而后来都被验证了。

她说，梦的创造性无比神奇，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受梦的启示而酝酿创作的，譬如长篇小说《脑裂》。有一次，她在梦中看到自己的脑子无缘无故地裂成两半，像被斧头劈开的西瓜。

我至今未读到《脑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把这个可怕的凶梦作为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命题。如果她在这部书出版之前给我讲述这个故事，作为朋友，我会坚决劝她舍弃这个极不吉祥的书名。我知道，即使如此，戴厚英也依然我行我素。在我与她的结识中，大凡她自己认定的事，没有一件因我或其他朋友的善意劝解而能改变她的思维定式。她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坚强的女人，有谁能改变她的行为轨迹呢？

戴厚英啊戴厚英，这个可怕的、隐藏着血光之灾的凶梦。难道就是你的心灵感应？这个不吉祥的书名《脑裂》，难道就预示着五十八年坎坷人主道路的终结？

中国文坛及其一切善良的人们，当记住这个黑色的日子——公元 1996 年 8 月 25 日。

8 月 27 日晚上，我坐在客厅里沙发上刚刚看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8 月 25 日戴厚英与她的侄女戴慧在上海家中遇难身亡！我如雷击顶，惊愣了片刻，忍禁不住对着话筒大声否定：“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一定是谣传！”朋友沉默了一下，声音沉痛地说：“老徐你听我说，这个消息非常可靠，上海公安人员也已来阜阳侦察线索...”

我还是不相信这个残酷的消息，放下电话，木呆地坐在沙发上，妻子问我话，我所答非所问地嘟囔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妻子关掉电视，提醒我打电话再向别处问问。我怎么没想到直拨戴厚英上海住宅的电话？我一边捺信号盘上的键钮，一边还想着当戴厚英接电话时如何跟她开个玩笑。信号通了，但没人接话。我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等了几分钟依然空无应声。我想她一定是晚上有事外出还未回家。我根本不相信也不愿联想到那个“死”字。

这天夜里，我与妻都寝不安枕。我希望从多方面否定传来的噩讯。

大约是 8 月 12 日那天，正是这位朋友约我去南照集看望戴厚英。十数年来，这几乎是我们与戴厚英交往的惯例：每年寒暑假她从上海回南照探亲期间，我们都要聚会一两次，或我们去南照，或她来阜阳。近几年戴厚英即便

来阜阳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只是与少数几位同学，朋友见面叙谈。这天中午，戴厚英在镇上一家餐馆招待我们。席间，戴厚英问及文学讲习班的筹备情况。去年春节期间，我曾告诉她阜阳市作家协会计划办个文学讲习班，并约定请她讲课。我告诉她因房子、经费问题延了时间，现在已有些眉目，正在筹备。戴厚英说为了减轻你们经费方面的负担，我不要任何报酬，但每天晚上我必须回南照住宿。我笑道，你是出名的大孝子，这样既成全你陪伴老母的一片孝心，我们又节省了房间费，何乐而不为？我记不清戴厚英为阜阳的文学青年讲过多少次课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她从未收过一次讲课费。

中午，朋友们欢聚一堂，戴厚英非常高兴，举起满满一杯酒跟大家碰杯。近几年很少见她这样喝酒。岂料，这竟是她告别亲友告别文坛，告别人生的最后一杯酒！

28日早晨6点钟我又拨通了戴厚英家的电话。信号足足响了5分钟，依然听不到那熟悉的回声。一个我极力想否认的事实告诉我：戴厚英恐怕凶多吉少……

我立刻又拨通了戴厚泉的电话——

“徐大哥我……我跟你说实话，二姐跟我女儿慧慧……出事了……25日下午……在家里……”

戴厚泉说那天他也在上海，出事后当即为公安人员引路回南照查找线索。公安人员嘱咐消息不要外传……

下午，我独自离开家门，默默向郊外走去。秋天了，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人生58岁，不正是这个季节吗？熬过了严冬，沐浴了春风，度过了酷暑，不就是等待着收获的秋天吗？然而，戴厚英却在这样的季节倒下了。

而且是倒在暴徒的刀下，倒在血泊之中……

1984年10月——金色的中秋。阜阳地区文联与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第四届淮河乡土文学笔会。笔会筹备组拟定从上海请几位作家到会讲学。戴厚英当然“榜上有名”。

笔会期间，我因忙于繁杂的会务，一直抽不出时间与她交谈。在亳州中秋晚会那天，戴厚英跳了一曲舞后，约我到她的房间去坐坐。她说，“最近读到你两篇小说，写得很真实，你不如辞去地区文联副主席的职务集中精力创作，你会写出好作品的。”她说她正在写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的长篇（即《空中的足音》）；之后想写写苦难的淮河。“不过我还要补充些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专程回来采访。你如果有时间，希望到时能陪陪我。”

第二年春天，戴厚英如期回家乡采访。我陪她在阜阳、太和、亳州、涡阳走访了很多人。其中有当年任县长时冲破封锁、躲在厕所里向中央调查组反映浮夸风、共产风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行署副专员；有1960年为了不使数百名职工饿死而胆大妄为拦车借粮、后被开除党籍、公职（采访时已恢复党籍公职）的某地质勘探大队的大队长，有廉洁自律、铁面无私的纪检书记。走访了许许多多农民和乡村干部。采访期间，还参观了一些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为期10天的采访活动遵照戴厚英的要求不住高级房间，不让公家宴请，大都在朋友家里就餐。在由涡阳返回阜阳的火车上，戴厚英高兴地说这次采访太有意义了，收获太大了。并约定有机会再去沿淮几个县走走。这次采访的素材大都反映在《流泪的淮河》一书中。后来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后，戴厚英送了一本给我。并说请你认真看看在内容上

有什么“犯忌”的地方没有。我读后坦率地告诉她，就内容而言，绝无“越轨”之处。对于浮夸风、共产风给淮北人民带来的大灾大难，似乎写得还很不不到位。我以为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文学性不强，过于平直，不如前两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书。戴厚英解释说：“这是一本描写淮河流域农民命运的书，初衷是想写得朴实一点，改变一下过去的写作风格。如果说写得不理想，也可能是我对农民终归没有对知识分子熟捻的缘故。我虽然出身于农村集镇，进上海读大学、工作后，毕竟距农民远了，所以我每年都要回来住一段时间，防止‘变修’啊。”

四

是的，责任和义务使戴厚英本应很轻松舒适的生活变得无比沉重。戴厚英生活俭朴，她把节省下来的钱接济生活困难的亲朋。她为家住蚌埠的姐姐买下一套住房，为弟弟添制家具，资助侄女、侄子上学。一些并不相识的家乡人跑到上海打工、拾荒，只要有求于她，她总是尽力给予关照（岂料善良之心却导致杀身之祸——凶犯陶峰是戴厚英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受老师之托，陶峰在上海期间，戴厚英曾给予帮助。）1991年淮河流域大水成灾之后，戴厚英为帮助家乡人民度过难关，重建家园，她不仅捐款捐物，还自费陪同香港《文汇报》的记者深入灾区采访。她写了几十篇文章，通过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介绍家乡的灾情，激发人们的良知，开展募捐活动，对全区、乃至全省的抗洪救灾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戴厚英还将在采访中了解到的违法乱纪现象，如实地反映给当地党委、政府，使问题得到及时查处，挽回社会影响。

采访期间，戴厚英的赤子之心再次遭到个别“左”先生的非议和误解。为了扩大“抗洪救灾”的宣传效果，以取得海内外更多人的捐助，她与记者杨先生在某县采访时，曾提出复制一盘纪录灾区实况的录相带。当地宣传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却冷言相告：我们不需要用阴暗面来乞讨、换取外国人的援助！戴厚英犹如劈头浇了一桶凉水，感到彻骨的寒冷。

戴厚英情系家乡，非常关心家乡青少年的成长。她曾计划将来在家乡办所实验学校，增强对学生科普、生产技能知识的教育，改变目前学校单纯追求升学率、死读教科书的现象。她曾告诉我台湾有一位朋友愿意资助一部分办学经费。为此，她曾考察了几个民办学校，请我帮她考虑计划，参与筹备工作。

作为作家，戴厚英关心家乡的文学事业。我们每次请她讲学，她总是有求必应。她经常热情接待慕名拜访她的文学作者，了解他们的写作和生活状况，戴厚英曾说，将来她退休后一半时间住在上海，一半时间住在家乡。那时以阜阳市文联为依托办个文学讲习班，她可以系统的为文学青年讲讲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至关重要，现在一些青年作家急功近利，舍不得花时间读点理论书，将来要吃亏的。然而，戴厚英这些美好的计划都被一双凶残的手折断了，永远不能实现了。

她在西方一些国家讲学、访问期间，大凡遇到西方人有辱中华民族尊严的言行，即使是她的朋友，她也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她对少数的所谓文人学者在国外洋人面前的奴颜婢骨，甚为深恶痛绝。戴厚英的女儿、女婿、外孙在美国都取得了“绿卡”，但她宁愿饱受骨肉分离的孤苦，也不愿移居美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戴厚英许久与我未通音讯。1990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她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徐瑛兄，这是我来美国后给大陆朋友的第

一封信。我好想好想家啊……我现在深刻感到我的根扎在中国的泥土里，无论这块土地贫瘠或肥沃，我都离不开它，离开它我就会枯死的……。”不久，戴厚英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徐瑛我回来了！明天就回阜阳，劳驾到火车站接我，一定啊！”戴厚英又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其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戴厚英心胸坦荡，表里如一，绝不文过饰非。她跟我谈到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从不掩饰和辩解自己犯过的错误。她最瞧不起“文革”期间那种对“四人帮”唯恐紧跟不及、尔后又把自己打扮成一直反“左”的“英雄”。她非常敬佩巴金老人勇于反思、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戴厚英淡泊名利，常常嘲笑、讥讽文艺界某些人为争职权、名位而明争暗斗的丑陋现象。她是作家，却又把自己置身于文艺圈子之外，她怕搅进文艺圈子里的是是非非。她曾多次拒绝报刊、电视台的采访，她给自己立下规矩：永远不出风头。她不愿见官，却很会与平民百姓相处。她的文品和人品，正如老作家萧乾先生献给她的挽联上所写：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五

“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戴厚英撰文批判过人道主义，批判过人性论。当她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经过反思之后，她毅然走出迷雾，摆脱“左”的束缚。之后，她的每一部作品字里行间无不蕴含着人道、人性的主题意识。但是人道只能对人而言，而不能对衣冠禽兽而言。人性只能依附于人的心灵，而不能依附于人面兽心的躯壳。因此，为了捍卫人性、人道，一切善良的人们还要高高举起法律的武器，对一切残无人性的不法歹徒，该杀则杀，丝毫不能心慈手软：

最近几年，戴厚英对佛学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仅研读了许多佛家经文论著，每天清晨，还诵经打坐，俨然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的模样。她说，她的功课已经达到静止思维的境界。戴厚英走了，静静地盘坐于一团如烟如雾如花的祥云，飘飘然飞向西天佛祖居住的圣地……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于阜阳

戴厚英的乡情

姚登恒

1984年春天，一位朋友推荐我看《诗人之死》。

书写中的故事发生在文革中的上海，而文革时我正在上海读书，因而这本书描写的许多情景如同亲历，当时虽然揭露文革恶果的“伤痕文学”，比比皆是，但象《诗人之死》那样以高层次名人为原型的还不多，读后使人感到沉重压抑。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戴厚英”这个名字，并且知道了她就是从阜阳地区的颍上县南照集走出去的一位作家。以后又见到她的另一本小说《人啊，人！》，我就赶快买了一本。那时根本没想过能见戴厚英，我觉得读者和作家之间距离太大了，太遥远了。

但是一年之后，却很轻易地见到了戴厚英。那年秋天，由阜阳地区文联主办淮河笔会，全省的文学大家会集阜阳，全国知名的作家也来了几位，其中一位就是戴厚英。笔会期间阜阳一中请她回母校讲学，因为我也是阜阳一中的毕业生，当时又是分管教育的宣传部副部长，所以确定由我陪同她去一中，并在她讲学之后作一番评价性讲话，那天我们都赢得了可能是各自在公开演说场合中最多的掌声。一旦有了交往，我便发现，她除在讲台上，或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时使人觉得有些神圣和神秘之外，其实是一个很普通、很随和的人。她每年回家都路过阜阳，下了火车就自己背着行李，坐上“嘭嘭嘭”，到朋友或同学家里，不愿接受公家招待；她从未穿过单价在百元以上的衣服；她从不摆名作家的架子，哪怕一个无业文学青年都可以找她谈上一番。她又非常直率和坦诚，即使对最好的朋友，她也决不会奉承你一句，在交谈中她也不会附和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我还发现，她是个感情丰富而外露的人，在她的感情中，表现最多的是她的乡情。我从未发现哪一个人象戴厚英那样一往情深地爱着家乡，有些人虽然终生跳不出家乡的圈子，却偏要撒几句南腔北调表示自己染上点洋气。戴厚英却不然，尽管她早已离开了家乡，成了才甚至成了大才；但她从不嫌弃淮河，从不嫌弃那块生她养她的地方。她从不标榜自己是上海人，即使在上海，她也到处讲自己是阜阳人，是领上人。她有一位同事长时间不回家乡看看，她就向那个同事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今年再不回家，我就宣布不承认你是颍上人了”，那位同事还真的就回家一趟。她自己则每年都要挤出不短的时间回到家，闭门不出，尽一个女儿的孝道，侍奉父母于堂前。她连家乡送葬的队伍吹唢呐都听得十分仔细，说那曲调有悲哀，但更多的是喜庆，那队伍也是认真而且投入，使人听了仿佛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领悟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红白都是喜事的道理。她的女儿在南照集读完小学，转到上海读中学，阜阳在小学期间不设英语课，而上海则在小学时就开设英语，她女儿自然跟不上班。别人劝她让女儿留级，她却回答：“我不能给女儿输入一种意识，似乎从淮北来的就低人一等”！她的女儿竟然很快赶上了中学的课，以后又以优异的成绩出国留学。她要求自己的亲友中当了基层干部的，绝不要染上不正之风，要对得起父老乡亲。她厉言正色地对同学校友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讲：“你们哪个人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我就要写文章骂你们！”她对阜阳地区1960年发生的灾害耿耿于怀，认为应该把这件事重重地写下一笔，留给后人作为前车之鉴，避免再发生这类事情。为此她在淮河笔会几年后，又独自专门回到家乡采访，终于写成长篇小说《流泪的淮河》。1991年夏天，阜阳遭受到特大水灾，引起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视。就在灾情最重的时候，戴厚英陪同香港《文汇报》驻上海办事处记者姚欣保来到阜阳，姚欣保的主要任务是采访，戴厚英则一是为他当向导，二是为阜阳募集捐款。她从上海到合肥，苦口婆心，入户到人，利用她的影响和关系，为阜阳募集了一批相当可观的捐款。在阜阳住了几天，她又和姚欣保到颖上、阜南的行蓄洪区活动了好几天。之后我才得知上海大学不给她报销差旅费，她是自费出差为家乡救灾奔波。如果她把自己的差旅费作为个人捐款，也会在报上留个名字，她却不这样做，宁肯自己花钱，奔波，换取更多但以别人姓名出现的捐赠。她对家乡爱得何等深沉，奉献得多么彻底呀！救灾中还有一件事，在世界许多国家慷慨捐赠时，美国政府向中国捐了二万五千美元。戴厚英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只身闯进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美国总领事万乐山提出严厉抗议和批评：“你们美国打着人权，人道的旗号，对中国的特大水灾却只作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捐赠。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行为，你们的‘民主’、‘人权’怎么能得到信任呢？”后来万乐山真的到阜阳灾区来了一趟，以后美国真的又以国防部的名义捐赠了价值十二万五千美元的救灾物品。我不敢断言这就是戴厚英的功劳，但这和她的努力有一定关系，恐怕不会过份吧。

如果说戴厚英在国内时，把阜阳，颖上当作家乡，那么她离开祖国以后就把整个中国当作家乡，她像热爱家乡一样热爱着自己的祖国。救灾以后一两年，她曾到美国居住一段时间，看望正在那里留学的女儿。许多人认为她可能一去不复还，她却很快回来了，回国以后又回家乡讲了一次学。她讲到自己到美国时，一下飞机就发现美国海关对西欧人、美洲人的检查只是作作样子，马虎草率，唯独对中国人和刚刚解体的苏联人检查时特别仔细，查看了证件不够，还要查担保人，有了担保人填的表格不行，还要电话找到担保人证实核准，生怕中国人到美国当移民，赖着不走。她说：美国的确非常富有，但他们的富有绝不会允许别国人民去分享。我们中国人只有自己争气，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能在世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虽然她可以在美国得到绿卡，可以得到相当于国内工资数十倍、百倍的收入，但还是放弃这一切，回到国内，那是她养她的地方，那是实现自己理想，发展自己事业的地方。她的演讲，使我的心为之一震。我们一些挂党员招牌，身居高位的人，在爱国这方面，能和戴厚英相比吗？

戴厚英也有遗憾和困惑，那就是她的这一腔浓浓的乡情并不总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她来阜阳的几次讲学，有人还想查查是不是有违背原则的越轨言论，甚至为家乡募捐救灾有人也怀疑是不是想搜集阴暗面，帮助海外舆论。近几年来，家乡出去打工的人日益增多，这中间绝大多数是正直本分的劳动者，但也夹杂着少数好逸恶劳，自私自利，没有气节，素质低下的人。戴厚英多次很痛苦地讲到，她住的院子里就经常有一些老乡并非生活无着，却去乞讨，有的为了唤起同情，还要加上一句“俺是安徽阜阳的”。戴厚英说，每听到这种声音，都觉得那些人仿佛就是自己，羞愧得恨无地缝可钻。她渴望着家乡能尽快富裕起来，渴望着家乡人能 and 发达地区的人一样挺起胸来，抬起头来。她对遇到困难有求于她的人总是尽力给予帮助。她没想到，要改变家乡的面貌，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办到的。她更不会想到，在她尽力帮助过的人中，还有陶峰那类的社会败类。竟然见财起意，恩将仇报，以致残忍地杀害了她和她的侄女，乡情和她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开得太残酷，太离奇。现在该是家乡人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时候了：我们何颜见戴厚英的在

天之灵呢？

戴厚英就这样去了，永远地去了。她给家乡一颗赤子之心，女儿之情，家乡给她一个空前悲剧，弥天之恨。但是陶峰终究不能代表家乡。我们衷心地期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阜阳能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在经济振兴的同时，精神文明也能同步发展，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能创造出一代新人，并能再培育一个、几个戴厚英来，这才是对戴厚英最好的纪念。戴厚英，安息吧！

怀念戴厚英 南丁

面对你遇害的消息发愣。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敢想象那情景。

飞来横祸！横祸为什么要降临到你这有着一颗真诚善良美丽心灵的女子头上，这太不公平。

1981年冬天的广州多么温暖啊。我们同在一个别墅写作，后来又陆续来了谌容和叶蔚林，我们都是花城出版社邀请来的客人。就是在那里，我们成了朋友。你是在少女时就离开家乡安徽颖上去上海读大学，后来又长期留在上海工作，我还是从你的普通话里听到了乡音。没有见到你之前，我就从你的《人啊，人！》和《诗人之死》中结识了你，见到你，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我就特别地欣喜，有种特别亲切特别骄傲的感觉。你比我的小妹还要年轻五岁，我就叫你小戴。你是1938年出生，我就开玩笑说你是“三八式老干部”，就叫你“三八式”。不论叫你小戴或是三八式，你都高兴地答应。你原来住在前楼，因你住的房间里修理什么，也就搬到后院来，与住在后院的我们成了邻居。你搬动时，正在头晕，大约是写《空中的足音》写得太劳累了。我帮你扛着那捆有相当重量的书。我很乐意帮忙，觉得是在帮我的家乡小妹。成了邻居后，就更多走动，晚间休息时，你有时到我的房间小坐，抽支香烟喝杯清茶说一会儿话。我感觉你是将我当作家乡兄长信任着，这感觉非常好。你向我述说你的处境你的心情，我就知道了你的孤独你的忧郁。你向我说起你正在大学读自然科学的女儿，你说要送女儿去美国留学深造，我就读到了你做为一个母亲的爱心。但你从未提及过那传说中的你在年轻时与诗人的那段传奇式的恋情。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你刻骨铭心地珍藏着，那是烙印在你灵魂上的与你灵魂同在的难忘伤痛。我也从来不问。我不敢触动你的伤痛。

在那个温暖冬天的广州，我也看到了你的欢快。

那个黎明，花城出版社请我们去吃早茶，范若丁领着我们四人先去不远处的另一家宾馆邀杨沫，我们步行在晨曦中，我看着你的脚步，那脚步是轻快的富有弹性的，托着你挺直的身躯前行，就更清晰地听到那中跟黑皮鞋敲出人行道水泥板块的清脆声响。我和叶蔚林会意地相视而笑，都为你的难得欢快高叶蔚林先回他的湖南了。相处一月，我也要回我的河南。你和谌容与我在送我去机场的汽车前握别，你们送别的话是笑着“批评”说我这一个月来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发展你们入党。我听到了你的好心情。

1984年春天的郑州多么温暖多么湿润。这年的春天，陈登科率领安徽作家访问团一行七十余人来河南访问，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文联管事，我当然要热诚接待家乡作家们的来访。出乎我意料的是你也来了。我真是十分地惊喜。你说你回故乡正好赶上这次访问。由于你的到来，那个春天就格外地温馨。

安徽作家访问团大队人马返程，你留下，说要去郑州大学看望你在华东师大时的一位同学，顺便休息两日直接回上海。请你在省文联招待所住下，安排省作协的同志好生照顾你的起居，走的那天，请你到家里喝鸡汤为你饯行。送你到列车上，在启动的列车窗口告别，祝你一路平安。你说会平安的，你说你不会参与劫机。你说着笑着，说得幽默笑得灿烂。我就又听到，看到了你的好心情。你和朋友在一起总是愉快的。

84年春天分别之后，就再没见过你。84年末至85年初有全国四次作家

代表大会，88年深秋有全国五次文代会，都没能见到你，你没有去北京。通信也只有一次，大约是86年前后，《莽原》找我向你约写中篇小说，你复信表示抱歉，说近期无中篇小说写作计划。

多年之后，山东作家塞风来信说曾到上海你的家中作客，你还向他说起那年在我家喝鸡汤的情景。

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1995年初夏，河南的《大河文化报》筹办，副刊部的扬长春找我，说要去北京上海两地组稿，要我给两地的朋友们写信，又说特别想约到你的文章，我就给你写了封便信让他们捎去。之后，果然就在《大河文化报》上不断读到你的文字，在《随笔》上也常看到你的文章，就读到了你那双在近视镜后面沉思的忧郁的眼睛，就读到了你那颗对国家对乡土对人民对乡亲的滚烫炽热挚爱的心。我总是为之感动。

7月15日出版的1996年第4期《随笔》上有你一篇文章《说梦》，你梦见了那样多的死亡，你弟弟的死亡，你妹妹的死亡，你侄儿的死亡，你父亲的死亡……真是可怕的梦。亲人们的死亡，你在事前都曾梦见，事后都验证，真叫人毛骨悚然。特别叫人感到可怕的是你写道：“在那次梦里，我看到自己的脑子无缘无故地裂成两半，像被斧头劈开的，却没有流血，那裂开的两半都有一层纸一样的东西盖着，像切开的西瓜盖了一层塑料薄膜。我为此惊恐了好多天，担心脑子出了毛病了。甚至一连几天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头颅。”你还据此写出版了长篇小说《脑裂》。你说，《脑裂》正是你当前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写照。你说，不论在文化思考和现实思考上，你都遇到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你说：“于是，一部小说就这样动手了，而且很快写成。没有精心构思，整个写作过程中，头脑里就是有那个脑裂的意象”。

《脑裂》我迄今未读，我怀疑我还有否勇气去打开这本书。

7月15日出版的《随笔》上的这篇《说梦》的可怕文章，读过不久，就读到了你遇害的消息。那条消息语焉不详地报道说：“以《人啊，人！》一书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晚被人发现在其上海的家中遇害，同时遇害的还有她的侄女。”

从那可怕的《说梦》发表到你惨遭不幸，这中间只相隔四十天的时间。你有预感吗？那可怕的不幸进入过你的梦中吗？你如果梦见过，你为什么事前就寻求保护呢？你的可怕的梦总是那样一一得到验证。

《诗人之死》。你所爱恋的诗人是打开煤气自我窒息告别这个世界的。你呢？有谁来写小说家之死呢？

飞来横祸！横祸为什么是飞来降临到你这有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灵的女子头上？这太不公平啊，太不公平。

我不敢想象那情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面对你遇害的消息发愣。你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吗？

但愿！但愿！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凌晨三时四十分

戴厚英的最后遗稿

倪墨炎

经记不起何时何地第一次与戴厚英相识，反正长期以来是熟人，见面的时候，她淡淡地叫一声“倪墨炎”，我也淡淡地叫一声“戴厚英”，然后各自伸础手，不大用力地握一握，几乎是同时各说第一句话：“好吗？”

她肤色浅黑，不漂亮，缺少妩媚，身材也很一般；她穿著很朴素；从说话、做事中，可以看出她很聪明，很果断。

在认识她以前，已久闻她的大名。1960年秋，上海作家协会集会批判十九世纪外国文学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一些老头子思想不通，一些与会的大学生狠狠地“帮助”他们，领导大为称赞，称他们是“文艺界新生力量”。我所在的上海师院，也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时我已由白校徽换成红校徽，参与总结那两位的先进思想，大块大块的文章登在校刊上。戴厚英就是华东师大的“新生力量”。还有一位后来在文艺理论上很有建树，名气不在戴厚英之下，地位是大大超过戴厚英。“新生力量”中后来也有跌跟斗的。

最近的一次见到戴厚英，已是几年之前。邓牛顿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一本美学的书，稿费拿到后请客吃饭。设宴地点是在九江路江西路角上一家企业的食堂里。那天来了两批人，一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理论室的全体编辑；另一批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教师，牛顿的同事，其中就有戴厚英。戴厚英当时已很有名气，许多国家翻译了她的长篇小说，但她仍然衣着十分朴素，仍然不漂亮，缺少妩媚，仍然是轻轻地叫一声对方的名字，然后不大用力地握手。理论室几个年轻人她大概不认识，没有握手。那天，我有幸和她坐在一桌。戴厚英那天活不多，更无妙语惊四座。只管慢慢地喝酒吃菜。分别时，戴厚英没有和大家握手，只举手摇摇，表示告别。想不到，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相见。

我们的《书城杂志》于1993年7月创刊。我想请她写稿，一打听她在南方。去年，不断在上海报纸上读到她的文章，我想她大概回来了，一打听，果然是的。我就不断地寄《书城杂志》给她，今年5月底。我写了封信给她，希望她能为《书城杂志》写稿。她立即复信，道：“谢谢您约稿。近来读书，“闲”学当头，除佛学外，便是老庄、尼采、叔本华之类。陆续写一些。能否发表，颇为犹豫。过几天整理出几则给您看看，行就行，不行就算，可否？”

相当著名的作家在学些什么，本身就是读者关心的信息，杂志当然欢迎她的读书札记。8月8日收到了她的读书札记六则，两则是读老子庄子的，四则是读尼采的。它们才是真正的读书札记，这使我很感动。我读书，重要的地方用红铅笔划上杠杠做记号，以便以后重读时注意：有的材料估计以后要用，在笔记本上写下书名页码；有的书刊是借来的，有些内容很珍贵，那就只好整篇整段的抄下来；但把读后心得写成札记，一天天的记下来，则从来没有过。戴厚英很聪明，人称“江淮才女”，但如果她没有刻苦学习、勤奋动笔的习惯，那才气也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岂能写出这么多大部大部的作品。随稿附来一封短笺，再次表示稿件可用则用，我给她写信，告知读书札记很好，拟分三篇发表，第一篇是读老子庄子札记，字数也很合适，已编入第5期，并已发厂；如果要和读者开玩笑，此篇也可题为《读两位老乡的札记》，因文中谈到老子庄子都是她的同乡。信中我还问：你的电脑打印稿好像有错字，你校对过吗？几天后的晚上，我刚看完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她打来电话，

说：“稿中如果你认为不妥的地方，你尽管改好了，不必征求我的意见。”这实际是说，她的打印稿中没有错字，后来我也就完全按原稿刊出。我说：“札记刊登完了，能否再给我们写些别的文章。能否谈谈你自己的作品？”她笑了声说：“这我还没有考虑。”我赶紧又出题目：“我们杂志上有‘书人书事’一栏，你能否写些你接触过的作家的事迹，去世的在世的都好，读者很欢迎这类文章。”她又笑了声说：“让我想想看。”在电话搁下之前我又说：“如继续寄些读书札记，当然也很欢迎。”

谁能想象得到，五天后，她竟被歹徒杀害了。她虚龄 58 岁，如寿终正寝，再活二十年不成问题，她还可以写出多少作品啊！或许她的新作又会引起争议，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历史已经证明：她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人啊，人！》，是我国艺术大花园中的花朵，是拥有不少的读者的，它们至今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印。她给我寄来的读书札记，或许是她一生最后寄出的遗稿吧，她竟来不及看到它们的刊出了。

回忆戴厚英

孙见喜

新疆乌鲁木齐，1996年8月27日晚，我出席文学界一个欢迎平凹的晚宴。上海余秋雨教授宣布：“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消息！”看他神色严峻，大家就放下酒杯。余教授用沉重的声音说，“昨天上午，我接到上海的长途电话，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前天被人杀害，死得很惨，与她同住的侄女只十九岁，也一同被害。”晚宴的热度立即降到冰点，大家默默地把酒祭洒在地上。

十多年前，李士非先生主政广东花城出版社，他从全国邀请了二十几位作家办了个白藤湖笔会，这个会上，我认识了上海的戴厚英和西藏的马原。黑脸大汉马原讲小说美学口若悬河，戴厚英则象个顽皮的女孩儿热闹又活泼。当时，她已年近五十，是上海大学文学学院的教授。

很快，她成了我们笔会的中心人物。在珠海，主人安排我们游览夜市，戴厚英却提议海上赏月，大家同声支持她。于是决定，租一条游船在月光下绕澳门岛转一圈，看海，看月，也看赌城的夜景。

可临到上船，乌云翻滚，冷风阵阵袭来，我们被告知：今夜有台风！

我们赶紧躲进宾馆，电视被统一关掉了，大家只能俯在窗上静观外边惊雷闪电大雨瓢泼，翻江倒海的恐怖声直听得人头皮发麻眼睛发花。几个钟头过去了，台风依然还是台风，大雨依然还是大雨，海上墨黑一片，明月照碧海的美景在人心惶惶中化作地崩山裂化作了世界末日。

有人就抱怨戴厚英，说她的策划是一时脑热。

确实，她的脑子还在热着：她在楼下的大厅里唱歌！

在这个台风之夜，在人们的闷闷不乐中，在内陆人对怒潮的畏惧中，歌声如一条无形的引线——人们不由自主地聚集到大厅来了！

于是，戴厚英的独唱变作了合唱，先是三三两两的跟着她哼，后来便是齐唱对唱二重唱，会唱的一齐高歌，不会唱的鼓掌加油。我终于知道，戴厚英身上潜藏着巨大的煽动力和鼓动力，她一领头，人们自然而然地跟着她走了，从五四时代的“打倒军阀”唱到八年抗战的“松花江上”，从解放战争时期的秧歌剧唱到抗美援朝时的“一条大河”，一路唱下去，唱“夫妻识字”、“十唱共产党”，唱“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抬头望见北斗星”，一直到“外婆的澎湖湾”里”让我们荡起双桨”……

连七十多岁的王老作家也鼓动起来了，连新华社当年写焦裕禄的老记者周原夫妇也高唱起来了，儿歌军歌长征歌黄河大合唱东方红舞蹈史诗，她领着唱居然唱不哑唱不累，她肚子里装着近代现代几乎百余年的歌曲总谱！

实在想不起唱什么了，她便领我们跳舞。

王老作家告诉我，文革中，戴厚英敢和自己的审查对象诗人闻捷相恋相爱，因为文革势力的阻挡，诗人为此自杀了。这出悲壮的活剧后来被人广为传扬。文革后，戴厚英根据这段经历写了长篇小说《寺人之死》和《人啊，人！》。据说为了这两部小说的出版，戴厚英又经历了曲折的抗争。

笔会结束那天，我向她索要《人啊·人！》。她说，那你得拿小米换，陕北的小米。毛主席在陕北喝小米汤指挥千军万马打胜仗，陕北小米里肯定有高能物质。我说那是当然的。

之后，我读到她一系列文章，知道她女儿出国了，结婚了，她得外孙了，

还知道女儿出国筹措经费时，她很体谅前夫的困难；知道她到过世界许多国家，几乎每年都要去美国住一段时间。我还读到她对一些地方的腐败现象表示强烈愤怒的文她读了拙著《贾平凹之谜》后，给我写来长信，说她童年的生活与贾平凹十分相似，她觉得她在许多地方和贾平凹有感应，她希望我把这本书继续写下去，说现当代文学史上没有人这么搞过，这样搞时间越久越有价值。

九年后，我们第二次见面了。我们出版社一次推出四部长篇，她应邀来西安签名售书。我和她的责任编辑邢良俊去机场接她。

到我家时，她见书房墙上挂有龙须草编织的草鞋，就取下来爱不释手。我说：“93年在陕南讲学时朋友送了几双，台湾女作家周芬伶要走一双，平凹拿去一双，你要喜欢，拿走好了。”她快活地笑着，急忙将草鞋装进精致的坤包。

她说，“小米加草鞋，咱是闹革命呀？那还没步枪呀？”我说：“现在的革命是改革开放，不要步枪。小米加草鞋，代表陕北陕南两个革命根据地。”她说：“要论革命，我的皮鞋还是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比延安的早。”大家就哄笑说，革命不分先后革命不分先后。

戴厚英远去了，她到另一个地方去闹另一场革命，她要把善良的人性、纯真的人情、完美的人道主义传遍大千世界，当我们再一次听到她“人啊人”的呐喊的时候，人人当从莲花生化，居住精舍由七宝筑成，人人智慧如大海修养如圣德，人间将永无争斗唯有友谊永恒……

留下一上历史的足迹

徐泓

运像一只无形的手，安排我与戴厚英有一面之交的缘分。

既不在我当记者工作的北京，也不在她当作家生活的上海。我和她萍水相逢于椰风蕉雨的天涯海角。

1988年春天，海南岛被升格为中国第30个省份。并开始创办大特区。一个特字，吸引了多少人去闯海南，寻找旧体制外的一片新天地。戴厚英对这个新生的省份也怀着几分憧憬，这一年4月底5月初，她从美国探亲回国途中来到海南。她告诉我，她想了解一下大特区能否办私人出版社。当然，她也有一个任务，海南省作家协会邀请她给青年创作班讲课。

创作班设在五指山下的通什宾馆，我在宾馆外宽宽的山路上，第一次见到她，她刚和学员们一起游玩归来。一顶草帽，一身布拉吉，一双白凉鞋，和学员们一样容光焕发，一样步履轻捷，我竟没有把她从年轻人堆儿里辨认出来。要知道那年她已过完50岁的生日我记得她晒得黝黑，甚至不逊色于在南中国海的阳光下晒了一辈子的海南人。她说，因为她来自夏威夷，她的女儿在夏威夷大学读生物化学，她从那片阳光下直奔海南岛来了。

没有先回上海的家。再一次证实了戴厚英对南方，尤其是对广东特殊的情愫。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是广东省保护了她，接她到广州写作，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她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力作《人啊·人！》、《空中的足音》。

5月2日至4日，我与戴厚英有3天的接触。对她进行了两次时间很长的采访，还听了一次她给海南师范学院学生们讲课。3天以后，我们分手了，从此再也没有联系，没有见面，没有通信，甚至电话也没有打过一次。这在我20多年的采访生涯中是很罕见的，因为但凡我用心用力采访过的人物，尤其是女同胞，我总会和她们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戴厚英却消失了。

可能因为我始终感到对她欠了一笔帐，事后我竟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实在愧对她那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下不去笔的原因很简单，还是戴厚英有先见之明，在接受我采访的开始，她就说：“我不愿接触记者，你们也身不由己。”确实，她讲的有些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发表，况且那时戴厚英的身上还多少有一些“敏感人物”的明影。

8年过去了，正如一首宋词中写的“今非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进步的速度比顶想的要快得多；可惜“人成各”，我已无缘再见戴厚英。她遇害以后，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笔记本，本子里留有十几页密密麻麻的记录，一行行看下去。她的面容，她的眼神，她的手势又活在我的眼前，当时采访的内容很宽泛，涉及她的心路历程、创作道路和文学观、下一步的写作与生活计划等等，我只略作文字和段落的调整，基本原文照录，希望能为她保留一份真实的历史资料。

开场白：

我有点儿代表性，我是中国一群女作家中的一个，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我在这几年（指80年代初）受过两次批评。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要求公开对话，但石沉大海。我的处境很微妙，好像一个带菌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有一种气氛，我只当什么也不懂，可心里感觉很不好，很压抑。不尊重人、损害人格的事情，我是最不能容忍的，名与利，都可以丢，就是人格不能丢。

到哪里我都不讲假话，但不能把真话都讲出来，即使我的话不讨有些人喜欢，我也不会留在国外，中国的问题需要人去解决，越走出去，越感到中国的贫困落后，我摆脱下了祖国。祖国贫困落后，我脸上无光，况且我在国外能干什么呢？我不能用英文讲课，我很喜欢和我的学生们交流，当然可以放开手写作；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但写作是需要感情的，长期在外，对祖国的感情会谈漠。再之父母在，不远游，我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我的父母都在安徽，我已经出国4次了，去过欧洲、美国，每一次都按时归来。

创作道路：

我这个人没有家学渊源，父母、祖父母没有当作家的，我是第一个，据说远祖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毕竟风光早完了。我的家在皖北小镇上，从小接触的是口头文学，民间唱本。会唱很多很多民歌，现在我和农村大嫂哄孩子，我会的歌谣比她们都多。少年时代，我很喜欢剑侠小说，想作剑仙侠客。我常常跟在道士的后边，希望他发现我有慧眼，我还时时幻想着腾云驾雾。我的性格中至今有这个成分，喜欢我的人说我是女侠之风，讨厌我的人说我是江湖义气，我想这总比无情无义、翻脸不认人好。

什么时候想当作家的呢？初中时，我看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大约我12岁的时候吧，一个偶然的机，我写的一篇作文，语文教师给打了99分。记得一个同学死了，我写的是他（她？），我对死亡有畏惧，写得有感情，不知不觉之间文字有了韵味，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小丁玲。但到了高中，我理科学得好，数学特别好，那时候我最想当的是律师了。

1978年我正好40岁，整整28年我没写过一篇小说。这次拿起笔，完全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回顾走过的几十年的路。我感到前半辈子活得冤枉，活得窝囊。事业没有了，生活被破坏了，理想破灭了，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荒凉的沙滩上。

四十而不惑，我四十开始惑了。我确实有错，错在几十年来把脑袋交给别人了。我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一个人，也有头脑，而且是相当聪明的头脑。我要对自己负责，从那以后，我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声音唱歌，我谁也不崇拜了。从自己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别人也有这样的痛苦，不过程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罢了，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给坑了，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应该把我的思考写出来，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

从第一部小说到现在，我始终坚持写自己心里要说的话，如果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声，对总结中国历史有作用，我就把它写出来，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对历史承担义务的作家，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近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经验总结出来。

文学的复苏，是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开始的。文革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它的成因复杂，客观地剖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个国家各方面弊病的根源，传统的弱点。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总结，就不可能和过去的历史决裂，很可能走了一个大大的怪圈儿，从反封建开始，到后来实际上把封建主义发扬光大了。许多过去认为很正常的事情，我悟出了不正常。西方的荒诞派，需要经过哲学的思考，才能看出荒诞，而我们只用眼睛，就可以看出大把大把的荒诞，我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写作的，我没有背离过这个目的。

文学观：

我的创作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写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写我故乡的老百姓。无论哪个部分我都要总结历史，探讨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和社会各种

各样体制的关系。我以文学作为我思考表达的工具，这可能与一些纯文学作家有所区别。因为据说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承担任何理念、义务和责任。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所谓文学观实际上都是作家本人提出来的，有多少种文学现象就有多少种文学观。不应该只有一个君临天下。

我的文学观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在这样的文学中，我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样的文学中同我们的时代一起前进，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在目前文学行情看跌的情况下，我坚持这样写，可能是自作多情。我理解一些作家作出其他的选择，一是文字工作太清苦，二是其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我不会改变自己。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承担很多角色，我是一个公民，一个党外人士，一个母亲，一个教师，一个作家。我作为一个人，要把我觉得应该说的话说出来，我前三部作品《诗人之死》、《人啊，人！》、《空中的足音》写的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第一部写曾付出怎样的代价，第二部写了代价后的思考，第三部想写思考后的行动，我感到惭愧的是我不能告诉读者应该怎样行动。《空中的足音》调子是比较低沉的。我常常感到想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张网在等着你，你苦苦挣扎，想拚个鱼死网破，结果鱼死网不破。我曾提倡一种笨鸟精神，后来我知道了，弄不好就变成惊弓之鸟，像《人啊，人！》还险些变成了呆鸟。但我还是乐观的，相信坚持下去，坚持几代，必有成效，我们的社会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创作计划：

现在我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下一个长篇三部曲《流泪的淮河》。我是淮河的女儿，我长在淮河边，我的父母兄弟还在那里生活。我要写故乡普通老百姓的命运。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人民，把他们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看清楚历史的面貌。况且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受伤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伤害最深的也未必是知识分子。我常常感到在老百姓中间，我的这种痛苦成了奢侈品，好像一种精神特权，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感受到自己生存中的悲剧，历史有各种各样的悲剧，最心寒的是无声的悲剧，没有反抗的悲剧。

我已完成第一部《往事难忘》，写到大跃进以后。1986年我到安徽走了一个月，我没有办法平息自己的感情。50年代末60年代初，安徽风调雨顺。农村搞得那么惨，完全是人祸，大办这个，大办那个。第二部写农村文化大革命。题目未定，我一般完稿后才作题目。第三部写改革开放后的农民状况。即使写现在，我的兴趣还在历史，因为现实生活中包含着历史，历史对我们并没有成为过去。讲历史也是为了讲今天。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根本的变化还没有到来，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困惑不安。今天的生活就好像踩在一块有裂缝的木板上，随时可能一分为二，你会从中间掉下去，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好事。因为过去的安全感是牺牲自己换来的，稳定感的背后是贫穷和落后，要打破这种平衡，需要作出一些牺牲，这是值得的。

写知识分子不用特别了解，但对农民的思想状况我不大熟悉，我还要再体验，我想留职停薪两年，暂时离开上海。下一步写文化大革命，要使自己完全沉浸到那种情绪中去，先到广州去写，然后回到父母身边，在农村住一段时间，我也希望从人们的注意中撤离出去，让我休息休息。

我打算写到56岁就不写了，最后写一部自传，用非常真实的态度来写，

以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好的、坏的，写出我是怎样变成这样一个人，我对自己有很清醒的估计，受才能、修养、经历的限制，我把自己叫做过渡性人物，过渡性作家。我不会成为什么大作家，我只能和很多很多作家一起为中国出现大作家做准备。

杂谈：

56岁以后我想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很会生活的，爱玩儿，当过体操运动员，演过戏，喜欢中国丝竹音乐，特别喜欢听二胡。在上海从来不进舞厅，都是在家里，工作之余，跳迪斯科，这种舞可以跳得很自由，不用和别人配合。我也喜欢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打扮。总之，如果我觉得写累了，那么我就坚决地把余热献给我自己。

至于爱情，请允许我保护自己的隐私权。我带着女儿单身生活，我只想说一句，中国的男人，和我同时代的中年知识分子，可敬、可怜的多，可爱的不多。

在以后的8年中，戴厚英是怎样写作的，怎样生活的？她的第二套三部曲以及她的自传是否如期面世？我只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消息，据说书部出了，但显然没有第一套那样走红。文学圈儿里有种说法，认为戴厚英属于80年代初期那批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理念的突破，说出了十年浩劫以后许多人想说的话，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学逐渐失去了轰动性效应，她的创作观念以及技巧就有些落伍了。后来我还听到一个传闻，她皈依了宗教，常年吃素、多行善事。

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她，还是那幅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的模样。有一个情节需要再写一笔，那晕当年5月3日晚上发生在从通什到海口路上的一幕。

那天我和她同乘一辆轿车回海口，起程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一路快行，我们都有些倦意，睡眼朦胧之间，恍惚感到轿车突然停住了。司机说：车坏了。开门下去检查，鼓捣了一天，他宣布，修不好了。

我和戴厚英站在马路旁，这时已是深夜12点，离海口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建省之初的海南公路，可远没有如今这样日夜的车水马龙，何况我们的车“趴窝”在冷僻的中线公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满天的星斗，还有公路两旁无边稻田上，飘浮着一团一团萤火虫，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壮观的成群飞舞的萤火虫。

我们希望能招呼一辆车，顺路的就搭个脚，反向的则请他到有电话的地方，设法通知有关部门再派一辆车接，可是腿都站酸了，连个车影儿也没有。陪戴厚英的海南省作协的同志很不安，连连向她道歉，她却毫不在意，面对着广阔无垠的天与地，她的兴致越来越高。几个深呼吸以后，她伸出双臂拥抱大自然，然后出其不意地建议：“让我们唱歌吧。”话音甫落，她已引吭高歌，于是我们跟着她一首一首唱下去，我记得当时我们唱的歌，几乎囊括了50、60年代所有的歌曲，包括苏联歌曲，后来唱到了70年代，语录歌、样板戏、红太阳颂歌，那曲目比我听过的任何革命歌曲大联唱都丰富得多，我很惊叹戴厚英的记忆力，无论对旋律，还是对歌词，她都信手拈来，大部分歌曲是她领头唱起的，而且一气呵成，唱到结尾。

终于感动上帝，在我们慷慨激昂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中，从通什方向驶来一辆吉普车，在我们旁边停住了，两个年轻人听说这伙奇怪的歌者中有戴厚英，马上热情地表示：“戴老师，请上车吧，我们看过您写的《人啊，人！》。”4日凌晨，我们回到了海口。

不知戴厚英是否记得这个夜晚。
让满天灿烂的星斗和漫野飞舞的萤火虫，送你远行吧。

戴厚英印象

陈贤茂

认识戴厚英，是从她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开始的。

《人啊，人！》出版后，便在知识分子中不胜而走，一时洛阳纸贵。1981年，我还在海南工作。当时的海南，仍然偏僻，较好的书是很难买到的。幸亏问事弄到一本，于是大家轮着看。书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有点残破了，上面还画满了圈圈点点，以及惊叹号。书一拿起来就一气看下去，两天就读完了。倒不是情节曲折吸引了我，而是那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那新颖的艺术手法，使我在阅读时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看惯了三突出，读惯了高大全，突然接触到这么一部对现实生活进行全新诠释的小说，怎能不令人振奋？何况书中人物就生活在我周围呢！

戴厚英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今天看来，象“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这一类词汇早已司空见惯，但如果联系到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仍被视为异端，王若水也还在费力地“为人道主义辩护”，那么，戴厚英在1980年时就敢于在小说中表现人性、人情，敢于讴歌人道主义，是颇需要一些胆量和勇气的。

戴厚英的名字在当时还是陌生的。从《后记》中，只知道她是一位大学里的女教师，教的是文艺理论，此外就所知无多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三年后我就有机会见到活生生的戴厚英，而且还送给我一本她亲笔签名的《人啊，人！》。

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戴厚英在劫难逃。报刊上批判《人啊，人！》的文章，一篇又一篇，火力相当猛。我想，戴厚英当时一定是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的。就在这时候，广东为她提供了庇护所。

广东是最早改革开放的省份，与上海比起来，观念要开放得多。《人啊，人！》是在广东出版的，而在她遭到批判的时候，又是广东为她提供了一个安静地读书和写作的地方。

戴厚英于1984年11月27日到了广州，正好我当时也出差到了广州，经杨越介绍，便在他家里与戴厚英见了面。本来在我的想象中，戴厚英的小说那么大胆泼辣，应该是一位有女强人色彩的人物，但见面之后，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中年知识女性，衣着入时，戴眼镜，温文有礼，除了抽烟的姿势显得有点男子汉的豪气外，其他倒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她除了抽烟外，也很会喝酒，而且敢与满桌男士斗酒。这才显出戴厚英的豪放本色。

在汕头大学期间，戴厚英讲的是《文艺心理学》。我也旁听过一两次。她讲课逻辑性极强，常用作品和生活实例来说明一些理论问题，既深入浅出，又非常生动，因此很受学生的欢迎。除中文系学生外，其他系学生也常来听她的课，还有市区的一些文学爱好者，也骑自行车来听她的课，可见她讲课的魅力。

当时来汕头大学讲学的，除戴厚英外，还有安徽大学教授沈敏特。我们几人彼此都很谈得来，因此这从颇密。平时除了谈文学、谈人生外，也谈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在话题涉及社会时弊的时候，戴厚英常常显得言词尖刻，毫无顾忌，虽然对她的批判高潮刚刚过去，但她似乎没有收敛

的意思。写《人啊，人！》时候的戴厚英，又活脱脱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戴厚英在汕大时间下到两个月，她就离开汕头回上海了。她第二次来汕大讲学，是1987年1月，来后不久，学校就放寒假了，她则应邀去香港访问。

1987年2月3日，戴厚英陪同萧乾和他的夫人文洁若一起从香港来汕头。

萧乾在汕头期间，我与戴厚英有较多时间相聚、聊天，谈得最多的是她在香港的见闻。她谈到香港某电视台对她的采访，给我印象很深。这次采访是现场直播的。原定的话题是谈文学，但谈着，谈着，她却把话题扯到政治上去了，把她平日郁积的一些看法，都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电视台负责人在旁边急得直摇手，我装作没有看见。既然要采访我，就得让我说个痛快。其实，我都不怕，他怕什么呢？”

鲁迅所说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戴厚英大概都具备了。如果在50年代，这种性格会给她惹祸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清明，也就有了容纳戴厚英这样的诤友的雅量。

本来戴厚英这次是准备来汕大呆一年的，但到4月上旬，她就回上海去了，此后便没有再来汕头。

不久，便听说她申请到美国探亲去了。她的女儿已获准在美国居留，因此不少朋友猜测她可能会定居在美国。出人意料的是，戴厚英在美国住不到一年就回来了。

1991年，我到杭州开会，路经上海，特地到戴厚英的寓所拜访她。

数年不见，戴厚英神采依旧，也有些许的不同。言谈举止间，似乎多了一些成熟，少了一些锋芒；多了一些抑郁，少了一些开朗。

她谈起了她在美国的经历，谈到她对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失望，也谈到她对那些所谓“民运分子”的争权夺利的厌恶。我觉得，戴厚英的这趟美国之行，使她变化很大。

此后又有数年时间没有见面。后来，从上海朋友处传来的消息是：戴厚英虔诚学佛，成了一位佛教徒。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有点愕然。一向入世甚深、以干预生活为己任的女作家，忽然成为了一位手持念珠、口诵佛号的佛教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但后来再一想，其实也不难理解。

戴厚英在《人啊，人！》后记中写到，粉碎“四人帮”以前，她曾经“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后来，“随着揭发‘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我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也不能想象的事情。猛然间，我感到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此后，她把探求的眼光投向了西方，把西方看作一片极乐世界。但当她在这片极乐世界住了一年之后，她发现，西方也不是一片净土，于是思路再次轰毁。理想的破灭，希望的失落，最后就只好在佛学中寻求解脱。

戴厚英的小说讴歌人道主义，最后却被一个卑鄙小人无人道地杀害了。她一生追求理想，寻寻觅觅，最后却归于空无。这世界有太多的矛盾，也有太多难以索解的谜。

戴厚英的小说记录了一位探索者的足迹，也记录了一位真诚的人的一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日于汕头大学

我又想起那一个夜晚

沈敏特

间：80年代中期。地点：广东汕头大学。此时此地我与戴厚英相识。

戴厚英比我名气大，而我并无攀附名人的嗜好。于是，在一般场合，我没有提到过与她相识，更没叙述过与她的友谊。而作为文学评论家，我也从没片言只语评论过她的作品。因为，评论就是评论，不评论友人的成就也许更易保持评论的客观与公正。

而今，她惨死刀下。她不再可能去叙述本可以由她自己去叙述的一切。抛开我的内心的震动与伤痛，作为一段时间与她共事和相处的朋友，当万众瞩目，关注这人格纯正、才华出众的女作家的人生之路的时候，我有责任动员可以动员的她的亲朋好友，各尽绵薄之力，从方方面面去展示她，留下她的音容笑貌，留下她的精神动态，应该说，这会是我们民族的一笔无形的财富。

我是从“晚间新闻”中得知她惨死的噩耗的。那时，追悼会已经开过。唯一和她相伴的侄女已与她相伴而去，我也没有她女儿戴醒的地址和电话，唁电无处可发。几天之后，才想起吴中杰和高云夫妇，他们和她是好友和近邻，于是，委托他们向她的女儿和其他亲属转致哀悼和慰问。但是，我深知哀悼也好，慰问也好，都无补于这人间深深的遗憾。

我对她当面的称呼是直呼其名：戴厚英。通讯则一个字称：戴。

这样的称呼可能与我对她的感觉有关。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汕头大学的一个欢迎会上。她和我都是香港富豪李嘉诚出资兴办的汕头大学的客座教授。校领导介绍到“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时候，在后排角落里站起来一个皮肤微黑，戴着副近视眼镜，圆脸上露出微笑的女同志。她的发型不算时髦，既不是新潮的披肩长发，也不是故作男性化的运动头。虽然不久之后，为了热闹，几个朋友为她做了提前的50岁生日，但欢迎会上给我的整体感觉却是一个朴素的女大学生的形象。

因此：称她“老戴”有点儿不象，称她“小戴”也不合适。干脆一个字：戴。

中国传统文化偏爱抬举，譬如你有几个头衔，那么就选那个叫得最响的头衔来称呼你。在那时出现了一个戴厚英和我都引以为笑话的现象。她当时还没有“教授”职称，在学校称她“戴老师”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可有的人认为这样的称呼辱没了她，故在很多正式场合称她为“戴作家”。对此习俗我和她当然颇不适应。我们见了面彼此不可能用“沈教授”、“戴作家”来称呼，而最方便的就是直呼其名。

前前后后有这么几年时间，我们大概都在下半年抽一段时间到汕头大学去授课。吴中杰不久也加入了这个“客座”的行列。

我们都在中文系授课；虽然在此之前没有交往，却因都在文坛上，彼此已有所了解，加上到了汕头当客座教授，工作很单纯，除了上课没有其它杂事；而那时汕头大学还在初创阶段，教师不多，几个客座必须唱重头戏。在白天的课堂上，她讲我讲；在晚上去录像室做教学资料片，又常常是她讲我讲；甚至附近部队邀请大学教师去做报告，也是她讲我讲。汕头大学座落市郊，当时称得上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很少有走出校门的机会。“客座”们又都是离家客居，成了临时单身，彼此之间的交往密度无形中增大。晚饭后，

照例是一起散步；星期天在一起聚餐，有时分工合作包饺子。我属于“壮劳力”，揉面的活儿是我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中年人，都经历了告别不久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身处在曲折的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可以交换意见的话题很多很多。社会、文坛、人生、彼此的个人经历。不敢说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涉及深广却是确实的。

有一点我很敬佩戴厚英。谁都知道，作为女性她是一个不幸的女性，用血泪斑斑四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作为作家，她的创作道路颇不平坦，可说是风风雨雨。她对事客观公允多于暴躁偏激，对人生洞达透彻多于迷惘或“看破”，有一种如暴风雨过后大地宁静般的心境；她依然追求，只是更加稳健，依然攀登，只是更加踏实。

至少在我与她共事的那一段时间里，我的感觉是这样的：社会的复杂促使她更冷静地思索，生活的磨难促使她更坚强地面对。当她发出“人啊，人”的呼唤的时候，正反映她自身的人生探索 and 追求。在此之前的《人啊，人！》、《诗人之死》以及稍后的《空中的足音》就是明证。

前些日子中杰在给我的信中说道，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汕头的那一段时间里算是她“最好的日子”。

确实，那时尽管她的作品尚有争议，但争议本身实际上承认了她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加上那一段传奇式的个人生活经历，更引人瞩目。说得俗一些，她在汕头很“风光”。上课的时候，中文系以外的学生甚至校外青年都挤进教室，要看一看著名女作家的风采，要听一听她睿智的讲演。广东省的一些领导来汕头视察，也要特意安排时间接见这位社会名流。

比较《诗人之死》所反映的那一段生活，此时，可算顺境。从个人心理历程而言，她也已挺过最悲伤、最无奈的日子，从中走了出来；而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事事没有让她失望，她常常以幸福和自豪的口吻讲到自己的女儿。而人们也常对她投以钦佩和羡慕的目光。

她站在一个可见阳光和碧空的人生台阶上，迈开了追求新生活的脚步。

但是，与她深交却不能不看到这一切远不能消除她心中悲剧的阴影。我常揣度，夜深人静之时，她会象白天那样开朗和愉快吗？

巧得很，在汕头大学党委的领导班子中还有一位女性，她也有一段传奇式的生活经历，主题是政治冲击婚姻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悲剧。这与戴厚英的经历主题相似、细节不同。

有一个晚上，这两位女性同时在我的宿舍相聚闲聊。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一段彼此相处的时间，也已略知对方的经历，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对方寻求知音的渴望。她们愈谈愈深，竟不能自己——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也巧，她俩都是瘾大的“烟鬼”。两包香烟放在桌上，一枝接着一枝。不大的房间竟是烟雾弥漫。而我这个男性公民又恰恰不会抽烟。为了缓解这不平衡，她们搬了一筐汕头盛产的柑桔放在我面前，让我多吃柑桔以解烟味。戴厚英不但抽烟，也有安徽北方人的酒量，她和汕头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还有过酒桌上的较量。所以，她们一面让我吃柑桔，一面揶揄我这个头很大却又烟酒不沾的男子汉“缺乏男子气”。但，这是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夜晚。抽烟也好，插几句笑话也好，终于挡不住她们的滚滚热泪，平日深藏的隐痛如决堤之水。

她俩倾诉的是绝对的个人经历，又是个人经历中最个人的那个部分。每个细节对她们都有切肤之痛，可说是声声血字字泪。她们生活在那一段时间，

却又偏偏是“情种”；把情、钱、权三样东西放在她们面前，她们义无反顾选择了情。而她们又不承认自己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在她们看来，一个合理的社会现实与她们对爱情追求是绝无矛盾的；纯正健康、忠诚无瑕的爱情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她们付出了很大的个人的代价，却依然保持“虽九死犹未悔”的气度；爱情对她们来说就是信念。朴素的表达是：“我没错！”

这是个人生活中的悲剧，而她们却又表现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成熟。她们的婚恋遭受那种政治气候的冲击，在整个过程中当然是有事有人，不存在无人之事。但是，她们深深的伤痛没有转化为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至今回想起来，戴厚英几乎没有说出任何一个个人的姓名。显然，她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人死了，却没有凶手，甚至没有需要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责任人。她在自己的个人经历中激发不出一丁点儿的个人报复情绪，而是升华出一腔公民的热诚。正是这热诚，使她思索人生，思索社会，用超越个人的思索，重新整理个人的经历，这才有了从《人啊，人！》开始的戴厚英的创作。她的创作是公民良心的产物，是人生和社会历史思索的产物。她以个人的血泪代价铸就了社会与民族的财富。

戴厚英的爱人闻捷死了。没有凶手，没有需要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责任人。这是历史的悲剧。

戴厚英死了。却有了法律，有了执法者，也有了承担法律责任的凶手。这是历史的进步。

我想，惟有此可告慰戴厚英在天之灵！

我将永远不忘那一夜晚！

安息吧，你真诚的灵魂

黄章恺

从外地回到汕头，就接到女儿从北京打来的长途：戴厚英阿姨遇害了，是被杀！惊愕中拨通了中杰兄的电话，得知了一些具体情况。当时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原因，然而那血泊已足够让我沉入深深的悲愤与痛惜之中——这叫什么样的“命运”阿！

我和戴厚英相识是在84年春天。当时我们都在刚刚开办的汕头大学做“客座”。可能因为同为异乡人吧，工作之余常常几个人一起散步、聊天。其间，我读了她的《人啊，人！》，对她笔触的深透和表达的清新印象颇深。也许，这也是我们交往较多的原因。八五年至八七年间，她不止一次以客座身份到汕大讲学，而我这时已正式调到汕大工作，我们自然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对她也有了一些了解。

她热情、豪爽，有强烈的事业进取心，她和学生的关系极好；她“有刺”，她“不讲情面”，她“口无遮拦”，于是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会说出、做出一些让有些人不愉快的话和事来。总之，她“有性格”。

戴厚英遇害后，我怀着怀念她的心情读了她送给我的《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和中杰兄寄来的《心中的坟》。我被感动了。我觉得，直到这时，我才算真正对她有了较多的了解。

这是一颗多么不甘寂寞的寂寞的灵魂啊！

她要做一个好样儿的。于是她用功读书，于是她加入宣传队，于是她参加“大批判”，她“造反”。终于因表错情而挨批，做不成“好样儿的”了。谁知这却使她成为作家，获得了许许多多读者。

然而她是寂寞的。

读她的自传，你会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真诚的人，她是那样苦苦地追求着，寻找着。她追求被认同，她寻找同道，然而她没找到，或者说她不容易找到的却又丢失了。“如今曲终人散，我脚下只有一片废墟，四周只是一片荒原。除了一个相依为命的女儿。我真正是一无所有。”

这是一颗多真诚的灵魂啊！

她勇敢地面对自己灵魂的深处，在谈到自己在“文革”中为什么会接受“那些工作”时，她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甘寂寞。”其次，“我内心的恐惧比觉悟更有力。”她又说：“我只是一个政治媚俗者，”“漫长的十年中，我的衣服色彩在变化着，可是无论穿什么，不都是想和周围的颜色保持一致？”“理性退隐，感情模糊，剩下的只有感觉了。”“我只要用眼睛左右看着不要走出队列，用耳朵听着自己唱出的声音是否走调，凭感觉调整自己的位置就行了。”

岂止是“文革”，岂止是戴厚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年是我们同一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然而敢于这样面对自己的灵魂，又敢于这样大声喊出来的人有多少？

戴厚英的悲剧还在于，她不仅这样对待自己，她还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不明白，怎么原来人人都高叫‘造反，……现在‘造反派’突然成了‘一小撮’？原来一直往左挤的人，怎么一下子就站到右边去，毫不羞惭地宣布自己是‘一贯反对四人帮’的？”

这样的事，这样的人又岂止出现在“文革”前后？戴厚英如此“苛求”

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面对我们这个需要“难得糊涂”的、“怕就怕认真二字”的社会，她当然会“不合时宜”。

她怎能不寂寞！

“我无可奈何，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完善必须和生存环境的完善一齐进行。否则，‘自我完善’的个人只能‘光荣的孤立’。而且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甚至在他死了以后，‘孤立’才是真实的，‘光荣’只是幻想罢了。然而，没有一个个‘光荣孤立’的个人，我们的生存环境又怎么能够改善呢？”

呜呼！你这执着的不知悔改的不甘寂寞的寂寞的灵魂！

然而，戴厚英有读者。

然而，戴厚英有朋友。

然而，世间终究还是有真诚的——尽管现在还是那么稀少。

白首黄泉，天下共——忆念戴厚英女士

刘坤生

英女士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惨烈。深夜电话里友人报告了这一噩耗。自己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与厚英女士算来也已九年没有见面，内心仍然受到极大的震颤，感到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多日来，自己觉得这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我是属于老三届下放知青那一代，从下放至今，三十年来生死离别之事，阅之多矣；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师长亲朋时有凋零弃世，渐渐地内心也麻木了，觉得人生不过如此，庄子所谓“死生亦大矣”，只是属于哲学上的追问而已。但厚英女士的离世，却使我至今不能释怀，中霄徘徊斗室，其弱小的身躯和音容宛在眼前。复旦吴中杰老师嘱我写一篇追悼性的文章，自己是没有资格写这篇文章的，我答应下来，目的就是想理清自己的情感和思绪。现在我终于明白，厚英女士的惨死，对我而言，在内心深处是一种信仰观念上的动摇。几十年来自己读书做人，因读的都是古代典籍，自知道德自律的重要，若说有功利的目的，那就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用孝子话说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用常言说，就是好人终有好报。以自己 and 戴厚英女士在汕头大学半年多的相与过从，觉得其人格魅力的光彩，给我印象之终生难忘，就是她那种处事细大不捐的为他人着想；夫子的忠恕之道，似乎还不足以概括她的待人处事的原则，须知，她是从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生命困苦中走出来的，虽然名满天下，却丝毫没有矜伐之态和傲气，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以我所了解的，与当今一些碌碌于功名的文人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真是人如其名，用一“厚”字来概括最为恰当。就是这样一个厚道之人，半生苦难都熬过了，以手中的笔终生宣扬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所缺乏的人道主义，却被宵小之辈不人道地残害而死，我们怎么不质问一声，天道何在呢？

与戴厚英的相识，是在汕头大学。她到汕大作客座教授，我当时也是汕大客座教师，从省籍说还是同乡，又都在中文系任教，自然很快就熟识了。初次到她所住的斗室去探望，南国早春的陽光从窗外射进来，刚届五十的她，虽然态度十分的安祥和睦，但两鬓丝丝白发清晰可见，显然是她过去苦难生活留下的见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由于自己的年纪比她小得多。有些琐屑之事以后就常去帮帮忙。譬如她每天都收到许多文学青年的来信，多的一天有十多封，我偶尔去帮她看看信。使我难忘的，是她有信必回，不论长幼亲疏，总是认真思考回答信中的问题，绝不马虎。除此之外，是文学青年们慕名寄来的文学作品，或要求修改或要求推荐发表。由于她这种热情渐渐传开，以致于汕大有青年教师的学术著作，也要她推荐出版；为此她曾面露难色地与我商量此事，说自己只熟悉文艺出版单位，不知如何处理；我当然主张她不要做这种事，但是她认为青年出版学术著作不容易，应该推荐。汕头大学在她主命的旅程中只是属于调养的驿站，但是她每天总是不厌其烦认真地做着这些事，为此消耗了大量的时间，除了上课外，紧张的文学创作就只有放在深夜进行，精神不足就大量地抽烟，她曾自嘲地说在汕大养得娇惯了，实际上依然是十分的忙碌和紧张。

戴厚英上课深受同学的欢迎，一方面是认真，投入的多；另一方面她上写作和文艺理论课程，自己在这方面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这是其它教师所缺乏的。八七年春夏之交，她作为写作课的教师，带同学去海边“采

风”，并邀我同往。路上同学们的纯真，乡亲们的纯朴，大海的瑰丽，使她回到了孩童时代。一路与同学们嘻嘻哈哈，唱着走调的歌；在海边遇上了阵雨，和同学们一起帮老乡抢收晾晒的干鱼，弄得满头满身的雨水，依然是其乐融融。去老乡家调查情况，看到有的村民贫穷而劳累的状况，禁不住眼里泪光莹莹。作为随行者，自己深切地感受到她是一个平民的作家，情感真诚，充满了爱心，毫无骄娇之气，她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我想，这是根本的原因。

厚英的“善”，还表现在她以女人的细腻体贴别人。作为一个单身名女人，受人注意是很自然的事。客座教师中有的碰到情感纠葛的问题，似乎十分痛苦，于是她多次找他谈心散步，却又要避免因为这种谈心散步使其再受到非议，于是就邀我相陪。这样就常常变成三人行。总之，尊重别人，不给别人造成一点伤害，是她处事的原则。记得她离开汕大的头一天晚上，凡是来看过她或有过交往需要回拜的，她都不顾劳累，一一去告别。我在陪同中感到汕大的教师是从内心里尊重她，感谢她的。这就是她的过人之处。厚英并非一味地严肃，相反平时言谈极爱开玩笑，由于内心敦厚，人又聪慧，玩笑开的是谑而下虐，听者也高兴，结果满堂欢喜，这也是她的过人之处。

厚英永远的走了，走的是那样突然，那样惨烈。近日拜读友人寄来她的遗著《心中的坟》，她的前半生所承爱的情感的苦难，今日年青的共和国公民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她以她瘦弱的肩膀承受了这种苦难，并且化而为艺术奉献给祖国，她创作的动力，我想，就是希望后来者再不要承受她所受过的苦难。就此而言，她的生命是顽强的，伟大的。史马迁有言“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厚英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其反映她那个时代和自己心路历程的著作，将长久地存在于世间。细想起来，如果她的生活是鸟巢式的安乐窝，没有苦难作为底蕴，又如何能有体现她生命价值的煌煌巨著？天道的公与不公，真是难说。回想与厚英在汕大所处的一段时间，那是她的人生早已走向成熟的阶段；听说她最近几年喜欢佛经的内容是发弘誓愿，在身体力行着大乘的精义，愿她在那个世界安息。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于汕大寓中

心祭

吴惠娟

戴，再过四天就是你遇害百日忌了。我望着窗外正在飘落的树叶，我的心又悲凉起来。明人屈大均曾在一首词中写道：“悲落叶，叶落绝归期。”老戴，你如同这飘落的树叶，再也不能回来了！

你不在了，可我耳畔似乎还回响着你的嗓音，眼前还常浮现出你高兴时爽朗的笑脸；的眼神……

我回忆着我们交往的十六年。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毕业后分配到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任教。还没进校，我听说分校有个戴厚英，才气过人，能说能写。上班后没有见到你，却先看到了你的《人啊，人》小说，此时想认识你的愿望更强烈了。一天，终于认识了你。

数月之后，听说你的处境不大好，情绪较低落。那时我单身，我家与你住的作协办公楼不算远，于是我就到你家去了。记得那天是中秋节，去时已近十点钟，我们一聊如故，我们谈各自的经历，谈文学，也谈《人啊，人》。你的爽快，你对问题的见解，竟使我舍不得马上离开你家，不客气地在你家吃了中饭。那天一直聊到傍晚。与其说是来看你，还不如说我是在听一个作家谈对生活的理解。我感到收获很大。

我小你十岁，无论是个人阅历，还是文学修养，与你都不是同等的。但在你那儿，你从来没有高踞我之上的话语和神态。在你那儿我也忘了自己学识的浅薄，特别愿意讲。而你总是静静地听我，从不打断我。你后来搬到了复旦宿舍，我想去你那儿神侃，一个电话打过去，你就在家等我。有时我怕影响你写作，打断你的思路，你总是说，“没事，也要休息的，来了聊聊也是调节。”于是你的家成了我最爱去的地方。我有事也最爱找你。那时我家居住面积不大，写文章、看书都不太方便，你知道了就放在心上。你外出时，就请我去看家。你说：

“我这儿什么都很方便，家里的油酱醋米面一应俱全，随意用好了。”

你一直象大姐一样关心我，你常对我说：“应该学会生活。”我不善修饰自己，你就常常帮我出主意，提建议。其实，你在这方面也并不擅长，但就这份热心肠也使我感激。你常说：“一个女人应该是个完整的人，应该有个温馨的家。”你自己的生活很不幸，一谈起这些，你的眼角就会闪着泪光，但你总希望我过得好些。

我成家后，有了孩子，再也没有时间跑到你那儿神聊了，电话就成了我俩的交谈工具。只要我有事向你求助，你一听，就马上斜穿过上海市区赶到我家。

后来，你搬到凉城，我一直没时间去看看你的新居。一九九三年年底的一天下午，学校不上课，我乘此机会到你家。我谈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因看的资料不丰富，难免孤陋寡闻。你一听，马上把别人寄给你的一大摞香港有研究传统文化的杂志挑出来，我怕你有时也需要翻翻，不好意思拿走，你说，没关系，全看过了。你慷慨地全给了我。

十六个春秋，寒来暑往，我们一见面就谈个不休。你是性情中人，你高兴时笑，伤心时就掉泪，从不掩饰自己。你是用一颗坦诚和火热的心，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你有时直率地批评我，说我让一些琐碎的小事分散了做

学问的精力。我也常常直言相告，说你太容易激动，控制不住自己，有时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我们俩的性格差异也很大，但这些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由于常常交谈，久而久之，一些永久的话题，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的，仍是那样清晰，仿佛就在昨天。

一九八八年秋，有位青年教师结婚，婚后，邀请我俩上他家小坐。在回家的路上，你谈起了欧洲之行。你说，在国外，最怕有人登门拜访，因为不知道这些人的政治背景，怕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你。你说，就因为忌讳这一点，不愿在国外。谈到国内还是有一些人不理解你，你叹了一口气。你还谈到与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的纠纷。你说：“我要让这样的人知道，中国作家并不是为了走向世界，就愿听从他们随心所欲的摆布的。”

一九九一年初春，你从美国的女儿处回来就到学校上课了。那天上完课，我与你学校礼堂后面的过道上不期而遇。我看见你，很惊喜，因为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你此行探亲不一定会回来了。可你还是如期回归。你说在美国待了一年有余，接触了各种文化思潮，比较之后，你还是选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你说：“我不忙写作，要好好看一阵书。我当然要回来，我熟悉的、感受深的，还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我写的小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不能真正理解的。我的读者在中国。”从这番话，感受到你的血还是那样热。你接着说，“在美国最开心的事是抱外孙女。面对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可爱纯洁无邪的小天使，自己也仿佛年轻了，此时，生活中所有的阴暗都没有了。有了这个外孙女，我觉得生活中似乎就多了些阳光。”你是个至情的人，你挚爱生命、生活、亲情，你渴望温暖。然而，命运却是那样的吝啬，给你太少了，太少了。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今年四月同去青浦上大法学院参加上大文科高级职称的评审会了。那天，要在法学院住一宿。你邀我同在。我们又象以往一样，无边无际地聊。现在回想起来，有不少话是可以作为你一生的总结的。

当谈到某些事情时，你说，“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现在，不会象当初那么处理了，我的心境会很平和。”是的，近年来，你一直试图在学佛中超越自身。你的自传的上部出版后，没有急于动笔续写，而是看书。你说过，“要跳出自身来观察社会，观察身旁发生的事。”你力图避免在写自传时伤害到别人。

夜深了，你向我提到原在上大文化所工作过的一位博士写的一本《救世与救心》的书，是专门研究近代佛学思潮的。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凭着书名就说，中国近代不少著名学者都对佛都很感兴趣，你的探索也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范畴，你走的人生道路也是这样一个圈。记得当时你没有反驳，你似乎有些简单，也不完全尽意。可惜我们不能再共同探讨了。

那晚你还说：“我以前以为当一个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可以对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现在想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个人能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我还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吧。”

这时，我才进一步理解了你在八十年代什么那样拼命地写啊写，写得颈椎发炎，写得人黑瘦黑瘦的，还得了肝炎。原来你的内心有着这样一个深切的愿望，这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也进一步理解了你在九十年代为什么那样热衷于慈善事业。你的家乡安徽遇到了特大水灾，你急忙地赶去，你捐款，

考察，深入灾区与灾民一同生活，一样的伙食，这些年，你还深切地关心着周围同事所发生的不幸。你曾说，“如果我能减轻别人痛苦，为不幸的人做一些事，我就会觉得很舒坦。”

回到上海后，五、六月里，我们还通过几次电话。一次你告诉我，你又在读庄子，这次又有新收获。你谈了对混沌的理解。又说，这次读庄子还同时读老子，并且和尼采、叔本华一起比照读，你认为他们对一些本质问题的思考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你似乎更偏向喜欢老庄。这些观点你都写在读书札记里，发表在《书城》杂志上了。

六月里，你打来一个电话，这是你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你说想借一本书，我告诉你。这本书别人还没有还。电话中你谈到你最近做了一个梦：你想上一辆公共汽车，可车上坐满了人，车门关上了，不让上。于是你就想从窗口爬进去，但车上的人马上把车窗关上了。你捶窗，还是不让进。于是，梦醒了。听你说完这个梦，我很难过。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老戴，这是一种心境。”你虽常常踽踽独行，但你的内心深处总渴望着自己能被“类”理解与接纳。你曾说，人类思考的问题，无非是“灵与肉”、“我与类”、“生与死”。其实，只有“我与类”的思考是最最困扰着你的心的。你常说，你活得很累。今年五月，你给女儿戴醒的信也说你活得很累。学佛并没有把你从情意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我从你的梦中，读出了你心中的孤寂与痛苦。

老戴，你并不完美，有不少缺点，但你是一个真诚的人，是一个好人，我想，你的梦是说不幸的一生不需要怜悯，你需要的是理解和接纳。

也许你不情愿地离开这个世界，心底只带着我唯一的愿望。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慢慢理解你、接纳你的。一定会的！

老戴，安息吧！

草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戴厚英的爱心篇

张晓云

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戴厚英自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寓所被歹徒惨害，至今已有三个多月了。

作为她的同事和朋友，相当长时间内不能相信她真的离开她挚爱的生活、乡土、亲人、朋友和已经融入她生命年轮的创作，惨然而逝。然而……每当经过她楼下，仰望她住所的阳台，只见一群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在檐下，窗前筑起了新巢，再也看不到她精心栽培的红花绿叶披戴着她亲手浇灌的水珠在阳光下摇曳；紧闭的铁门，锈迹斑驳、尘埃积淀，再也不会闪现出她那娇小敏捷的身影。邻居们每天上上下下经过她门前的楼梯，总是放轻脚步，行色匆匆地一掠而过，是因为那曾经流出门外的挥之不去的血腥？还是因为那短促凄厉的惨叫？抑或是因为不忍惊动那缘于善良而终于屈死的冤魂？

戴厚英走了，走得如此惨不忍睹，走得如此冤屈和无奈。朋友们一提起她的死，禁不住为文明死于愚昧、人道毁于兽性而愤怒、颤动和叹息。大家都不忍正视现实：一个活泼泼、充满激情和智慧的生命竟在须臾之间消失了。偶而拨通她的电话，期待着在铃声中断后，能听到一声亲切、绵和、抑扬顿挫的“喂——”，然而，铃声执拗、冰冷、空洞的一声接一声响着，传递出让人心悸和窒息的颤音，“期待”的结果是朋友们的清醒：戴厚英真的走了！撇下和带着她无限眷恋的世界消失作为同事和朋友，从来不曾也不须想到去勾勒她的形象。她其实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充满七情六欲会笑会恼会爱会恨的普通人，是个忽而刚强、忽而软弱，忽而理智、忽而任性、忽而有理不让人、忽而心慈面软；忽而尖刻犀利，忽而声泪俱下；忽而无法无天，又忽而孤独恐惧的普通女人！她是一个有才华而被冷落、一个想努力奉献而不被理解的知识分子！一个有创作才能、有创作个性、又富有思想和平民意识的作家！她突然走了，平时留下的印象却渐渐清晰起来。创作和教书有共通之处，应该对生活充满激情和爱，更需要无怨无悔的付出和贡献。这些年来，戴厚英执着地生活着，正如她所说：“我为自己创造和开拓了一个广阔的、深厚的、爱的天地。”（《风雨情怀》）

戴厚英走了，和她初识的印象萦绕脑际，难以忘怀。那是一九七九军春天，当时复旦分校成立不久，我也“归队”于教育战线。去报到的那天；在中文系办公室里，熙熙攘攘挤满了刚下课的、等开会的、来报到的一大群人。只见一位中年女性，手捧一杯茶，笑嘻嘻地走进来。和她打招呼的人不少，才一会儿功夫，她就成了核心。记不得当时她和别人在讨论什么热门话题了，只听见她妙语联珠，旁征博引，把她讨论或争论的一位同事逼得招架不住、满脸通红、结结巴巴起来。惹得几位平时善辩的男士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声援”的行列。只见她从容答对，才思敏捷地反驳，笑着、说着，她周围的人被逗得鼓掌、跺脚、笑声不断，辩论的气氛是善意、友好而热烈的。她在咄咄逼人之时，只听得门外有人叫着：“戴”丫头，开会啦，快来！”她笑着应了一声，仍然从容地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轻捷地捧着茶杯走了。围观的、参战的、拍手叫好的、不依不饶的，哄成一片，唯一认同的是：好厉害！铁口钢牙！

“她是谁呀？”我问身边的同事。

“大名鼎鼎的戴厚英。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你不认识？”我当时确实不

认识她。但虽是初识，却留下了由表及里的、独特而深刻的印象。

戴厚英后来确实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优秀教师。当然她不是那种以女性的细腻，常常邀学生来家包馄饨、做饺子，增进情感，轻易地获一张教书育人的奖状而终身受用无穷的老师。她是用对学生一片真诚的爱和自己广博的学识潜移默化引导学生的老师。她上课从不迟到，总是早早地带着教案，捧一大杯茶走进教室，和早来的同学们亲切交谈；有时发高烧后，还强支病体准时到校上课；凡是有教学任务的学期，她基本上不安排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备课、授课、批改作业和考卷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她的额外教学任务并不轻，校内、校外，甚至在狱中服刑的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都常到她家访问或投书求教，她从不拒之门外。有时复旦大学作家班的学员会拿着一叠叠的初稿，登门求教。她都能耐心细致地提出修改意见。

她爱学生；学主也敬重她，不论在生前或死后，她两次搬家，都是闻讯而至的学生出大力；复旦分校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中，大部分是老三届知青，在大风大浪中拼搏出来的业务尖子，至今有不少人毕业以后与戴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追悼会上，许多往昔的学生赶来了，有的留学海外，还托人敬献了花圈和花篮！

老戴爱故乡、爱乡亲，更爱赋予她生命的父母，以及在清贫中成长，在逆境中互相依傍的弟弟和姐妹。她是家人和朋友们公认的孝女。一九八四年，从复旦大学分到了一大一小的单元房，在上海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的她，总算有了一个完全属于她的、独立的家。她那掩饰不住的喜悦、兴奋溢于言表。稍稍安走后，她立刻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出来。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时间，竭尽做女儿的孝道。

老戴对父母的爱是诚挚深沉、无以复加的，这里包含着对赋予自己生命的父母的报答，还渗透了在她处于逆境时，父母家人给予她唯一女儿的爱和温暖的感激。

老戴对女儿的爱中既有母亲的温柔，更具有父亲的责任，所以她付出的母爱往往把理智与感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我看见老戴大哭过一次，并非在她被批判、被冷落之时。

有一天，她爬上六楼，敲响了我家的门。开了门，只见她面色萎黄，神情惨淡、气喘嘘嘘地停立在面前。还没进屋，就见她泪如雨下地说：“你说我错在哪里？我该怎么做？”我从来没看到老戴如此激动和软弱过，一时束手无策，只得给她倒杯热茶，递条毛巾，先安顿她坐在沙发上，听任她渲泄心中的情感冲击波。

她哭够了，这才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原委：和女儿为了不考研究生的事，两人各执己见，发生争吵。她的女儿醒醒一直是个聪明懂事、可爱的女孩，老戴一直为她的学业自豪和骄傲，考研究生应该不成问题。但女儿不考总有不考的理由；老戴从来是聪明理智，善于以理服人的。为什么连女儿也说服不了？还是应了那句：一家有一家的难事？

“老戴，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为什么？！”

“女儿大了，不听娘的啦！”

我望着她笑了。她立刻恍然大悟，重重地给了我一拳，笑着长长的叹了口气。

此刻，我才发现她的笑是如此酸涩、沉重。哪家父母不望子成龙，哪家没有两代人的矛盾争吵。但只要父母双亲步调一致，往往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矛盾就容易缓和、化解！即使一时难以解决，父母双方也会商量妥善处理的方法，互相劝慰。唯有老戴，在对女儿的爱中既要揉进母亲的温柔、宽容，还要揉进父亲的严厉刚强，还要做到不是轻易能做到的、对孩子朋友般的理解和信任。她也是血肉之躯，在和女儿相依的两人世界中，得一身兼任几职。再刚强能干，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老戴对女儿的爱是十分深沉，也是十分艰难的。

醒醒没有让母亲失望，以优异的成绩直升研究生。以后老戴一提起女儿，脸上又是阳光灿烂了。后来她女儿出国留学，成家，现在已是博士后了。几年前，老戴成了“年轻的外婆”，对外孙女的爱又直线上升，有增无减。她为了让外孙女不做被动吸烟者，毅然戒掉了吸了几十年的烟。有一年冬天，朋友的孩子要去美国，主动提出愿为她带点礼物给醒醒。她很高兴，连奔带跑地往家赶。朋友们很少见她这么忘形，颇为感动，送了她一个“年轻的外婆”的雅号。后来，看到她托带的东西全是色彩缤纷的童装，也许是女儿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她五十几元工资，要资助父母，还要养活自己和女儿，哪有财力满足女儿物质上的愿望和需求。现在宽裕一点了，在外孙女身上可以聊作补偿。另外，她潜在的、长期的独身女人的经济上的屈辱感也得到一种释放解脱的机会。她打算退休以后去美国住段时间，外孙女渐渐大了，她想成为她的外婆，更想成为她成长过程中的老师和朋友。

女儿是她生命的延续，对外孙女的爱更是她对女儿爱的深化和继续。

四

老戴把爱慷慨地赋予别人，只留给自己一小部分。即使是数量不多，却也有滋有味，同样鲜明执着。

老戴爱美、爱打扮。自与她相识以来的十几年中，她的衣着都是整洁、得体的。偶而翻看她的影集，在乡气未脱的少女时代或下乡劳动的非常时期，她都会留下一撮留海、一条围巾给自己保留爱美的色彩。后来经济条件好了，老戴对服饰的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

说真的，她几次出国都没有做什么正儿八经的西装或礼服。她最得意的也不过是几件旗袍或中式短装。其实，老戴穿的所谓“领导文学院服装新潮流”的行头，大部分是她从女儿那里“拿”来的，最贵的新衣服也和时下流行的名牌无缘。主要是这些衣服搭配得体，加上她得天独厚十几年不曾发福的娇小身材，再和她独特的书卷气质，敏捷的思维和年轻人般的活力、对服饰的审美情趣、开朗性格等融为一体，所以，她穿什么衣服，总给人得体和入时的印象。特别是在亲人和朋友们之间，洋溢在脸上的笑容、蕴藏在眼中的温柔、真诚的心灵坦露、机智、犀利精警揉合在起语言和她的服饰互为映衬，构成了戴厚英独特的气质和美感。

五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我站在银川旅游胜地沙湖边的滑沙场上，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老戴。因为我每年暑假都忙于教学，很少有机会外出度假或旅游。而每年暑假结束以后老戴在开学以前总要到我家小聚，于是只得听她滔滔不绝地介绍她的见闻。我除了回忆几件暑假期间在上海的旧闻外，简直成了孤陋寡闻的人。今年暑假，我到银川、北京、西安一游，大开眼界，最起码，刚才从几百米高的沙丘顶上，借助滑板，滑下时的大惊大险，

以及从缆车远眺银川颇具代表性的大西北的广袤和壮阔、观沙湖清澈见底、芦荡幽深的北国江南风光，也可以让老戴捧着茶杯，温和地笑着、静静地听我侃上一回。

然而，我做梦也想不到，就在我站在大西北的沙丘上想到她的那一刻，她正遭到歹徒杀害，被惨无人道地砍了数十刀，孤立无助地躺在血泊中，生命在惨绝人寰的杀戮中划上了句号。

当我倦游归来，重见老戴，是在龙华殡仪馆的吊唁大厅了。老戴由爱女安放在灵堂正中，依然是一头短发、一身蓝底白花的旗袍、一副眼镜；依然是温和、沉静、自信、潇洒的笑着，面对着她倾心爱过的亲人、师长、朋友、学者和读者。我立良久，期望着每次我们暑假后重逢时她的第一句话：“我回来了！”；也期待着门铃骤响，她进屋后人到声到的神聊；更期待着一杯茶、一盅贡酒、几碟家常小菜、一碗稀饭的小聚……然而，只有哀乐在大厅中回响，伴着她的亲人们撕心裂肺的悲号。我随着长长的、缓缓流动的吊唁人流，向她的遗体告别。在她遗体前致哀的几十秒钟内，我紧闭双目，终于保留住了她生前温和的笑容！她依然站着、坐着、谈着、笑着、而不是含冤屈地躺下！

老戴真的走了，女儿亲手把她安葬在她外公的墓旁。她终于能不分昼夜地倾听淮河的浅唱低吟或咆哮怒吼了。然而，也许她的灵魂难以得到安宁，因为她死得如此突然和罕见的悲惨；因为她对这世界和所爱的一切有太多太多的眷恋；因为她的性格命运决定了她生前的大起大落、曲折坎坷，死后的灵魂也会与奔腾不息的淮河一般潮起潮落。不过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对她来说不再重要了。她生前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一书的自序中说过：“多少年来，我一直象一团迷雾中的鬼魂，让人抓不住，看不清。”然而，当她真的成了鬼魂之后，回忆与她识相熟十几年的往事，觉得是看得清、抓得着的。她是充满了爱心的老师、是有才华而勤奋的当代女作家，是父亲母亲的孝顺女儿、是女儿的温柔刚强的好母亲、是真诚待人的好朋友、也是一个把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爱说爱笑爱美的普通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言：“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既非天使也非魔鬼，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算得上一个含糊不清也明明白白的‘好人’”。愿她带着自信和自剖俯首贴耳地“做淮河忠实的女儿”，得到从“泥土里来的，就要回到泥土里去”的归宿。愿她留下的拳拳爱心留存人间；愿她凝聚着生命履痕的作品带着淮河的浪花，涌入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相融相汇的文学长河之中。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于复旦达庐

生命沉思曲
——记作家戴厚英的最后精神历程
林国良

合上《坛经讲座》，内心充满喜悦和感动。那是四川一位老居士贾题韬的讲稿，几天来她几乎是手不释卷地读完了它。此刻，她的内心沐浴在一片光明之中，似乎眼前展现了一派辽阔大海，一望无际，她坐在海中央的一朵莲花上，头顶上一轮红日当空照耀，四周是碧蓝的海水，舒心悦目，清醒的空气荡涤了她心中的一切烦恼和秽浊之气……。《坛经》以前她并不是没有读过，但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感受，她似乎受了一次洗礼，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眼里流出了泪水。

不能说她完全读懂了书中的内容，但她为《讲座》一书的恢宏气势和精深思想所感染，有一种“心安”的感受。现在她明白了，这段时期中她努力地阅读、苦苦地思索，正是在追求这样一种感受。“心安”，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啊！或许所有的精神探索者都在追求这一境吧：没有彷徨，没有疑惑，坦然处世，坦然行事。“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她读着《坛经》上的这句话，似乎也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她觉得自己此刻的心，正象能容纳百川的大海，希望容纳一切美好的事物、吸收一切优秀的思想。

她想起了一位朋友极力推荐的南怀瑾的书，现在她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先生了。她在一叠南先生的书中随手抽出一本，看了看书名：《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很好！”她又随手翻开书，一段文字跃入她的眼帘，使她精神为之一振：“做人要做大丈夫，学佛要学文殊、普贤。一上来便是泱泱大度，气象万千，”“正合吾心，”她想，“发大愿行，生大智慧。凡事以别人的利益为紧要，处处为别人好，”她觉得说的正是她的心里话，她又看了下去，“临境觉照清明，洒脱自在，不依不著，不但洞察事情本末，知晓因应处理之道，并且困断能行。”这里的“觉照清明”、“不依不著”是什么境界呢？她思索着，仿佛有点感觉，但把握不真切。不过这位老先生与她的距离似乎正在缩短，她对他有了一种亲近感……。

以后一段日子里，她认真地读了这位老先生的一些书，深深地为他的学识渊博、佛理精通、修持功力深厚而折服，虽然有时那种想发笑的感觉仍会油然而生。“这就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吧，”她想。

在费力地看完了《如何修证佛法》后，她非常感慨，给一个朋友挂了个电话，“这么多法门，要修到哪年哪月，唉，我这辈子是修不成喽。”但尽管如此，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她想起了朋友对佛老与人道主义作的一个比较：在《悲惨世界》的结局中，当冉·阿让把那个孤女抚养长大、送她出嫁后，便感到了空虚，生活失去了目标。在忧郁凄惨中度过余生。这就是人道主义作家本身的局限，他们对生命究竟要走向哪里，自己也不太清楚，至多是等待着上帝的召唤了。特别是当没有人需要他的帮助时，他自己的生存意义究竟何在，这一点恐怕这些作家自己也未必考虑清楚。而一个自己要成佛的佛教徒，要做的事真是大多了，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这些事是一辈子也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去感到忧郁凄惨？她想“是的，正是这样。”现在在她心中升腾的正是这样一种充实感。

那么庄子呢？她又想到了庄子，这些年来她对庄子有一种偏爱，对《庄子》一书下过很深的功夫，对庄子深锐豁达的智慧和天马行空般的自由自在

的精神境界十分欣赏。可以说，走向庄子是继人道主义后，她的精神历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人道主义和庄子是她的一对翅膀：看待世事，她用的人道主义的眼光；而个人精神，则神游在庄子的境界之中。现在，她要重新审视庄子，将之与佛教作一比较。于是，她将《庄子》重读了一遍。新的眼光带来了新的感受，她发现了过去没有看到过的一个侧面。她兴奋地对朋友谈了对庄子的新观感。她说：“在庄子那里，高的一层境界也有，低的一层境界也有，就是缺了中间一层。所谓高的一层境界，是指个体的自由精神，这是庄子的精义所在；所谓低的一层境界，是指对世事的洞察，这是庄子的智慧表现。而所缺少的中间一层境界，就是对普通群众的关心和帮助。”朋友说：“这大概就是《老子》中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吧”“正是，不过《老子》我也想重读一遍，”她补充道，“而在佛教中，三者都具备了。对世事洞察的智慧，求个人解脱的智慧，以及哀悯众生的大悲和普度众生的大愿。这些都融合成了一体。”

这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以更大的热情埋头读着佛经，读了《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圆觉经》、《阿弥陀经》等，酣畅地吸收着自在无碍的养分，胸中澎湃着一阵阵激情。她为大乘佛教舍己为人的彻底无我精神所感动，“现在谁要来拿我的头，我一点也无所谓，”她在电话中对朋友说，“真的，一点也无所谓。”

她坐在沙发上，微闭着眼，轻轻地念着佛号，手里还捻着一串佛珠。这是她的功课，也是她的休息。自打雪窦寺回来后，她就养成了做功课的习惯。

雪窦寺之行，对她影响重大。她原是受几个大学生的一再有了一定成就？”她揣测着，感到很兴奋，只要有朋友来，她都要请他们观赏一下。

“你的师傅快要来了，你多作些祈祷吧。”一个有特异功能的、早已毕业却保持着联系的学生对她说。她听了非常高兴，因为她一直盼望着能有个高僧大德对她进行指导，尤其是在修行方面。她更努力地念佛、拜佛，虔诚祈祷。但有一天，她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一位朋友，那朋友却提出了异议：“你要注意，她那样的预测可意味着来的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师傅，就象柯云路在《大气功师》里所写到的那样情况一样，那样的话，你就设法分辨他的正邪了，即使是正的，大抵也来自天道。”这话使她凛然一惊，这倒是她设想到过的。她并不贪图什么特异功能，佛教修行不追求神通，这道理她也已多次看到过和听到过。此外，她也不想惹什么神秘的、未知的力量上身。于是，她仍然虔诚地念佛，但不再作这类祈祷了。

她的心越趋宁静，往往是在念佛声中进入睡眠。但近来她在似睡非睡时，往往感到一种恐惧，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接近她，于是她会突然惊醒。记起了禅宗语录中“佛来宰佛，魔来宰魔”的说法，朋友的忠告也是“不理睬他”，于是她急声提起佛号，或念起了《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渐渐进入梦乡。有时，在她进入较深程度睡眠而受到恐惧干扰时，她会喃喃自语着：

“不理他，不理他。”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此后，一切都过去了，那种恐惧不再来干扰她了。她说不清这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但一切都过去了，这就好了。

她又回到了写作状态中。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搁下了笔在读佛经，现在写作的冲动又回来了。除了一些新涌现的思想和感觉需要表现之外，还有一些计划中的稿件需完成。《流泪的淮河》的第一、二卷早已出了，第三卷还

未完成，她一直在考虑这本书，她要通过这本书来表现她的家乡和她的家族的历史。还有她的《自传》的下半部，她也想尽快完成。

她打开电脑，调出了新写的《自传》的那些文字，看了一遍，突然觉得很满意，“能那样写吗？”她删掉了一些文字，啪啪啪啪，又打上了一些，但想想又不满意，又作了些修改。她觉得很难很累，而以往的写作是没有这么难这么累的，因为以往她觉得想怎样就怎样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但现在她想的是，这样写会不会伤害别人？

她还在往下写，啪啪，啪啪，打字的速度很缓慢，有时，中间的间隔时间很长。“先写个大纲吧，”她想。

快到午饭时间了，她起身去厨房烧菜做饭。但发现侄女还没去买过米，而早晨她发现米没了时已经吩咐她去买了。她有些不快，转身到房厅一看，侄女仍在看电视，已经看了一个上午了。她提醒她米还没有买过，谁知侄女站起身，说了声“我要上外婆家去吃饭”，便关上电视，转身出门去了。她的不快变得更强烈了，“独生子女，真拿他们没办法，”她想着，拿了个袋子，出去买米。

不快的情绪仍在心中翻腾，而且，联想起其他一些不快的事，她的情绪变得更糟了。“活得真累啊！”她喃喃自语着。现在，午睡睡不着，看书看不进，于是她打开了念佛机，悠扬的念佛声在屋中飘荡着，散布着宁静祥和的气氛。她跟着念佛机念了一会，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用念佛来排遣不快，这已逐渐成为她的习惯。随后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佛教类的书，翻了几页，突然四个字跳入她的眼帘：“恒顺众生”。她心中一凛，象找到一条泄洪通道，心中的不快开始退潮，她记起与朋友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一致的结论是“难”。但还有一个结论是：虽然对众“恒顺”的要求是太高了，但不妨对众生先顺一、二次，再顺三、四次，一点一点地增强自己的这种能力。

当不快情绪消退后，她心中一片清净，思维也更活跃了。她问自己为什么不快？她反省着：那个造成不快的原因只是一种外部存在，而不快是内在的心态，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一切唯心造”，所以，还是自己的心造成了自己的不快。想到此，她便释然了。她又想起了禅宗的一个话头：“主人公在哪里？她明白，原则上说，主人公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但一般人的主人公却不能发挥自觉作用。禅宗则要求主人公于醒时每一刻都了了常知，于睡时梦中也了了常知，于睡时无梦状态中也了了常知。难啊！佛教修行讲究行、住、坐、卧无时不休，修的就是一颗清清明明、了了常知的心，就是主人公常在、觉照清明。

此时，她心中一派清明境界，同时也知道这清明境界还会跑掉，以后遇事她还会烦恼，还会主气，但不怕，她已经领略了这种境界，跑掉了还能把它找回来，因为有主人公在。

她甜甜地睡了个午觉，然后心平气和地坐到电脑旁继续写作。在做晚饭的时间，她兴致勃勃的做了几个菜，“说不定她回来一起吃晚饭呢，”她想，“既然照顾她是无法推掉的责任，那就愉快地承担这个责任吧。”

四

她还在写作，《自传》的下半部写了一部分后，她放下了。《流泪的淮河》第三卷也一直在揪她的心，那贫穷的、多灾多难的土地是她的家乡，她为之倾注真情，与其说是淮河在流泪，不如说她在为之流泪。与家乡紧密相连的是她的家族，灾难和不幸频频降临，使她猜疑难道是宿命？宿命啊，宿

命，真是令人困惑。有时，她的某些见闻以致她的某些体验，几乎是使她接受这一理论了，但有时她还是会将对佛教的轮回和因果报应有着强烈的排斥。

“难道那些利用金钱、利用权力干着各种坏事的人，是命好，该享用他们的金钱或权力来做那些坏事？”她这样问一个朋友，朋友说：“为什么不看作是他们在造新业呢？如果只有旧业，没有新业；那么旧业早就该完了。”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她想，“但是……。”但是她在感情上仍不能接受，她对轮回和因果报应仍有某种程度的保留。可对神秘现象、多元生命，她完全相信。

她有着一一种异常的敏感性，她经常做梦，而且有的梦还很灵验。她曾怀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过各种梦的理论，对于梦，她有很多想法，但只是简略地写了一篇《说梦》的杂文。她还常梦到她那已经亡故的父亲，她感到父亲还在时时关注着她与她的家人，这使她感到很宽慰。因而她对多种形态的生命的存在深信不疑，从而对死亡也毫无畏惧。“死就死吧，死后的那个我与现在的我毫不相干了，还有什么可怕呢，”她这样对朋友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无我吗？”她对此想不通。她历来就不怕死，但那是出于激情，现在佛教的“无我”观似乎给了她一种逻辑的证明。

这几年她与外界的主动交往越来越少，人们对她也越来越不了解，尤其是对她转向佛教更是不理解。于是各种揣测都有，各种好奇都有，就象那女孩，一些关心她的朋友则率直地与她长谈了几次，希望她不要如此消极。

“这是消极吗？”她想，“不，这决不是消极。”她觉得这两年她活得很充实很快活。她所进行的是对生命的思索，已经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还没有完成。她与南怀瑾老先生的一些著作还有点距离，不能切入，因为那位老先生谈的许多内容都是对佛教教理深信不疑后的修行方法，而她有时还有点疑问，还要停下来，想一想。

“生命是什么？”她沉思着，“这问题已经超出了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的那点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了。”她曾留心过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从分子生物学到现代宇宙学，从基础知识到最新发展的各种科普介绍。她以浓厚的兴趣阅读着这类书籍，认真地思考着，但总觉得她父亲死后的存在……。

“生命是什么？”她想起了各种伦理观，包括人道主义伦理观、儒家伦理观，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解答中的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曾使她激动不已，并至今仍是她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人生意义这一问题并不能代替生命是什么这一问题，毋宁说前者的解答是以后者的解答为基础的。她想起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家对这相关问题的看法，他们一般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人，上帝是人的主人，人是为上帝服务的。但这一解答并不能使她满意。如果没有其他的答案、那这一答案倒也不夫为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那样可以使人熄灭狂妄之心，使人精神安宁。而佛教给予了一个根本不同的解答：每一个生命都是永恒的，永远在各种生存形态中流转；每一个生命中都内涵着与上帝一样至高无上的存在，只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它、自觉地运用它，所以才现出各种卑微的生存形态。她对这一解答感到满意，或者说，她需要这种解答。

黄昏时分，她下楼去取报纸，又是一大摞报刊杂志。那些报刊杂志。有的是她自己订的。有的则是朋友或报刊杂志社给她寄来的。回到屋里，她翻阅着报刊杂志，外部世界的飓风又激荡着她的心。从陈希同、王宝森的贪污受贿到某个基层干部的滥用职权，都使她愤慨；国有企业的亏损，使她皱眉；

贫病孤苦的报道，使她流泪；当代人的精神萎靡，使她叹息……。她拿起电话，就一段报道对一位朋友发了一通观感，最后感慨地说：“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当然，如果碰到了什么事或社会真需要我做什么事，我也绝对不会逃避，绝对不会推卸责任，但是，我越来越感到，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真的，很有限。”

晚上她拿出了从学校取回的信件，拆开一封封地读着。这些多半是读者来信，其中，有些是以满腔热情叙述着读她作品后的感受，有些则以焦灼的心情期待着她的帮助，有受人歧视的残疾女孩，也有境遇坎坷的文学青年……。“还得抓紧时间回信啊，那女孩要的书也得赶紧买了给她寄去。”她想着。在记事本上作了记录，接着又回到了自己的思想中。

“生命是什么？”她沉思着，翻开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近来，她又在大量地阅读尼采、叔本华……。她读着，思考着，比较着，力图吸收人类思想中的各种精华。

生活中的烦心事仍在时时发生，但她的反省能力与化解烦恼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她明白，佛教修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脱胎换骨的过程，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有人不能成为圣人，佛教修行就是要不断地榨出躯壳中相对渺小丑陋的“我”，换上更大更完美的“我”，而最大最完美的“我”就是彻底的“无我”。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如果把这过程比喻成治病，那医生往往也只能是自己，今天心情很好，明天可能突然心情变得很糟，这时往往只能靠自己走出这很糟的心情，这就是佛教讲心要能转物而不为物所转。道理上要明白这些并不困难，但实际做时却远非那么容易。有些情况下，她的反省能力与化解烦恼的能力已足以对付，当时就能反省，当时就能化解；但有些情况下，她仍身临其境而不能自主，要事过境迁才再行反思。六月初，她遇到了一件本不麻烦的事，但折腾了她好几天，在几次被踢皮球后，她的气不打一处来，情绪由烦躁转为愤懑，在愤懑达到极点时，她一天给一位朋友打了几次长时间的电话，倾诉了她的愤懑，叙述了她碰到的类似遭遇，甚至考虑能用些什么激烈方法来解决问题。就在她忍耐力达到了极点时，事情突然解决了。她象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感到身心两方面都疲惫不堪，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她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但同时，她又隐隐感到这几天太麻烦朋友了，干扰了他的工作。

晚上，她又给朋友打了个简短的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对他表示了歉意。放下电话后，她继续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特别是对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进行反思……。她的心渐渐平静了，渐渐安宁了，渐渐空了，于是，她盘腿入座。自从最近参访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居士后，她开始学习打坐，刚开始时，没坐上五分钟，腿就酸得受不了，但坚持下去后，她开始学习打坐，现在已能坐上半个小时了。此刻，所有的烦恼烟消云散，尘世的喧嚣已经远去，她盘腿而坐，手结莲花中，整个身心沐浴在一片光明之中，感觉中自心在不断放大，不断放大，似乎要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似乎要将整个宇宙囊括在自心之中……。

暑假临近，她与一位朋友通了电话，说她就要回家乡去了。朋友说他这阵子也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她说：“那下次我与你一起去，找个闭关道场，好好地修一修。”

一九九六年七月初，她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地踏上了回乡之路……。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二姐我永远不会忘记

戴厚森

人死不能复生，你们可都要想开点。”

“节哀顺便，节哀顺便。”

安慰我们的人络绎不绝。可怎么也慰藉不了我们一颗颗流血的心。

厚英，二姐！您在哪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她。可她再无应声，永无回音。她走了，走得那样突然，走得那样遥远，走到了另一个世界。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张张微笑的照片，一件件难以忘怀的往事，一本本薄薄厚厚的——她用血和泪著成的书。看着照片——哭；想起往事——哭；看到遗物——哭，捧起她的书——还是哭。不停地哭，悲痛的泪水似泉涌不止。老怕伤子，尤其是对于我那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母亲来说，正是晴天劈雷，当头一击，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

“慢慢会忘记的，要安慰自己。”可谁也不会忘记。活着的亲人不能，热心的读者不能，淮河岸边的灾民不能，我更不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七年，我才十八岁。忠厚一世、胆小怕事的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人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村里的人待我们还好，只是我觉得太累、太穷、太苦。每天劳动日只合壹角玖分伍，有一年仅仅只合壹角柒分伍。如果优惠的话，只能够买一支雪糕。后来，知青们一个个都插翅飞了，飞进了工厂飞进了学校，飞进了部队。而我却不能，父亲有历史问题。光盼何用。直到七八年，我还在乡下呆着。我自卑、焦急、愁煞。

烦恼的时候，我最爱发脾气。可只能泄火而已。于是，我想到写信给上海作协的二姐，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我认为世上可能我最苦，最黑，最穷。有时信中也谄上几句小诗，以泄痛苦。二姐不厌其烦地与我这个小弟弟书来信往。开导我：“人怎么能都坐轿，谁抬轿？”“人不能比，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安慰我：“你还小，还年轻，会有前途的。”有时还给我寄些书籍，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呀，马列著作呀，叫我多学点东西，不要耍小孩脾气。有两年春节回乡，还帮我们挑塘泥，运肥。她告诉我：“我的肩膀是在奉贤县五七干校里练出来的，我们在干校里要拉车运粪，要上房子修屋，我们也要锻炼，要劳动呀。”但在当时，我不信这是真的，我不信。

那是七八年的五月，可能由于我太自卑，太唠叨，太怨天忧人，惹火了二姐，撩起了她的苦楚。五月十八日我便接到二姐寄来的诗。

风刀霜剑经几场，天上人间雨茫茫。

行程漫漫孤鸿影，梦断回回冷月节。

西窗红烛千滴泪，战地黄花一片香。

飞天要窍三昧火，再铸一腔热心肠。

看罢，我猛然醒悟，二姐虽然生活在繁华的大上海，文人的天地间，可她生活得并不愉快，并不幸福。她孤独，艰难，她也同样累，可我知道，她没有向生活低头，她对生活还充满着信心。

八年，长篇小说《人啊，人！》历经磨难终于问世。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戴厚英成功了。《人啊，人！》被译成英、德、法、俄、日、韩等多种文版先后在国外发行，受到了国际上的好评。我当然也引为自豪和高兴，于是我也谄上几句送二姐：“十年拭去腮边泪，一朝茶为坛上魁。征人扬鞭欲万里，刁徒挡道不足畏。”几句话虽不高雅，可我总觉得是从我心中

流出来的，里面蕴藏着赞誉、高兴和鼓励。

几年前，我还住在公司家属院，好似《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院子大门口正中有一棵大泡桐树，出去的路又坎坷不平，天一落雨，更苦不堪言。我们一家四口人便住在院子里仅有十四平方的房子里。每年二姐与母亲来看我，都只能住在堂弟家。堂弟家住在银行家属院，论房子，条件远胜于我。

三年前，二哥二嫂为了我侄女戴慧到上海打工，二哥在上海患了腰脊椎间盘突出卧床不起。此时，大哥刚满十九周岁的儿子又突然患了骨刺癌，不幸夭折。全家人悲痛至极。特别是两位老人，失去了长孙，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过后，二姐便想改变一下环境，想让父母住我处，可我房子屋窄怎么也往不下，而我工资低微又常常因单位效益不佳拿不到钱，靠我买房子，根本不可能。二姐便主动提出帮我买一处合适的房子，而且要求必须离下水道近，能安抽水马桶，父母用着方便。谁知，房子刚刚看好父亲回南照后，又不幸仙逝。不幸，一个又一个的不幸像无情的恶魔威胁和吞食着我们家的生命，是谁，又能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更何况年逾八十的老母亲。当务之急，母亲必须立即改变环境。二姐又积极主动支持促成，叫我抓紧买下房子。父亲的丧事办理完毕，二姐回沪后，就把韩国的九百美元稿费急换成七千多元人民币汇给我。有其母必有其女。乐于助人是二姐母女的美德。远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外甥女戴醒也寄来二百美元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支持我。使我有今日宽敞舒适的小楼。我永远不会忘记，二姐不爱锦上添花·甘愿雪中送炭。二姐，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孝顺老人，疼爱姐姐，妹妹，弟弟。不是吗？老人家的哪件衣物不是她亲手添置？我们兄弟姐妹哪一家没有受过二姐的帮助和恩惠？

妈妈告诉我，你小姐说，先走顾上。在厚森家多住一段。厚森家困难，我们可以多补贴他几个，等到小民考中学通知后再走。

二姐此次回来，精神蛮好。她一进门，洗把脸，便打开鼓鼓的旅行包，拿出一块块布料“妈，这个给你的，做件褂子，这块布留给你做裤子。”这个给你的，那个给他的，还有几个小孩的，人人都有份。当然给我的是大份。包很快地空了。然后又从皮夹里拿出壹仟元钱硬塞给我：“留给你买菜，厚森。”我收下了。我每天都要买些晕菜，可二姐信佛不吃晕，喜欢吃素，特别爱吃我们县城的豆饼子。

小民是我的儿子，才十二岁。自侄儿世钧死后，我们弟兄三人也仅有这一男孩了。六岁生日时他编了三个小故事，二姐很疼爱他。把他的三个小作品还用电脑打印后寄给我后。小民没录取一中，二姐也很生气。因为她是一中毕业的学生，她总希望自己的侄儿象她一样。虽然有气，可对小孩没发脾气，她仍然耐心地与小民单独谈心，讲道理，征求小民意见：是上二中呢？还是回头念小学？她效我不要勉强孩子。可她又很焦急。小民是戴家的一条根，是母亲心肝宝贝，命根子。怎么办？求人，走后门，我们不行，而二姐可从来不爱拉关系走后门。

记得我有个至亲，请求二姐写封信给某某当官的，看看可能给个方便，调动一下工作。可二姐不愿干。这个至亲说：

“凭你的名气在报上给他吹吹不就行了。”听了这话，二姐脸色陡然变了，厉声厉色地说：“老百姓骂他，你叫我吹他，你叫我出卖灵魂，我不干！”说罢忿忿而去。当然，这次为了侄儿她也不会干的。她意见是：能有高价的上一中，多花几个钱也让孩子上，钱的问题不用愁，钱由我出。

临行的头天晚上，我给二姐包里装条钟鼎烟，可她硬是不要，竟掏了出来。我让二姐带瓶酱豆回沪吃，可她还是坚决不肯，我深深地感到：二姐只知奉献，没有索取。不管是对国家，人民，还是父老乡亲。

九一年，她从电视里看到洪水吞没着家园，威胁和吞食着淮河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她食不进，夜不寐，她伤心，她流泪，她与其他两个学者在香港报上发表了《学作募捐人》的吁求书，想唤起同胞们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增援。她又只身闯入美国住沪总领事馆，向总领事先生抗议，意在用人道主义去复苏洋人冷酷无情的心，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国家的灾民。她又慷慨解囊为灾区捐了一千元现金，并给生活在灾区的老同学汇去四百元钱。她“拿着一张张吁救书，一个装钱的信封，一本记帐簿”，一家一家地走，一遍一遍地叙说灾情。一声又一声地请求：请对我的乡亲伸出援助之手……”为了水深火热中的父老乡亲多方求助。并以沪皖联谊会的名义与香港《文汇报》驻沪办事处主任姚欣保等一行，自费跑遍了淮河两岸灾区。在南照赵岗时，她因尝过灾民的粑粑而食物中毒，在蚌埠吊水六天。她又把在香港发表《学作募捐人》的壹仟元港币稿费亲自送到南照给六里村的灾民。淮河两岸留下了她的足迹，洒下了她伤心的泪水和劳累的汗水。灾区人民没有把她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

二姐在我家住了近二十天。刚到那几天，每天早晨，我和孩子陪她散步，有时能环城一周。我和孩子都觉得累，可她年近花甲倒不觉得，反而精神更加抖擞。二姐此次在颖上，看到了我们颖城的开发，也看到了被污染的淮河在流泪。

二姐信佛。而且非常虔诚、用心。每天早饭后和午饭后，她都要到我家二楼上专有一间放有观音菩萨的房间打坐半个小时，而后她诵一段佛经。二楼顶上没有隔热层，七月天烈日炎炎，把楼板晒得滚烫，屋里象油闷子一般。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她坐的还是那么安稳，双手合一，始终不动。静坐后便聚精会神地诵经，她诵得那样认真、执着。

她也常常给我们讲佛教，讲佛经。她说她生气的时候常念“阿弥陀佛”抑制激动。她常告诉我们什么叫“十善（恶）业”：一不杀生，爱护动物；二不偷盗，非义财物；三不邪谣，遵守梵行；四不妄言，说诚实话；五不绮语，勿谈秽语；……每说一句，她就认真地解释一句，意在让我心领神会，受教育，堂堂正正地做人。二姐，我怎会忘记——您的教诲。

“心有利他，广修六度，中道而行。菩萨之心。”她信仰崇拜菩萨，她要拥有菩萨之心，她请我们颖上颇有名气的画家，给她画一幅观音菩萨，让我再请人给裱糊裱糊，挂在她上海的书房。临行的头天晚上，画家送来了“观音菩萨”，她很高兴。可谁知还来不及裱糊，她就被害了。

四

八月二十四日八时，我送她去车站。车还没开，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我回去吧，我就是舍不得，总感觉到，二姐仿佛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长途旅行，此次分别可能要很长很长时间。我不敢眨眼，一直等到汽车远远地消失在尘雾中，车影在我视野内消逝，我才有气无力地往回走。

“今日忌出门远行。”二姐走了，我才发现日历上这行不吉利的忠告。我好后悔，我好担心，我走不安坐不宁。

果然，此一别乃为永别，二姐再也不会回来了。八月二十五日，魔鬼就残忍地夺去了二姐的宝贵生命，连我那十九岁的侄女戴慧也没放过。我好悲

痛，我好遗憾，为什么好人偏遭恶报，好人不能长寿！

苍天啊！

“九泉路遥难招已往之魂，三宝功勋肯抬超生之德。”

二姐虽没有皈依佛门，可她虔诚地信仰释迦牟尼。那么我们愿为她祈祷：
求佛主保佑二姐在天之灵幸福安宁。

给她勇气。给她引导，给她开辟一条更光明的道路，归宿佛祖。

二姐，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

一九九六年十月四日

永留人间的情爱

戴厚泉

姐和我的女儿戴慧在上海家中被恶魔陶峰惨毒杀害已三个多月。这些天，虽有亲朋好友和周围同志的热情关切和苦心相劝，但由于是空前残酷地打击和无法自持的悲痛，我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除了忙于紧张的工作，哪怕在睡梦中都在想二姐想女儿。想女儿只是为了她是我独生的天真可爱的心肝宝贝，而想二姐则不仅因为她是我的手足同胞，更因为她留给人间有那么多的情和爱。

我十分敬重二姐，敬重她的才华，敬重她的性格，更敬重她的为人。

二姐一生为人最重情和爱，而且是纯真的情和爱。无论对亲人、对朋友、还是对同事、对路人都是如此。

在父讨面前二姐是个孝女。从小到大直到生命终结时她都把孝敬父母视为至高无上。学生时代的她没有经济实力孝敬父母，就自觉地用省吃俭用、诚实听话和刻苦学习去体现对慈父贤母的爱。有了工作刚具备一点条件便主动挑起赡养父母、照顾家庭的重担。36年来，是步于坦途也好，是身险沼泽也好，她都情深意重、坚定不移。令人难忘的1960年，如果不是她用微薄的工资和借债的渠道去全力以赴地帮助父母照顾家庭，我们全家老小想平安无事地熬过那场举世罕见的灾难，怕比登天还难。所以直到现在母亲还常常提及此事并把它当成一件忆苦思甜的生动教材。70年前后，文革之风还相当盛行。那时也许是二姐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夫妻矛盾的激化曾使她度日如年，痛不欲生。然而，恪守孝道的她只是暗暗强咽苦涩的泪水，从来不把忧愁和烦恼在父母面前在弟妹面前流露。在沉重的精神包袱的无情压抑下，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给家里寄钱寄东西，仍旧是一趟趟地从千里之外的上海来家与亲人团聚，而且表现得“喜笑颜开”、“无忧无虑”。为了对亲人表达自己全心全意的爱，她忍辱负重付出多大的代价、做出多大的牺牲啊！

1980年之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随着迁回南照集已开始逐渐好转。按理说二姐可以就此缓口气顾顾自己了。可是，她对父母的孝敬依然没有半点懈怠。除了按月往家寄400元的赡养费之外，逢年遇节或每次来家还要“加码”，给老人带些点心、添件衣服，就连父母及大伯父、老婶母百年之后的棺木都一一备齐。遇害的那天早晨，她从南照返回上海，刚到家就急着买点心让我们带给母亲。可谁能想到，点心还未来得及交给我们就惨遭毒手。一份未了的孝意连同宝贵的生命被意外地无辜地断送在魔掌中，香甜的点心也随之撒落在鲜红的热血里。可悲！可恸！

二姐对长辈付出的爱是鲜见的，对手足付出的爱也是少有的。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她言传身教的影响才使我们真心懂得应该怎样为人处事，是她无私无怨的帮助才使我们一个个小家庭的日子过得较为殷实。居住在蚌埠的大姐一家五口住房拥挤，虽然没有向二姐告过艰难，但她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千方百计在蚌埠买套房子让大姐一家先住进去。我们几家修建房屋时，她也都先后给了不少的资助。平时她连我们要买什么家具、要添什么衣服都挂在心上且非要表表心情不可。她这样做是因为钱多？不是！我们知道她那一笔笔款子都是从并不算多的工资和稿酬中挤出来的，都是拼死拼活挣来的血汗钱啊！是她的钱没有用场可派？她是大学教授、著名作家，理所当然地

要有与之相称的家具，衣着和饮食，达到相应的生活水平，可是她却没有创造这样的条件。在她的居室内，除了书橱和女儿送的电脑之外并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两张床都是破旧的，其中一张还是从朋友废弃的家什中捡来的。她的衣着很朴素，朴素得叫人不敢相信她是大都市里的大作家、大教授。公安人员在清点她的遗物时竟发现她的全部衣服不仅上不了档次，而且有不少是从地摊上买到的廉价品。目睹此情，联想往事，人们无不为之惊叹！

二姐的饮食则更为节俭。一日三餐随随便便，即便来客、赴宴也不讲究几个碟子几个碗。她自己常说：“吃饭不用清规戒律，只要吃饱就好”。近几年，她的生活有了点改善，但这还是从我女儿戴慧到她身边后才开始的。毫无疑问，她是出于对下一代的关心和爱护才这样做的。

提起二姐对慧儿付出的爱，我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就由不得多写几笔。

慧儿是1993年8月根据上海知青子女回沪的政策到上海商业职校就读的。开始与她妈妈住在外婆家，后来因她妈妈要回单位上班和外公外婆年迈体弱无力照顾才被二姑接去的。我们深知二姐的处境。因而在一般情况下都不愿给她再多找麻烦。可是把慧儿交给她却是注定要给她增加负担的。为此，我的心里一直不安始终觉得对不住二姐。然而二姐不仅不计较，而且对慧儿犹如对待自己心爱的女儿。从学习到生活。从家里到家外，时时处处都能体现出温暖的母爱。慧儿的学校离家较远，时常要摸黑还家。每逢这个时候二姐总要在宿舍的大门口焦急地等待，直到慧儿安全到家才算放心。炎热的盛夏是如此，寒冷的隆冬也是如此。她的心就等于系在慧儿身上。

她对慧儿既体贴入微，又严格要求。她经常教育慧儿要学会做人，要求她做一个作风正派的人，奋发向上的人和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慧儿之所以在上海商业职校能成为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好学生，与她二姑的言传身教分不开，更与其付出的母爱分不开。慧儿受益于她二姑当然也非常感激她二姑，她们活着的时候相处得很融洽，既是在临死前与罪犯搏斗的危急关头也是那么得肝胆相照。倘若亡人确有灵魂存在，我们真希望慧儿的在天之灵永远与她二姑相伴并继续享受姑妈那深挚的爱。

二姐生前非但把无私的爱献给了自家亲人，而且以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献给了社会。无论在作品中，还是在讲坛上，或是在日常生活里。人门都不难察觉她那爱憎分明的性格和朴素热诚的情感。《悼词》中说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关心家乡的建设。”是对她一生最公正的评价。对此，作为她的亲人部在悲痛之余感到自豪和骄在与二姐长期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中，我们觉得她尤为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的老百姓。这非但反映在她平时的言谈中，更主要的还是反映在她的力行上。在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在地方政府机关当干部。因而她曾多次告诫我要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与群众文明友，当群众的贴心人。她每次来家探亲首先接触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平民百姓，与百姓谈衣食住行、道酸辣苦甜。她尽管没有能力一一解决百姓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可她依然坚持这样做，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给予安慰和支持。她十分关心家乡各方面的建设，其中特别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当她发现家乡办学条件差和教学质量低时，曾毅然拿出手中的全部积蓄在南照集买套房子。决定在退休后回家与弟妹们创办一所学校。同时还打算发动海内外友人捐资扩建南照镇中心小学。虽然这些心愿再也不可能实现，但她那热爱教育工作、关心下一代的精神却感动了许多多少年来，二姐人在外地心却与家乡人紧紧地连在一起。看

到家乡人一个个富起来，有说不出的愉悦。听到家乡人遭难，她又忧心忡忡，焦急万分。九一年，家乡洪水泛滥，数以万计的群众陷于特大的自然灾害之中。当时的她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和冷静。为了及时救灾为了尽快减轻群众的痛苦和政府的压力，她除带头捐款并在校内发动募捐外，还主动自费奔赴灾区深入群众进行现场采访和体察民情，又无代价地撰文投稿大造舆论，以期争得国内外各界人士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近二十天的艰辛奔波中，她黑了，瘦了，病了，甚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因支撑不住不得不留在蚌埠大姐家就医。然而对于这些她却认为很值得。因为她觉得她是在对灾区人民对父老乡亲付出应有的爱。二姐的这些义举当时曾受到某线官僚主义者的猜疑和误解，甚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她在抗洪救灾中所做的一切贡献却受到灾区广大知情干群的充分肯定，所到之处也给人门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当她亲手把捐款交给南照镇六里村灾民时，许多人都感激得直淌眼泪，说她是道道地地的“平民作家”，名符其实的“老百姓的女儿”。

“平民作家”、“老百姓的女儿”。这大概是二姐生前最乐意最感欣慰的称呼。她说她常为这种称呼激动不已。

二姐一生对付出的火热的情和爱从不求别人感恩图报，只图她自己感到心安理得而又对别人有所启迪、有所帮助。可是孰能料到在她正向她的教师及其孙子付出爱的时候却导致了惨不忍睹的结局。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然而在二姐身上竟出现了“善得恶报，恩将仇报”的反常现象。试问，天理何在！

二姐去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可是她留给人间的情和爱还存在。我们忘不了二姐，更忘不了她留给人间的情和爱！

呜呼！我的好姐姐！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底

唱给妈妈的歌

戴醒

三次被约写纪念妈妈的文章了，总是不想动笔。

妈妈走了近百日了。记忆时时被抛回三个月前的那个周日：接到二舅突如其来电话，告知妈妈病重，控制不住内心升腾不已的幻想与渴望：如果世界能定格在那之前的一天，不再游移转动，该有多好！

下飞机时得知妈妈被害，脑子里除了一片空白之外，只看见妈妈的一双手，那双常常搂住我肩头，握在我掌心的手，那么纤细，又那么温热，分开两年半，我终于又可以见到她了，死亡却横在我们中间，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她的手不再有体温，不再有跳跃；死亡是我伸手上前时，握住的只能是漠然的冰冷。

我欲哭无泪。

是我的躯体办好了妈妈的后事，看望了年迈的姥姥，又回到远隔万里的女儿们的身边。我的灵魂出窍了，追随妈妈，作了一次天上人间的遨游。阴阳两界的界线在那时荡然无存。

今天的我，坐在写字台前，有一种死后重生的感觉。

我不再怕看见妈妈的照片和遗物，我开始愿意与人叙述妈妈的故事。我不再回避。

我失去了一位母亲，师长，和朋友，我的生活从此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多么深远，我还无法预料。但跟其他失去母亲的人比，我是幸运的。妈妈留给我的，不仅有无穷无尽的回忆，还有几百万的文字，那是她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记录，这些天，通过整理阅读她的作品，日记，和信件，我对她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我真正悟出了许多人一遍遍说的话，她的灵魂不死，思想不死，我们母女之间的交流，又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我想正视我的失去，回顾妈妈和我共同走过的道路，共同拥有的时光，这是我走向真正康复的第一步，我的眼里，流出了实实在在的泪水。我为自己，为妈妈感到欣喜。我毕竟是戴厚英的女儿，我身心流淌的，是属于生命的血液，我要让妈妈的生命，一个强者的生命，在我和我的孩子们身上得到延续。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分居两地。妈妈一个人无法带我，不得不将我送到安徽姥姥家抚养，儿时的我，跟着被打成右派的姥爷，姥姥家下放农村，从此与泥土花草相伴着成长。回想起来，当时对妈妈的印象并不深。隐隐约约记得的，是等妈妈回乡的情景。妈妈每年都回去，每次都带很多好吃的东西，好看的衣服。我懂事以后，一到妈妈快要来的时候，定要搬个小板凳，坐在村头小河旁，翘首盼望。远远看见妈妈背包快步跑来，就大叫大笑着扑上去。

真正和妈妈一起过家庭生活，是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被妈妈接回上海，和她一起住在作协宿舍里。我立即喜欢上了我的妈妈，因为她是那么地温柔又活泼。我刚到上海，一口安徽话，总被同学欺负。家中没有父亲（父母在我五岁时离异），更成了同学门取笑的把柄。人性的邪恶在无知的顽童身上，恐怕表现得最赤裸裸不加掩饰了。我夜里常常做梦哭，哭醒了发现总在妈妈怀里，而妈妈也在流泪。妈妈的臂膀能遮风挡雨，躲进她怀里我心中就感到安全、踏实。出国这么多年了，自己怀里也有了两个小小的生命，最日思夜想的，还是妈妈那温暖的怀抱。她走后，我接连做了两个相似的梦，

梦见妈妈将我搂在怀中，告诉我，不要哭，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妈，远离人世，你依然做着我的保护神！

妈妈跟我，更像是朋友。我们家从小到大，总是吸引我的同学朋友们的地方。妈妈从来不摆大架子，不装腔作势。她喜欢跟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疯疯癫癫。跟她，我们什么都能说。不管是我，还是我的朋友们，在生活，交友上遇到问题，都可以全部告诉她，她则放下手头的事为我们分析，解难。那时我情窦初开，多愁善感，总觉得自己长得丑。妈妈就逗我：我的女儿长得不错啊，小嘴大眼睛的，又聪明。要是鼻子再高一点脸再长一点，五官再分开一点，那可就不好了，要倾国倾城，天下大乱了。直到把我逗笑为止。

但是，妈妈也有厉害的时候。初到上海不久的一天，我在班上被男同学打了，在教室里哭。老师不但不惩罚打入的同学，却让我“立壁角”，因为我是“乡下人”。脸肿着回到家，告诉了妈妈。妈妈没有象往常那样搂住我安慰，反而骂了我。她说，我们不欺负人，但也绝不让人欺负。明天到学校，你打还那同学。老师问，就说是妈妈教的，第二天，我果然一进教室就给了那男生一巴掌，从那以后，我没有允许自己被别人欺负过——起码在武力和尊严上。用手腕和心计的，当然除外。妈妈教的东西里，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了。

高中的时候，我自作决定进了垒球队。以后读书就不怎么用功，凭些小聪明，这下成绩就直线下降。妈妈试图说服我退出球队，我却振振有词：打垒球，将来考第一医学院可以降低标准 20 分。妈妈生气了，打了我一巴掌。那是我记事起她第一次打我，她说我没出息不想靠自己努力，却靠别人降低标准。在她的“高压”下，我退出了球队，成绩恢复了正常。

回头看去，妈妈这一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尊、自爱、自信和自主的精神。对我，她也正是这样教育和要求的。

在我和事业之间，妈妈努力地平衡着。当时的我并不明白。如今自己有了两个孩子，才逐渐体会了她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的艰难。由于工作，她常去外地。每次出门时，操心的就是我的去处。我有自己的小朋友，很想请小朋友家里来陪我住，可以无拘无束，大闹天宫。可妈妈总不让，她不放心。于是就把我托给她所信任的成年朋友。托的最多的，是她的同事小钱姐。小钱当时正谈恋爱，只能出去“压马路”时也带着我这个“电灯泡”。

赶上我考大学，妈妈又必须出去开会。无奈之下，她将我在蚌埠的大姨接来，照顾我日常的生活。两个星期在家自由复习，我是真正的“自由”了。除了玩，就做数学题，因为数学也好玩。别的课全拉下了。临考前去学校接受教师的检查。才认清“现实”，大哭起来。最后是在老师的个别辅导下过了高考的那几天。复习一门，考一门。妈妈回来后，得知情况，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说。等通知那些天，她一直守着我，对我说，如果我这次考不上大学，她将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她在关键时刻离开了我。朋友劝她：孩子第一志愿是华东师大，你是师大出来的，有那么多朋友。去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让学校照顾照顾。妈妈却不。她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她不会为女儿去做。女儿的路要靠女儿自己走，不能靠妈妈，靠人情。平时还常去师大看望老朋友的她，那些天，却绝对不在校园内露面。没想到最后我竟然考进了师大生物系。接到通知的那天，妈妈笑啊，跳啊，比我还高兴、还得意。只是从此以后，她很少出去开会了。能推的就推，推不掉的，就自费将我带上。沾妈妈的光，我跑了很多地方，结识了不少朋友，这也是我生命一笔不小

的财富。

妈妈很重感情，和家乡的亲人一直保持着血脉相关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单单用钱可以衡量的。关于妈妈经济上帮助亲人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但这当中，妈妈所做的，并不仅仅是付出，也有得到。

妈妈不是个会算帐的人，没有能力在现有的钱中，过出最富足的日子来。因此我们曾经很穷，很苦，月底常出去借钱。但即使在那样的时候，妈妈也没有断过给家里寄钱。对她来说，这不是一种负担。她所要的幸福，永远不是自己吃的好穿的鲜，也不是伪善的施舍。她的快乐来源于对她所爱的人最实际的帮助。能使一家人生活有着，她再苦，心里也高兴。而我们的亲人，在那些苦难的岁月，又何尝少给过我们？姥爷、姥姥在政治上被困、经济上潦倒的情况下，养育了我十几年。舅、姨们既做我的老师，又做我的朋友，在我无父的童年生活中注入了多少爱和关怀！妈妈成名前后，在政治上一次次地被打击、委曲，是亲人的关爱使她过了一关又一关，走了一次又一次，由于妈妈家乡的亲人们对时事有了古朴小镇上少有的敏锐。每当风吹草动，就有一封封信从南照、颖上、蚌埠飞来，送来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妈妈和这个大家庭的交往，永远是双向的。家乡的亲人，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将妈妈的骨灰送回了南照镇，在姥爷身边安葬了。妈妈是淮河的女儿，终日在淮河与淮河之外的世界间来往奔波。她太累了，该回家歇着了。她和家乡的亲人、家乡的土地终于合为一体了。那一块开阔的黄土地，连着上面姥爷和妈妈的坟头，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捧回一把妈妈坟前的泥土。供在家中。南照，将比从前更是我梦系魂萦的地方。

妈妈也有惶惑的时候。她是人，面对人所面对的诱惑，有人的欲望和要求。但她总能克制和超越自己，为别人着想和付出。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不敢说她的境界是正常的。不管是当今的中国还是美国，多数人肚皮都被欲望胀得满满的。堂而皇之地拼命追求满足尚嫌不够，还谈什么克制、超越！就是我。也时有受到诱惑而动摇的时候。因此我常常开妈妈的玩笑，说她早生了一百年，太理想，太痛苦。其实我知道，即使是晚生一百年，妈妈仍会是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她大善良，大无私，她永远是属于未来的。我感谢妈妈用一生教了我。我努力做到和她一样，热爱亲人，热爱家庭、贡献、付出。这使我在欲海横流的现代社会里，能保持一块心灵的净土。

送走妈妈的时候，正好是我离开中国整整十年。这些天来，我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出国？为什么要离开她？如果我还在上海，就不会有今天的事。退一万步说，如果我不出国，她生命的最后十年也不会这么孤独。

可是妈妈从来不拦我。

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想去外地。我不喜欢上海。第一志愿准备报北京农业大学，因为我答应了当时下放农村但不会种地的姥爷，我要学农业，学成之后回去帮他科学种田。第二志愿想报山东海洋学院，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大海。海和诗总联在一起。我喜欢诗。跟妈妈商量，也看见了她眉目之间瞬间掠过的惆怅，可她说：好，自己去外面闯，有志气！后来还是一位叔叔，跑到我们家指着我的鼻子骂：丫头，你疯了？怎么能离开你妈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将志愿改成了上海。

最终却还是离开了妈妈，来到了更远更远的地方。

到美国之后，很是后悔。想念妈妈，舍不得妈妈。妈妈却总是说：咬咬

牙挺住，学成以后再回来，中国需要科学。但是一定要回来，因为中国人还是应该先把中国搞好。我学成了，拿到了生化博士，却在美国成了家，立了业。和妈妈原先约定的五年拖成了十年。这当中的理由，我说不清。总在等着更好的形势，总想等到妈妈的书能在国内自由出版的时候。总也没等到。

这一次，得知妈妈病重，我决定当天只身回国。临行前我对丈夫说，如果妈妈能挺过这一关，我们就举家回国定居。丈夫说好。

可是晚了，太晚了！

去凉城家中整理东西的时候，虽然公安局的人好心用报纸将现场遮住，我还是看见了墙上妈妈的血迹。点点滴滴，几天了，依然是鲜红的。我流不出眼泪。我怔怔地站在那儿，觉得自己的血全涌到头上，也快要涌出来了。我妈妈的血是红的！十几年来，自从《诗人之死》出版受阻，自从《人啊，人！》受批，自从妈妈被赶下她热爱的讲台，我心里有过多少次的冲动。想要这样对着世界喊，却始终没有喊出声。我三十二岁的生命里，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遗憾。

妈妈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教师（不是毒蛇猛兽）。她爱人，爱国（从来不想颠覆什么）。她的血管里，曾经流淌着殷红的鲜血。去了解她，了解她的作品，听听她的声音吧！我想对世人这样说。

我决定承担在国内出版妈妈作品的责任。不管是如何商海滚滚，心灵的呼唤，还是要听，该听的。

我得到了大多太多的朋友们的帮助，无价的帮助。我受到了多家出版社的积极呼应。妈妈没说错，中国在变，越变越好。也许不久，我们终于可以打起行囊，踏上归程？妈妈的女儿终于不再是茫茫海外漂泊人，妈妈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

我用鲜花和烛灯守卫妈妈的英灵，耐心地等着。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于芝加哥编后记

征求了多方面的意见，都未能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书名。确实，戴厚英曲曲折折的一生引起人们的思索绝不是单一的，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概括这些思索的书名。现在暂用这个书名，我们仍不认为是最好的。但这个书名显得有点儿朦胧，而朦胧也许恰好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一、戴厚英的成名作是《人啊，人！》。《戴厚英啊，戴厚英》正好与她的成名作呼应，这本书可以联想到那本书。

二、人格纯正、才华横溢的戴厚英竟死于一个人格卑微、委琐的小人之手，何其悲哀而又无奈。这个书名也许恰好表达人们用一两句话说不清的慨叹。三、戴厚英的才华与成就令人赞赏，而她的个人命运可说是自始至终的不幸。这个书名也许能表达人们既赞赏又悲叹，因赞赏而更悲叹的思绪。当然，书名重要却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书稿本身，作为编辑，掂量这部书稿我感到厚重，感到颇不一般，很权威、很全面、很真实，可以说是它的基本特点。

很权威，因为本书的作者包括了在戴厚英一生中几个关节点与她直接交往甚至进入她生活深处的亲朋很全面，因为本书反映了戴厚英一生各个阶段，方方面面的生活经历。

很真实，因为本书都是作者们与戴厚英的直接交往的实录，绝不借助于二手、三手的资料。

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真实的戴厚英，并从中获得应有的启迪。

本书的出版、编辑工作前后仅用了半个月，由于时间等种种原因，在工作中我们可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敬请大家谅解；一些该选入的稿件，未能编入本书，我们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对来自于戴厚英生前各个方面的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书责编

